中亚通史

现代卷

丁笃本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丁笃本 著

中亚通史

现代卷



ZHONGYATONG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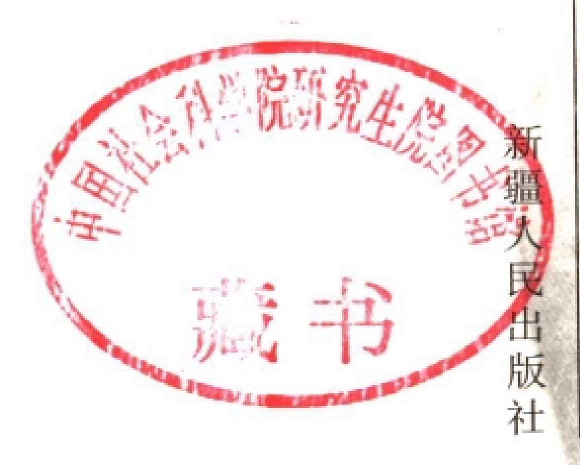
ISBN 7-228-08379-2 定价:30.00元

中亚通史

丁笃本 著

ZHONGYATONGSHI

现代卷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通史. 现代卷/丁笃本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

ISBN 7-228-08379-2

Ⅰ.中... Ⅱ.丁... Ⅲ.①中亚—通史②中亚—现代史Ⅳ.K3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837 号

国家测绘局审图批准号(2003)150 号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责任校对 钟 鸣 卢 艳

装帧设计 王 洋

地图编制 张惠琴

中亚通史 现代卷

丁笃本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0991-2816212

印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8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8-08379-2 **定价**:30.00 元

序 言

"中亚"，是"中亚细亚"或"中央亚细亚"的简称，其涵盖的地理范围在本书第一卷作了明确介绍。不过这里要说明，作为中亚现代史的本卷所涉及的中亚地理范围与前几卷稍有不同。本卷叙述的中亚现代历史是以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所统辖的中亚地区亦即今天的中亚五国为核心展开的，地理范围较前几卷可能稍小一些，但地理界限更明确了。对于阿富汗、中国新疆等中亚五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历史，不再独立成篇，主要从它们与俄（苏）属中亚地区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叙述，它们本身的历史进程主要作为上述双边关系的背景来介绍。正因为这种情况与前几卷有所不同，所以首先加以说明。

作为广义中亚地区核心部分的中亚五国，在本书叙述的年代（1914~1991年）不是作为独立的国家而存在，而是首先作为帝俄的属地，后来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出现的，所以准确地说，中亚现代史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内部的地域史。这样，现代中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无一不受俄国或苏联整体历史发展的制约。有鉴于此，本书免不了要对各个时期俄国或苏联全国的历史演进情况和重大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发生的中心地有时在远离中亚的欧俄）作些交代，因为非如此不能把中亚现代历史阐述清楚，读者们也不能对此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点有必要加以说明，由于中亚长期处于俄国与苏联

的版图之内，因此俄罗斯文化给中亚现代历史的发展打下了相当深的烙印，比如中亚居民姓氏、名字的俄罗斯形式化，改用俄文字母标音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会说俄语等等。鉴于这种情况，本卷在用外文标示中亚地区的人名及其他专有名词时不再采用拉丁字母，而统统采用俄文（尽管中亚五国到30年代末才普及俄文字母），只是在标示外国人名（如阿富汗等）才采用拉丁字母。而且，在书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只在每章第一次出现处用外文标示。

本书对人物姓名的俄文标示一般视他们的民族习惯而定。书中凡是中亚五国土著穆斯林的姓名，都力求标示出其姓氏和教名的全部。如阿里汗·布凯汉诺夫（Алихан Букейханов）、图拉尔·雷斯库洛夫（Турар Рыскулов）等等。而书中出现的俄罗斯人，一般只标出姓氏的全部和教名、父名的第一个字母，如古比雪夫（В. В. Кубышев）、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等等。还有，有些穆斯林的教名查不到全称，就只好用头一个字母代替，有些完全查不到，也就只好省了。俄罗斯人也一样，查不到教名和父名的，就只能标出姓氏，如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东路军司令员潘菲洛夫（Панфилов）。有些人名是从中国出版物获得的，而且译法不规范，因此连俄文姓氏也无法标出，如俄国驻新疆外交官迪牙阔夫之类。这些缺憾只能待以后寻找机会弥补了。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亚的影响

第一节 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中亚概况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俄国中亚地区，与今天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该地区总面积约为400万平方公里，东面与中国相邻，南面同阿富汗、伊朗接壤，西濒世界最大的内陆湖里海，北面沿一条漫长的边界线和俄罗斯本土相接。同当年相比，中亚地区的东、南、西三面边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北面这条界线有所变更。

1914年时中亚地区的北界大致走向如下：自西向东依次为乌拉尔河中下游河谷—托博尔河上游河谷—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后改名彼得罗巴甫尔，今克孜勒扎尔）—鄂木斯克—额尔齐斯河河谷。今天，这条界线乃是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国界，它是1925年划定的。比起1914年的界线来，其西段向俄罗斯境内西移了，靠近了伏尔加河下游，即把原布克汗国的草原区划给了哈萨克；奥伦堡地区的边界向哈萨克斯坦境内南移了，奥尔斯克以东则向哈萨克斯坦境内东移了，鄂木斯克附近也是向哈萨克斯坦境内南移了；东段自塞米巴拉金斯克城（今塞梅伊）沿额尔齐斯河而上至纳雷姆山脉再至中国边界的这条界线向俄罗斯境内北移了。

如果说中亚地区同外界接壤的边界自1914年以来没有多大变化的话，那么中亚地区内部的行政区划则是几经变更，已经面目全非了。首先，介绍1914年即第一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中亚地区内部的行政区划。

19世纪中后期，俄国一步步加紧征服中亚各地，同时，在其征服地区陆续划定新的行政区域，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统治，期间并且不断地进行过一些调整。到大战前夕，中亚地区分为南北两大区域。按照1891年俄国政府颁布的管理章程，中亚北部以游牧为主的哈萨克大草原东半部归草原总督区管辖，首府设鄂木斯克；西半部则直属俄国内政部；中亚南部以农耕为主的山地、河谷、沙漠、绿洲地区归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亦译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管辖，首府设塔什干。此外，位于突厥斯坦总督辖区中的阿姆河流域还有两个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君主国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不过两个君主国的版图比俄国入侵中亚之前也缩小了。由于南北两个区域差异比较明显，所以不少沙俄时期和前苏联时期的文献将南部区域称为中亚，北部区域则称为哈萨克斯坦。西方有些作者也采用这种说法。

归草原总督区管辖的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分成两个省：阿克莫林斯克省（省会设在该省以外的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省会塞米巴拉金斯克）。直属俄国内政部的哈萨克斯坦西部两个省为乌拉尔斯克省（省会乌拉尔斯克，今乌拉尔）、图尔盖省（省会设在该省辖区以外的奥伦堡）。[①]归突厥斯坦总督区管辖的中亚南部地区共分为五个省，它们是东北部的七河省（音译谢米列契耶省，省会维尔内，今阿拉木图）、北部的锡尔河省（省会塔什干）、东部的费尔干纳省（省会浩罕）、中部的撒马儿罕省（省会撒马儿罕）和西南部的外里海省（省会阿斯

① 不过，上述四省一般仍被统称为草原区，本书头几章中的“草原区”即包括这四个省。

哈巴德，今阿什哈巴德）。此外，布哈拉酋长国的首都为布哈拉城，希瓦汗国的首都为希瓦城。俄属中亚地区的这种行政区划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几年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按照19世纪俄国政府颁布的中亚管理条例，中亚各省均划分为若干个县，县下面设乡，乡下面设村。其中乡的划分或按地域，或按血缘。以农耕为主的突厥斯坦边区多按地域划乡，而以游牧为主的草原边区按血缘划分的则不在少数，但是有些部落氏族被分割划入不同的乡村。

当时中亚地区的总人口约为1300余万，由于自1897年人口普查以后，沙皇俄国一直没有再进行人口普查，因此难以得到准确的数据。据有关资料，1911年北部草原区四个省的总人口383.4万人，而突厥斯坦边区五个省的总人口为611万。[①]二月革命前，布哈拉汗国的人口约为250万，希瓦汗国的人口60余万。[②]中亚地区的总面积有400万平方公里，当时每平方公里平均居民只有3.2人，是个地广人稀的区域。中亚地区居民的分布也是很不均衡的。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高寒山区、卡拉库姆沙漠人口稀少，哈萨克大草原也差不多。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东部的山间河谷和某些沙漠绿洲，人口才比较稠密，人口最为稠密的是位于天山和阿赖山之间的费尔干纳盆地。

当时中亚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为乡村居民，城市人口很少。1911年，突厥斯坦的城市人口只占边区居民总数的16.3%。[③]草原区的城市人口比例更低，不到10%。[④]而且大城市不多，最大

①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1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另有资料称：战前突厥斯坦676.1万人，布哈拉汗国360万人，希瓦汗国80万人。

③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9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④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9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1926年哈萨克城市人口比例仅为9%，而当时城镇人口较多的七河省已划入哈萨克。

的城市塔什干1914年的人口为27.1万，突厥斯坦其他城市人口很少超过10万，如浩罕为12万，撒马儿罕9.8万，安集延8.7万，纳曼干8.1万，维尔内4.3万。[①]草原区城市规模更小，1911年没有一个城市人口上了5万。乌拉尔斯克有4.6万居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有4.3万人，塞米巴拉金斯克有3.4万人，库斯塔奈有2.5万人，而阿克莫林斯克（后陆续改名为切尔诺格勒、阿克莫拉，今阿斯塔纳，为哈萨克斯坦新都），只有1.4万人。[②]

中亚地区民族成分相当复杂，1300余万居民由十多个民族组成。它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当地土著民族，外来移民主要是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斯拉夫各族人。

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造就了错综复杂的民族结构。一方面，中亚境内多山地、草原、沙漠，这些地理单元相对封闭，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与外界交流不多，因而形成了具有不同体征、不同文化习俗的居民族群。另一方面，中亚地处东西方文明交会处，那里的关隘、河谷、绿洲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史上一浪又一浪的民族迁徙或匆匆而过，或留于此。经过上述两大因素长期相互作用，演化出了现代中亚的民族万花筒。

现代中亚各土著民族，是上古中亚居民与后来进入的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长期融合、分化而形成的。但是，由于中亚地区近代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直到20世纪初期，这里不同的居民族群没有像欧洲的居民族群那样演进为近代民族集团。居民们缺乏起码的民族意识。他们各自的体征、语言、文化、风习等特征，一方面被淹没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之中，因此他们在很多场合都通称为穆斯林。另一方面被部落、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98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0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氏族等更小的族群所分割，因此他们也常常自称为某某部落人。实际上到大战前夕，中亚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比较确定的现代民族，而且俄国政府在1897年的人口普查和1911年的人口调查工作中使用了这些民族的名称。[①]只是这些民族的居民不太用它们来界定和称呼自己而已。

根据中亚土著居民不同的体征、语言、文化及不同的居住地域和生产生活方式，可以划分为哈萨克人（казахи）、吉尔吉斯人（киргизы）、乌兹别克人（узбеки）、土库曼人（туркмены）、塔吉克人（таджики）以及卡拉卡尔帕克人（каракалпаки）、维吾尔人（уйгуры）、东干人（дугане）等多个民族。不过，这些族名到20世纪20年代才最后确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民族的聚居地域自那时以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哈萨克人是“迁走者”乃至“自由人”的意思。16世纪初，月即别人的一支脱离主体，游牧于中亚北部大草原，因此称为“哈萨克人”。俄国的历史文献在17世纪以前就出现了“哈萨克”一词，也是用来称呼草原上的游牧居民。可是从18世纪以后，俄国学者把哈萨克人讹称为“吉尔吉斯人”，意谓草原上的游牧人。后来，无论俄国官方还是民间，乃至其他欧洲国家的文献，都多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人。直到1925年，哈萨克民族才恢复自己原来的名称。

哈萨克人主要分布在锡尔河中下游和天山山脉以北的广袤草原和低丘地区，即当时的草原区四省（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突厥斯坦的七河省、锡尔河省，亦即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中亚其他地区均有哈萨克人聚居，其中又以今乌兹别克斯坦最多，主要在塔什干附近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04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以及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布哈拉州和撒马儿罕州等地。其次，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境内有少量哈萨克人。除中亚外，不少哈萨克人居住在今俄罗斯与哈萨克毗邻的阿斯特拉罕州、奥伦堡州、鄂木斯克州、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共和国等地。中国境内也生活着很多哈萨克人，分布在新疆以及甘肃、青海的西北部，现在新疆设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此外，蒙古国西部也有少量哈萨克牧民。

吉尔吉斯人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经过几次南迁，从南西伯利亚草原来到天山地区，途中不断融入其他民族的成分，于18世纪逐渐形成现在的吉尔吉斯族。

前面提到过，哈萨克人长期被俄国人称为吉尔吉斯人，而真正的吉尔吉斯人却被他们称为“卡拉吉尔吉斯人”。有时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被混为一谈。1911年的俄国人口调查甚至没有单独列出卡拉吉尔吉斯人，他们包括在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一栏中去了。也是到1925年，吉尔吉斯民族才恢复自己真实的名称。

吉尔吉斯人在中亚的分布原来比较广阔。19世纪中，吉尔吉斯人居住的卡拉捷金地区（今塔吉克斯坦西部）被塔吉克人所挤占。因此，到1914年前后，吉尔吉斯人主要集中居住在天山以及其西延山脉地区，即当时的七河省南部、费尔干纳省的北部和东部，亦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在中亚其他地方，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和塔吉克斯坦北部有较多的吉尔吉斯人，而哈萨克斯坦尤其是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人就不多了。中亚之外的吉尔吉斯人散居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有一些。在中国新疆西南部有不少吉尔吉斯人聚居，不过中国政府确定的汉译族名叫“柯尔克孜族”。现在新疆设立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另外，在伊犁地区的昭苏县和特克斯县也有少量柯尔克孜人聚居。蒙古国西北部也有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不

过被称作“霍顿人”。此外，在阿富汗的东北部山区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山区也有一些吉尔吉斯居民。由于高大的天山横亘境内，即使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吉尔吉斯人也明显分为南北两群。居住在天山山地、伊塞克湖区、楚河和塔拉斯河谷的吉尔吉斯人是北方吉尔吉斯人，而居住在费尔干纳盆地、阿赖山河谷和帕米尔高原的吉尔吉斯人是南方吉尔吉斯人。

乌兹别克是中亚土著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其先民是北部大草原上的金帐汗国的遗民月即别部（“月即别”是“乌兹别克”的异译）。15世纪末以后，月即别部大举南迁，定居在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与当地原住民族融合形成了农耕的乌兹别克族。不过，当时还有相当部分的乌兹别克人以“萨尔特人”自称，另有不少仍以“突厥人”自称。

乌兹别克人主要聚居在中亚两条大河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特别是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即当时的撒马儿罕省、锡尔河省的东南部、费尔干纳省的西部和中部、布哈拉汗国的西部和中部、希瓦汗国的阿姆河沿岸，亦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是当时突厥斯坦总督区和布哈拉酋长国、希瓦汗国的主要民族。在中亚其他四个国家，均有不少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今天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人较多，他们主要聚居在南部的基萨河谷和北部的山前地带。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人主要分布在锡尔河上游和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奥什地区。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人大多居住在同乌兹别克毗邻的南部锡尔河流域。在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中下游流域，也有不少乌兹别克居民。此外，有不少乌兹别克人散居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阿富汗北部居住着很多乌兹别克人，成为该国第三大民族。中国新疆的喀什地区也分布着少量的乌兹别克人。

“土库曼人”一词出现也比较早。10世纪末的阿拉伯文献



就有土库曼人的记载，不过是指屯垦中亚农耕区边境的讲突厥语的部落。[①]后来，这些部落主力西征，“土库曼人”则成了咸海—里海草原部落居民的称呼，他们是乌古斯人与其他突厥语民族融合而成。16~17世纪，土库曼人不断向南迁徙，民族逐渐定型。可是在18~19世纪之交的俄国文献中，土库曼人被讹称为“特鲁赫明人”。直到20世纪初，土库曼人把自己也把周边一些突厥语部落称作“土库曼人”。

土库曼人主要分布在阿姆河中下游、卡拉库姆沙漠各绿洲，即当时的突厥斯坦外里海省的中南部，希瓦汗国大部分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境内。此外，中亚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较多土库曼人，主要在西部。塔吉克斯坦也有一些土库曼居民。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土库曼人很少。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也有少量的土库曼人。但是在伊朗东北部和阿富汗西北部有为数不少的土库曼人。

塔吉克可以说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居民。11世纪西迁中亚的突厥人将当地定居的穆斯林称作“塔吉克人”。乌兹别克等民族进入河中地区以后，塔吉克人不断向东部山地河谷迁徙，挤占吉尔吉斯人居住的卡拉捷金地区，血统中也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

塔吉克人主要聚居在阿姆河上游的高山河谷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地区，即当时的费尔干纳省的南部和布哈拉酋长国的东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境内。此外，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以及东部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塔吉克人居住。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塔吉克人较多，哈萨克斯坦南部也有少量的塔吉克居民。同样，在俄罗斯境内有塔吉克人散居着。

① С.П.托尔斯托夫等：《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民族志》第2卷，第28页，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

阿富汗东北部的山地河谷是塔吉克人另一聚居地。塔吉克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此外，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也有一些塔吉克居民。中国新疆在西端的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除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五大民族以外，还有一些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

卡拉卡尔帕克人的先民早就生活在里海—咸海岸边，各部落当地无统一名称，直到1924年才正式定名为卡拉卡尔帕克人。绝大多数卡拉卡尔帕克人聚居在咸海以南的阿姆河平原和沙漠绿洲，当时的锡尔河省西南部和希瓦汗国的北部，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境内。其余多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地方以及土库曼斯坦境内。此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以及阿富汗境内也有少量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分布。

中亚的维吾尔人是19世纪从中国新疆移民过来的，首先到达浩罕汗国。1881~1883年，又有45300多名维吾尔人辗转来到七河省定居。当时，生活在中亚的维吾尔人并无统一的民族名称，他们多以迁出地自称，如喀什噶尔人、吐鲁番人、阿克苏人、莎车人等等。直到1921年在塔什干举行维吾尔民族代表大会以后，才统一定名为维吾尔族。①

维吾尔人主要聚居在中国新疆。在中亚，维吾尔人成点状分布在靠近中国的天山南北麓地带。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较多，居住在春贾（为维吾尔区行政中心）、伊塞克、奇利克和潘菲洛夫（今扎尔肯特）。吉尔吉斯境内的维吾尔人分布在山区若干居民点及某些城镇。乌兹别克境内的维吾尔人主要居住在费

① С.П.托尔斯托夫等：《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民族志》第2卷，第489页，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

尔干纳盆地的安集延地区。中亚其他两个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很少有维吾尔人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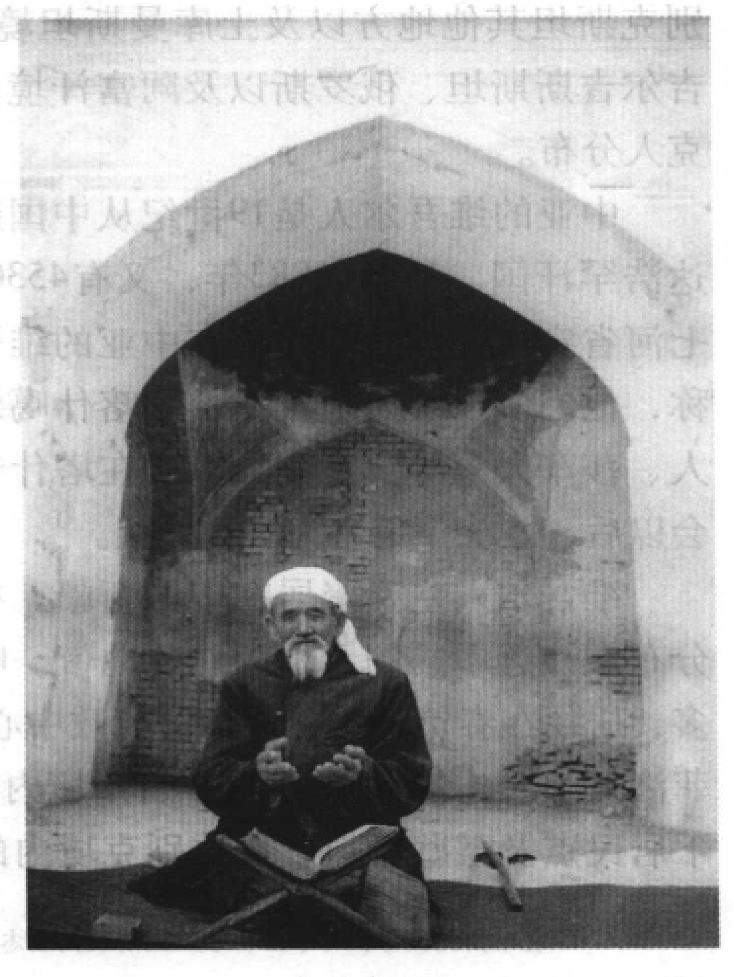
东干是中亚的一个特殊民族。东干人的先人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居民。19世纪后期，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发生回民起义，遭到清朝政府镇压后，起义者残部不断西迁。19世纪七八十年代，约6000名回民越过中国新疆西部边界，抵达中亚楚河流域。他们定居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乡村中，被称为东干人。

从人种学来看，除东干人属蒙古人种（黄色人种）外，其他中亚各土著民族都属于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与蒙古人种的过渡类型。

哈萨克人尽管居住地域辽阔，但各地的哈萨克人外表看上去差不多，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成分比较均衡，属南西伯利亚人类型。

吉尔吉斯人的体征与哈萨克人差不多，只是蒙古人种的成分要更多一些。在吉尔吉斯民族内部，南方吉尔吉斯人的蒙古人种血缘要少一些。

由于河中地区历来为各民族进退经由之地，所以从人种学的特征来看，乌兹别克人较之中亚其他民族更为多样化。


中亚东干人

总的来说，乌兹别克人是古代中亚河中居民的典型后裔，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较蒙古人种的特征明显一些。乌兹别克人按体征可以分为三个族群：第一个族群的血统主要来自自古以来定居在乌兹别克境内河谷地区的居民，多称“萨尔特人”。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和1911年人口调查均有“萨尔特族”栏目。他们高加索人种血统较多。第二个是统称为“突厥人”的族群。1897年人口普查有“突厥族”栏目，1911年没有，多归人乌兹别克族，居民血缘主要来自15世纪以前西迁来中亚的突厥人后裔，蒙古人种成分较前一族群稍多。第三个是游牧或半游牧的乌兹别克族群，其血缘主要来自南下而来的月即别部，蒙古人种血缘更多一些，几乎与高加索人种血缘相当。①

土库曼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比起上述各民族更加明显一些，属于地中海人类型，但是仍然保留了少许蒙古人种的血缘成分。

在中亚所有土著民族中，塔吉克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最为明显，尤其是山区塔吉克人只稍带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而平川地区塔吉克人的蒙古人种特征要明显一些。

卡拉卡尔帕克人的人种特征介于乌兹别克人与哈萨克人之间，不过更加接近后者一些。在维吾尔人身上，蒙古人种的特征和高加索人种的特征也表现得比较均衡。

中亚地区土著民族所讲的语言不是很复杂，但是也比较丰富，分属阿尔泰语系的东、西突厥语支和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波斯语支）。上古中亚人主要讲古波斯语，后来突厥人迁人，突厥语逐渐成为中亚主要语言。其他征服者如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语言成分也对中亚民族语言的定型产生过一些影响，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等同属突厥语支系，

① С.П.托尔斯托夫等：《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民族志》，第1卷，第166页，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

因此差别不是很大，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困难不大。只有塔吉克语属于伊朗语支系。

哈萨克人所讲的哈萨克语（当时俄国人称为吉尔吉斯语）属于西突厥语支的钦察语族。哈萨克人居住的地域辽阔，因此哈萨克语又形成了东北、南方和西方三种不同的地方方言。吉尔吉斯语同样属于钦察语族，由于境内高山纵横，形成了南北两大方言系统。卡拉卡尔帕克语也是钦察语族下的一个语种。乌兹别克语属于西突厥语支的葛逻禄语族，本身又可分成几种方言。

土库曼人讲的土库曼语属于西突厥语支的乌古斯语族。维吾尔语属于东突厥语支的察合台语族，与乌兹别克语比较接近。

在中亚土著民族中，塔吉克人所讲的语言与众不同。塔吉克语不属于突厥语，而是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支的西伊朗语族。但是也有不少塔吉克人会讲乌兹别克语，还有帕米尔高原上的某些塔吉克人讲雅格诺布语，后者是不属于突厥语和伊朗语的东方语种。

东干人直到20世纪前期还普遍讲汉语，属汉藏语系。当时所谓的东干语实际上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方言，而且，吉尔吉斯境内的东干人多讲甘肃方言，而哈萨克境内的东干人多讲陕西方言。

所有的中亚土著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最先接受伊斯兰教的东南农耕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最深，反之，接受伊斯兰教较迟的哈萨克大草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要明显小得多。

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落后。俄国政府虽然设置了省、县、乡、村各级行政区划和相应的机构，但是传统的部落等社会组织仍然保持得相当完整，而且保留着不少行政职能，这种现象在游牧的民族和部落中尤为突出。例如，土库曼人分散、封闭的氏族部落组织长期保持原貌，直至十月革命才发生变化。卡拉卡尔帕克人的情形也差不多。

当时，中亚地区绝大多数居民仍然从事传统的农牧业生产。在哈萨克大草原和七河省北部，哈萨克人以及吉尔吉斯人基本

上都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只有少数定居下来的农牧民。在突厥斯坦的七河省南部和锡尔河省，定居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明显增多了，但仍有不少人停留在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方式。而在费尔干纳省，定居农耕的吉尔吉斯人超过了游牧的人数。1917年革命前夕，该省36.2万吉尔吉斯人当中，定居及半定居者达到了20.6万。①

主要聚居在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人基本上是一个农耕民族，而且大多依赖历史悠久的传统灌溉农业。但是在西北沙漠草原地区，也有游牧半游牧的乌兹别克部落。居住在平川地区的塔吉克人多以农耕为生，而帕米尔高原山区的塔吉克人仍然在游牧。

生活在卡拉库姆沙漠地区的土库曼人部落维持着祖先四处游牧的传统，而生活在阿姆河灌区和南部绿洲的土库曼人则主要从事定居农业。1913年，土库曼地区共有水浇地30万公顷。卡拉卡尔帕克人基本上从事游牧，而维吾尔人和东干人都是定居河谷的农耕者。

此外，居住在中亚各个城市里的穆斯林多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

应当注意，当时中亚的居民除了土著的穆斯林以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民族集团斯拉夫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 русские ），其次是乌克兰人（ украинцы ），另有很少的白俄罗斯人（ белорусы ）。

斯拉夫移民是随着俄国对中亚的征服而来到中亚的。他们自北向南，不断迁徙，最后到达中亚几乎每一个县。这股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移民潮源自两个方面的动力。首先，沙皇政府为了巩固对新近征服的中亚的统治，认为必须移民。这一点在征服初期表现得比较明显，因此最早来到中亚草原的移民是兵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农合一的俄国哥萨克。其次，为解决俄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当局允许甚至鼓励俄罗斯农民移居中亚进行垦殖，不少农民为了得到土地，主动来到中亚定居。

早在18世纪初，第一批俄罗斯移民就出现在哈萨克草原上。19世纪后期，俄国农奴制改革的结果虽然导致广大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却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土地，于是出现了向中亚大草原移民的高潮。1896年俄国政府设立各级移民局，移民进展继续加快。从1905年革命失败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前后，中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1911年，中亚的斯拉夫移民总数接近200万。[①]大战前夕则突破了200万，占中亚地区总人口15%以上。而草原总督区所辖四省移民人数比例高达40%以上。1911年，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四省383.4万居民中有154.4万是来自欧俄的移民。[②]

以俄罗斯农民为主的斯拉夫移民主要集中在哈萨克大草原，草原四省的移民占中亚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三还多，如果再加上七河省（那里也是以草原为主）的20.4万移民，则占到移民总数的87.4%。[③]草原区之所以吸纳了如此多的欧俄移民，一方面是因为地理位置接近俄国内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而且地广人稀。

除农民之外，大批的俄罗斯商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知识分子、投资者，还有官吏、军人来到中亚，他们大多居住在中亚各个城市当中，或者以他们为主形成了新的移民城市。在城市较多的突厥斯坦，战前40多万欧俄移民中有将近一半（18万）居住在城市或工矿城镇。此外，布哈拉酋长国的5万俄罗斯人和希瓦汗国1万多俄罗斯人基本上生活在城市里。[④]

①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③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④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7页，第77~78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在中亚许多古老的城市，如塔什干、撒马儿罕、浩罕、布哈拉等，这时都辟有专门的欧俄移民居住区。此外，一大批新兴的移民城市拔地而起，如塞米巴拉金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阿克莫林斯克、奥尔斯克（今属俄罗斯）、克拉斯诺沃茨克（今土库曼巴希）、维尔内、阿斯哈巴德（今阿什哈巴德）、斯科别列夫（今费尔干纳）、佩罗夫斯克（今克孜勒奥尔达）等等。

欧俄移民讲俄语，很少有人能通中亚本地民族语言。他们信奉东正教，因此移民们在文化方面与本地穆斯林显得格格不人。不少移民特别是官吏、军官、富商自以为比土著居民高人一等。他们支持沙皇政府在中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俄国政府已经在中亚建立起类似殖民统治的民族压迫制度。俄国统治集团把中亚广大穆斯林土著居民视为“低等人”。俄国的黑帮分子和一些反动官吏更是把哈萨克大草原上的各族人民称为“成吉思汗和跛子帖木儿的后代”，叫嚣要像美国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来消灭他们。

总的来说，俄国沙皇政府在中亚实行的是一种殖民统治体制。不过，对中亚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俄国的具体统治方式也有所不同。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分而治之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中亚地区十分复杂的民族、宗教、生产方式等现实需要。此外，在征服中亚过程中遇到的不同反应也是俄国政府具体选择何种统治方式的一个考虑因素。一般来说，在传统势力相对薄弱和移民最多的草原区，俄国政府进行直接治理的成分要明显一些。而在传统势力强大、欧俄移民又少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当局对当地传统权威的依赖性则更强一些。尤其是在乡、村两级机构中，本地人任职的比例较高。对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俄国政府只是从外交和防务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控制。

但是，无论在草原区还是在突厥斯坦总督区，都不是像俄国内地那样实行文官治理，而是实行军事外独裁统治。所有的

总督和省督均由沙皇直接任命，而且无一例均由军人担任。两位总督直接对国防大臣负责，省督则对总督个人负责。担任县级行政长官的也是军人，一般不称县长，习惯叫指挥官。他们往往凭借其统领的军队对所辖区域实行武力控制，不仅负责安全事务，而且负责所有行政和民政事务，其中包括赋税的征缴。

在中亚，尤其是在突厥斯坦，俄国政府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新的行政系统。原来中亚各地的行政系统很不一致，基层行政单位更是五花八门。俄国征服中亚后，虽然普遍重新进行了行政区划，不少部落活动区改划为乡、村，但是传统机构仍然对基层行政活动发挥着较大影响，某些偏远地方实际上完全沿袭旧制。

在当时的中亚，县级以上的机构一般由俄国官吏把持，而基层行政机构负责人仍然多由土著居民中的头面人物担任。而且，1891年政府颁布的条例加强了乡长和村长的权力。条例规定，乡长以及村长负责向居民征收赋税，管理户籍，执行政府的法令和法院的判决。①

俄国征服中亚以后，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虽然没有像浩罕汗国那样被俄国兼并，但是实际上丧失了独立，沦为了俄国的附属国，而且版图也明显缩小了。在名义上两个汗国由它们原先的君主布哈拉埃米尔和希瓦汗进行统治，实际上俄国官员握有很大的支配权。他们代两国对外进行交往，俄国驻军严密监视着两国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不过，在内政方面两国的君主和政府尚保留了相当多的权力。而且，两国原先自上而下的一整套行政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这些机构除了原有的职能以外，统统都增加了一项重要的职能，那就是替俄国政府在两国境内征收贡税。

在俄国的中央机构，沙皇政府也安排了少许中亚居民的代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409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表装点门面。在1906年5月产生的第一届国家杜马（Дума）488名议员中，共有36名穆斯林代表，中亚及邻近地区的代表占14名。但是由于政治方面混乱的原因，中亚的杜马代表没有参加杜马的会议和工作。

中亚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的活动比较活跃。1907年3月选出的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中，中亚穆斯林有10人当选（全国共有31名穆斯林代表），其中草原边区4人，突厥斯坦边区6人。他们同其他穆斯林代表在杜马中组成穆斯林集团。在政治上，该集团附和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温和方针，同时为实现中亚人民的民族权利而呼吁。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届杜马只存在了3个月就遭到解散。从此，俄国进入了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П.А. Столыпин）的专权时期，按照新颁布的选举法，进入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年11月召开）的穆斯林代表人数减少到10人，其中没有中亚的代表。①

尽管俄国政府在中亚建立近代政治统治机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对教会组织及其影响的干预却收效甚微。众所周知，所有的中亚土著居民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俄国征服之前的中亚各地政权虽然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是伊斯兰教及教会对本地政治生活的介入程度和影响能力是不容低估的，至于宗教对当地居民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就更不用多说了。

俄国征服中亚以后，对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乃至风俗习惯一般不过多地进行干预，基本上一仍其旧。此外，教会还继续垄断着居民的大部分教育。在俄国征服之初，伊斯兰教会依旧握有对当地穆斯林的司法权力，诸如审讯决案、调解纠纷等多由教会定夺。沙皇政府允许教会保留上述职权，并不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是为了求得安定，因为教会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实在太大了。实际上，俄国的宗教信仰是不平等的。

①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91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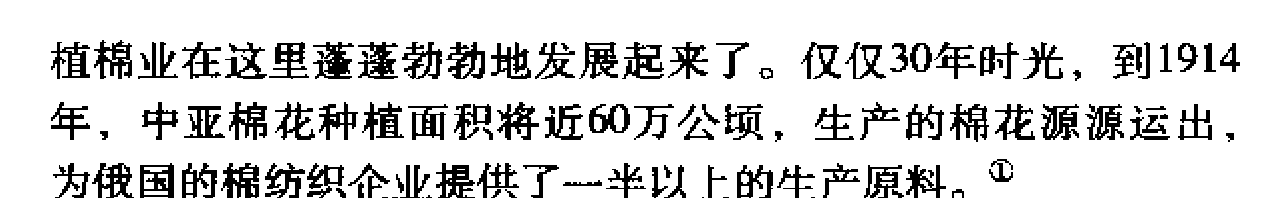
由于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因此所有不信东正教的居民包括穆斯林都被视为二等公民。

俄国征服者在中亚地区逐渐站稳脚跟以后，就开始对伊斯兰教会的各种权力进行限制。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当局着手在中亚各地逐级建立以“帝国法律”为基础的审判机关。1886年，俄国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在突厥斯坦总督区同时建立两套法院系统，即新型的帝国法院和传统的民族法院。前者依据现行的帝国法律进行案件审理，后者进行审判的依据仍然是当地古老的习惯法和伊斯兰法典。后来，政府又颁布新的法令进一步限制传统法院的权力。但是要看到，在落后的中亚地区特别是在广大乡村，传统法院仍旧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案件审理，法官的酬金还是像以往那样从收取的诉讼费中提取。

1891年颁布的政府条例进一步对教会进行约束。它规定每个乡只能保留一名专职的伊斯兰教士，居民们如果是出于自愿，可以供养清真寺和其他教会人员，但是禁止教会强迫信徒们这样做。由于中亚地域辽阔，交通闭塞，伊斯兰教会的权力和影响根深蒂固，俄国政府的权力远不能遍及各个角落，因此上述法令和条例在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了。

如果说沙皇俄国的征服对中亚居民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俄国的统治对中亚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的冲击和影响就不容低估了。俄国的征服和统治给中亚多少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方式，对中亚传统经济体制的冲击和改造从此没有间断，而且一步步深入下去。

新的生产方式的冲击首先表现在新兴植棉业在中亚迅速勃起。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尤其是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等河谷地区，气候比较干燥，土地十分肥沃，灌溉相当发达，非常适宜棉花生长，而且棉质优良。以往，集中在欧洲地区的俄国棉纺织企业依赖美国出产的棉花做原料，每年的进口量很大。1884年，美国的良种棉花首次在中亚引种成功，于是



植棉业在这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仅仅30年时光，到1914年，中亚棉花种植面积将近60万公顷，生产的棉花源源运出，为俄国的棉纺织企业提供了一半以上的生产原料。[①]

植棉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亚的粮食播种面积锐减。这样一来，使得过去粮食完全可以自给的中亚地区不得不从外地，主要是从俄罗斯的产粮区输入大量粮食。大量的棉花从中亚运往欧俄地区，而大量的粮食从俄国其他地区运进中亚，这一出一进，促使中亚地区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同时促进了资本积累和外资流入，从而使得中亚的近代工矿业诞生和发展起来了。

最初发展起来的中亚工业部门是棉花加工（轧花、榨棉籽油等）、肥皂制作、葡萄酒酿造等初级加工行业。采矿业也随之兴起，主要有费尔干纳省的克孜勒基亚煤矿、苏留克塔煤矿，外里海省切列肯半岛的石油开采和里海盐矿等等。除了初级加工业和采矿业以外，当时中亚很重要的一个产业部门就是铁路修筑和运输业。战前，中亚总共雇佣的3.2万名产业工人中，铁路工人就占了1.5万人，矿业有1.45万人。[②]电力工业也发展起来了。1914年，中亚的多数城市都有了发电设备。[③]

但是总的来说，中亚的工业还是很落后的，主要表现在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合理。比如，中亚盛产棉花，却没有一家纺织印染企业，只有轧花厂一类的初级加工企业，而且绝大多数企业是俄罗斯人投资及国家兴办的。此外，当地人进入工厂、矿山做工的人很少。据统计，战前中亚采矿业雇佣的1万多工人当中，俄罗斯人占45.6%，外地穆斯林占34.4%，当地的穆斯林只有18.9%。[④]

---

① 阿尔希波夫：《中亚共和国》，第86~87页，莫斯科1930年俄文版。

②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80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③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70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④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181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中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进一步促进了现代交通的发达。早在19世纪后期，俄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中亚的统治，同时为了增强在南部边疆同英国的抗衡力量，开始修筑连接中亚和俄国内地的铁路。同时，中亚越来越多的棉花等农矿产品需要运到俄国其他地方，而中亚短缺的粮食、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品需要从俄国其他地方运进来，这种情况加速了中亚的铁路修筑。迄至1906年，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从里海东岸克拉斯诺沃茨克经阿斯哈巴德、谋夫（今马雷）到撒马儿罕再到塔什干的两大铁路干线先后建成。此外，还修筑了通向费尔干纳产棉区（经浩罕至安集延）和克孜勒基亚煤矿的铁路支线。大战期间，从新布哈拉（今卡甘）经卡尔希到阿富汗隔河相望的铁尔梅兹支线修通。此外，一项重大的铁路工程项目全长2000公里的土西铁路（从突厥斯坦的阿雷斯经维尔内至西伯利亚的鲁布佐夫斯克）也于大战前夕动工兴建，1915年通车到奇姆肯特（今希姆肯特）。

这样一来，长期封闭的中亚地区同俄国其他地区的各种联系（尤其是经济联系和人员来往）变得越来越密切，这无论是对中亚还是对俄国本土都带来了积极效果。同时，这种联系的加强全面影响着双方的各种相互关系，由此开始形成的中亚和俄国本土的关系格局，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夕都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中亚同俄国内地联系的不断密切，使得俄国政府对中亚地区的控制不断加强，结果导致中亚居民的赋税负担不断加重，这也是对中亚原来的经济生活方式的一大冲击。俄国当局对草原地区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牧民征收所谓"天幕税"，税额不低。同时，以务农为主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承担的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而且税额比俄罗斯人同类税种高出数倍。例如，早在1868年，俄国政府就规定草原区哈萨克居民每户年纳税额由1.5卢布增至3卢布，另外增征1.5卢布的人

头税。[1]而且以后的税额还在不断增加。这种货币税的征收和推广对中亚传统农牧业的分化瓦解作用越来越强，使千百年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中亚农牧民开始卷入市场经济活动。

俄国征服之前，中亚的社会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很不平衡，不少居民还生活在部落氏族阶段。但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业发达的河中地区和山间河谷，社会阶级分化也相当明显。封建贵族、巴依（Бай，地主、高利贷者）以及伊斯兰教会拥有大量土地，而贫困农民的耕地很少，只得租地耕种，甚至沦为雇农。俄国征服后近代工业和交通的发展、植棉业引起的农业商品化等因素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中亚地区的阶级分化，土地的集中趋势越发加剧，不少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进了工厂，或上了铁路工地，成了工人。此外，不少无地农民成了无业游民。

在游牧区域，社会阶级的分化不如农耕区那么强烈，但是部落首领们占有的牲畜越来越多，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也不断提高，贫困牧民的处境则每况愈下。

俄国征服给中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同时，不能忽略一个更加重要的后果，那就是随着大量斯拉夫移民蜂拥而至，使得很多原中亚居民的土地转移到了移民手里。这一巨变不仅改变了中亚原有的民族结构和土地分配格局，而且大大激化了中亚社会的各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后中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亚地区尤其是北部的哈萨克大草原地广人稀，肥美的牧场一望无垠，而且气候比俄国本土温和，宜于开垦和种植谷物。以哥萨克为先导的俄罗斯移民早就随征服大军进入哈萨克草原北部进行垦殖。1886年，沙皇政府关于草原各省管理条例就宣布要剥夺土著牧民的土地。1891年3月25日颁布的新的草原各省管理条例第119条进一步重申，草原各省哈萨克人（原文中为吉

---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390页，第391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尔吉斯人）占有的土地及土地上的森林等附属物全部“归国家所有”，不过部分土地仍按传统习惯划分，由农牧民单独或公共使用，而其余成片成片的所谓“剩余土地”则由财政部掌握。[①]也就是说由政府拨给俄罗斯移民耕种。因此，到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及乌克兰农民一批又一批来到草原。进入20世纪以后，斯拉夫移民的规模更是骤然扩大。

农民土地问题本来是1905年俄国革命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革命最后失败了，俄国农民的土地要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社会矛盾依旧十分尖锐。沙皇政府拒绝在俄国本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鼓吹俄罗斯农民应当移居到“剩余土地”极多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去。根据1906年11月斯托雷平提出的“处女地”计划，俄国当局开始大规模组织移民去中亚。1906~1912年，进入草原区四省定居和垦殖的斯拉夫移民就达43.8万户。[②]在1917年革命前定居中亚的200万移民人口（不少移民大战期间又离开了中亚）中，一半以上是1906年以后到达的。

斯拉夫移民们到中亚，大多如愿以偿的从当局那里得到了可观的“剩余土地”。必须指出，这些“剩余土地”绝不是什么无主土地，而是政府从土著居民那里强行剥夺过来的。沙皇政府借口哈萨克大草原原先属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王室所有，因此草原区被兼并和汗王们被废黜以后，他们拥有的土地理所当然成了“国家财产”，即归沙皇和俄国政府所有，政府也就有权将“国家所有”的土地转拨给新来的移民耕种。1891年、1895年、1902年和1908年，俄国政府曾经多次派遣官员深入草原“调查”，结果他们声称在那里“发现”了土著民族并不需要的广袤“剩余土地”，并且建议将这些“无主土地”划拨给涌进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410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②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18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草原的斯拉夫移民。

来中亚草原垦殖的斯拉夫农民几十年间络绎不绝，而且他们都采用欧俄盛行的粗放轮作制，因此每个农户所需的耕地面积比中亚原农户要成倍增加。这样，沙皇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加速剥夺当地农牧民的"剩余土地"才能满足外来移民农户的需要。

1910年，以土地专家自诩的斯托雷平视察了中亚。从此以后，当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强占所谓"剩余土地"。1906~1912年，即斯托雷平当政期间，当局从中亚土著那里剥夺转给斯拉夫移民的土地多达1743万公顷。[①]到1917年革命前夕为止，俄国政府总共剥夺了4500万公顷的哈萨克土地。[②]

最后应当补充说明，被俄国政府强行剥夺的草原区土地并不全是牧场，也包括不少定居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农耕地。他们被当局粗暴地赶出家园，结果致使数十万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其中不少人远走中国。在流浪途中死于饥馑和疫病的流民不在少数。俄国政府在中亚的大规模移民和土地剥夺与转拨，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亚地区社会动荡和1916年民族暴动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　大战对中亚的影响和1916年民族暴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是最先卷入这场大战的国家之一。在所有交战国当中，俄国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最为丰富。但是，俄国现代工业和技术落后，沙皇专制的政治体制效能低下，官场腐败，军事当局指挥无方，军用物品本来就供应短缺，加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前方战士缺衣少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19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②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32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食，弹药匮乏，这一切导致庞大无比的俄国军队在战场上屡打败仗，战败又促使俄国国内危机迭起。战争期间，战前看似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弊病暴露无遗。而且，随着战事的迁延难决，俄国局势越来越危急，帝国大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世界大战的战场在俄国西部的欧洲平原地带，那里虽然距离中亚有万里之遥，但是战争的阴影很快就笼罩了这片古老偏僻的土地。这种情形对刚刚起步走向社会转型的中亚地区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战争打响后不久，沙皇政府就宣布在中亚实行"非常状态"，禁止人们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和擅离工作岗位，对反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行为予以严惩，直至判处极刑。[①]

大战年代，远离前线的中亚作为俄国大后方的原料基地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特别是棉花的生产和供应，在整个俄国战时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国政府千方百计加强对中亚的掠夺，企图以此缓解政府面临的困境，进而摆脱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

早在战前，突厥斯坦就成了俄国最重要的产棉基地。战争爆发以后，数百万官兵的衣被供给对棉花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与此同时，从国外进口的棉花数量却急剧减少，因此，俄国政府只得竭尽全力在中亚扩展棉花种植面积。

1916年，俄国从国外输入的棉花由战前的1350万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锐减为700万普特，几乎缩减了一半，而当年全俄国棉花的需求量据测算为2100万普特。[②]也就是说，进口棉花充其量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需要，其余三分之二要靠国内主要靠突厥斯坦边区来生产。所以这个地区棉花种植面积连年递增，1913年为40万多公顷，1915年为57万多公顷，1916年为58万多公顷。[③]

尽管政府拼命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勉强满足了前方和全国的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33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3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需要，但是并没有给中亚的棉农带来相应的收益。一方面，由于技术、肥料、管理没有及时跟上，加上天气寒冷，1916年棉花播种面积虽然较上年有所增加，但产量却明显下降。1915年突厥斯坦边区棉花产量为2051.8万普特，1916年降为14900万普特，1917年更是降到784.5万普特。[①]另一方面，棉花产量下降，那么棉花售价理应上涨。当时确实出现过抢购风潮，但是沙皇政府不是采取有力措施调节市场，而是强行压低棉花交易价格。结果1916年的棉花价格比1913年只上涨了1.5~2倍，大大低于同期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这种把中亚纯粹当做殖民地进行不等价交换的做法不仅引起了广大棉农的激烈反对，而且也触犯了从事棉花加工和经销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战时棉田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突厥斯坦粮食短缺的局面。加之当时前方对粮食的需求大增，因而从俄国其他地区运进中亚的粮食及其他食品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1917年几乎陷于停顿。而中亚人口却与日俱增。除了本地人口自然增长，外面还不断流入难民和运入战俘。仅1914年9月俄军取得加利西亚战役胜利后，将22.5万名奥匈帝国战俘押送到中亚的集中营。[②]截至 1916 年 3 月，中亚地区关押的同盟国战俘就达 30 万人，另有7万难民流落中亚各地。[③]这样一来，中亚特别是突厥斯坦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粮食短缺导致粮食和各种食品的价格迅速上涨。1916年，突厥斯坦市场上的粮食售价与战前相比上涨了4倍。后来的事态发展更为严重，1917年1月中亚有些地方的面包价格比上年同月竟涨了40倍，广大民众怨声载道，叫苦不迭。[④]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70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②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7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③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70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大战期间，中亚向俄国前方和内地运出的产品除棉花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农牧产品和煤、盐等矿产品。1917年初，刚上任不久的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А.Н.Куропаткин）在一份上呈沙皇政府的报告中列出了战争三年期间他的辖区运出的各项产品的清单：棉花2089.9万普特，肉类30万普特，棉籽油10.9万普特，鱼类47.4万普特，肥皂22.9万普特，蓖麻5万普特，马7万匹，骆驼1.27万峰，毛毡3.8万平方俄尺（1俄尺等于0.3米），帐篷13441顶。[①]其中在土库曼人聚居的外里海省，战时征集的马6872匹，骆驼12805峰，大车299辆，羊皮军帽32528顶，帐篷650顶，以及价值20万卢布的其他物资。[②]中亚的各类物资源源运出，而从俄国内地运往中亚的日用工业品像粮食一样连年减少。到战争中期，食糖、烟草、火柴等常用产品成了奇货，投机商们乘机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

战争期间，俄国政府在中亚实行的高压政策和掠夺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中亚地区的各种矛盾。战争打响以后，大量俄国农民当兵上了前线，因而政府在向中亚移民一事上有所收敛，但是剥夺土著居民土地的行为并没有中止，主持此事的移民局仍然十分活跃。这一切不仅引起中亚普通农牧民的强烈愤慨，而且引起当地僧俗上层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风行起来。

早在战前，随着俄国的征服和俄国移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工人及商人的来到，欧洲式的先进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和某些进步的思想观念传入了中亚，这些新的革命性种子逐渐在中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以当地知识分子和某些上层人士主导的中亚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滥觞于19世纪后期，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高涨起来。这场革命动摇了俄国的旧制度，特别是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70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②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8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给根深蒂固的皇权意识以致命打击，加上不少穆斯林人士投身了革命，唤醒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中亚民族主义从此正式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

中亚的民族运动与俄国的革命运动的目标有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因此两者之间可以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互相援助。但是中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目标，那就是结束俄国在中亚的民族压迫制度，给予中亚各族穆斯林广泛的自治权利，正因为中亚的民族主义者是以本地穆斯林代言人的角色登上政治舞台的，所以他们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也是他们当时在反对沙皇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后来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能起到领导作用的关键所在。

中亚地域十分辽阔，民族众多，传统各异，因此在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上也不尽相同，明显地存在着南北两大趋势。

哈萨克大草原（包括草原区四省及七河省、锡尔河省北部草原）由于离俄罗斯本土较近，历史上的联系比较悠久，也比较密切。同时，由于游牧生活和伊斯兰教传播较晚等缘故，草原地区的伊斯兰传统影响不是很深，加上俄国移民众多，因此哈萨克大草原的民族主义带有欧洲式的“自由主义”色彩。这种特征看起来比较先进，但是与束缚在落后生产方式中的广大农牧民联系不是很密切。

20世纪初，一批哈萨克青年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喀山、奥伦堡、鄂木斯克等地接受了欧式教育，毕业后成为哈萨克民族知识分子的骨干。他们兴办学校，创办报刊，宣传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民族启蒙。同时，他们批评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尤其是抨击政府在哈萨克草原大规模移入欧俄农民和剥夺当地人土地的行为。

阿里汗·布凯汉诺夫（Алихан Букейханов）是这一代哈萨克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是典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启蒙

政治活动家，也是知名学者。他参加了俄国立宪民主党，是国家杜马中穆斯林集团成员。此外，巴伊图尔西诺夫（Ахмед Байтурсынов）、卡拉塔耶夫（Б. Каратаев）等人也是哈萨克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政治立场总的来说相对温和，力图将哈萨克民族运动纳入在俄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开展自由主义改革的轨道之中，主张同立宪民主党合作，认为这种方针对哈萨克民族比较有利。但是，他们同时强烈批评政府的土地方针，把停止向哈萨克地区移民和停止剥夺哈萨克人的土地作为主要的政治诉求。身为国家杜马代表的卡拉塔耶夫认为："在我们国家，最紧迫的农业问题就是要停止向草原各省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实行农业移民，哪怕是暂时停止这种移民也好。"①

老实说，这些人在政治方面直至大战前夕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就，但是在办报启蒙方面倒有所建树。1912年，一份哈萨克文报纸《哈萨克人》在奥伦堡正式创办，发行人就是巴伊图尔西诺夫、布凯汉诺夫和杜拉托夫（М.Дулатов）。该报批评俄国政府在哈萨克实行俄罗斯化和殖民化的政策，但是反对泛伊斯兰主义（пан-исламизм）和游牧主义，也不主张哈萨克从俄国分离出去。另一份哈萨克文杂志《阿伊坎》周围聚集了一批被称为农民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塞弗林（С. Сейфуллин）是这份1910年创刊于奥伦堡的杂志的主编，卡拉塔耶夫等人参加了杂志工作。

与哈萨克地区相比，突厥斯坦的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特色。突厥斯坦距离俄罗斯本土十分遥远，而且伊斯兰教的传统影响非常深厚，民族的成分比较复杂，俄罗斯移民少，因此那里的民族主义传统色彩要浓一些，比如，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33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义（Пан-тюркиэм）普遍流行就是例证。由于民族主义与民众的联系相对紧密，所以政治能量比较大。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亚，并进一步发展，对中亚特别是对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影响很深。

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后期阿富汗人哲马鲁丁（Jamal ad-Din al-Afghani）创立的，它宣扬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抵御西方欧美列强的侵略。这种思潮得到土耳其帝国苏丹的赏识和利用，因此很快传播开来，迅速传到了中亚。

泛突厥主义可以说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同胞。它是19世纪末由俄国穆斯林伽斯普林斯基（И.Гаспринский）创立的学说，鼓吹全世界所有讲突厥的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泛突厥主义在中亚比泛伊斯兰主义更有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中亚得到广泛传播。

在泛伊斯兰主义尤其是泛突厥主义的推动下，“贾迪德”（джадид）运动在中亚尤其是突厥斯坦蓬勃兴起。贾迪德运动是“革新运动”的意思，它的源头正是泛突厥主义始祖伽斯普林斯基倡导的“新”的教育方式“贾迪德”。

1897年，中亚地区第一所“新”学校在安集延开办。1901年，塔什干出现第一所贾迪德学校。到1914年，中亚地区已经有了100多所这样的学校。[①]同时，突厥斯坦许多宣传贾迪德思想的报刊也创办起来了。作为政治运动的贾迪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1905年革命以后，突厥斯坦两个民族主义组织浩罕的“青年党”和塔什干的“马什拉伯”（машраб）发起贾迪德运动，其骨干是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及商人、小企业主等。

贾迪德运动的主流正如其名称“革新”一样，是改良主义，多数成员没有提出与俄国分离的主张。他们认为抵制俄罗斯

①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7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化、保留和发展民族文化才是当务之急。此外，运动中也有人主张中亚各民族应该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道路。但是运动也夹杂着一些激进的派别，因此有时被当局视为革命组织，苏维埃政权初期也承认其存在。突厥斯坦总督府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把它看做泛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派，认为它是主张开展社会革命的组织。不过，贾迪德人士中确有一些人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俄国在中亚的统治。一位名叫阿卜杜·瓦希德·卡里耶夫（Абду Вахид Кариев）的贾迪德领导人，1908年就曾号召所有的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该死的俄国人"。到大战爆发前后，贾迪德运动的政治功能越来越强，成为后来突厥斯坦民族主义政党的先声。

中亚下层人民反抗沙皇政府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斗争，从俄国征服者踏上中亚这片土地起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时起时伏，沿一条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而已。而且应当看到，中亚广大下层农牧民的斗争方式同知识分子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不同的，尽管有时候两者进行过一些配合。穆斯林知识分子创建的民族主义运动，一般采用"合法"的形式进行抗议，而下层人民的斗争总是采取直接对抗形式，直至进行武装反抗。

早在俄国完全征服中亚以后的19世纪后期，中亚各地就开始频频发生"抢劫"和暗杀军政官吏（包括不少穆斯林出身的本地人官吏）的事件。虽然官方宣布这是恐怖主义行为，但是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却得到了为数众多的穆斯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例如，1906~1907年间，在撒马儿罕省进行活动的一个有名的"劫匪"——"纳马扎"（Намаза），当局的报告承认，"他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①

① П.Г.加卢佐：《突厥斯坦——殖民地》，第197页，莫斯科1929年俄文版。

与此同时，来自欧俄的斯拉夫移民在中亚也经常遭到所在地穆斯林激进分子的袭击。1906年3月，在锡尔河省奇姆肯特县巴达姆乡，发生了原住居民夺回已划拨给俄罗斯移民的灌溉地的事件，而这已是该地发生的第三起类似事件，为首“闹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两名本地的穆斯林法官。1910年，费尔干纳省发生了一起吉尔吉斯人与俄罗斯移民的严重暴力冲突，结果有4名吉尔吉斯人被打死，另有3人受伤。这类事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应，土著居民对俄罗斯移民及俄国各级政权机构的仇恨加深了。

中亚下层民众对政府的普遍敌视和民族主义运动人士对政府的不满交织起来，使反抗的怒火不断累积，到1916年夏，终于由一纸政府征召令引发出来，发展成为一场中亚空前未有的民族大暴动。这场发生在俄国后方的大暴动给本来就已经风雨飘摇的沙皇政权以沉重的一击。

1916年7月8日（俄历六月二十五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Ⅱ）颁布一项敕令，下令对库班、外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19~43岁的男子进行“动员”，征召他们开赴欧洲前线各个战区担负修筑防御工事和其他军用建筑的工作。[①]就中亚地区来说，动员对象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以及维吾尔人、东干人等。[②]这里没有列入土库曼人，其实此前就动员了土库曼人。还是在1914年，俄国政府就曾令外里海省当局组建了一个土库曼骑兵团开赴前线。[③]

根据敕令，俄国政府计划在草原总督区征召24.3万人，在突厥斯坦征召25万人。[④]仅仅过了5天，草原区总督苏霍姆林诺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34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73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③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92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夫（Сухомлинов）将军下达了征召哈萨克居民入伍承担后勤任务的命令。

依据传统，中亚穆斯林向来认为自己没有为俄国政府从军服役的义务，沙皇政府以往也一直尊重他们的这一习俗。这次，当局以为在战争非常时期，采用的又是较为温和的动员措施，只修工事不打仗，想必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何况，就是在一个月以前，突厥斯坦总督府还给俄国政府呈递过一个报告，内称中亚的局势“绝对平静”。不过，中亚统治当局过去十分警惕的贾迪德运动成员以及泛伊斯兰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还有哈萨克民族主义者确实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但是，沙皇政府没有料到，中亚广大普通民众会做出如此猛烈的反抗行为。

中亚穆斯林群众反对政府动员的最初反抗行为是销毁户籍册。当时，登记居民身份重要资料的户籍册一般是由乡公所编纂并保管的，可以说它是官方征募壮丁的惟一文字依据。如果失掉了户籍册，也就无法确定到底谁是征召对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各地纷纷发生抢夺并焚毁户籍册的事件。有些地方局势更加失控，甚至发生了杀死官吏和户籍管理人员的事件。时任突厥斯坦总督在上呈给沙皇的一份奏折中称：“天亮前，大约50名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作者注）冲进马斯洛夫乡乡长家中，杀死了乡长和他的秘书。”[①]此外，还有许多农牧民逃进草原深处逃避兵役，甚至已经在工厂就业的穆斯林也有不少逃走了。就是上面这样一些零星、分散的骚动，没过多久就最终汇合发展成为一场遍及中亚各地的民族大起义。

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基本上是各族穆斯林群众的自发反抗。它不是统一发动起来的，因此各地的暴动并没有汇成统一的斗争。各地发起暴动的时间有先有后，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反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75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抗最持久的一直延续到了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但是，各地暴动的目标是一致的，从抵制兵役到推翻沙皇政府在中亚的统治都是一致的，而且，各地的暴动客观上形成了相互策应的局面，所以不能孤立地看待1916年暴动中各地发生的事件，而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

抗议和暴动是从突厥斯坦开始的。7月17日，撒马儿罕省苦盏城首先起事。当天，苦盏的抗议群众聚集在警察局门前示威，结果与城市守备队发生流血冲突，有两名示威者在冲突中丧生。这一事件激起极大民愤，远近各地的穆斯林纷纷响应。7月24日，锡尔河省塔什干老城的居民揭竿而起，打死打伤26名官吏和警察。接着骚乱波及该省许多地方，其中卡扎林斯克、奥利耶-阿塔（后改名江布尔，今塔拉兹）、奇姆肯特等县的暴动者坚持战斗较久，他们与政府的讨伐队一直周旋到9月底。此外，费尔干纳盆地浩罕在7月下旬、卡拉卡尔帕克诸部落在8月初相继掀起了抗服军役的暴动。暴动队伍频频袭击军政机关，对为虎作伥的当地人官吏也不放过，而掌管户籍册的乡公所又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不过，上述各地的反抗到10月基本上平息下去了。

突厥斯坦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是七河省。7月20日夜，离维尔内不远的乌什科努尔的哈萨克人代表经过通宵开会，决定销毁花名册、割断电话线，以抵制地方当局的征召，行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当时，一个名叫托卡什·博金（Токаш Бокин）的人在省内四处游说，鼓动穆斯林起来抗命。此人虽然很快就被当局逮捕入狱，但是他点燃的大火是谁也无法扑灭的。七河省各地暴动连绵不绝。8月21日，该省各处的暴动队伍联合起来，他们捣毁了从维尔内到库尔泰的邮政设施，切断了通往塔什干等地的电话线。接着，暴动队伍同政府军展开了战斗。在这期间，有

些穆斯林武装人员被人煽动起来，对当地的俄罗斯移民进行“报复”。有鉴于此，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推迟了征召穆斯林入伍的最后期限。

新任土耳其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和七河省省督福尔包姆（Фольбаум）拼命调兵遣将镇压暴动。1916年9月，七河省的暴动武装与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先后在列普辛斯克、科帕尔（今塔尔迪库尔干）和维日河展开激战，由于武器落后和指挥不当，暴动武装遭到失败。到10月间，七河省轰轰烈烈的暴动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

随后，政府当局对暴动人员和和平居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遭乱军所杀者估计有20万之多。1917年2月，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任命的特别法庭对七河省的暴动骨干进行审判，结果有347人被判处死刑，168人被送去服苦役，还有129人被送进了监狱。[①]此外，全省有30多万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躲避战火和迫害逃往他乡，其中约有20万人远走中国新疆。[②]

草原区的暴动要稍迟一些。7月下旬，乌拉尔克斯省的哈萨克人举起反抗大旗，很快波及全省。但是由于队伍分散，各自为战，到10月被当局平定。阿克莫林斯克省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情形与乌拉尔斯克省的情况差不多，那里的哈萨克暴动者坚持到了11月。尽管暴动遭到了镇压，但是大多数应征者拒不到指定地点去集合出发。

草原区的图尔盖省的暴动在中亚各省中规模最大，坚持的时间也最长，因而成了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的中心。

7月，图尔盖省省督收到沙皇的征召敕令后马上进行动员，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79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②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准备强行征召哈萨克人入伍。可是，此举立即招致广大哈萨克牧民的激烈反对。人们群情激愤，他们捣毁铁路，袭击邮局，特别是放火焚烧各地的乡公所，烧掉户籍册，杀死地方官吏的事也时有发生。整个图尔盖省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武装暴动迅速遍及全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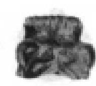
图尔盖省暴动队伍的首领是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Аман－гельды Иманов）以及阿卜杜·加法尔·詹博西诺夫（Абдул гафар-Джанбосынов）、卡西姆·奥斯潘·绍拉科夫(Касым Оспан Шолаков)。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1873年出生在图尔盖省图尔盖县一个贫困农牧民家庭，成年后参加反对沙皇当局的活动。暴动队伍在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和他的战友的率领下不断壮大，图尔盖省的民族暴动声势越来越强。暴动的浪潮席卷图尔盖全省，而且把邻近省份的零散暴动武装也吸引过来了。暴动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哈萨克人，也有一些其他民族的穆斯林加入。

到10月间，中亚其他地区的民族暴动被相继镇压下去了，而伊曼诺夫的队伍越战越强，由最初的5000人左右猛增到5万人。[①]伊曼诺夫把暴动队伍按10人、50人、100人、1000人依次编成四级战斗序列，各级均任命了指挥官。此外，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乡、村建立了事实上的政权机关。

经过整编，图尔盖省的暴动队伍形成了三支大军。10月中旬，三支大军分别在伊曼诺夫及詹博西诺夫、绍拉科夫指挥下，对图尔盖城形成合围之势。经过一系列外围战斗，到11月5日，1.5万名暴动战士将图尔盖城围个水泄不通。守军不敢出城迎战，只得向上司紧急求援。

接到图尔盖守军的紧急求援信以后，沙皇政府急忙派拉连季耶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36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Лаврентъев) 将军率领一支强大队伍驰援图尔盖。这支援军共包括17个步兵连、18个哥萨克百人队、4个骑兵连，并配有18门大炮和17挺机关枪。政府的援军从三个方向向图尔盖进发。拉甫连季耶夫将军亲率主力，从切尔卡尔直奔图尔盖城。另一支援军从阿克纠宾斯克（今阿克托别）出发，进攻正在攻击伊尔吉兹城的暴动武装。第三支援军经库斯塔奈向图尔盖城挺进。这样，图尔盖城下的伊曼诺夫的队伍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像

得到这个消息后，伊曼诺夫指挥加紧攻城，企图抢在援军抵达之前拿下图尔盖。可是在11月19日开始的连续10天的激烈攻防战斗中，暴动队伍严重受挫，始终没能攻进城去。由于援军逐日逼近，伊曼诺夫只好放下攻城计划，带领暴动军队回过头来迎战政府援军。

11月29日，科托明（Котомин）中校率领的援军前锋与伊曼诺夫的万人大军遭遇，经过一番苦战，政府援军终于突破暴动者的阵地，冲进久困的图尔盖城。暴动队伍长达一个月多久的

图尔盖城攻坚战以失利而告终。

面对源源开来的政府增援大军，伊曼诺夫深知硬拼不是办法，于是将暴动队伍化整为零，深入广袤无垠的草原腹地开展游击战。伊曼诺夫本人率领的一支队伍在别特帕克—卡拉建立了游击营地，继续坚持战斗。

1917年1月27日，伊曼诺夫指挥2000名游击战士一举击败了前来征剿的一支政府军。2月下旬，由图尔根涅夫（Тургенев）中校率领的一支政府讨伐队再次向别特帕克—卡拉进攻，最后占领了这个营地。可是，游击队在营地附近继续跟讨伐队周旋，最终迫使讨伐队于3月12日（也就是俄国二月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撤出别特帕克—卡拉，返回图尔盖城。就这样，伊曼诺夫等人领导的部分暴动队伍一直坚持战斗到沙皇制度的覆灭。

后来，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积极参与图尔盖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担任过图尔盖县革命军事委员，组建了第一支哈萨克民族赤卫队。1918年5月，他被反苏维埃叛乱武装抓捕并很快遭到枪杀。为了纪念这位哈萨克民族英雄，苏维埃政府把图尔盖东北的一座城镇命名为阿曼格尔德。

中亚民族暴动虽然整体上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当时就迫使政府作出了明显的让步。政府不仅被迫推迟了征召中亚穆斯林的期限，而且实际应征上前线的人大大减少了。第一批穆斯林军用建筑工迟至9月18日才离开中亚，原计划在突厥斯坦征召25万人，结果直到二月革命前后才征发了12万人。[①]

1916年的中亚民族暴动，是中亚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沙皇政权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暴动的矛头直指沙皇政权，实际上给这个极其腐朽反动的政权的打击也是极其沉重的，这一主流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但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不良影响在暴动群众中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在这些思潮的鼓动下，有些穆斯林暴动者把对沙皇政府在中亚大规模剥夺土地的仇恨发泄在俄罗斯移民身上。据统计，整个暴动期间，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流行的突厥斯坦，共有2325名移民被暴动者杀害，另有1384人失踪。而同期被杀的俄罗斯官吏只有24名，被杀的土著官吏55人。政府军阵亡97人，受伤86人，失踪76人。[1]被杀的移民90%以上定居在七河省，因为那里是突厥斯坦接纳移民最多，剥夺当地农牧民"剩余土地"也最多的省份。[2]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小的草原区，虽然移民很多，哈萨克人的土地被剥夺也多，而且战斗激烈，但是对俄罗斯移民的报复较突厥斯坦要轻得多。在暴动中心图尔盖省，总共只有54名俄罗斯移民被杀，另有3名俄罗斯官员和6名土著官员被杀。[3]

应当补充说明，虽然有一些中亚民族知识分子如塞弗林、波金等参加了1916年民族暴动的相关活动，但是总的来看，中亚民族主义者在其中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有一种解释是，暴动发生时，以布凯汉诺夫为首的一批哈萨克民族主义者当时正在大战前线，为维护已经应征到那里的哈萨克人的利益奔走，并设法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4]不过，向沙皇政权机关和国家杜马写信抗议政府军镇压屠杀无辜平民的民族知识分子还是不少。

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是各族穆斯林农牧民的自发抵抗斗争汇合和发展而形成的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从以自发斗争而开始这一点来看，它与战前盛行中亚的"抢劫"和"恐怖"事件有一定的联系。不过，这场暴动的政治色彩要明显得多，其政治

①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93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② П.Г.加卢佐：《突厥斯坦——殖民地》，第227页，莫斯科1929年俄文版。

③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93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④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38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影响更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而且，暴动达到高潮以后，当地一些传统社会上层人士也卷了进来。这些人的思想十分复杂，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尤其是那些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散布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甚至煽起民族复仇情绪，对1916年暴动乃至以后的中亚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

总之，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对沙皇在中亚的统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进一步唤醒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为二月革命在中亚的胜利打下了有利基础。

第二章
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二月革命和中亚民族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腐朽落后的俄国的打击是致命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动摇了专制主义的沙皇制度，使俄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起来。进入1917年以后，这些矛盾的总爆发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不久，俄国二月革命终于爆发了。

二月革命一举摧毁了统治俄国长达数百年的沙皇专制制度。同时，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在革命怒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革命有力地促进了包括中亚全体人民在内的全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觉醒。同俄国其他地区的民族运动一样，中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中亚各族人民在要求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同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解放要求，从民族自治直至民族独立。

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革命是从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1917年3月12日（俄历二月二十七日），彼得格勒街头连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终于演变为武装暴动。同时，奉命上街弹压示威的数万名士兵一举反戈，纷纷加入暴动者的队伍。当天，革命的士兵和民众控制了整个首都，起义取得了胜利。由于当时俄

国采用俄历，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二月革命”。

首都的二月起义相当顺利，迅速取得了胜利。而且，起义胜利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极其迅速的。就在3月12日当晚，经过革命士兵和群众的推选，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苏维埃，即“委员会”、“代表委员会”之意）宣布成立，成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全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苏维埃同时选举成立了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孟什维克（меньшевики）、社会革命党（эсеры）及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и）等社会主义党派人士，孟什维克的领袖齐赫泽（Н. СЧхеидзе）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其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导权掌握在奉行中间路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

得知首都起义的胜利消息以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于3月15日宣布退位。与此同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经过紧张磋商，组成俄国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由俄国几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控制，政府总理由全俄自治机构联合会主席李沃夫（Г.Е.Львов）公爵担任。这样，俄国出现了列宁（В.И.Ленин）所说的“两个政权并存”的独特局面。

首都起义胜利后，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到辽阔俄国大地的各个地方，各地的沙皇政权机关纷纷瓦解，苏维埃组织和临时政府的代表机构在俄国各个省市和边疆地区陆续建立起来了。当然，中亚地区的局势也不例外。

尽管中亚地处俄国南部边陲，交通和通讯设施相当落后，旧政权当局也蓄意封锁革命信息，但是彼得格勒起义胜利和沙皇政权垮台的消息还是没过几天就传到了中亚地区的大中城市。例如，突厥斯坦首府塔什干的居民很快就从私人电报中获知沙皇政权已被推翻，消息马上传遍全城。接着，二月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中亚各地。



最初，沙皇政府的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还想作困兽之斗。他给各省督军频频发去电报，一方面要求他们服从在彼得格勒刚刚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承认苏维埃这样的革命民主组织，释放政治犯；另一方面，他更加强调督军们应担负起“维护本地秩序”的责任，特别要防止穆斯林造反。有一次，库罗帕特金在向革命情绪高涨的驻军士兵发表演讲时，居然把中亚本地居民说成是内部“最危险的敌人”。[①]

3月16日，总督府当局通过《突厥斯坦信使报》发出呼呈：“突厥斯坦边区全体公民！彼得格勒发生了重大事变……我们谨向你们全体驻军官兵、公职人员、工人、工匠、商人、农民，最后还有土著同胞呼吁，你们一定要牢记，任何破坏秩序的行为都只能对新制度的敌人和我们的外部敌人德国人有利。”[②]此外，库罗帕特金继续授意下属镇压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的参加者，继续剥夺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俄罗斯移民。这个顽固不化的沙皇总督企图用挑起民族仇恨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库罗帕特金“防止土著人暴动”的立场得到了彼得格勒的俄国临时政府的支持。[③]

可是，革命的洪流不是库罗帕特金可以阻挡住的。尽管这位总督及其下属想尽了办法，最终还是无法控制突厥斯坦出现的革命局面。3月中旬，塔什干先后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旋即两个苏维埃合并为统一的机关，塔什干苏维埃[④]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我们报》。二月革命的烈火开始在中亚各地蔓延起来。

---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历史》，第1卷，第588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② X.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14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③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15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④ 本书“塔什干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简称为“塔什干苏维埃”。

紧接着塔什干之后，在突厥斯坦的一系列城市和矿区，苏维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二月革命爆发后一个月期间，撒马儿罕、斯科别列夫、皮什佩克（1926年改名伏龙芝，今比什凯克）、阿斯哈巴德、奥利耶-阿塔、维尔内、奇姆肯特、奥什、佩罗夫斯克、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今图尔特库尔）以及克孜勒-基亚矿区等都建立了苏维埃。

在草原区，由于俄罗斯移民较多，与俄国中央地区相距较近而且联系紧密，因此很多城市在3~4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主要有奥伦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阿克莫林斯克、巴甫洛达尔（今克列库）、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今厄斯克门）等。而且，草原区各城市苏维埃的活动和主张更具“欧俄色彩”。比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苏维埃刚成立不久，就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粮食供应、实行商品限价、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主张。

迄止4月，中亚各省都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有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与全国大多数苏维埃一样，中亚各地苏维埃的领导权同样掌握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例如，实际上起着突厥斯坦地区苏维埃作用的塔什干苏维埃的主席就是孟什维克别利科夫（И.И.Бельков），布尔什维克在塔什干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只有利亚宾（С.В.Ляпин）3名代表等。在中亚其他城市的苏维埃当中，布尔什维克也是少数派。

应当指出，参加中亚苏维埃的各党派的基本成员是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很少有当地穆斯林代表。因此，中亚穆斯林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民族主义组织。3月，塔什干的本地居民自行成立了穆斯林代表委员会（又称舒拉-伊-伊斯兰党，Шура-и-ислам），这是在贾迪德运动基础上成立的政治组织，主席是贾迪德人士穆纳瓦尔-卡里·阿卜杜拉希德汉诺夫（Мунавар-кари

Абдурашидханов)。随后，穆斯林委员会在中亚尤其是突厥斯坦各地城镇很快建立起来了。

苏维埃和穆斯林委员会同是革命的产物，它们与旧政权的残存机构都在争夺控制中亚局势的权力。4月13日，在革命的士兵和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塔什干苏维埃和穆斯林委员会宣布撤销突厥斯坦总督区，同时正式解除库罗帕特金的总督职务。接着，库罗帕特金及其副手叶罗菲耶夫（M.P.Ерофеев）、参谋长西维尔斯（Н.Н.Сиверс）等人被送进监狱。同时，塔什干苏维埃颁布命令，撤销前沙皇政权各级地方军政官员的职务，他们当中不少人也遭逮捕。不过，所有被捕者包括库罗帕特金本人不久被释放了。随后，沙皇俄国政府驻布哈拉汗国的全权代表米列尔（А.Я.Миллер）和舒尔加（Н.А.Шульга）也被勒令离开布哈拉。在草原区各省，同样发生了各省旧政权机关被解散和原军政官员纷纷被解职甚至被逮捕的情况。就这样，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一个月时间内，沙皇政府在中亚的政权体系彻底瓦解了。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革命事变，俄国临时政府在中亚的各级政权机构陆续建立起来了。早在3月19日，塔什干市杜马就推举产生了塔什干临时政府委员会。随后，在一系列城市及乡镇成立了类似的政府机构。4月20日，作为俄国临时政府在边区的地方最高机构突厥斯坦特别委员会在塔什干宣告成立。委员会共有9名成员，其中5名俄罗斯人，4名穆斯林，他们多是立宪民主党人（кадеты）、原地方官吏和中亚民族主义者。俄罗斯人、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尼古拉·谢普金（Н.Н.Щепкин）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中其他4名俄罗斯人包括施卡普斯基（О.А.Шкапский），4名穆斯林是：阿里汗·布凯汉诺夫、穆罕默德然·塔内什巴耶夫（Мухамед-Жан Танышбаев）、萨德列特金·马克苏多夫（Садретдин Максудов）以及达夫列特申（А.А.

Давлетшин）少将，但他们不全是中亚土著。[①]

突厥斯坦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成立以后，俄国临时政府立即授予该委员会“解决本地所有问题”的全权，特别要求这个委员会应全力“维护秩序”，意在防止布尔什维克这样的激进势力和本地民族主义势力破坏临时政府的统治。

与此同时，中亚各省一般都很快成立了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为首的称专员。在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也驻有突厥斯坦特别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这些委员会的人员成分与塔什干的边区特别委员会差不多。例如，七河省的专员是社会革命党人施卡普斯基和哈萨克民族主义者塔内什巴耶夫。

在市镇和乡村，普遍成立了名为“执行委员会”或“公民委员会”一类的行政组织，作为临时政府的代表机构。在土著居民聚居的乡村，上述委员会的主席多由原来的乡长或村长担任，在俄罗斯移民村落，委员会的骨干成员是富裕农民；在哥萨克村镇，握有实权的仍然是传统的军人委员会或军事长官。

需要说明的是，在草原区没有成立像突厥斯坦那样统一的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不过在各省，临时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很快建立起来了。虽然执行委员会在体制上直属中央政府，但是与突厥斯坦边区特别委员会关系密切。比如，边区特别委员会委员布凯汉诺夫兼任了草原区图尔盖省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专员，同样来自草原区的委员塔内什巴耶夫又兼任了七河省的特别专员。

仅从各级临时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来考察，不难看出，不论这些委员会采取何种形式，它们总的政治倾向无疑是保守的。这些机构与比较激进一些的同级苏维埃分享权力。如此一来，二月革命后的中亚与全俄国一样，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15~216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两个政权的关系也同全俄国的情况差不多，即临时政府的各级机构掌管行政权力，而各级苏维埃主要对它们实行所谓“革命的监督”。1917年4月20~28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明确指出，苏维埃不干涉临时政府委员会行使权力，只是从各方面对其进行监督。即便在非常场合，也只是施加“有组织的压力”而已。[①]这样一来，实际的权力大多握在临时政府机构手中。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后面边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简称边区苏维埃）。

不过，在二月革命初期，中亚也像全国一样，苏维埃在民众中的实际影响力和号召力要超过临时政府机构。一位曾在锡尔河省临时政府机构任过职的官员描述了他目睹的现实，他说：“无论在哪里，苏维埃在工人和士兵中都享有巨大的威望。在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它们实际上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我确信，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居民们心目中是拥有牢固权力的惟一机关。”[②]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迫于苏维埃的压力，临时政府委员会颁布决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企业主必须确定工人相应的工资标准，严禁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签订任何奴役性契约等。[③]

还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中亚的“两个政权”，无论是临时政府的各级机构，还是各级苏维埃组织，实权都掌握在俄罗斯人手里。当地各族居民虽然也有代表，但是没有多少发言权。

---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21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②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90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③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90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因此，中亚的苏维埃各级组织以及临时政府各级委员会尽管都是摧毁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的革命的产物，然而它们对解决中亚地区面临的最迫切的革命任务彻底废除民族压迫不是十分关心。同时，它们对当地各族居民代表提出的实行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的要求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库罗帕特金虽然被赶下了中亚政治舞台，但是他的观点“土耳其人（指中亚穆斯林——译者注）不必享有完全的权利”[①]——阴魂未散。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亚的临时政府机构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恢复那些因种种原因被剥夺了选举权的本地居民的权利，把沙皇政府时期负责剥夺当地穆斯林的土地的机关移民局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而七河省临时政府委员会特别专员施卡普斯基本人原先就是移民局官员。正是在七河省南部各县，甚至还在继续执行由前总督库罗帕特金制订的剥夺当地穆斯林250万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土地的计划。[②]

对于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临时政府机构所持的态度与沙皇政权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赦免了在镇压这场暴动中犯有严重罪行的凶犯，甚至容忍军事当局继续追剿暴动者的行为。例如，由拉甫连季耶夫将军指挥的讨伐队仍然在图尔盖草原进行这样的追剿。直至亲身参加过这场暴动的布尔什维克阿里比·詹基尔金（Алиби Джангильдин）提出申诉，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直接干预以后，追剿行动才不得不停止下来。

在此期间，中亚某些地方当局对1916年暴动参加者的迫害令人发指。当时，听到俄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大批流亡中国新疆的暴动者和难民便启程回国，但是他们在回国途中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26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②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93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经常遭到当局武装的抢劫甚至屠杀，而临时政府机构对此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1917年春，一批七河省的流亡者从中国新疆出发，西行回国。可是当他们途经普尔热瓦尔斯克（今卡拉科尔）县境内时遭到一伙前政府讨伐队员的袭击，所有人员无一幸免，遇害者的牲畜和财物也被劫掠一空。此外，尽管有些流亡者历尽艰难险阻回到故土，可是由于土地已被剥夺，生活无着，只得长期呆在高寒山岭之中，很多人因此冻饿身亡。

为了摆脱极其艰难的境地，当时七河省17个牧区乡的回国流亡者和难民联合致电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电报具体描述了他们所处的悲惨境地，并且要求给予援助。电文写道："我们全都住在山里，不断有人饿死。我们没有面包，什么都没有。听说还要把我们遣送到维尔内县和纳伦县去。可是我们已经走不动了，等不了到达那里，全都会在路上死去。请求你们以自由、正义、平等的名义来关注我们的处境，拯救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恳请你们不要放逐我们，让我们在自己的故乡生活下去。"①

接到电报后，突厥斯坦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经过调查，委员会确认电报中所说的都是事实。不料此举得罪了临时政府当局，结果不但落难的流亡者和难民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相反，根据七河省特别专员施卡普斯基的命令，把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当做煽动闹事的布尔什维克抓了起来，然后把他驱逐出七河省。

此外，在临时政府统治下的中亚，国家机关和各类学校只能把俄语作为通用语言，中亚各民族语言仍然被禁止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同样，中亚土著各族的文化和习俗没有得到起码的

---

① 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593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尊重。

这样一来，中亚各民族对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地方当局日益感到失望了。那些民族情绪日趋强烈的中亚民族主义政治代表认为，只有另行组建自己的政权机关，才能确保他们自身的政治权力，才能以当地穆斯林利益的代表发挥作用，也才能实现他们的民族自治和自决的目标。结果，在中亚这个俄国的边远地区，一度出现了“三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即除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以外，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地方政权系统。

其实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初，那些以“民族代表”和“民族利益捍卫者”自诩的中亚民族主义者，并不怎么赞成激进的革命主张。在他们的头脑中，无论民族自治还是民族自决，都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他们所直接追求的是中亚各族人民应当在“同一个俄国”享有和俄罗斯人平等的权利。因此，当时即使最“激进”的中亚民族主义者对保守的临时政府一般都持容忍、妥协甚至欢迎的态度。例如，乌拉尔省的“吉尔吉斯人代表大会”1917年春刚成立就通过了支持临时政府各项政策的决议。直到1917年9月举行的突厥斯坦边区第三次穆斯林代表大会，还宣称要支持临时政府。[①]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中亚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对“俄罗斯人的政府”不满，终于走上了试图建立地方民族政府的道路。而且，这种尝试在突厥斯坦和哈萨克草原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

在突厥斯坦，由于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民族主义情绪相对要强烈一些。民族主义者根本不提苏维埃政治词汇中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他们主张的是全民族（实际上是中亚全体穆斯林）的统一，鼓吹建立代表整个民族的统一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80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机构“穆斯林委员会”。

前面曾经提到，早在1917年3月间，中亚特别是突厥斯坦各地就开始普遍建立穆斯林委员会。但是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各地穆斯林委员会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一次次的分化组合。最后，它们当中有些一度发展壮大，成立了名副其实的地方政权；有些一直停留在一般的宣传和发动阶段；还有些则因为或激进过头或温和过度而失掉了影响。

1917年春夏，突厥斯坦边区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活动十分活跃。民族主义者经常召开民族代表大会，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1917年4月29日至5月6日，42个地方穆斯林委员会的代表在塔什干举行边区穆斯林首次代表大会。大会主张建立一个以民族自治和“夏里亚特”（伊斯兰宗教法典——作者注）为基础的突厥斯坦联邦自治共和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虽然迈进了一步，明确提出了民族自治，但是并没有提出完全脱离俄国实现民族独立的政治要求。他们认为，突厥斯坦联邦自治共和国可以继续留在“民主的新俄国”的版图之内，这至少表示当时他们还是相当信任和支持临时政府的。此外，参加这次会议的450名代表中却有93名俄罗斯人。①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有关经济生活方面的决定倒是更加值得注意。决定要求在中亚停止推广种植美国良种棉花，因为大规模植棉使中亚完全沦为俄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产地，加上需要从俄国内地运来大量粮食，结果中亚完全处于依赖俄罗斯的地位。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与经济上的殖民主义独无二致。

代表大会最后通过选举，成立了一个名为“穆斯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组织，中亚知名的民族主义活动家穆斯塔法·卓卡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16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也夫 (Мустафа Чокаев)（卓开）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卓卡也夫是哈萨克人，生于1890年，因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为哈萨克草原自治奔走而出名。他依照俄国自由派的政治主张，向突厥斯坦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主要内容包括：从中亚撤走俄国驻军，把司法权力全部移交给穆斯林组织，本地土著居民应当享有与俄罗斯人同等的选举权，设立独立的突厥斯坦立法议会等等。

对于卓卡也夫代表穆斯林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政治要求，突厥斯坦临时政府委员会后来既无法满足，也无所谓拒绝，因为它自身与彼得格勒的全俄临时政府一样，在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力量冲击下，处在日益走向衰亡的过程中。革命的士兵和工人一再要求苏维埃直接掌管全部政权，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下的塔什干苏维埃和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却提出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方案，那就是在中亚实行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以俄罗斯人为主的政治组织与当地穆斯林的民族主义组织共享政治权力。但是这个比较温和稳妥的主张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得到实现。

1917年夏，中亚的政治局面风云变幻。穆斯林委员会出现了危机，一个叫“宗教委员会”的组织从中分裂出来了。宗教委员会的极端主义色彩很浓，它极力主张突厥斯坦应当脱离俄国，从而成为泛突厥主义国家的一部分。宗教委员会反映的是上层穆斯林少数极端分子的主张，因此在当时的中亚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由于俄国临时政府没有在中亚实行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致使突厥斯坦民族主义分子的不满情绪日渐强烈，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立场由本来比较温和的民族自治转回相当激进的民族独立。1917年9月，一批有影响的穆斯林民族主义人士聚集浩罕，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它的首脑就是卓卡

也夫。他们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费尔干的盆地颇有些势力，后来成为中亚与苏维埃政权抗衡的主要力量之一。

此外，在土库曼人聚居的突厥斯坦外里海省，二月革命后也建立了一个民族执行委员会，由沙皇俄国的土库曼军队指挥官奥拉兹·谢尔达尔（Ораз Сердар）上校任主席。民族委员会不仅有军队，而且跟伊朗的英国驻军有联系，准备与苏维埃争夺政权。

位于中亚北部的哈萨克大草原，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情形与突厥斯坦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要比后者温和。因为大草原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俄罗斯文化接触较多，伊斯兰教传播较晚，而且扎根相对浅一些，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不深。故而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哈萨克大草原地区的民族主义提出的政治要求有其独特的内容，而且可以从中看出俄罗斯因素的某些影子。

二月革命在首都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哈萨克草原，那里的民族主义者也迅即行动起来。1917年4月，草原区的土著民族哈萨克人的政治代表在奥伦堡举行了首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吉尔吉斯委员会”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分子，此外还有伊斯兰教会人士和游牧部落的首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俄国临时政府表示支持，同时，大会要求给予哈萨克地区有限的地方自治，允许在学校、法院和行政机关使用哈萨克语。[1]大会以后，各省及各城市陆续成立了类似的吉尔吉斯委员会，其中好些也同样对临时政府持支持立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到1917年夏，草原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再度活跃起来。8月3~8日，哈萨克人的代表再次在奥

[1]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22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伦堡举行"全吉尔吉斯代表"的大会。大会明确提出要求在俄罗斯联邦国家体制内实行草原区的自治。会上宣布成立哈萨克民族主义政党阿拉什党（Алаш），党的首领是著名的哈萨克政治家布凯汉诺夫。阿拉什党提出的14条政治纲领内容相当广泛，除了自治要求以外，还包括停止向大草原移民和停止剥夺哈萨克人的土地，不再征召草原居民入伍和组建本地人民警队等等。来自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代表的要求激进得多，主要是推进反对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于他们人少，所以他们的主张没有被大会接受。不过，即使是阿拉什党的"温和"主张，也没来得及付诸实施，甚至还没来得及展开认真的讨论，就被1917年秋季传播开来的布尔什维克更加激进的阶级革命主张所淹没了。

总之，二月革命爆发后，中亚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后来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三个政权并存的情形。但是到1917年秋，这些政权的日子都越来越不好过，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影响和实力迅速增长，把其他政治势力日益排挤出中亚的政治舞台，为十月革命在中亚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节　十月革命和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合法政党，正式登上俄国的政治前台。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队伍迅速壮大，终于发动了俄国十月革命，并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

1917年4月16日，列宁结束国外流亡生活，回到首都彼得格勒。第二天，列宁就提出了有名的"四月提纲"。提纲的核心内容就是动员布尔什维克为夺取俄国的政权而斗争。同时，列宁在提纲中制定了夺取政权的策略，那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具体设想是首先排挤资产阶级政党把持的临时政府，由苏

维埃接管俄国的全部政权；然后通过努力，排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达到布尔什维克党掌管苏维埃和取得全国政权之目的。这就是列宁制定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

在“四月提纲”的指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广大工人、士兵和其他阶层的劳动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和革命组织工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和平、土地和面包”这样一些布尔什维克口号深入人心，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与日俱增。接连不断的群众游行示威往往成为布尔什维克向临时政府和全俄苏维埃施加强大政治压力的手段。从5月份起，临时政府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机”。

随着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执政当局更加感到不安和恐惧，临时政府总是想把它压下去。7月17日，在征得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后，临时政府派兵镇压了发生在首都的大规模群众示威。随后，政府借机以煽动叛乱的罪名镇压布尔什维克，事后成立了以社会革命党右翼分子克伦斯基（АФ.Кренский）为首的新一届临时政府，新政府拥有的权力更大。布尔什维克虽然遭到了严重打击，但是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通过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方针。

在这期间，中亚的局势演变方向与首都及全俄国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表现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

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中亚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还没有在组织上公开分裂，双方共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中工作，但是各自有自己的所属派别团体。1917年7月4~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突厥斯坦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06年3月召开的）。出席大会的31名

代表中有11名布尔什维克，他们包括舒米洛夫（Н. В.Шумилов）、索尔金（А.Ф.Солькин）、鲍曼（В .П .Бауман）、奇鲁尔（Ф. Я. Цируль）、利亚宾等重要人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的代表在大会上就如何看待临时政府、如何对待战争以及没收地主土地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双方仍然没有公开分裂。最后，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突厥斯坦边区委员会。边区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居少数地位。

但是这种地位丝毫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组织和个人积极贯彻列宁的“四月提纲”。他们提出了关于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立即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切实保障工人的权益以及废除民族压迫等一系列激进主张，因此在中亚地区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在俄罗斯族居民和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尤其如此。

布尔什维克在中亚的群众工作1917年夏见了成效。它倡导建立了有44个工会组织参加的突厥斯坦边区工会联合会中央局，军队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士兵也越来越多。此外，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穆斯林工人的组织工作，它在许多城市成立的穆斯林工人代表苏维埃当中影响很大，它还对中亚普遍出现的穆斯林劳动联盟和吉尔吉斯联盟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有一些中亚土著民族出身的工人或其他人士加入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中亚地区革命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中亚的临时政府机构却出现了危机。1917年5月1日，塔什干等城市爆发了声援彼得格勒反政府示威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同时反对本地临时政府的政策。最后，迫于广大民众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强大压力，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提出了罢免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主席谢普金的要求。6月，谢普金黯然下台，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原费尔干纳省副省长纳利夫金（В.П.Наливкин）接任临时政府

委员会主席之职。但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并没有使中亚的革命浪潮平息下来。

彼得格勒七月事变发生以后，中亚一些城市的苏维埃发表声明支持临时政府的镇压行动。7月25日，《我们报》刊登了一份由突厥斯坦临时政府委员会发布的文告，谴责布尔什维克借用革命的名义“危害自由事业”。这张报纸当天还刊载了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穆斯林委员会、边区临时政府委员会和突厥斯坦军区司令部联合发表的呼吁书，呼吁边区全体居民在临时政府及其地方机构的周围团结起来。[①]也是在同一天，塔什干苏维埃通过了谴责布尔什维克的决议。随后，浩罕和阿斯哈巴德等重要城市的苏维埃也通过了类似决议。在7月25~28日举行的突厥斯坦边区各省苏维埃、边区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委员会的代表联席会议上，一项将全部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的决定经投票获得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从此受到当局的严格限制，中亚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临时政府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局势的发展，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时有发生。继7月27日塔什干爆发两万人参加的抗议示威后，8月31日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示威群众先后来到临时政府委员会和边区苏维埃的办公大楼前面，举行抗议。最后，当局只得答应满足示威者的要求，游行队伍才慢慢散去。

9月上旬，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Л.Г. Корнилов）发动反革命叛乱，临时政府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束手无策。布尔什维克党挺身而出，组织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迅速平定了叛乱，科尔尼洛夫本人被捕。平叛以后，布尔什维克威望大增。全国各地的苏维埃纷纷转向拥护布尔什维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66~167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克，首都卫戍部队、工人赤卫队和外地很多驻军的士兵决定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指挥。俄国革命重新掀起高潮，布尔什维克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中亚的革命形势同样出现了转机。9月11日，塔什干举行的纪念二月革命半周年的集会结果变成了声讨科尔尼洛夫叛乱、抗议临时政府委员会保守无能、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妥协退让的大示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上升，当时由该党突厥斯坦中央局散发的一份传单写道："在革命的俄国，全部政权应当属于革命的人民和他们所创建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①]

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势力也不善罢甘休，所以双方的斗争从此更加激烈了。9月12日，突厥斯坦边区各团体组织在塔什干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边区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委员会操纵否决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全部政权立即转交给各级苏维埃的议案。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保卫革命自由的委员会"，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和突厥斯坦军区司令切尔克斯（Л.Н. Черкес）都是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委员。但是这个委员会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主要是因为士兵们为革命情绪所感染，根本不听上司的命令和调遣。

在革命情绪最为强烈的驻军第二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倡议下，塔什干的"革命民主派"组织于9月25日举行集会。会上推举14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其中4人为布尔什维克，5人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人为无政府主义者，3人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人士。参加集会的代表要求革命委员会接管权力，直至边区苏维埃改造完成为止。[②]同日，塔什干苏维埃进行改选，成立了新的执行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75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②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84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委员会，33名委员中有16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0名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委员增至7名，影响明显上升。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涅夫斯基（Н.И.Черневский）当选为执委会主席。边区临时政府委员会主席纳利夫金被迫承认革命委员会。

9月27日，《我们报》发表了革命委员会和塔什干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致边区人民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出，由于临时政府机构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从而导致人民的普遍不满。为此，革命委员会和塔什干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一道把政权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等激进势力夺取政权的开始。

临时政府机构对塔什干发生的事变感到十分恐慌。切尔克斯将军命令逮捕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不料此举引起塔什干革命士兵和民众的愤怒。在双方对抗的紧张气氛中，边区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一度出逃到斯科别列夫。

9月29日，《突厥斯坦公报》报道，边区一级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穆斯林委员会、农民苏维埃、吉尔吉斯人委员会都不承认革命委员会。[1]夺取政权的尝试宣告失败，这就是"九月事变"。其实，报道见报时，塔什干苏维埃已于前一天再次改造，布尔什维克在36名执行委员中占有8名。他们是：卡扎科夫（А. А. Казаков）、舒米洛夫、利亚宾、科列索夫（Ф.И.Колесов）、托博林、（И. О.Тоболин）、鲍曼、索尔金、茨维林（Г.М.Цвилинг），而当选的孟什维克佩尔申（А.Я.Першин）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这些人后来在中亚的十月革命和内战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塔什干苏维埃从此基本上控制着边区的局势发展。

边区临时政府委员会为了挽回局势，接二连三地向彼得格勒发电报请求援助。边区苏维埃主席费捷尔曼（М.Фитерман）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87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上甚至要求克伦斯基政府派兵前往塔什干镇压革命。10月1日，克伦斯基委任喀山军区司令科罗维琴柯（П. А. Коровиченко）将军为突厥斯坦军区司令，并致电要求他赶赴塔什干，“尽快用武力平定叛乱”。[①]

面对政府方面的反扑，塔什干苏维埃于10月3日发动政治总罢工。10月7日，科罗维琴柯率领军队开进塔什干。他刚上任就下令要严惩“叛乱分子”，并且强调“在军队内部恢复秩序”。但是因为很多士兵抗命，他于是被迫退让，并且于10月10日同塔什干苏维埃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取消市区军事管制，未经苏维埃同意不得解散和调走拥护革命的驻军部队，承认革命民主派和革命部队的代表不可侵犯，释放被捕的革命者等。[②]这样，历时7天的总罢工才宣告结束，对峙双方暂时取得了妥协。

1917年10月12~23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举行。大会围绕塔什干九月事件和组建边区新政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最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退出了大会。

在这期间，中亚各地的苏维埃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佩罗夫斯克、浩罕、塔什干、撒马儿罕等城市的苏维埃，陆续转到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其中，塔什干苏维埃在10月31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时局的重要决议。

此时，中亚的驻军士兵也公开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10月15日和30日，第一和第二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士兵先后宣布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89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②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192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同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边区机构中占到了多数。在中亚的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权也开始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

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在中亚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只要俄罗斯中央地区起义爆发，中亚地区就会马上起来响应。

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一举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国十月革命首先在首都取得了胜利。

11月7日当天晚上，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开幕（第一次代表大会是6月举行的）。大会宣布俄国全部政权归各级苏维埃所有。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宣布俄国将退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把全国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俄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等在苏维埃政权担任了重要职务。

彼得格勒起义胜利后，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苏维埃组织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或通过武装起义，或通过和平手段夺取了当地政权，到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个地方普遍建立起来了。

来自突厥斯坦的4名布尔什维克代表索尔金、科列索夫、弗罗洛夫（А.И.Фролов）、杰卡诺夫（Д.Т.Деканов）出席了全俄苏维埃第二代表大会。科列索夫还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把首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情况及时通报给了中亚地区的苏维埃机关和布尔什维克组织。

接到消息后，中亚的布尔什维克马上准备行动，中亚地区的十月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就在11月7日当天，塔什干苏维埃作出了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11月9日，塔什干苏维埃颁布的《公报》正式刊出了俄国临时政府已被推翻的电文。接着，塔什干苏维埃和边区临时政府委员会之间的斗争马上开始了。

在此之前，作为预防革命的手段，科罗维琴柯将军就将两个西伯利亚步兵团中革命情绪最强烈的士兵遣散了。11月10日，他又派兵占领了塔什干苏维埃所在地自由宫，逮捕了5名委员。同时，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主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乌斯宾斯基（К. Я. Успенский）和执行委员、布尔什维克卡扎科夫也被逮捕了。但是在解除第一和第二西伯利亚步兵团的武装时，科罗维琴柯的部队遇到了革命士兵和铁路工人的联合抵抗。塔什干武装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11月11日清晨，双方争夺塔什干城区的战斗打响。苏维埃一方成立了指挥起义军事行动的革命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佩尔申、舒米洛夫、利亚宾都是委员会重要成员。

头两天的战争异常激烈。苏维埃方面的兵力尽管明显不如科罗维琴柯的强大，但是起义者顽强作战，顶住了敌方的进攻。中亚其他地方的苏维埃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派人支援塔什干的起义武装，实际上也有不少武装人员从各城赶到了塔什干，参加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形势对起义一方变得有利了。

科罗维琴柯将军见取胜无望，便于11月12日提出同起义者进行谈判的要求，并且派外里海省的临时政府专员多列尔（Г. И. Доррер）伯爵为首席谈判代表。他企图用谈判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但是苏维埃方面要求科罗维琴柯无条件投降，结

果谈判很快破裂。

11月13日这一天是关键性的一天，塔什干武装起义的形势出现根本转折。当天清晨，起义武装向敌方发起猛烈进攻，接连占领了邮电局、电报大楼和几座军事要塞，并消灭了那里的守军，敌军开始败退。到夜间，塔什干整座城市几乎落到了起义者手中。龟缩在一个堡垒中的科罗维琴柯企图重新谈和，但是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无条件放下武器。走投无路的科罗维琴柯于当天深夜向革命委员会投降，战斗终于以起义者的胜利而结束。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士兵和工人武装取得了塔什干武装起义的胜利。

11月15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组成了9人临时执行委员会，其中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代表3人，农民苏维埃代表2人，吉尔吉斯委员会、穆斯林委员会、社会革命党边区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边区中央局的代表各一人。在临时执行委员会下面设立了由22人组成的常设会议，作为政府执行机构。参加常设会议的除上述边区一级各机关、党派、团体的代表以外，还有塔什干市苏维埃的3名代表和各工会组织的5名代表。但是，常设会议的多数成员属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囊括所有“革命民主派组织”的联合政府，却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所以，塔什干起义胜利后产生的边区新政权内部仍然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执和斗争。

1917年11月28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开幕。出席大会的共有114名正式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布尔什维克党、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等党派。其中布尔什维克和最高纲领派一起组成了阵营最为强大的代表团。

会议围绕成立什么样的政府展开了激烈争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坚持要按苏维埃俄国中央政权的样式建立边区苏维埃政

府，这个主张最终占了上风。经过大会投票，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会当中有7名成员是布尔什维克，8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他们全都是俄罗斯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科列索夫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虽然是联合政府，但是布尔什维克在人民委员会当中完全起着主导作用。新政府组成后，代表大会于12月5日闭幕。1918年1月1日，列宁代表全俄人民委员会发给突厥斯坦边区人民委员会的电报在报上全文公布，明确表示俄国苏维埃中央政权完全信任和支持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样，边区人民委员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塔什干是中亚尤其是突厥斯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交通枢纽。因此，苏维埃政权在塔什干的胜利对整个中亚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十分有利的。突厥斯坦边区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过程大体上是从塔什干沿外里海铁路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向各个城市展开的。从1917年11月起，首先在锡尔河省、撒马儿罕省和外里海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后是费尔干纳省和七河省。直到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才在突厥斯坦各重要城市建立。

交通比较便利、产业工人和俄罗斯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和矿区，如苦盏、乌拉秋别、库什卡、奇姆肯特、卡塔库尔干、佩罗夫斯克、铁尔梅兹和克孜勒-基亚、苏柳克塔等，在得知塔什干起义成功后不久，就由苏维埃接管了全部政权，而且一般都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带有和平夺取政权的色彩。1917年12月22日，塔什干所在的锡尔河省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12月17日，中亚名城撒马儿罕苏维埃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城市政权。12月26日，撒马儿罕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全部政权归各级苏维埃。但是后来经历了一番曲折才逐步巩固下来。



费尔干纳省是民族主义大本营，局势复杂。虽然12月20日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将政权转交给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组织，但是多数城市仍由反对派控制，直到1918年春。

外里海省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早在11月13日，克拉斯诺沃茨克建立统一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德米特里耶夫（В.Д.Дмитриев）当选为苏维埃主席。该市苏维埃通过决议，支持彼得格勒和塔什干的武装起义，拥护全俄和突厥斯坦的苏维埃政权。就在同一天，在查尔朱伊（今查尔朱）苏维埃大会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接管城市政权。11月30日，在阿斯哈巴德召开的外里海省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在本省成立苏维埃政权。并且选举产生了7人人民委员会，日特尼科夫（Я.Е.Житников）等3名布尔什维克当选为委员。随后，阿斯哈巴德、麦尔夫、克孜勒阿尔瓦特等城建立苏维埃政权。12月21日，外里海省临时政府被解散。1918年初，全省各地基本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局势仍然相当复杂，尤其是奥拉兹·谢尔达尔的民族委员会没有归顺苏维埃政权。

七河省是突厥斯坦边区哥萨克部队的大本营，又是边区镇压1916年民族大起义最惨烈的地方，因此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势力相当强大。南部山区如皮什佩克等地1918年1月才建立苏维埃政权，省会维尔内的哥萨克军在塔什干起义后解散了市苏维埃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后来，在从前线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领导下，经过长时间准备，革命武装于1918年3月2日发动起义并取得成功，到3月下旬，七河省的苏维埃政权才基本上确立起来。

在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除铁尔梅兹、新布哈拉、凯尔基、查尔朱伊等俄罗斯人聚居城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外，其他地方的情况无多大变化。

在哈萨克草原地区，十月革命的进展比突厥斯坦明显落后。

虽然很多地方的临时政府机构软弱无力，但是哥萨克控制着局面，使布尔什维克一时无法夺取政权，有些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又被推翻。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在1917年冬至1918年初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奥伦堡历来是草原区哥萨克部队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那里驻扎的哥萨克军队有55万人之多。十月革命以后，奥伦堡成为俄国国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中心之一，此地哥萨克的阿达曼（Атаман，即统领——作者注）杜托夫（А.И.Дутов）举兵与苏维埃政权对抗。1917年11月28日，他下令逮捕了以布尔什维克茨维林为首的奥伦堡革命委员会许多成员。

12月18~26日，以布凯汉诺夫为首的阿拉什党人在奥伦堡宣布建立阿拉什自治政府“阿拉什翰耳朵”（Алаш-орда）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布凯汉诺夫，委员有巴伊图尔西诺夫、然沙·多斯姆哈梅多夫(Жанша Досмухамедов）等知名人士。阿拉什政府与杜托夫若即若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大堆“施政”、“改革”的主张，但是这个政府终归是徒有其名，奥伦堡地区的所有权力实际上全部握在杜托夫手中。

11月下旬，草原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阿尔纠宾斯克宣告成立，后来布尔什维克津琴柯（В.Ф.Зинчеко）当选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2月5日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建立草原区第二个苏维埃政权。12月15日，布尔什维克在阿斯特拉罕省东部草原上的布克汗国（букеевская Орда）故都乌尔达建立了布克革命委员会。年底，手持列宁签署的委任状的布尔什维克切克马列夫（Чекмарев）率领一支波罗的海舰队水兵队伍来到库斯塔奈，他们于1918年1月7日推翻当地临时政府机构，成立苏维埃政权。随后几天，苏维埃政权相继在阿克莫林斯克、科克切塔夫（今科克舍套）、阿特巴萨尔等地建

立。至此，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在草原区任何一个省会城市夺得政权。

到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虽然在中亚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了，但是形势仍不容乐观。首先，中亚地区的反苏维埃势力白卫哥萨克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并没有遭到严重打击。相反，他们（尤其是民族主义者）重新集结起来了，对苏维埃政权形成了现实威胁。其次，苏维埃政权自身建设刚刚起步，各种机构、职能、制度都很不完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内部都有分歧和矛盾。直到1918年春，中亚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经历了内外各种斗争的考验以后，才初步巩固起来了。

第三节　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初步巩固

从1917年11月塔什干起义到1918年春，中亚一系列重要城镇和大部分地区陆续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反复和曲折。在许多地方，布尔什维克不仅要同临时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主义势力以及白卫哥萨克武装展开搏斗，而民族主义和哥萨克两股势力远比临时政府强大。穆斯林民族主义分子与俄罗斯人、哥萨克之间本来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但是为了共同对付苏维埃政权，他们往往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对于俄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应当说布尔什维克是相当重视的，或者说不敢掉以轻心。1917年4月1日，临时政府发表的声明强调保证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但是回避了敏感的民族平等如何实现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在“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重申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声称俄国境内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直至从俄国分离出去。10月11日，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承认在立宪会议制定的原则基础上实行所有


土库曼地毯

民族人民的自决权。”[①]可是，此时的临时政府风雨飘摇，自身尚且难保，怎么谈得上来实行各民族人民的自决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苏维埃政府一再表示要给予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以自决的权利。1917年11月15日，成立只有一个星期的苏维埃政府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名义发表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言宣布了苏维埃政府有关民族问题的三项原则：（1）俄国各民族的平等和自决权。（2）俄国各民族的自由自决直至分立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3）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和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②]

尽管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后再次重申了“民族完全自决”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14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的原则，但是领导人并不愿真正看到俄国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一个个地从国家中分离出去，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少数民族留在苏维埃俄国版图之内。所以在上述宣言中，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特别强调了他们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建立“俄国各族人民的自愿和真诚的联盟”。不过，这个宣言当时的意义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因为没有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加以贯彻。例如，以斯大林为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虽然受权负责实施《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公布的各项原则，但是该部一直没有拟定出相应的法令使之得以落实。

此外，俄国境内有几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它们分布面积很广，拥有人口众多的居民，在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长期遭受民族压迫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俄国广大穆斯林对十月革命反应冷淡，不少人甚至对革命怀有敌意。为了争取广大穆斯林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1917年12月5日，苏俄人民委员会专门发表了《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这个文告承诺：“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俗，你们的民族机关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无拘束地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权利这样做。要知道，你们的权利和俄国所有民族的权利一样，都受到革命和革命机关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全力保护。”[①]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告穆斯林书与《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一样，没有得到当局应有的重视和切实的贯彻。根据这个文告，苏俄政府于1918年1月底决定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之内设立了专门负责“穆斯林事务”的机构，由鞑靼人布尔什维克穆拉努尔·瓦希托夫（Мулланур Вахитов）掌管。但是，瓦希托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夫和他的机构操劳的不是如何实施各民族的自治和自决，而是如何控制遍布俄国中部和东部广大地区的形形色色的穆斯林民族主义组织。这种局面对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演变和解决发挥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中亚大多数民族主义人士甚至普通穆斯林民众看来，当地的“十月革命”似乎完全是俄罗斯人的内部争斗，是俄罗斯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推翻了同样是由俄罗斯人把持的临时政府。虽然也有一些穆斯林工人参加过塔什干的武装起义和其他地方的夺权行动，但是从整体来看，作为中亚居民主体的各族穆斯林是一群旁观者，对双方的斗争介入不深。事实上，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临时政府，在1917年11月的关键时刻双方谁也没有向穆斯林提出支援的请求。

中亚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并没有对各族穆斯林的自治要求给予应有的关注，更不用说满足这种要求了。这就使很多穆斯林感到失望，产生不满。加上中亚反苏维埃势力的挑动和策划，因此引起了较大规模的与苏维埃政权对抗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引发了民族武装暴动。

在推翻临时政府委员会以后举行的突厥斯坦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合党团于12月2日就建立政府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把边区人民委员会而不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而且，声明公开宣称：“在目前，吸收穆斯林参加边区革命政权最高机关是不可接受的，不仅因为当地居民对士兵、工人和农民代表政权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在当地居民中还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倘若他们在边区最高权力机关中设有代表处，党团还是会欢迎他们的。”[1]这个声明毫无掩饰地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表明俄罗斯革命者不相信土著居民。第二天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建边区人民委员会的指示的口气变得缓和多了，内称："人民委员会是由代表大会多数党派，包括有组织的穆斯林无产阶级群众代表参加组成的，这些代表也将拥有相应数量的席位。"[①]但是，实际上哪里有什么"有组织的穆斯林无产阶级"，因此代表大会选出的边区人民委员会15名成员中没有一个当地穆斯林的代表。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用其他手法争取穆斯林群众，但是做法并不那么恰当。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关于组建地方政权组织》的决议，决议指出，在那些已经成立了穆斯林苏维埃并积极开展活动的地方，要促使它们同俄罗斯人的苏维埃联合起来；在那些尚未建立穆斯林苏维埃的地方，要在工兵农苏维埃领导下尽快建立起来。12月23日，边区人民委员会依据决议颁布了一个专门决定，安排各地苏维埃合并问题。结果，省县两级苏维埃政权虽然有当地居民代表参加，但是决定权完全握在俄罗斯代表布尔什维克手中。

1917年12月6日，也就是苏俄人民委员会发表《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的第二天，突厥斯坦边区人民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呼吁书，号召边区全体居民起来同国民经济的崩溃作斗争，为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团结在新的人民政权的周围。同时宣布："将采取一切措施，在穆斯林劳动群众当中传播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的思想，以便加快各民族劳动群众的联合。"[②]根本没有提及穆斯林代表平等参加政权机关的问题。至于在边区实行民族自治或自决的问题，更是没有踪影。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X.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220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如此看来，突厥斯坦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群众产生了严重的隔阂，更谈不上得到他们的欢迎和支持。而临时政府的一些支持者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趁机提出了民族自治的主张，从而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些情况无疑增加了中亚苏维埃政权扎下根来的难度。

中亚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与布尔什维克大相径庭，加上中亚苏维埃政权在实行民族自治方面迟迟迈不出步伐，所以民族主义者积极筹划建立自己主导的自治政权。1917年11月底在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穆斯林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在塔什干召开，大会采取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立场。随后，边区各地的民族主义者纷纷离开塔什干等城市前往浩罕，因为早在9月中央穆斯林委员会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一时间浩罕成了民族主义力量的大本营。

边区的民族主义者于1917年12月10日在浩罕召开第四次穆斯林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不顾边区人民委员会代表波尔托拉茨基（П. Г. Полторацкий）的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决定成立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临时政府，通常称为“浩罕自治政府”。浩罕自治政府宣布自己是突厥斯坦惟一的全权政府，从而否认了苏维埃政权。政府由12名成员组成，原阿拉什党人、边区临时政府委员塔内什巴耶夫出任浩罕自治政府主席，中央穆斯林委员会主席卓卡也夫任对外联络局长，但是实权掌握在他手中。另外，成立了一个高级委员会，54名成员中有36个穆斯林，18个俄罗斯人，后者多是原临时政府的军政官员。

浩罕政府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代表边区各族人民的合法政权，而苏维埃政府只是俄罗斯人的政权。浩罕政府虽然没有宣布突厥斯坦脱离俄国独立，但是声明不允许任何俄罗斯人的政党（当然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干涉本地穆斯林的内部事务，不得

干涉他们在夏里亚特基础上组织政治和文化生活，不得干涉由穆斯林代表组成的边区和地方政权，其他民族（主要指俄罗斯人）只能按人口比例加入地方政权。[①]从性质上看，浩罕政府是一个民族自治政权，但是带有较浓的政教合一的色彩。正如当地的《穆斯林旗帜报》12月10日刊载的有关第四次穆斯林非常代表大会的一则报道中所说的："穆斯林自治的途径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古兰经》和《夏里亚特》指出的途径。"[②]

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政权不承认浩罕自治政府，为了进一步与"俄罗斯人"的苏维埃政权对抗，浩罕政府积极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其策动之下，塔什干一批穆斯林群众选择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那一天（12月26日）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浩罕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掌权。示威者要求释放政治犯，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多列尔（А.И.Доррер）。示威者企图把他推举为新政府首脑。很快，示威演变成为暴力冲突，示威者冲进了塔什干监狱，还扣押了市民警队队长。苏维埃当局动用武力进行镇压，结果有18名穆斯林示威者被打死。

这一严重的流血事件引起中亚穆斯林的普遍愤怒。为了安抚他们，平息事态，苏维埃政府答应尽快召开经全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从而保障土著居民的政治权利。但是，1918年1月18日，全俄立宪会议刚刚开幕就被苏维埃政府强行解散，因此在中亚召开立宪会议一事也就成了泡影。

直到1918年2月1~8日举行的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突厥斯坦自治"的决议草案，而且获得通过。但是这个决议只提到"努力建立边区无产阶级自治"，并指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

① M.瓦哈波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第260页，塔什干1961年俄文版。

② X.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309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治”。[①]这种把民族自治局限为阶级自治的做法使得在边区建立自治体制一事上毫无进展。

在同边区苏维埃政权进行对抗的日子里，浩罕自治政府深感自己实力薄弱，于是一方面抓紧组建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加强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进行联络与合作。

到1918年1月，浩罕政府费尽心机拼凑起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这支所谓的“伊斯兰军”由一个叫伊尔加什（Иргаш）的绿林好汉指挥。伊尔加什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民警队”。而俄罗斯军官恰内舍夫（М.Чаньшев）被浩罕政府任命为国防部长。

浩罕政府结交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主要有扎伊采夫（И.М.Зайцев）上校指挥的希瓦汗国境内哥萨克驻军，和据守在乌拉尔地区的杜托夫麾下的哥萨克部队。在1917年底，作为穆斯林代表的浩罕政府与上述两支俄罗斯哥萨克部队结成了反对突厥斯坦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联盟。

处于联合的敌对势力包围之中的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处境十分艰难险恶。尤其是杜托夫的军队控制着奥伦堡、特罗伊茨克、车里雅宾斯克等乌拉尔重镇，把整个中亚同苏维埃俄国中央地区的联系完全切断了。后来又有更加强大的高尔察克（А.В.Колчак）白卫军充当这个角色，因此直到1919年秋高尔察克覆灭之前，苏维埃中亚与苏维埃俄国中央地区及中央政府的联系时断时续。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政权在多数场合只能依靠不那么强大的塔什干卫戍部队和工人赤卫队来捍卫自己。

1月初，白卫部队推翻了外里海省查尔朱伊的苏维埃政权，恢复了临时政府机构。浩罕政权的代表和希瓦汗国的朱耐德汗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Джунаидхан）前往祝贺。不久，扎伊采夫的部队解除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新布哈拉（今卡甘）卫戍士兵的武装，这使反苏维埃势力大受鼓舞。杜托夫与扎伊采夫商定对塔什干进行夹击。

同月，扎伊采夫的军队很快攻进了撒马儿罕，接着向塔什干挺进。但是在罗斯托夫采沃车站一战，哥萨克军被一支3000人的苏维埃军队击败，退守撒马儿罕。不久，各路苏维埃军队赶到这里，扎伊采夫的主力被歼灭，他本人狼狈逃往阿斯哈巴德。

接着，苏维埃俄国政权决定拔掉杜托夫这个"奥伦堡楔子"，以便打通俄国中央地区同中亚的交通线，恢复两地间的联系。在苏维埃政府非常委员科博泽夫（П. А. Кобозев）的统一指挥下，来自俄国包括中亚各地的苏维埃武装兵分两路，合击奥伦堡。北路主力从特罗伊茨克出发，南路主力则从塔什干沿铁路线北上。哈萨克草原和突厥斯坦的革命士兵和赤卫队作为南路主力参加这次战役。

经过激烈战斗，苏维埃军队于1918年1月31日解放奥伦堡。杜托夫在主力被歼灭后，率领残部南逃，遁入图尔盖草原腹地。于是，乌拉尔地区处于苏维埃政权控制之下。

苏维埃军队胜利后，在奥伦堡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关，布尔什维克茨维林重新出任委员会主席，奥伦堡革命委员会管辖的范围包括乌拉尔地区和哈萨克草原。奥伦堡战役结束后，哈萨克草原上的城镇一个接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月底和2月初，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巴甫洛达尔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2月15日夜，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布尔什维克率领赤卫队向哥萨克部队发起进攻，次日占领市内各要害地点。17日，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省、市政权均转移到自己手中。2月19日，里杰尔（今列宁诺戈尔斯克）成立苏维埃

政权。另外，许多中小城镇的苏维埃也接管了政权。草原区另一重要城市乌拉尔斯克的情况比较复杂，1月底虽然宣布成立市苏维埃政权，但实权仍握在哥萨克手里。3月28日，即乌拉尔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接管全省政权后不久，哥萨克发动政变，逮捕了几十名苏维埃执行委员。

就在奥伦堡战役期间，浩罕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纷争，卓卡也夫取代塔内什巴耶夫担任总理职务。由于得不到哥萨克的有效支持，浩罕政府打算与刚刚建立的浩罕新城苏维埃妥协。但是，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利用有利时机，一举摧毁浩罕自治政权。

2月上旬，来自斯科别列夫、安集延、佩罗夫斯克和塔什干等地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在佩尔菲利耶夫（Перфильев）率领下向浩罕发起进攻，伊尔加什指挥没多少战斗力的"伊斯兰军"进行抵抗。浩罕新城苏维埃主席巴布什金（Е.А.Бабушкин）组织俄罗斯居民与苏维埃军队里应外合。2月11日，苏维埃军队占领浩罕新城。尽管敌方已经兵临城下，刚接替卓卡也夫的伊尔加什还是拒绝投降。2月20日，苏维埃军队攻占浩罕，"伊斯兰军"就歼，伊尔加什脱逃。卓卡也夫也设法逃走了，后来到了欧洲，浩罕自治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胜利者对"顽抗分子"进行清洗，有资料说至少杀了5000人，当地人说被杀的不下1万人。[1]此举在当地居民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费尔干纳省后来长期成为"巴斯马奇运动"的根据地。

浩罕自治政府覆亡以后，突厥斯坦还有两个省——外里海省和七河省的政权没有完全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里。

塔什干起义胜利后，外里海省的临时政府当局企图不承认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外里海省的苏维埃宣布夺取政权以后，

①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105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阿斯哈巴德等地经常发生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奥拉兹·谢尔达尔为首的军事当局还宣布在阿斯哈巴德实行军管，但是民众并不完全服从，使局势朝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方面转化。2月22日，突厥斯坦边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科列索夫和劳动委员波尔托拉茨基率兵抵达阿斯哈巴德，依靠当地民众驱逐了奥拉兹·谢尔达尔的民族主义志愿军，成立外里海省人民委员会。不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苏维埃仍然与外里海省苏维埃政府进行对抗，而且4月召开的外里海省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宣布剥夺人民委员会的权力。但是人民委员会拒不服从这一决定，握住权力不放，双方一直对峙到5月12日外里海省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在阿斯哈巴德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支配下，决定解散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阿斯哈巴德等城市的苏维埃，另行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行使权力。革命委员会下令取缔除红军和赤卫队以外的任何武装。大会通过选举成立了外里海省人民委员会，7名人民委员中有布尔什维克3人，左派社会革命党2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和无党派民族人士各1人。布尔什维克捷利亚（ В. Т. Телия ）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七河省的局势同样错综复杂。南部吉尔吉斯人聚居地区的叛乱在2月间被苏维埃军队平定。3月上半月，七河省哥萨克军人委员会在维尔内附近索菲火车站开会，要求苏维埃政府将权力移交给反布尔什维克的“临时联合委员会”。随后，哥萨克与赤卫队发生冲突，并且包围了维尔内城。守城的苏维埃军民进行顽强抵抗，双方僵持到4月下旬签订了停战协定。不久，叛军重新发起进攻，但是守军得到塔什干等地的苏维埃援军的有力增援。5月19日，双方展开激战，哥萨克的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七河省的苏维埃政权巩固下来了。

在巩固中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认识到本地

穆斯林群众的力量，于是在消灭浩罕自治政府以后，着手在突厥斯坦边区筹划建立自治体制，而且根据苏俄中央政权机关的精神积极行动。

1918年1月25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言》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①]《宣言》最后强调这只是"根本原则"，"至于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这应当由他们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②]但是要在中亚地区做出这样的决定还要付出特别的努力。

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的落后，苏俄中央政府对突厥斯坦边区的实际情况和民族情绪并不十分了解，因此没有对在边区实行民族自治及时进行部署。例如，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在3月23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在好几个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制度的打算，却没有提到突厥斯坦应建立自治制。[③]3月31日，塔什干苏维埃主席托博林在向同事通报自己与斯大林通电话一事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中央对我们的情况很不熟悉。"[④]但是，突厥斯坦的布尔什维克觉得建立自治体制的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

经过紧张筹备，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4月20日在塔什干开幕。出席大会的200多名正式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6人，左派社会革命党70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

①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10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45~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④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命党17人，无党派人士87人。这当中共有120名穆斯林。

苏俄中央政府派往中亚的特别代表科博泽夫在大会上就突厥斯坦实行自治的问题做了专门报告。大会代表围绕如何在边区实现自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还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占了上风。

4月30日，代表大会通过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条例》。条例指出："突厥斯坦边区的领土被宣布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突厥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又说："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实行自治，它承认并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中央政府协调行动。"[①]条例还对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土范围、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地方机关的构成和职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关于共和国的领土范围，条例宣布即原突厥斯坦边区领土范围，希瓦汗国和布哈拉酋长国除外。大会选举产生了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权力）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最高执行（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前者由36人组成，其中3人为穆斯林，主席就是中央特别代表科博泽夫；人民委员会由14人组成，其中2人为穆斯林，主席是科列索夫。

5月1日，在塔什干举行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成立的庆典，共有4000多人参加。代表大会也于当天宣布闭幕。

突厥斯坦宣布实行自治，但是这个自治与边区穆斯林特别是各族民族主义人士期望的自治仍有很大差距。虽然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将近一半是穆斯林，但是被选进自治共和国最高机关的穆斯林却微乎其微。这样，广大穆斯林的利益即使在"自治体制"下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此外，突厥斯坦实行的自治是地区自治，而不是真正的民族自治，这也是需要指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出的。

突厥斯坦宣布自治得到了苏维埃俄国中央政府的认可。4月22日，列宁和斯大林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致电突厥斯坦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电报说："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人民委员会一定会支持你们边区根据苏维埃原则实行自治。"电报还提到请大会派代表到莫斯科来，以便共同解决边区"全权机关"同苏俄人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①]

1918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7月19日，宪法开始生效。宪法承认俄国境内"不分种族和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规定："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区域的苏维埃，可以联合成自治区域联盟；……这些自治区域联盟根据联邦原则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②]这样，双方的关系有了一个法律基础。

为了弄清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关系，一个突厥斯坦特别代表团于7月18日抵达莫斯科（1918年3月，苏俄迁都莫斯科）。在代表团要求下，苏俄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特别代表团一位成员说："土耳其斯坦（即突厥斯坦——作者注）共和国宣布自治管理并不是土耳其斯坦要分离和独立于俄罗斯中央，而是表现了土耳其斯坦在遵照俄罗斯中央政权的指示和命令行事的同时，有更大的独立自主权和自治权。"[③]

专门委员会明确承认了突厥斯坦的自治权。但是在如何划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谢·谢·斯图坚尼金：《苏维埃宪法史》（文件汇编），第1分册，第163页，1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8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分共和国和联邦中央的权利和义务一事上，双方意见不一。因此，突厥斯坦政府基本上按照自己对“自治权”的理解来行使权力。1918年10月，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宪法在第六次非常苏维埃大会上获得通过，进一步在法律上确认了这种自治权。不过，突厥斯坦的布尔什维克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开始进行新的政治社会建设工作。

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马上着手政权机关的建设。边区和后来的共和国建立了各级苏维埃及其各种职能机关，包括军事、安全、财经、文教等部局都陆续建立起来了。它还有外交机构，并且同布哈拉、希瓦两个君主国签订了条约，与两个君主国及中国和伊朗的边境城市互派外交代表。1918年春，突厥斯坦建立了自己的红军，而且把旧军队直接编入红军。肃反委员会（契卡）和革命法庭、警察机构也在边区建立起来了。

在社会经济领域，突厥斯坦的苏维埃政权仿效苏俄中央政府进行“革命改造”。在工厂，先是实行“工人监督”，后又开展“国有化”，不仅铁路、银行、矿山和大企业被宣布国有化，而且连中小企业也企图国有化。1918年初，突厥斯坦开始搞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在有些地方，甚至推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成立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不过，这些经济改造措施收效甚微，甚至对国民经济起了消极和破坏作用，这是因为突厥斯坦经济发展落后，搞上述各种激进改革完全脱离了实际。此外，当时突厥斯坦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粮食和其他食品供应极其紧张，居民连最起码的食品供应都无法保证，当局被粮食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能力去落实那些“社会主义改造措施”呢。

在突厥斯坦新政权建设中，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值得一提。直到中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地的布尔

什维克甚至没有自己统一的组织。1918年6月，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共有20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党员共2000余人。[1]为了加强党对共和国的领导，巩固苏维埃政权，1918年6月17~25日，突厥斯坦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代表会议在塔什干举行，讨论建立共和国统一的共产党的问题。会后，突厥斯坦共产党很快建立起来了，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当时的党员基本上是俄罗斯人。

突厥斯坦共产党在组织上是服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2]中央的，但是它有相当的自主权力，而且在某些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中亚土著民族问题上与俄共（布）中央多次出现分歧。同时，突厥斯坦共产党内部也经常为这些问题发生争论。此外，除突厥斯坦共产党以外，突厥斯坦还有一些其他较小的共产党组织。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决定在突厥斯坦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成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但是作为州一级党组织并人俄共（布）。7月，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成立，成为当地党的最高机关。因此，直到内战结束之际，俄共（布）中央才真正掌握了对突厥斯坦共产党的领导权。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330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②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第三章 中亚的内战

第一节 中亚反苏维埃政权白卫势力的覆灭

到1918年3~4月间，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了。3月3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同德国及奥匈帝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正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喘息时机。以列宁为首的苏俄领导人打算开始进行恢复国民经济、重建国家社会的工作，但是紧接着爆发的内战把这个计划打破了。

原来，在1917年11月至1918年春，反布尔什维克的势力虽然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它们还是保存了相当的实力。这些敌对势力包括：沙皇旧政权的反动将领及他们统领的旧军队、大部分哥萨克武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及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同路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有众多的民族主义政党团体，乃至外国干涉军等等，它们被苏维埃政权统统称为“白卫分子”和“白卫军”。在同样敌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协约国支持下，白卫势力于1918年春夏之交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且马上蔓延到俄国的广大地区。就这样，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遭到国内外强敌的四面夹击，俄国从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的

全面内战之中。

在惨烈的内战期间，俄国苏维埃政权好几次处于极其险恶的境地，但是布尔什维克依靠俄国革命的工人、士兵及农民，奋起反击，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击败了所有的叛乱武装和外国干涉军队。到1920年底，俄国内战基本结束，苏维埃政权经过空前严峻的考验，立稳了脚跟。在中亚地区，内战的进程和整个俄国大体上是一致的。在1920年春，中亚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就基本战胜了白卫势力（巴斯马奇武装例外），比全俄国范围的苏维埃政权胜利还早几个月。而且，随着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内战中不断取得胜利，中亚地区的自治体制在以列宁为首的全俄苏维埃政府关注下不断走向完善。

苏维埃俄国内战的第一把烈火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点起的。退出世界大战以后，苏俄政府根据协议，将已经重新武装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战俘运送到远东，让他们从那里乘船前往西欧，协助协约国作战。[①]1918年5月，搭乘数十列火车东进的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官兵在协约国顾问的挑动下发动兵变。当时，列车正行进在乌拉尔至西伯利亚的漫长铁路线上。兵变发生后，军团官兵向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起猛烈进攻。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兵变不仅得到协约国的全力支持，而且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呼应，为此这两个党被开除出各级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于是自行成立“政府”，与莫斯科分庭抗礼。一时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极度危急之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动兵变的地区正好靠近中亚北部的哈萨克大草原，那里的一系列城市正是叛军要攻占的重要目标。因此，中亚地区的内战一开始就和全国的战局紧紧地联系在一

① 这些战俘原来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役，在同俄军的战斗中被俘。由于协约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奥匈帝国独立，因此苏俄装备了这批战俘。

起。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装备精良，又有各路叛军策应，很快攻占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地区许多重要城市，最西占领了喀山。哈萨克草原区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阿克莫林斯克、阿特巴萨尔、库斯塔奈、塞米巴拉金斯克等重镇很快落入叛军之手。6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举夺取原草原区首府鄂木斯克。不久，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两省全部陷落。年初被苏维埃击溃的杜托夫也卷土重来。早在1918年3月，杜托夫的部下攻占了乌拉尔斯克，并且在该省征召了2.2万名哥萨克军人，而苏维埃政府同期只征集了2000人。时任萨马拉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В.В.Куйбышев）忧心忡忡地向列宁报告："哥萨克不再摇摆不定了。我们以往半年的努力毫无结果，没有能够把劳动哥萨克吸引到革命方面来。"[①]

7月，杜托夫的哥萨克部队重新攻占乌拉尔—哈萨克草原重镇奥伦堡。叛乱接着蔓延到突厥斯坦的七河省等地。早在1918年4月，七河省会维尔内一带就发生了哥萨克叛乱，6月才被镇压下去。现在，哥萨克叛乱在七河省重起，并且得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哥萨克首领安年科夫（В.В.Анненков）的大力增援。哥萨克部队切断了维尔内同北面的红军七河战线的联系。

哈萨克草原地区绝大部分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只有图尔盖高地南部、布克草原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地方的几个俄罗斯移民村镇还掌握在苏维埃军队手里。例如，在移民镇切尔卡斯，苏维埃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击退了强敌的猛烈进攻。

为了击垮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及其他叛军的进攻，苏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经过紧急动员，苏俄红军组建了强大的东方战线，展开全线反攻。从9月10日到10月7日，东方战线

①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00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的红军接连攻克喀山、辛比尔斯克、萨马拉等重要城市。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败局已定，只得放弃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对抗，军团官兵陆续开往远东，离开俄国经海路开赴欧洲战场。

11月，东方战线的红军集中力量开始对盘踞在乌拉尔地区的杜托夫哥萨克军进行打击，哥萨克军力战不支。1919年1月，红军再次解放奥伦堡及乌拉尔斯克，杜托夫的主力脱逃，遁入草原。其他叛军也没遭到致命打击，鄂木斯克不久落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手中。至此，哈萨克草原区的内战暂时告一段落。

在1918年内战期间，哈萨克草原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配合苏俄主力红军作战，开始组建地方红军，其中包括忠于新政权的哈萨克民族军队。具体做法最初是招募志愿兵，后来根据5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征召义务兵。1918年秋，第一支哈萨克民族红军布克草原骑兵团组建成功。接着在詹吉尔金和阿曼格尔德·伊马诺夫的领导下，在图尔盖组建两个哈萨克骑兵连，在伊尔吉兹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后来，更多的哈萨克骑兵和步兵团队组建起来了。这些民族部队大多参加了平定高尔察克叛乱的严酷战斗。

高尔察克（А.В.Колчак）原先是沙皇政权的海军上将，在协约国支持下，他在西伯利亚集结了一支庞大的白卫军，号称40万之众。1918年11月18日，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发动政变，推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政权，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准备向苏维埃政权发动大规模进攻。

1919年3月4日，自恃有协约国撑腰的高尔察克统率25万大军从鄂木斯克誓师出发，西进攻打苏维埃政权。高尔察克的白卫大军装备精良，又有充分准备，因此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越过乌拉尔山脉，直抵伏尔加河东岸。哈萨克大草原北部不少城镇被高尔察克的军队所占领，当地苏维埃政权

被迫撤走了。

高尔察克起兵以后，哈萨克草原各处的白卫哥萨克纷纷响应。杜托夫接受高尔察克授予的中将衔，并率领部队倾巢而出，与格·别洛夫（Г.П.Белов）将军指挥的高尔察克南路军合围奥伦堡。奥伦堡的苏维埃军队和工人武装在韦利卡诺夫（М.Л.Великанов）带领下从4月坚守到6月，直到主力红军反攻。另一支哥萨克军在托尔斯托夫（В.С.Толстов）率领下早在1918年3月占领了乌拉尔河口城市古里耶夫（今阿特劳），后来他自封为乌拉尔斯克省的哥萨克阿达曼。1919年3月，托尔斯托夫与高尔察克勾结，受封为少将，接着起兵占领了里海与咸海之间大片地区。从4月20日起，托尔斯托夫的哥萨克军攻打乌拉尔斯克城，守城的苏维埃军民在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П.Г.Петровский）带领下顽强抵抗，坚持到7月11日解围。

与高尔察克主力作战的任务再次落到了东方战线红军的肩上。东方战线的红军兵分南北两路，对高尔察克展开强大反攻。靠近哈萨克草原的南路红军在名将伏龙芝（М.В.Фрунзе）的指挥下于4月底拉开了全面反攻的帷幕。随后，南路红军接连取得几个重要战役的胜利。6月9日，又收复乌拉尔重镇乌法，高尔察克的主力遭到重创。

苏俄内战时期红军的传奇英雄恰帕耶夫（В.И.Чапаев，旧译夏伯阳）当时任南路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他在乌法等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接着参加乌拉尔斯克解围之战。9月在乌拉尔河西岸的勒比先斯克（今恰帕耶夫）城下的战斗中阵亡。

高尔察克白卫军自乌法战役失败后向东撤退。东方战线的红军稍事休整，1919年初秋推进到哈萨克草原。8月14日，伏龙芝指挥新成立的突厥斯坦战线红军在阿克纠宾斯克与格·别洛夫

的叛军南路主力展开决战，红军方面担任主攻的是格·季诺维也夫（Г.В.Зиновьев）率领的第一军。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苦战，红军歼灭了别洛夫的有生力量，并且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军队会师。随后，红军横扫哈萨克草原。

阿克纠宾斯克战役刚刚打响，8月20日，以图哈切夫斯基（М.Н.Тухачевский）指挥的第五军为主力的东方战线红军开始实施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高尔察克纠集其北路主力进行顽抗，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战役到11月4日才结束，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于10月间被红军收复。

在上述两次战役期间，库斯塔奈、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等草原区重要城市先后被主力红军和地方苏维埃部队解放。11月，东方战线的红军一举攻克高尔察克的老巢鄂木斯克。高尔察克只带着少数亲信向东逃窜，次年2月在伊尔库茨克被当地苏维埃法庭处死。

高尔察克主力就歼以后，杜托夫率领余部仓皇逃往七河省。1920年3月，遭到红军痛歼，残部又逃窜进入中国新疆。托尔斯托夫的白卫哥萨克武装在1920年1月的乌拉尔斯克—古里耶夫战役中遭到突厥斯坦战线红军给予的毁灭性打击。托尔斯托夫率残部逃至里海东岸的曼格什拉克（今曼格斯套），不久便被彻底消灭，托尔斯托夫逃往国外。盘踞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安年科夫哥萨克军1920年失败后，少数残兵败将也逃到了中国新疆。总之，到1920年3月，哈萨克大草原四省（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及布克草原的反苏维埃叛军被全部肃清。

在这期间，哈萨克民族主义政权阿拉什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命运。1918年春，阿拉什的几个领导人先后同苏俄领导人列宁、斯大林会晤或致电谈判，提出自治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

应。[1]由于阿拉什党人不满布尔什维克独占哈萨克草原区各级政权，因此他们一度与白卫势力进行过联系。杜托夫利用阿拉什政府建立军队的想法，帮助它组建了两个哈萨克骑兵团，一个驻库斯塔奈，一个驻伊尔吉兹，但是杜托夫控制了这些民族部队。同样，1918年8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组建的一个哈萨克骑兵团处在安年科夫控制之下。[2]阿拉什党人后来倾向支持高尔察克，但是高尔察克根本不信任他们，他不仅拒绝了阿拉什党人提出的组建民族武装的要求，反而要哈萨克人每年为他支付600万卢布军费。1918年10月，高尔察克公开镇压哈萨克民族主义运动，阿拉什党人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在詹吉尔金的劝说下，阿拉什的重要领袖巴伊图尔西诺夫和多斯姆哈梅多夫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且一度参与了哈萨克地区的苏维埃政权重建工作。

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哈萨克草原逐步从白卫军的占领下摆脱出来，在哈萨克地区重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首先是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得到恢复，然后苏俄政府筹划建立哈萨克地区统一的苏维埃政权，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建立过统一政权，只建立过各省的苏维埃政权。

1919年7月10日，哈萨克草原的内战还在激烈进行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建立吉尔吉斯边区（当时哈萨克人仍被称为吉尔吉斯人）革命委员会的法令。法令规定边区革命委员会管辖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四省和阿斯特拉罕省东部的布克草原。革命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是俄罗斯人，主席佩斯特科夫斯基（C.C.

①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19~220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05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Пестковский）也是俄罗斯人，只有两名委员是哈萨克人，即1918年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詹吉尔金和明达希夫。1920年1月，边区革命委员会进行改组，吸收了一些哈萨克人，其中包括阿拉什的著名领袖巴伊图尔西诺夫和卡拉塔耶夫等。革命委员会下设劳动和社会保障、国民经济、土地、司法、粮食、工农检查、邮电、国民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部、局。同时，革命委员会制订了建立自治体制的有关条例，积极协调边区同俄罗斯联邦、边区同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1920年1月2日，全俄工农国防委员会决定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将其全部权力移交给同级苏维埃机关。1月3~11日，哈萨克草原地区的280多名代表在阿克纠宾斯克召开边区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边区各省联合组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并加入俄罗斯联邦。会后，边区境内举行了各级苏维埃选举。

1920年8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关于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法令规定，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自治共和国的领土包括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布克翰耳朵等省，以及里海东岸的曼格什拉克县（从突厥斯坦外里海省划来）。9月22日，奥伦堡省划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共和国总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自治共和国首都设在奥伦堡。据1920年底统计，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有人口4781300人，其中哈萨克人（当时仍称作吉尔吉斯人）占50.3%，俄罗斯人占31.2%，乌克兰人占14.4%，其他民族只占4.1%。农村人口占91.2%，城市人口占8.4%，其余0.4%居住在小城镇。自治共和国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2.5人。[①]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21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20年10月4~12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在奥伦堡举行，大会宣布自治共和国正式成立，公布了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和首都。大会通过了《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言宣布："每个民族都享有在所有国家机关和任何一所学校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享有本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保证的一切权利。"[①]但是这些原则在以后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遵循和实现。宣言更强调与俄罗斯联邦的一致："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复兴，只有在全面的经济互助以及其经济政策与俄罗斯联邦其余部分所实行的政策相协调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为此，它（指代表大会——引者注）决定，吉尔吉斯共和国不应实行经济独立政策，而应实行完全统一的并由俄罗斯联邦相应人民委员部直接领导的财政经济政策。"[②]

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自治共和国的政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由内务、司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农业、粮食、财政等人民委员部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组成。哈萨克人缅杰舍夫（С.М.Мендешев）当选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人拉杜斯-津科维奇（В.А.Радус-Зенкович）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阿拉什党人巴伊图尔西诺夫当时被排斥，后来出任教育人民委员。

内战期间，哈萨克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了。1920年4月30日，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吉尔吉斯局，同时通过了在吉尔吉斯边区成立地区临时党委会的决议，艾季耶夫（А.Айтиев）、詹吉尔金等哈萨克党员成为地区党委会成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49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1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员。1921年6月，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奥伦堡举行，经过选举，组成了俄共（布）州一级的党委会。

内战结束以后，哈萨克民族主义运动迅速低落下去。以布凯汉诺夫为首的阿拉什政权在内战期间实际上没有起多少作用，它组建的民族军队基本上没有独立作过战。阿拉什政权开始倾向俄罗斯白卫势力，后来转而支持俄罗斯红色政权。1920年4月，阿拉什政府归顺苏维埃政权，阿拉什的民族军被红军收编，后来甚至有些阿拉什党人加入了共产党。

但是，哈萨克苏维埃政权与以阿拉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斗争还继续了一段时间。1920年9月，苏维埃政权宣布剥夺伊斯兰教士、沙皇地方政府和阿拉什政府的官员等“特权阶层”的选举权，此举遇到强烈抵制和批评。所以，自治共和国政府又一度放宽了对民族主义者的限制，允许“受过教育”的哈萨克人担任公职，甚至还用没收俄罗斯富裕移民和哥萨克的土地的方式取悦当地居民。可是在1921年10月举行的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阿拉什人士遭到公开抨击，他们担任的职务被撤销。1922年2月19~27日召开的吉尔吉斯边区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是猛烈攻击民族主义，对“向民族主义让步”的共产党员提出了严厉警告和谴责。随着对政府机构和党组织进行清洗和改组，哈萨克草原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被清除出中亚的政治舞台，从此转入地下活动状态。

与哈萨克草原地区相比，中亚南部的突厥斯坦的内战虽然战斗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是斗争的复杂程度比草原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突厥斯坦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同白卫势力进行过激烈较量，而且内部的争论和斗争也十分激烈。

前面提到过，突厥斯坦东北部的七河省内战与草原区的战局紧密相连，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同时，突厥斯坦另一个省位

于西南部的外里海省的反苏维埃叛乱来势猛烈。这样，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中心地区锡尔河省、撒马儿罕省、费尔干纳省处于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特别是浩罕自治政权覆灭以后，其残存势力转入费尔干纳乡村地区，组成反苏维埃的巴斯马奇运动，成为共和国的心腹之患。这样，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要在几条战线上同敌人展开搏斗。

反苏维埃叛乱首先在外里海省爆发。1918年6月，省会阿斯哈巴德发生大规模的反苏维埃暴动，暴动者解散苏维埃政府，答应举行新的选举。该省其他不少地方也发生类似事件，全省绝大多数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处于瘫痪状态。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政府闻讯后，马上派特命全权代表弗罗洛夫（А.И.Фролов）前去平息事态，弗罗洛夫极力主张采取强硬措施，进行血腥镇压，不料这样一来反而促使叛乱进一步扩展。弗罗洛夫到达克孜勒阿尔瓦特后就被暴动者杀死。7月11日，由于英国出资支持，叛乱分子夺取外里海省的政权，建立由白卫军人、土库曼部落首领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外里海省临时政府，首脑是社会革命党人丰季科夫（Ф.А.Фондиков）。

临时政府采取极端的反苏维埃政权措施，大批苏维埃政府官员遭到逮捕。7月23日，外里海省人民委员会主席捷利亚（В.Т.Телия）、委员日特尼科夫（Я.Е.Житников）、莫利博日科（С.М.Молибожко）、罗扎诺夫（Н.И.Розанов）、阿斯哈巴德市苏维埃主席巴特米诺夫（В.М.Батминов）等9名苏维埃政权负责人在阿斯哈巴德郊外遭枪杀。外里海临时政府对1918年9月20日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邵武勉（С.Г.Шаумян）等26名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负责人在外里海省西部（今26名巴库委员城）遭到枪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外里海临时政府控制了除库什卡的外里海省全境。为了维持下去，一方面它向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建议，在边区保

留双方的政权，直至立宪会议召开。另一方面它向驻扎在邻近外里海省的伊朗东北部的英国将军马勒松（Malleson）求援。此外，它还同奥拉兹·谢尔达尔上校的部队进行谈判，实行合作。

但是，苏维埃政权断然否定外里海临时政府。1918年8月，苏维埃军队从查尔朱伊发动反攻，很快占领了外里海重镇麦尔夫，但临时政府在驻伊朗英军支持下，不久夺回了麦尔夫与库什卡。1919年2月，苏俄红军开始向外里海省进攻，临时政府抵挡不住。6月，英军见无法挽回败局，便撤回伊朗境内。7月初，红军攻占战略重镇克孜勒阿尔瓦特，阿斯哈巴德西边门户洞开。7月9日，谢尔达尔上校弃城而逃，临时政府作鸟兽散，红军收复阿斯哈巴德。为纪念被白卫军枪杀的曾为建立外里海省苏维埃政权作出贡献的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波尔托拉茨基（П.Г.Полторацкий），阿斯哈巴德改名为波尔托拉茨克（Полторацк，1927年改名为阿什哈巴德，Ашхабад）。红军继续扫荡外里海省境内残敌。1920年2月6日，红军克复里海重要港口克拉斯诺沃茨克，俘虏白卫官兵1600多人。到年底，外里海省的反苏维埃势力被彻底肃清。

在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中心地区，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敌人巴斯马奇暂时还没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斗争主要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展开，后来更多地是围绕如何对待本地穆斯林而进行的激烈争论和较量。

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发动兵变，结果被布尔什维克清除出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共产党在10月举行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决裂了。不过局势依然紧张。1919年1月19日的凌晨，自治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奥西波夫（К.П.Осипов）率领一支驻军发动军事政变，当天就占领塔什干城，逮捕并杀害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沃京采夫（В. Д. Вотинцев）、人民委员会主席菲格尔斯基（В. Д.Фигельский）（他们是1918年11月当选的）、人民委员马尔科夫（А.Н. Марков）、佩尔申、肃反委员会主席福缅科（И. П.Фоминко）、（塔什干市苏维埃主席舒米洛夫）等14名领导人。政变两天后被红军平定，奥西波夫逃往费尔干纳投奔巴斯马奇分子，后来又去了布哈拉酋长国避难。这次政变虽然被平定了，但是暴露了自治共和国政府施政方面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同当地穆斯林群众的关系。

1918年6月在塔什干举行的突厥斯坦共产党组织首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允许土著穆斯林进入苏维埃机关和共产党组织的议题。后来，地区党组织提出吸收有文化的本地人入党，让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与穆斯林群众之间的桥梁。在1919年3月举行的边区党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团结穆斯林成了主要的议题。不少从贾迪德运动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大会选出的边区党委会由7名俄罗斯人和3名穆斯林组成，科博泽夫任书记。更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党委会中设立穆斯林局，负责制定推行共产党对穆斯林的政策，该局由在民族问题上相当开明的图拉尔·雷斯库洛夫（Турал Рыскулов）和图尔松·霍贾耶夫(Турсун Ходжаев)主管。

但是突厥斯坦党委会的民族政策遭到自治共和国政府方面的抵制和反对。1919年1月塔什干政变平息后先后担任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卡扎科夫（А.А.Казаков）坚持反对吸收穆斯林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5月底，参加突厥斯坦第一次穆斯林共产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发言攻击当权集团："我们被迫容忍已形成的'特权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对本地人的敌视态度，这种态度甚至存在于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当中，存在于理应把关心本地人作为自己的职责的当权人物当

中。”[①]

苏俄中央政府似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它于7月12日致电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政府，要求后者吸收穆斯林参加工作。但是在讨论电报的党政联席会议上，卡扎科夫的意见压倒了科博泽夫。结果会议决定向莫斯科发一封电报，解释为什么不让穆斯林参加地方政府工作的理由，甚至决定不发表莫斯科来电的内容。[②]

苏俄中央政府对此还是不放心。1919年9月，突厥斯坦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在塔什干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后同意让本地人在自治共和国政府中占多数，穆斯林出身的雷斯库洛夫担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俄罗斯人柳比莫夫（И. Е. Любимов）担任。

在1920年1月举行的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主义者取得了重要“胜利”。当地人共产党员占了大会代表的大多数，他们在雷斯库洛夫带领下，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把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的“突厥民族”共和国，同时突厥斯坦共产党改为“突厥民族”共产党。此举表明，不少当地的共产党员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他们要把突厥斯坦变成俄国境内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的统一体，同时要吸引境外的突厥语民族。美国中亚史专家爱德华·艾耳渥斯（Edward Allworth）认为，这是本地共产党员“给他们还是贾迪德分子时所抱的古老的大突厥斯坦梦想注入新的生命力”。[③]这次大会还选举当地人图尔松·霍贾耶夫任新的党委会书记。但是本地共产党员越来越明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3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③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3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最后被压下去了。

早在1919年10月8日，即高尔察克溃败和中亚与俄国内地的交通刚刚恢复的时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一个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格鲁吉亚人埃利亚瓦（Ш. З.Элиава），委员有古比雪夫、伏龙芝、鲁祖塔克（Я.Э.Рудзутак）、戈洛谢金（Ф.И.Голощёкин）、博基（Г.И.бокий），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穆斯林。最初给委员会的任务是肃清突厥斯坦共产党员中的"大俄罗斯主义"。年底，委员会到达突厥斯坦，确实清洗了一些被认为是"大俄罗斯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并把他们调离中亚。经过委员会的努力，1916年暴动失败后被剥夺了土地的暴动者收回了他们的土地，无地的农民不分民族一概分给土地，投机商、旧警察以及旧官僚中那些"不适宜于新突厥斯坦"的人，统统被驱逐出突厥斯坦。[①]

但是在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发现，民族主义成了最大的威胁。伏龙芝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对当地人让步过多会导致巴斯马奇运动的加强。有鉴于此，俄共（布）中央于1920年3月8日就突厥斯坦自治条例和突厥斯坦党组织章程发了一个指示，强调指出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突厥人的自治共和国，而是"居住在那里的各主要民族：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自治共和国"。[②]从而否定了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突厥语民族统一体的主张。

在纠正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党员干部中"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的过程中，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

① 参见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30~31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18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的权力迅速膨胀，它从一个监督性质的机构演变成了凌驾于当地苏维埃政府之上的独立的政权机关，越来越经常地颁布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

鉴于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权力极大，其中又没有一个穆斯林，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创建人之一的瓦利托夫（托甘）（Зеки Валитов-тоган）向列宁建议改组这个委员令，应当让穆斯林参加，而且人数上要占多数。这个建议遭到拒绝，1920年6月，俄共（布）在一个通知中指出，穆斯林不得参加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同时，委员会陆续换成了新的成员：卡冈诺维奇（Р.М.Каганович）、萨法罗夫（Г.И.Сафаров）、彼得斯（Я.Х.Петерс）、索科里尼科夫（Г.Я.Сокольников）以及后来的委员会主席托姆斯基（М.П.Томский），同样没有一个穆斯林。身为肃反委员会负责人的彼得斯，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控一部分穆斯林共产党员企图僭夺权力，企图用民族主义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来取代共产主义，以及支持巴斯马奇运动等等。[1]结果，追随雷斯库洛夫的“民族主义分子”纷纷被清除出党，党委会穆斯林局实际上被取消。雷斯库洛夫丢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样是穆斯林出身的阿卜杜拉·拉希姆巴耶夫（Аблулло Рахимбаев）取代了他。拉希姆巴耶夫还取代图尔松·霍贾耶夫成为突厥斯坦临时党委会的责任书记。经过清洗，党内本地人的比例明显下降，直到1922年，突厥斯坦共产党的当地各族党员也只占29.8%。[2]

在内战期间，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政权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191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先后撤销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35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的外交、军事和民族事务等几个人民委员部。外交事务转到了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了对外关系局和对外贸易局。1919年4月，平息塔什干叛乱有功的伊·别洛夫（И.П.Белов）将军担任自治共和国军队的总司令。后来军事防务由1919年秋冬到达突厥斯坦的第四军负责。1920年8月，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成立，成员有伏龙芝、古比雪夫、埃利亚瓦、柳比莫夫（И.Е.Любимов）等人，负责使突厥斯坦党组织与俄共（布）中央保持一致。

1920年9月，突厥斯坦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自治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主席团，人民委员会下设内务、司法、粮食、财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农业、劳动、邮电、交通等人民委员部，后面三个是其他自治共和国所没有的，还有一个中央统计局。至于外交和军事事务，权力集中到联邦。宪法明确规定，对外关系事务属于"联邦政权机关的特殊职权范围"。[①]大会选举拉希姆巴耶夫为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柳比莫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到1920年秋，不仅俄罗斯联邦中央收走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原来拥有的外交、军事及大部分财政经济权力，而且联邦派出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以及红军第四军也掌握了自治共和国相当多的权力。

第二节　希瓦（花剌子模）革命和布哈拉革命

1920年春，苏维埃政权基本肃清中亚地区的白卫势力之际，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0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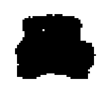
处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领土包围之中的布哈拉酋长国（Бухарский Эмират）和希瓦汗国（Хиви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君主制度。但是，随着全国内战行将结束，苏维埃俄国并不愿意让两个君主国再继续长期存在下去，于是想方设法促成布哈拉和希瓦的革命爆发。

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原来是沙皇俄国的保护国。沙皇政权被推翻以后，俄国政局动荡不安，因此布哈拉和希瓦的独立自主还有所加强。当十月革命的风暴席卷整个中亚的时候，布哈拉和希瓦两国的局势看起来比较平静，但是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夕的那种平静。除了俄国苏维埃政权不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下去之外，两个君主国的内部状况也决定它们无法原封不动地生活下去。

布哈拉酋长国面积为18.2万平方公里，首都布哈拉城（Бухара）。希瓦汗国面积为6.2万平方公里，首都希瓦城（Хива）。十月革命前，布哈拉国内大约有居民250万人，其中乌兹别克人占50%以上，塔吉克人占31%，土库曼人占10%，其余8%多一点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民族的人民。希瓦汗国当时约有居民60多万，



伏龙芝像



其中乌兹别克人占60%，土库曼人占25%，卡拉卡尔帕克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占15%。[①]

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政治上实行封建君主制。布哈拉酋长国的君主称"埃米尔"（Эмир），当时的埃米尔是乌兹别克人曼格特王朝（Мангыт）的赛义德·阿利姆汗（Саид Алимхан）。希瓦汗国的君主叫"汗"，当时的汗是乌兹别克人洪吉拉王朝（Кунграт）的伊斯芬迪亚汗（Исфендиархан）。与中亚其他地区相比，布哈拉和希瓦是经济文化更加落后的农业国，除了传统的商业和手工业以外，现代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状态。伊斯兰教会对国家和居民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中亚其他地区还要深刻。

在革命爆发前，两国国内政局都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在希瓦汗国，定居的乌兹别克人掌握着政权，他们和游牧的土库曼各部落之间民族矛盾相当突出。而在乌兹别克人当中，出现了一个主张改革的政治集团，称作"青年希瓦"（Младохивцы）。青年希瓦党人既不满汗国的封建体制，同时与土库曼部落贵族们不和。在布哈拉酋长国，一些自由派贾迪德人士早在1916年就建立了力主改革的"青年布哈拉"（Младобухарцы）的政治组织，但是遭到埃米尔政权的压制。俄国二月革命后，埃米尔迫于形势的压力，于1917年4月21日发布了一个改革宣言，似乎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是没过多久埃米尔就变了卦，将主张改革的青年布哈拉党人驱逐出境。布哈拉的政治流亡者于是聚集在突厥斯坦的塔什干及撒马儿罕等城市，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十月革命在中亚的胜利对布哈拉和希瓦都产生了十分重大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1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的影响。两国政府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采取敌视态度，虽然它们没有同突厥斯坦乃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公开决裂，但是收容了不少中亚的反苏维埃人士，因此布哈拉和希瓦的领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活动基地。另一方面，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来自苏维埃政权的外部压力促使布哈拉和希瓦两国内部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一部分激进人士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的口号所鼓舞，于是把改变国家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中亚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上面。

为了促成布哈拉和希瓦的革命，突厥斯坦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在两国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一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首先在两国的政治流亡者和俄罗斯居民中间发展共产党员。1918年10月，布哈拉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举行，结果成立了以阿齐姆占·雅库博夫（Ачим джан Якубов，乌兹别克人）为首的布哈拉共产党中央机关。名义上，布哈拉共产党是独立的政党，实际上它是受俄共（布）主要是俄共（布）在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党组织领导，而且很多党员是布哈拉境内的俄罗斯人。

革命的形势首先在希瓦汗国成熟起来。1918年1月，负责希瓦汗国安全和防务的俄国驻军在扎伊采夫上校率领下撤出希瓦，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暴乱去了。希瓦一个土库曼部落首领朱奈德汗（Джунаидхан）趁机发动政变，废黜老汗王伊斯芬迪亚汗，不久便把他杀害。朱奈德汗另行扶植了一个傀儡赛义德·阿杜拉（Сеид Адулла）作为汗王，自己掌握军政大权，在希瓦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朱奈德汗严厉镇压青年希瓦党，5月还处决了几个“企图造反”的青年希瓦党人。不仅如此，朱奈德汗对所有不支持他的暴政的人都不宽容，所以不少土库曼部落首领对他也心怀不满。为躲避独裁政权的迫害，许多希瓦人流亡国外，加上战乱等因素，1920年希瓦全国的人口比1917年减少

了15万，只剩下45万多人。[①]

希瓦的流亡者大多集中在与希瓦一河之隔的突厥斯坦城市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青年希瓦党在这里建立了独立的委员会，作为反对朱奈德汗的机构。中亚苏维埃政权主要在这里组织反朱奈德汗的力量。1919年初，中亚俄共（布）党的机构把一些青年希瓦党左翼成员秘密组织起来，作为未来希瓦共产党的核心。但是，当时中亚苏维埃政权处于内战危急关头，因此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于4月9日宣布承认希瓦汗国的独立。苏维埃政府一方是作为缓兵之计，朱奈德汗则利用这样的时机积蓄力量，以便将来与敌手决一雌雄。

1919年9月，正当苏俄红军成功地打通了连接俄国内地与中亚的交通线之际，汇集在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两万多名希瓦流亡者聚会决定用武力推翻朱奈德汗的独裁统治，并且要求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出兵援助。突厥斯坦方面欣然应允，以便就此一举拔掉朱奈德汗这颗钉子。

1919年11月，在苏维埃政权策动下，一个名叫戈奇马梅德汗（Гочмамедхан）的土库曼部落首领在希瓦汗国北部土库曼人聚居区发起反朱奈德汗政权的暴动，共有8名土库曼部落首领率部加人了他的行列。暴动很快向希瓦汗国其他民族聚居区蔓延，例如卡拉卡尔帕克人就参加了暴动。暴动者企图一举推翻朱奈德汗的统治，但是后者有托尔斯托夫等人的白卫军队支持。因此尽管激战了一个多月，暴动部队在战场上并无明显进展。在这种情况下，苏俄红军准备直接进行干预。

12月4日，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苏维埃以希瓦人民的名义致电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政府，请求给予援助，电报说："希瓦的无产阶级已经举行反对朱奈德汗的起义。战斗正在进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70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行，形势非常严峻。……请求你们派兵赴希瓦支援起义的无产阶级。”[1]左翼青年希瓦党人莫拉奥拉佐姆·霍贾马梅多夫（Моллаоразом Ходжамамедов）还率团赴塔什干搬救兵。同时，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苏维埃还给列宁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希瓦人民正在朱奈德汗匪帮的恐怖下呻吟，迫切期待着解放希瓦的苏维埃军队的到来。希瓦人民向负有解放被压迫者使命的红军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希望加入自由的苏维埃共和国。”[2]可见，红军出兵希瓦主要是隶属于突厥斯坦的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苏维埃出面促成的。

12月25日，苏俄红军“应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苏维埃的邀请”攻入希瓦汗国。红军兵分两路，北路由沙伊达科夫（Н.А.Шайдаков）率领攻打霍杰伊利城，南路在谢尔巴科夫（Н.М.Щербаков）指挥下直取新乌尔根奇（今乌尔根奇），然后两路会师，合击希瓦城。12月29日，北路红军击溃朱奈德汗的主力，拿下霍杰伊利。朱奈德汗竭尽全力，继续抵抗了一个月，终于不敌红军和土库曼部落反叛武装的内外夹击，逃进了卡拉库姆沙漠。

1920年2月1日，红军攻占了希瓦城，并且在没有继续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希瓦汗的宫城，朱奈德汗的傀儡赛义德·阿杜拉汗被占领当局废黜。2月2日，也就是在红军占领希瓦汗宫城的第二天，作为希瓦新的政权机关的希瓦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个在苏俄红军保护下建立起来的委员会共有5名成员，其中有2名青年希瓦党人，2名土库曼部落首领，1名伊斯兰教会人士。青年希瓦党的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委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36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员会主席吉米安·苏丹穆拉多夫（Джимян Султанмурадов）任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土库曼部落首领戈奇马梅德汗任副主席。

希瓦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布自己的基本施政纲领。宣言的主要内容有：在希瓦“立即着手建立人民政权”，“希瓦革命者们永远消除君主专制和可汗及其政府对国家的统治”，并宣布可汗、贵族和大臣们的财产全部归人民所有，同时还允诺“利用地主的土地来改善贫农的生活”。[①]希瓦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宣布，继续要求苏维埃俄国提供援助。

3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派遣一个特别使团来到希瓦，筹划在希瓦建立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4月4日，在特别使团的要求下，希瓦当局决定恢复希瓦的古老国名花剌子模（Хорезм）。同时，花剌子模共产党委员会和执政的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参加上述委员会的青年希瓦党领导人宣布解散自己的党派，加入花剌子模共产党组织。

1920年4月27~30日，花剌子模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希瓦城召开。大会宣布废除希瓦汗国，成立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ХНСР）。大会通过了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花剌子模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手中”。[②]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政府由15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巴巴·阿洪德·萨利莫夫（Баба Ахунд Салимов），外交人民委员是霍贾马梅多夫，内务人民委员是苏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20–22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38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丹穆拉多夫。[1]这样，花剌子模的执政权力由名义上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原青年希瓦党人所掌握。5月，俄罗斯联邦驻花剌子模特命全权大使贝克（И.М.Бык）到任。5月底，花剌子模共产党首次代表会议召开，正式成立花剌子模共产党，并组成以塔什干工人出身的阿利姆占·阿克丘林（Алимджан Акчурин）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后来苏丹穆拉多夫接替阿克丘林为花剌子模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接着，花剌子模共产党大力发展组织，到1920年秋，已经成立了22个地区支部，党员人数超过1000人。[2]

1920年9月，以巴巴·阿洪德·萨利莫夫为首的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签订了两国同盟条约和两国经济合作协定。根据条约，苏维埃俄国承认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取消帝俄根据原俄国-希瓦条约在花剌子模取得的所有特权，把俄国人在花剌子模占有的一切土地、财产和企业全部移交给花剌子模；双方不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的敌视对方的活动，必要时实行军事合作对付共同的威胁；苏俄向花剌子模提供物资、技术和人员方面的援助，以帮助花剌子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等等。[3]

就在希瓦革命爆发的1920年春夏期间，布哈拉酋长国面临着来自中亚苏维埃政权和青年布哈拉党人越来越大的“革命”压力。原来，早在1918年初春，即浩罕自治政府覆灭后不久，苏维埃政权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布哈拉酋长国。2月28日，突厥斯坦边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科列索夫从塔什干专程到布哈拉，拜访

① 爱德华·艾耳逐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42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38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③ M. 瓦哈波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第348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在会谈中，科列索夫提出布哈拉酋长国和苏维埃突厥斯坦进行“合作”的要求，但是遭到阿利姆汗的拒绝。为迫使埃米尔就范，科列索夫命令事先部署在附近的一支赤卫队突破布哈拉城防军人的防线，冲进城里。不料此举激起众怒，布哈拉城穆斯林民众配合守军开展猛烈反击，结果赤卫队寡不敌众，匆忙逃走，但是被这次“入侵”激怒的穆斯林进行疯狂报复，杀害了几百名居住在布哈拉城的俄罗斯人，罪名就是他们充当了引狼入室的“奸细”。而布哈拉军队对这场屠杀没有采取有力的制止行动。

这场冲突过后，阿利姆汗下令中止布哈拉同苏俄的贸易关系。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遭受失败耻辱之后，尽管想予以报复，但是迫于白卫势力进攻的紧张形势，只好咽下这口气。不久，刚刚成立的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同布哈拉酋长国签订和平协定，突厥斯坦共和国不仅承认布哈拉的独立，还答应将自1855年以来被俄国侵占的布哈拉领土归还，甚至承诺向布哈拉提供武器援助。[①]

像1919年承认希瓦的朱奈德汗政权一样，苏维埃政府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缓解自己所处的危局，作为缓兵之计，同时加紧支持布哈拉内部的反埃米尔力量。1919年秋，突厥斯坦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不致力于暴力革命，而是等待布哈拉（及希瓦）国内人民起来完成革命。[②]布哈拉埃米尔则打算利用这个协定巩固布哈拉的地位，积极地同中亚地区各种反苏维埃势力（民族主义者、巴斯马奇分子甚至英国间谍）进行联络与合作，企图同苏维埃政权长期抗衡。因此，当时在中亚工作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古比雪夫认为，布哈拉酋长国“是反革命、白

①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112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②B.Л.格尼斯：《1920年粉碎布哈拉酋长国》，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93年第7期，第42页。

卫军分子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客栈”。[1]

布尔什维克对布哈拉所做的“工作”渐渐有了成效。1918年11月，青年布哈拉党人出现了分化，以费祖拉·霍贾耶夫（Файзулла Ходжаев）为首的左翼极力主张依靠苏维埃政府的武力帮助推翻埃米尔政权。后来，这些人加入了布哈拉共产党。同时，处于苏维埃政权渗透压力之下的布哈拉，境内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各种规模大小不等的暴动骚乱时有发生。

1920年春，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白卫势力已基本肃清，巴斯马奇运动一时遇到挫败，苏维埃政府决定利用时机尽快解决“布哈拉问题”。

3月14日，突厥斯坦战线红军司令员伏龙芝专程访问布哈拉城，向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提出了与当年科列索夫类似的要求，不过同样遭到了埃米尔的一口拒绝。后来，埃米尔号召居民开展反对“无神论者”的“圣战”。但是，这一次埃米尔错误估计了形势。再也不是1918年春那样，现在苏维埃政权已经在突厥斯坦立稳了脚跟，一支庞大的红军正规部队就部署在布哈拉周边地区。尽管如此，苏维埃方面还是不急于行动，它要寻找更合适的理由和更有利的时机。在继续进行精心的军事部署的同时，苏维埃政权继续鼓励布哈拉人民的反埃米尔情绪和运动。

5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副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Л.М.Карахан）的意见，决定在布哈拉发动“革命”。[2]随后，各种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8月中旬，布哈拉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查尔朱伊召开。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2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В.Л.格尼斯：《1920年粉碎布哈拉酋长国》，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93年第7期，第44页。

会后，组成了由古比雪夫、费祖拉·霍贾耶夫、纳吉特·侯赛因诺夫（Нагит Хусаинов，布哈拉共产党中央新任领导人）等人组成的核心小组，负责布哈拉革命的政治事务。8月23日，布哈拉共产党人在查尔朱伊揭开暴动序幕，宣布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向布哈拉人民发出如下呼吁："兄弟们，清算的时刻来到了。深受埃米尔政权、贵族及其走卒压迫的多灾多难的布哈拉人民终于起义了。他们推翻了查尔朱伊州的旧政权，建立了人民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宣布，布哈拉人民为战胜所有的敌人和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拿起了武器。"[①]革命委员会还以布哈拉人民的名义，要求苏俄红军出兵帮助他们"解放"祖国。

8月29日，伏龙芝指挥的突厥斯坦战线一万名红军部队攻进布哈拉境内。红军主力分四路向布哈拉实行向心突击，它们分别由伊·别洛夫从查尔朱伊、尼基京（М.Н.Никитин）从卡塔库尔干、库热洛（З.Ф.Кужелю）从撒马儿罕、施维措夫（Е.Н.Швецов）从卡甘（新布哈拉城）率部出发。由于红军兵力强大，装备精良（动用了11架作战飞机），只经过短短几天战斗就消灭了布哈拉酋长国的军队主力。9月2日，红军攻克布哈拉城，不久占领了布哈拉境内大部分地区。城陷以后，阿利姆汗仓皇出逃，直奔东布哈拉山区的吉萨尔。

红军占领布哈拉城以后，布哈拉革命委员会马上宣告成立，共产党员阿卜杜卡德尔·毛希丁诺夫（Абдукадыр Мухитдинов）担任主席。革命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激进措施，例如将闲置的土地、灌溉供水设施、国家上层人士的大地产及其他财产收归国有，还准备把没收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②]

① Н.D.杰格米亚连科：《塔吉克苏维埃国家的发展》，第41页，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②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46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1920年10月6~8日，布哈拉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布哈拉城举行。大会宣布取消布哈拉酋长国，成立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БНСР）。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和政府——人民委员会，阿卜杜卡德尔·毛希丁诺夫和费祖拉·霍贾耶夫分别当选为两个委员会的主席。政府成员基本上是原青年布哈拉党人，这一点跟花剌子模的情况差不多。但是，11月底青年布哈拉党人全部加入了布哈拉共产党。古比雪夫以俄罗斯联邦和俄共（布）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常驻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布哈拉新政权声明奉行与苏俄结盟和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

11月3日，俄罗斯联邦同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军事政治合同协定，承认布哈拉人民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同时，苏俄将把沙皇政府在布哈拉掠夺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全部不动产移交给布哈拉人民共和国。[①]11月23日，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两个中亚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同盟条约。

1921年3月，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署。条约的内容与1920年9月签订的俄罗斯——花剌子模同盟条约大体相同。同时，两国还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

9月，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哈拉城举行。大会通过了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国家政权交付给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苏维埃。根据大会选举结果，组成了以乌斯曼·霍贾耶夫（Усман Ходжаев）为首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35名成员中大多数为稳健的原青年希瓦党人）和以费祖拉·霍贾耶夫为首的政府人民委员会。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2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922年2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将布哈拉共产党并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由上可见，希瓦和布哈拉两个人民共和国都是在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红军直接出兵两国尤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个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面掌权的是名义上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希瓦党人和青年布哈拉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持温和民族主义立场的改革派人士，他们要求结束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是多数青年希瓦党人和青年布哈拉党人的政治理想与布尔什维克大异其趣，他们倾心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特质的苏维埃体制。因此，俄共（布）方面并不相信他们的“革命性”，之所以同意让他们主持政府，完全是出于形势要求和反映了“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特点”。此外，青年希瓦党人和青年布哈拉党人要维护和保持希瓦和布哈拉的真正独立地位，而他们的俄国盟友不仅要他们照搬苏维埃制度，而且要让希瓦和布哈拉加入俄国的苏维埃联盟。这样一来，青年希瓦党人和青年布哈拉党人掌权不久就和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俄国及中亚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了分歧，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加上青年希瓦党和青年布哈拉党是乌兹别克族的党派，其领导人执政以后没能妥善解决国内的民族纠纷，斯大林称他们是反对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的“乌兹别克沙文主义”。[①]从而导致俄国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干涉。由于希瓦和布哈拉境内都有可观的红军部队驻扎在那里，因此这场斗争的结局无疑将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告终。

青年希瓦党人执政以后，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土库曼及卡拉卡尔帕克等民族的居民。1920年9月，包括花剌子模人民委员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会副主席戈奇马梅德汗在内的80余名土库曼部落首领被以捏造的“发动政变”的罪名惨遭杀害。谁是这一事件的主谋，还有许多的疑问，但执政的青年希瓦党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中难辞其咎。事件发生后，土库曼人寻机报复，一些人闯进乌兹别克人聚居区进行杀掠，族际之间战争一触即发，朱奈德汗也伺机东山再起。

为了制止花剌子模的内战，同时为了制服不太驯服的青年希瓦党领导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在11月派遣以萨福诺夫（М. В. Сафонов）为首的特别使团再次来到希瓦。特别使团对花剌子模共产党的“乌兹别克沙文主义者”即青年希瓦党领导人进行了清洗，此项工作得到了红军驻军政治工作领导人马哈茂德·穆萨耶夫（Махмуд Мусаев）的强有力支持，后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花剌子模共产党进行全面清洗和组织重建。

1920年12月，特别使团主持召开花剌子模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对特别使团的工作表示赞同，并且选举产生了新的花剌子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取代原先被青年希瓦党人控制的共产党领导机构。

在政府改组方面，特别使团于1921年1月下旬在小城波尔萨赫召开了土库曼部落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以霍贾马梅多夫为首的土库曼执行局，实际上是在花剌子模政府系统之外另立炉灶，与青年希瓦党人抗衡。执政的原青年希瓦党领导人对特别使团一系列太上皇似的行动极为不满，特别使团也决心端掉花剌子模现政府。3月，在特别使团的策划下和红军的支持下，希瓦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3月14日晚，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特别使团主持解散了花剌子模人民委员会，建立一个5人临时革命委员会，其中乌兹别克族两人，土库曼族一人，哈萨克族一人，本地共青团员一人，由扎巴尔别尔根·库奇卡罗夫

（Жаббарберген Кучикаров）担任主席。

1921年5月的下半月，花剌子模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希瓦城召开，来自劳动阶层的代表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明显增加。大会就国家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大会还对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主要是剥夺旧贵族官僚和“剥削阶级分子”的选举权，以确保政权的“人民专政”性质。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由6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从这60人当中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阿塔·马克苏莫夫（Ата Максумов），人民委员会主席是马夫利亚尼亚兹·尤苏波夫（Мавлянинияз Юсупов）。

这次代表大会就民族问题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决议写道：“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每个民族都有权实行具有相应机构的地方自治。”[①]会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土库曼局和哈萨克—卡拉卡尔帕克局。

大会闭幕以后，花剌子模抓紧建设各级苏维埃组织，新的警察机构、法院和肃反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还准备组建一支5000人的花剌子模红军。

与此同时，5月份成立了花剌子模共产党临时中央局，在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代表领导下开始大规模清党，结果2000多名共产党员只剩下60名合格者。[②]

尽管如此，花剌子模政府的民族主义倾向似乎阴魂不散。1921年10月，人民委员会的几名成员遭到逮捕或枪杀。11月，花剌子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塔·马克苏莫夫和外交人民委员穆拉·尼亚兹（Мулла Нияз）被指控为“泛突厥主义中心”发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22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55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动政变，于是投奔朱奈德汗去了。萨福诺夫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调离了花剌子模，其角色由俄罗斯大使贝克继任充当。12月上旬，花剌子模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希瓦举行，代表全国1200多名新发展的党员。1922年2月，花剌子模共产党与布哈拉共产党同时并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到7月，花剌子模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花剌子模政权机关内的“民族主义者”遭到彻底清除。

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也在7月召开。大会代表以农民为主体，大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花剌子模让境内的土库曼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和哈萨克人实行自治，并且在他们的聚居区划界成立了相应的自治州。

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同样经历了复杂的斗争过程。与希瓦不同的是，在青年布哈拉党内部有一个左派，他们协助俄共（布）代表对自己党内的“民族主义集团”进行了无情清洗。

1920年10月1日，布哈拉共产党主席侯赛因诺夫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费祖拉·霍贾耶夫在一次会上发生了分歧，古比雪夫出面调解，矛盾暂时得以缓和。12月2日，布哈拉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为解决民族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即在人民委员会建立附属机构使土库曼、塔吉克和哈萨克等民族的代表进入政府。大会批评了侯赛因诺夫的“左倾”错误，并且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花剌子模的“三月事件”对布哈拉的民族主义人士震动极大，原革命委员会主席毛希丁诺夫、陆军人民委员阿里福夫（Абдухамид Арифов）等人公开反对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红军撤出布哈拉，并且把“外来的”俄罗斯族及鞑靼族共产党员驱逐出去，目的是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1]为了稳定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60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布哈拉的局势，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鲁祖塔克来到布哈拉，与民族主义代表达成一定的妥协。1921年7月，俄共（布）中央下达了一项指示，强调必须严格遵守花剌子模和布哈拉是独立国家的原则，任何社会改革都要谨慎从事。与此同时，布哈拉政府内的“民族主义代表”却遭到不断清洗。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乌斯曼·霍贾耶夫被赶下台，逃到巴斯马奇那里去了。像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只不过没有发生花剌子模三月事件那样大的事件。

直到1922年8月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帕尔萨·霍贾耶夫Парса Ходжаев）的成员中还有不少“剥削阶级”的代表，其中有大商人14人，中等商人25人，巴依6人，毛拉7人。[①]人民委员会也是如此，以致斯大林到1923年6月还在批评：“在布哈拉政府里一个农民也没有。在九个或十一个政府委员中，有富商的儿子、商人、知识分子、毛拉……但没有一个杰赫坎。”[②]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中亚局对布哈拉政府进行了彻底改组。至此，在布哈拉清洗民族主义和剥削阶级代表的工作才告基本结束。这一年在布哈拉政权机关总共清除了500名“异己分子”。[③]

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和布哈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它们同苏俄的结盟，还有苏俄对这两个共和国的控制不断加强，大大改观了中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同时从根本上改善了中亚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环境，为在中亚彻底剿除巴斯马奇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63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杰赫坎（Дехкан），中亚穆斯林农民——作者注。

③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63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第三节　巴斯马奇运动的兴亡

苏维埃政权在整个中亚（包括花剌子模和布哈拉）建立起来以后，面临的最后的敌人就是"巴斯马奇运动"。"巴斯马奇"（Басмач）一词源出突厥语，意思就是"土匪"、"强盗"之类，后来衍生出"侠客"、"绿林好汉"的含意，总之，是指那些打家劫舍的落草之人。中亚地区尤其是古代商道辐辏之地的突厥斯坦，匪盗为患的历史相当悠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其独特的传统。匪盗在乡村和草原上十分活跃，出没无常，以劫掠过往商客及当地财主、农户为生，势力强大的有时也袭击大小城镇。他们进行打劫，最初多为生计所迫，但是后来打劫除了作为谋生乃至聚财的手段之外，甚至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如每天祷告一样。有些匪盗还被人们视作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

在革命发生之前，沙皇俄国当局也经常把骚动和反抗的中亚民众称作"巴斯马奇"，为其进行镇压寻找合法的借口。不过，巴斯马奇成为一种中亚特有的政治军事组织，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形式，乃是1918年浩罕自治政权覆灭以后的事情。当初，浩罕自治政府成立以后，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无法跟中亚的苏维埃政权分庭抗礼，于是决定借助活动在费尔干纳地区的巴斯马奇武装来抵御布尔什维克赤卫队的进攻，达到长期坚持下去乃至发展壮大的目的。浩罕自治政府首脑卓卡也夫于是邀请费尔干纳的一支巴斯马奇游击队伍的首领伊尔加什来负责浩罕的城市防御。此人后来不仅掌握了浩罕的军事指挥权，最后实际上把浩罕政府整个捏在自己手中。但是伊尔加什没有能够挽救浩罕政府，很快就被突厥斯坦各地赶来的赤卫队打败了。

1918年2月，浩罕自治政权被苏维埃军队推翻，随后伊尔加

什率领他的残部逃回乡间和山区，依旧与苏维埃政权对抗。当时，有些浩罕政府的官员就随他而去了，后来陆续又有些政治人物投奔他。从此，巴斯马奇开始正式登上中亚的政治舞台，并且从一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团伙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主义武装演化。

从1918年春夏开始，巴斯马奇运动迅速壮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突厥斯坦境内不少反苏维埃势力与它进行合作，遥相呼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维埃政府推行某些错误政策造成的。本来经过连年战乱，肥沃富饶的费尔干纳盆地已是百业萧条、饥荒横行，可是苏维埃政府还在那里强制推行无偿征集农民的粮食和其他农畜产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情镇压那些同情民族主义分子的穆斯林群众，因此许多农牧民不得已加入了巴斯马奇的行列。而且，有些不满俄国及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当地民族出身的官员也明里暗里地为巴斯马奇效力。这样一来，巴斯马奇运动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越来越成熟的政治内涵，加上一贯敌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英国为巴斯马奇提供了大量援助，所以巴斯马奇能够与苏维埃政权周旋和战斗多年。

反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奇最初活动在费尔干纳盆地。1918年间，伊尔加什和苏维埃变节官员、马尔吉兰民兵队长马达明（Мадамин）是盆地内两支最大的巴斯马奇武装的头目。他们颠覆了盆地大部分的乡村苏维埃政权。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那么和睦，因此费尔干纳两支主要的巴斯马奇武装不能相互配合行动。

1918年11月，马达明率部袭击盆地内的俄罗斯移民村庄，不料遭到移民们的有力抵抗。可是没过多久，武装起来的移民因为不满苏维埃政府无偿征集粮食而与政府对抗。1919年夏，政府试图解除俄罗斯移民的武装，结果没有成功。8月，马达明

主动与移民武装结盟，双方联合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势力明显增强。9月，这支联合部队竟然一举攻克了费尔干纳盆地重镇奥什城及贾拉拉巴德。他们在奥什建立了一个联合的临时政府，马达明担任这个政府的主席和军队总司令，俄罗斯移民武装指挥官蒙斯特罗夫（К.Менстров）任政府副主席。

奥什政权成立不久，就遭到红军突厥斯坦战线司令员伏龙芝麾下的红军的猛烈攻击。9月26日，红军攻占奥什城，接着又攻占了贾拉拉巴德。被击败的俄罗斯移民武装终于抗不住了，1920年1月在蒙斯特罗夫的带领下向苏维埃政府投降。2月4日，红军与马达明进行决战，一举击溃马达明的队伍。一个月以后，走投无路的马达明只得投降了苏维埃政府，他的余部被改编为红军的乌兹别克骑兵团，马达明任团长。但是另一个巴斯马奇首领库尔-希尔马特（Кур-Ширмат）仍然在逃，当年夏季他还活捉了马达明，并把马达明交给另一支巴斯马奇队伍处死。此外，伊尔加什的巴斯马奇武装遭到红军的致命打击，他本人在1920年1月中旬被击毙。

在伏龙芝的红军部队里，有一个由鞑靼人组成的穆斯林旅，该旅官兵利用宗教信仰相同的关系招降了许多巴斯马奇士兵。1920年1月招降了2600人，2月招降了3000人。[①]后来，招降谈判破裂。5月23日，伏龙芝向突厥斯坦战线红军全体官兵下达了彻底歼灭巴斯马奇的动员令说："是该与巴斯马奇匪帮彻底决裂的时候啦！到该用铁扫帚从地区清除一切妖孽的时候了。……这项任务落到你们肩上，红军战士们！"[②]这一年，红军在费尔干纳盆地陆续取得了一些胜利，巴斯马奇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但是其残余势力并未被全歼，他们分散后继续活动。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И.К.加姆布尔格等：《伏龙芝传》，第19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就在这时，花剌子模的局势因巴斯马奇运动的兴起而变得动荡起来。朱奈德汗被红军赶进卡拉库姆沙漠以后并不甘心失败，他与花剌子模境内的巴斯马奇分子结成一体，并且与突厥斯坦、布哈拉境内的巴斯马奇势力广泛联络，使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威胁陡然增加。另一方面，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执政当局内讧不断，许多人遭清洗后投奔了朱奈德汗。

1920年夏，经过休整的朱奈德汗自认羽毛已经丰满，带领部属窜出沙漠，在花剌子模境内多处发动进攻，占领了不少村镇，甚至围攻花剌子模重要城市新乌尔根奇达10天之久。

9月，戈奇马梅德汗被杀事件发生以后，花剌子模的巴斯马奇分子四处掀起暴动。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特别使团将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归罪于站在前台执政的原青年希瓦党人，对他们进行清洗。1921年“三月事件”前后，许多失势的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官员投靠了朱奈德汗。后来，包括花剌子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在内的许多高级官员都跑到朱奈德汗那里去了，成为巴斯马奇运动的骨干分子。

经过较长时间的整顿，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的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新的红军队伍组建起来了，加上俄共（布）中央中亚局强有力的干预和协调，花剌子模政府的战斗能力空前增强，于是把剿灭朱奈德汗一事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23年5~6月，突厥斯坦红军兵分几路，夹击朱奈德汗设在卡拉库姆沙漠北部绿洲中的一系列据点和基地。红军部队分别开赴塔沙乌兹、昆格勒、霍杰伊利、伊利亚雷等地区作战。7月11日，朱奈德汗设在那里的最后一个基地被红军攻克，红军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但是，朱奈德汗的主力并没有受到严重打击，他带领部队再次逃进了茫茫的卡拉库姆沙漠。

1924年1月，花剌子模的党政要员前往塔什干，再从那里转赴莫斯科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联盟苏维埃第二

次代表大会。朱奈德汗认为这是推翻花剌子模苏维埃政权的大好时机，他重新集结了一支人马，倾巢而出向希瓦城进攻。这次进攻得到了邻近的布哈拉和突厥斯坦境内几支巴斯马奇军队的有力配合，因此进展顺利。叛军一路攻占了塔沙乌兹、伊利亚雷、库尼亚乌尔根奇、卡扎瓦特等重要城镇。1月20日，1万多名叛军将花剌子模首都希瓦城和新乌尔根奇团团围住，并开始发动猛烈的攻城战斗。

当时希瓦城的守军只有几百人，但是花剌子模政府进行了坚决抵抗，它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并且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非常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行使职权。大约30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会会员和城市苏维埃代表被动员当了兵，还有不少城市贫民参加了保卫战。附近的红军闻讯后前来增援守城部队。1月22日，从查尔朱伊出发的第82突厥斯坦红旗骑兵团跋涉500公里赶到希瓦附近。同时，红军派了飞机来助战。28日，希瓦城下一战，在红军空中轰炸和地面强攻之下，朱奈德汗的部队伤亡惨重，被迫后撤，希瓦城终于解围。接着，在第82骑兵团的打击下，朱奈德汗率残兵逃进了卡拉库姆沙漠腹地。

后来，朱奈德汗还与苏维埃政权周旋了好几年。1931年，毫无东山再起希望的朱奈德汗逃到阿富汗去了。

布哈拉是继费尔干纳、花剌子模以后的一个巴斯马奇活动区，而且是巴斯巴奇势力最强大、坚持时间最久的活动地区。

布哈拉境内的巴斯马奇运动是1920年9月苏俄红军推翻埃米尔政府后兴起的。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在布哈拉城陷落以后逃往东部山区。在出逃途中，他就与巴斯马奇分子接上了头。到达吉萨尔以后，阿利姆汗任命穆拉·阿卜杜拉-卡哈尔（Мулло Абдулкахар）统领东布哈拉的巴斯马奇队伍，不久这支队伍达到六七千人。巴斯马奇武装在东布哈拉攻城掠地，成为苏维

埃政权一大祸患。为了确保战场上的胜利，突厥斯坦红军集结了4000人的队伍，在东布哈拉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收复了许多失地。赛义德·阿利姆汗被红军追得无路可走，于是在1921年3月逃到了阿富汗。这时，红军似乎控制了所有叛乱地区的局势。2月20日的全俄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乐观地写道："埃米尔的地盘一日一日地缩小了，现在只剩下一支大约600人的队伍跟着他了。"[①]实际上巴斯马奇还保存着相当强大的实力。因此，红军指挥官格·季诺维也夫于1921年2月与巴斯马奇代表举行谈判，劝说他们投降时遭到了拒绝。以后还进行过谈判，同样是无果而终。

然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1921年的花剌子模"三月事变"使布哈拉的局势发生了急剧转变。事变使得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前青年布哈拉党人惶恐不安，他们当中很多人陆续与俄共（布）决裂，或组织或参与新一轮巴斯马奇暴动。游击战在布哈拉尤其是东布哈拉的山区蔓延，面对来势凶猛的反叛浪潮，苏维埃政府集中所有力量进行镇压。调集大批红军部队开赴东布哈拉作战。围剿巴斯马奇的红军队伍绝大多数官兵是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和鞑靼人，中亚各族穆斯林出身的红军士兵比例极小，最多时也不到10%。[②]尽管苏维埃政府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俄罗斯人的红军部队身上，然而战果很不理想。当地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穆斯林对政府强化粮食征集和强行征召他们入伍当红军极为反感，纷纷参加巴斯马奇武装。已经在红军中服役的穆斯林出现了明显的动摇，致使当局最后不得不解散成立才一年多的乌兹别克骑兵团。该团不少官兵也投奔了巴斯马奇。

① 爱德华·艾耳沃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51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在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费尔干纳盆地，1921年秋巴斯马奇运动再度兴起。在库尔-希尔马特提出的“圣战”口号鼓舞下，巴斯马奇武装重新控制了广大乡村，并且占领了马尔吉兰、纳曼干、安集延等重要城市。库尔-希尔马特的部队猛增到6000人，使苏维埃政府不敢掉以轻心。9月，政府调集重兵，分两路夹攻库尔-希尔马特。在马尔吉兰附近一战，把库尔-希尔马特打得落花流水。库尔-希尔马特率领残兵败将，往南逃进东布哈拉。苏维埃政府从此恢复了对费尔干纳的控制，但是巴斯马奇武装败退时，毁坏了大量成熟的棉田和许多重要道路。

费尔干纳盆地暂时平静了，可是南面的东布哈拉地区烽火连天。1921年秋，布哈拉原革命委员会主席、青年布哈拉党领导人阿卜杜卡德尔·毛希丁诺夫和布哈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毛希丁·马克苏莫夫（Мухитдин Максумов）来到东布哈拉，为巴斯马奇效劳。同时，另一个巴斯马奇头目易卜拉欣（Ибрагим）拉起了一支大队伍，盘踞在吉萨尔谷地。还有费祖拉·马克苏姆（Файзулла Максум）率领的巴斯马奇武装也越来越强。一时间，东布哈拉似乎成了巴斯马奇头领们的天下。

面对四处活动的巴斯马奇游击队伍，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显得顾此失彼，应战不暇。当局认识到单凭武力一时是难以剿平巴斯马奇运动的，于是改变策略，试图采用招抚手段来平息叛乱，安定局势。

布哈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决定邀请原青年土耳其政府三巨头之一的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来承担招抚巴斯马奇的任务。自从土耳其1918年10月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恩维尔为躲避协约国的追究流亡国外。他先是去了德国，1920年到达莫斯科。1921年11月，恩维尔应邀来到布哈拉。可是恩维尔到达布哈拉以后立即变了卦，非但不帮助共和国政府做招抚工作，反而跑到巴斯马奇叛军一边去了。恩维尔帕夏企图利

用他在穆斯林中间的声望，把所有突厥语民族联合在一个大中亚国家之内。他的这种“泛突厥主义”想法对布哈拉政府影响不小。布哈拉两个重要官员陆军人民委员阿里福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阿里·里扎（Али Риза）就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恩维尔到达东布哈拉后，当地巴斯马奇大头目易卜拉欣把他当做主张改革的异端分子关起来了。后来赛义德·阿利姆汗从喀布尔致信易卜拉欣说明真相，易卜拉欣才放了他。接着，恩维尔帕夏接受流亡的埃米尔的委任，当上了巴斯马奇武装的总司令。

恩维尔的出走使得原先极力主张邀请他来搞招抚的布哈拉领导人难脱干系，加上这些人本来就反对苏俄插手布哈拉国内事务，于是干脆跟恩维尔一块来为巴斯马奇出力。12月，布哈拉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乌斯曼·霍贾耶夫、警察首脑即内务人民委员阿里·里扎以苏俄红军没有遵照条约撤出布哈拉领土为由发动叛乱，他们率领800名骑兵奔袭东布哈拉的久尚别（后改名斯大林纳巴德，今杜尚别），恩维尔闻讯后发兵配合。结果万名巴斯马奇武装围困了久尚别，经过两个月激战，终于在1922年2月中旬攻克了这座东布哈拉中心城市。

与此同时，阿卜杜尔-卡哈尔在布哈拉城附近发起巴斯马奇暴动，恩维尔命令部属挥师西征，与阿卜杜尔-卡哈尔合兵于1922年3月初包围了布哈拉城。眼看布哈拉人民共和国首都岌岌可危，各路红军部队紧急赶来增援。经过一番苦战，到3月11日才解除了巴斯马奇对布哈拉的围困。

1921年冬至1922年春是巴斯马奇运动最鼎盛的时期，当时光是听从恩维尔帕夏指挥的巴斯马奇武装就达两万人之众。[①]布哈拉人民共和国陆军人民委员阿卜杜哈米德·阿里福夫这时也率350人投敌。整个东布哈拉实际上处于恩维尔的控制之下，因而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70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对布哈拉和突厥斯坦的苏维埃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踌躇满志的恩维尔发出了“全体穆斯林起来战斗”和“建立中亚穆斯林国家”的呼吁，他甚至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苏俄放弃中亚。①

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尽快剿灭巴斯马奇武装。1922年1月8日，布哈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东布哈拉非常委员会，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主席是纳西尔·哈基莫夫（Насир Хакимов），委员包括布哈拉共产党东布哈拉局负责人阿利姆占·阿克丘林等。这个委员会把布哈拉东部近10个州的军政大权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为平定巴斯马奇叛乱，它可以无限制地运用“专政手段”。东布哈拉非常委员会实际上是独立于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外的特殊权力机构，因此两者之间免不了有些龃龉。为了协调好双方关系，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布哈拉人民委员会主席费祖拉·霍贾耶夫为首的东布哈拉革命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到1924年5月东布哈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才停止活动。

也就是在巴斯马奇运动最猖獗的1922年春，苏维埃俄国境内其他地方的反政府叛乱和农民暴动都已平定下来，苏维埃终于可以腾出足够的力量来解决中亚问题。现在，巴斯马奇成了苏俄红军最主要的打击对象。

1922年4月，苏俄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布哈拉集团军，司令员是卡库林（Н. Е. Какурин）（后为帕夫洛夫，П. А. Павлов）。集团军的主力由45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组成。②集团军组建完毕后，马上开赴东布哈拉作战。为了确保战场胜利，苏俄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С. С. Каменев）亲自来前线督战。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52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73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就在红军即将发动凌厉攻势之际，巴斯马奇运动的内讧却进一步加深了。即使在这以前，恩维尔企图统一当地各巴斯马奇队伍的努力一直没有完全成功过。东布哈拉各路巴斯马奇头目对恩维尔这个外来人并不服从，而他自封的一大堆头衔，如"全体穆斯林部队的总司令"、"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先知的代言人"等使他同赛义德·阿利姆汗的关系恶化了。在红军打过来以后，易卜拉欣、费祖拉·马克苏姆与恩维尔出现了分裂，他们不仅不听他的指挥，反而跟他发生了武装冲突。

1922年5月，布哈拉集团军的红军经过激战攻占了恩维尔在西布哈拉的主要基地努拉塔。紧接着，红军乘胜向东布哈拉追击。北路红军取道拜松，南路红军则从铁尔梅兹出发，向久尚别进军。面对四分五裂的巴斯马奇武装，红军所向披靡，连战皆捷。7月14日，红军一举收复久尚别。恩维尔的主力在拜松一战中遭到重创。随后恩维尔率残部往南撤向阿富汗边境，在8月4日巴尔朱安遭遇战中与其副手阵亡。

恩维尔死后，阿利姆汗委任土耳其军官赛里姆帕夏（Selim Pasha）接任。赛里姆重整旗鼓，与红军在山里周旋，占领了一些村镇，1922~1923年之交还围攻边境城市库里亚布几乎达一个月之久。由于库里亚布守军顽强抵抗，赛里姆的攻城战以失败而告终，总共损失300人。接着，赛里姆躲进吉萨尔谷地。与此同时，东布哈拉其他许多巴斯马奇武装不是遭到歼灭，就是四散逃亡。

在此期间，在费尔干纳省活动的乌兹别克族巴斯马奇分子与吉尔吉斯族巴斯马奇分子分道扬镳了。1922年7月，吉尔吉斯巴斯马奇队伍在穆埃特丁（Муетдин）带领下投降了政府。乌兹别克巴斯马奇队伍被红军击溃，其首领库尔-希尔马特逃到阿富汗去了。于是，整个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只剩下2000人。[1]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922年，苏俄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在中亚地区普遍推行，穆斯林居民的农业税负担比原先减轻了一半，伊斯兰教会的精神权威及世俗权力得到了部分恢复，社会紧张气氛得到明显缓和。许多穆斯林农民离开了巴斯马奇武装。

1923年春，赛里姆重新集结了4000人，联合易卜拉欣的2000人重新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他们控制了卡尔希至凯尔基和铁尔梅兹至吉萨尔两条重要交通线。红军在突厥斯坦战线司令员科尔克（А.И.Корк）指挥下发起了围剿战。5月，赛里姆的部队与梅利尼科夫（М.В.Мельников）率领的第一阿赖红旗团在凯伊进行决战，赛里姆败下阵来。接着凯利夫一仗，赛里姆的主力被红军歼灭，他带着残兵败将逃入阿富汗境内。苏俄政府向阿富汗提出引渡赛里姆的要求，赛里姆于是逃亡伊朗，他的部属被阿富汗政府缴了械。

1923年夏，东布哈拉政府当局征募了一万多本地人入伍，协助红军清剿残余的巴斯马奇游击队。苏维埃政府还对巴斯马奇成员发布了大赦令，许多巴斯马奇官兵放下武器、返回家园。1923年，横行多年的巴斯马奇运动急剧衰落下去了。

1923年8月，红军在加尔姆和洛凯分别击溃了费祖拉·马克苏姆和易卜拉欣的主力。易卜拉欣逃到了阿富汗。经过红军扫荡，到年底，布哈拉全境残存的巴斯马奇武装分子不到3000人，到1924年上半年就被基本上肃清了。[①]1924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巴斯马奇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被消灭。

1925年，红军彻底捣毁了易卜拉欣在塔吉克地区（1924年布哈拉人民共和国解散，东布哈拉划入塔吉克）残存的基地。战乱使20多万塔吉克人沦为难民，逃到阿富汗北部地区去了。1927年，塔吉克境内的巴斯马奇运动最后失败了。一些被打散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76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的巴斯马奇人员复又沦为盗匪，他们重操旧业，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流亡境外的易卜拉欣还不甘心，后来又潜回塔吉克，1931年6月被苏联边防军人抓获。到1933年，中亚地区的巴斯马奇武装终于销声匿迹了。

巴斯马奇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现象。巴斯马奇队伍的大多数人员是中亚的穆斯林农民，但是指挥官多系惯匪和绿林头目出身。后来，不少朱奈德汗和阿利姆汗的追随者、花剌子模和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人士加入到巴斯马奇的行列中来了。关于巴斯马奇运动的性质，英国中亚史专家杰弗里·惠勒（Geoffrey Wheeler）说得比较中肯："巴斯马奇领袖们尽管赢得了相当高的声望，但是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和改革人士，而是纯粹的反动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差不多就是横行不法的盗匪，这些人既反对贾迪德运动和青年布哈拉党，又反对俄国人。"[①]尽管有不少希瓦特别是布哈拉的政界人士投奔过巴斯马奇，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改革人士不适应巴斯马奇那种盗匪式的游击生活。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脱离了巴斯马奇运动。例如，乌斯曼·霍贾耶夫后来流亡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创建了"布哈拉自由委员会"。还有巴什基尔的民族主义者瓦利多夫，在努力建立伏尔加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失败以后来到花剌子模，为青年希瓦党人所收容，他在那里创立了名为"突厥斯坦民族联盟"的秘密组织。花剌子模"三月事件"后，瓦利多夫也投奔了巴斯马奇，在改造巴斯马奇的企图失败以后，他于1922年离开了。

历时10年以上的巴斯马奇运动给苏维埃统治下的中亚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给中亚苏维

①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110~111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埃政权本身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威胁。在镇压巴斯马奇运动的漫长日子里，中亚的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自身最终巩固起来了。在这期间，中亚的苏维埃政权逐步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中亚地区自从19世纪末萌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俄国革命中得到加强的、在巴斯马奇运动期间得到武力支持的民族主义势力，遭到最后的扫荡和清算，从此中亚民族主义长期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况。但是，平定巴斯马奇叛乱为中亚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为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地区开展社会经济改造、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章
中亚的经济社会改造和民族国家的组建

第一节 中亚的土地改革和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苏维埃政权就开始了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尝试。这项开创性工作即使在内战的惨烈日子里也没有中断过。

全国性的第一轮土地改革刚刚完成，苏维埃俄国就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国内战争。内战时期，苏俄政府为了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其控制区内普遍推行名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结果导致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雏形的出现。内战结束后不久，苏维埃政府为形势所迫，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НЭП），最后形成了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直到20年代末。

在偏远落后的中亚地区，这一时期经济形势的发展方向与整个苏维埃国家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发展是不同步的。总的来说，中亚的土地改革和不同经济政策的实施及转变都比俄罗斯地区要迟，而且，土地改革尚未真正铺开内战就开始了。中亚地区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完成的，有些落后

地区直到新经济政策中止执行也没有完成土地改革。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列宁亲自审定的《土地法令》，立即部署土地改革。《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①]法令和所附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规定所有地主、皇族、教会的土地一律没收，按人口或生产能力平均分配给劳动农民。1918年2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土地社会化法令》对土地改革的原则、政策、措施作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依据上述两个法令，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在广大农民的热情支持和配合下，苏俄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迅速铺开。到1918年夏，俄国农民不仅无偿获得土地，而且还获得了农具。为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初步赢得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

但是，苏维埃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粮食问题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为了从农民那里征集到足够的粮食，苏维埃政府在一系列非常措施的基础上，出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由于连年战争和革命，加上天灾和投机商囤积居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就陷入了严重的粮荒。为了收粮，政府想尽了办法，诸如实行粮食贸易垄断、派武装征粮队下乡等等，然而效果仍然不显著。

1919年1月11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决定，实行余粮收集制。做法是政府把国家所需粮食总额层层下摊，一直摊派到每个农户，强制征收。如果抗拒不交，除了没收"余粮"以外，还要"没收财产，剥夺自由"。[②]余粮收集制的出台，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形成。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125~12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由于政府采取了如此严密而又严厉的政策，总算使得苏维埃政权渡过了难关，取得了内战胜利。但是内战结束后，苏俄政府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引发了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甚至士兵哗变。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只得立即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代之以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这标志新经济政策的开端。根据这个决议，俄国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法令，内容包括大幅度降低农民的粮食税额度、允许私人租赁和开办工商企业、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直至允许农村的租地和雇工等。新经济政策出台后，在俄共（布）党内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和非议，经过列宁耐心解释和说服才得以推行下去。但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一开始就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欢迎和拥护。由于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苏维埃俄国的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到1925年，俄国的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73%（1920年为14%）；谷物生产恢复到战前的92%（1920年为50%）。[①]

中亚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土地改革同样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中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十分复杂，有旧俄政府、王室贵族、教会寺院占有的连片庄园，也有巴依（бай）地主、高利贷商人、富裕农民占有的较大地产，还有小农使用的小块耕地，还有许多无地或少地农民租种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另外，有本地土著居民使用的土地，也有俄罗斯移民使用的土地。农耕区有农耕区的土地占有方式，游牧区有游牧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各种土地占有关系和使用方式交织一起，因此中亚地区

① Г.Ф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第286、352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的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实非易事。

此外。中亚落后的社会关系给土地改革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首先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宗法关系。巴依等大土地所有者基本上是部落、氏族或家族首领，他们同贫困农民之间还存在着非经济的邻里乃至血缘关系，而且对后者有一种自然的权威。哈萨克民族主义者布凯汉诺夫甚至把这归结为共产主义思想，他说，在哈萨克人的日常习惯中就有“共产主义思想”，例如“免费款待所有人，‘无偿’帮助自己的亲戚穷人。哈萨克人那里有共同的氏族利益”。[①]其次是根深蒂固的宗教影响。伊斯兰教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教会警告人们不能为了个人目的剥夺他人财产，当然包括土地。第三，中亚的穆斯林农民几乎都是文盲，无法摆脱宗法思想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和控制，也就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改革。因此，中亚苏维埃政权推行土地改革不可能照搬俄罗斯地区的做法，不能操之过急，改革之前有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要做。

中亚地区的土地改革首先是在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突厥斯坦开始的。为了冲破土地改革的阻力，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事先大造舆论。1917年12月22日，《突厥斯坦报》刊登了边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在突厥斯坦边区完全停止土地的买卖和继承”，土地租赁问题在一年内解决。除了官方的声音，还有民间的“强烈要求”。在1918年2月4日的《我们报》上，登出了塔什干县196个农民给边区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要求“把巴依的土地社会化”，以便把这些土地平均分配给“受巴依剥削者奴役”的穆斯林无地农民。[②]

① 塔赫什雷格尔：《1921~1928年哈萨克阿吾勒社会经济改造的特点》，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61年第6期，第14页。

② X.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255、256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接着，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组建各级土地改革机构。1918年1月成立土地人民委员部，取代旧政权的移民局和其他土地管理机构。承担土地改革任务的各级农民苏维埃到1918年年中才在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同时，作为苏维埃土地改革工作机构的各级土地—水利委员会也逐步建立起来了。它们的职能是对属于非劳动者的土地（及土地上的附属物）进行分配。

迄至1918年春夏，突厥斯坦边区的土地改革行动主要是对移民局掌握的备用土地和个别俄罗斯富裕移民的土地实行"社会化"，对巴依等穆斯林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基本上还没有触动。而且，不少乡一级的土地—水利委员会控制在穆斯林"上层"——巴依、毛拉、官吏手中。土地改革大多在城市附近地区启动，而外里海省完全没有开始。不过，七河省苏维埃政府在分配土地给1916年暴动农民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普尔热瓦尔斯克县有8个乡的回国流亡农民分得了8万公顷土地。但就整体而言，突厥斯坦边区的土地改革当时进展很慢，整个乌兹别克人居住区（也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1918年才分配了10万公顷土地。[1]直到内战爆发，除突厥斯坦外中亚其他地区的土地改革根本没有提起。而且，内战爆发后，突厥斯坦的土地改革也基本上陷入停顿，政府的主要精力用于征集和筹措粮食方面了。

内战爆发前后，比起农民缺地来粮食供应紧张恐怕是突厥斯坦政府面临的更为紧迫和危急的事情。自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以来，突厥斯坦粮食难以自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从俄罗斯地区输入粮食锐减，突厥斯坦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现象。接着，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的发生，使突厥斯坦的粮食恐慌日甚一日。

① X.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262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1917年底，杜托夫的哥萨克军队控制了乌拉尔地区，从而切断了中亚与俄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中亚地区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骤然加剧。刊登在1918年1月13日《我们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我们突厥斯坦的居民已经感受到了人民的敌人的罪恶阴谋。半个月以来，杜托夫控制了所有运往突厥斯坦的粮食。因为他，突厥斯坦边区全体居民被迫挨饿，将来可能会陷入断粮的境地。"[①]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当时城市居民每日面包供应量降到了半俄磅（1俄磅约合410克——作者注），还不能保证及时到位。为了筹粮，突厥斯坦政府绞尽脑汁，加紧向富裕移民和本地巴依征粮、拨出专款进行采购、千方百计从外地运进，等等，但是都没有使粮荒得以缓解。于是，突厥斯坦也步俄国中央地区后尘，全面推行起战时共产主义。

从1920年起，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开始普遍推行余粮收集制，上半年主要在俄罗斯移民区推行，下半年扩展到穆斯林村庄。不过，余粮收集制在突厥斯坦远不如俄国中央地区推行得那么彻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允许居民"自由支配超过摊派部分的余粮"[②]，这无异于给彻底禁绝自由贸易的战时共产主义开了一个口子。而且，中亚游牧区和半游牧区并没有彻底贯彻余粮收集制，通过商品交换进行粮食采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对棉花的收集抓得很死。1920年12月9日，突厥斯坦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棉花和棉种的自由贸易，私人拥有的棉花加工机械和器具被宣布为国有财产。[③]

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耕地种粮多（种棉很少），按理不如

① Х.Ш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第285~286页，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247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③ В.Я.涅波姆宁等：《跨越资本主义》，第23页，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

突厥斯坦缺粮严重。这里是1920年恢复苏维埃政权以后开始实行大范围粮食垄断和配给制的，而且垄断贸易逐渐囊括了畜牧产品。根据俄罗斯人民委员会1920年7月20日的法令，哈萨克斯坦境内开始强制推行余粮收集制。1920~1921财政年度，哈萨克斯坦东部两省（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克莫林斯克）收集"余粮"3500万普特，歉收严重的乌拉尔斯克省（1920年收获250万普特）也收集了150万普特。[①]不过，同俄国中央地区相比，哈萨克斯坦同突厥斯坦一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要缓和一些，游牧区更是如此。

尽管在中亚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如俄国中央地区厉害，然而由于中亚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加上1921年大旱灾（哈萨克斯坦最严重），同样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1920年，突厥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工业生产比1913年减少了80%。突厥斯坦的播种面积比1913年缩减40%以上（其中棉花播种面积缩减75%），谷物产量减少50%。哈萨克斯坦播种面积则减少了21%，谷物减产50%以上。[②]大批牲畜死亡。死于饥荒的人口数目也是惊人的，1920年仅哈萨克西部地区就有140万人饿死。[③]据俄罗斯联邦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委员萨法罗夫说，空前的旱灾加上严厉的粮食收集，使七河省1/3的吉尔吉斯人死于饥馑。[④]

更为严重的是，内战结束后百业凋敝的中亚还在继续强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早在1919年，不满强制征粮的俄罗斯移民在蒙斯特罗夫带领下与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奇武装合作，尔后更多的穆斯林农民走上了

①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08~209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237~238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③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09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④ В.Л.格尼斯：《1921年从突厥斯坦驱逐出境的俄罗斯人》，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98年第1期，第45页。

这条道路。1920年夏，哈萨克东部农民组成的“人民起义军”达到一万人。1921年2月，一支2.5万人的暴动队伍冲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捣毁了苏维埃机关办公楼，并且一度占领该市和科克切塔夫（今科克舍套）。乌拉尔斯克省的暴动者人数也在一万以上。暴动虽然都被红军严厉镇压下去了，但是苏维埃政权受到的震荡极大，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遇到了严重挑战。

1921年3月俄共（布）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中亚地区逐步完成了政策转变。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转变较快，5月中旬在全境停止了余粮收集制，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了，自由贸易恢复了。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实现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较慢。有些领导人认为完成土地改革才是当务之急，以致列宁在1921年8月写信给突厥斯坦领导人，要求他们把实施新经济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结合起来。[①]此后，突厥斯坦才宣布实行自由贸易。俄共（布）中央10月14日通过《关于突厥斯坦》的决议，次年1月11日又写信给突厥斯坦党组织，督促后者抓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尽管有所进展，但还是有阻力。1922年2月召开的七河省党代会还坚持认为，在七河省穆斯林中间推行新经济政策，会倒退到革命前的状况。因此直至1922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才在突厥斯坦地区普及起来。20年代中期，新经济政策达到高潮。1925年11月，吉尔吉斯自治州（1924年成立）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发展州内的商品货币关系，使它渗透到目前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吉尔吉斯部分地区，是我们州经济上的中心任务。”[②]

新经济政策在中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哈萨克斯坦粮食产量不断上升，1922年全境谷物产量仅4600万普特，1925年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260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达到9200万普特，整整翻了一番，几乎达到1914年的水平。[①] 1925~1926财政年度中亚各共和国的工业总产值比1920年增长了43%。[②]但是电力等新兴工业增长较慢，技术水平提高不快。

新经济政策在中亚推行以后，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局势日趋稳定。哈萨克斯坦的农民暴动平息以后，1922年的歉收也没有引起骚乱。突厥斯坦境内的农民纷纷脱离巴斯马奇队伍，回家种地，因此，从1921年秋季起费尔干纳等地的巴斯马奇迅速走向衰亡。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中亚苏维埃政权恢复被内战中断的土地改革。从突厥斯坦、吉尔吉斯（哈萨克）两个自治共和国到布哈拉、花剌子模两个人民共和国依次铺开。中亚地区的土地改革明显分为两个阶段：2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20年代后期为第二阶段。

中亚第一阶段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消除旧俄国留下的殖民主义土地关系。在1917年革命时期，这种土地关系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在有些地方甚至得到了强化。萨法罗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发言指出，在革命时期，七河省的俄罗斯富农“占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与此同时，该省的吉尔吉斯人的死亡人数“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③]早在1920年6月，列宁在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中提到：“（1）使俄罗斯人、外来人和当地人所占有的土地均等；（2）最坚决地打垮俄罗斯富农，把他们迁走，并强制他们服从；”[④]这一阶段的土地改革是大体遵循列宁确定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51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453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③ 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列宁文稿》，第3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的原则进行的。

1920年12月5日，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作出进行土地改革的决议。1921年春，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改革的法令。从1921年开始，土地改革在中亚各地陆续铺开。为了解除传统的宗法关系、宗教观念对穆斯林农民的束缚，中亚苏维埃政权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各地建立“科什奇协会”（Кошчи，为“劳动农民”之意）。其任务是提高劳动农民的“阶级觉悟”，组织他们同大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配合政府完成土地改革。

这一轮土地改革到1922年底告一段落。凡是镇压1916年中亚民族暴动期间和驱逐暴动者以后建立的移民村一律撤销，富裕移民多余的土地（超过劳动定额的土地）被没收，有些“富农”的土地被完全剥夺并遭驱逐。上述土地主要分配给无地的穆斯林农民。

1921年，中亚（主要在七河省）共撤销了161个移民村、175个独立农庄、95个小村庄、35处大地产，迁走或遭驱逐的达8084户，用于分配的土地达232831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9755户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农民、3017户乌兹别克农民和54户俄罗斯农民分得了这些土地。1922年，又对48700俄亩土地进行了分配。分得土地的农户一半以上是“科什奇协会”的成员。[①]此外，沙皇政府划拨给哥萨克军役人员的额尔齐斯河和乌拉尔河左岸宽10俄里（1俄里等于1.07公里）的土地归还给了哈萨克农民。总的来说，这次土地改革涉及的土地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完成了消灭殖民土地制度的基本任务。

在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两个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最初是没收王室、显贵和寺院的土地分给农民。1923年10月，两国的第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268~269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四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样的决定以后，花剌子模农民分得土地117860俄亩，布哈拉农民分得土地124700俄亩。①

1923~1926年，中亚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清理。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了当地农民和移民之间的土地关系，使他们的实际土地使用面积更趋平均，缓和了他们之间历时多年的对抗情绪。同时，苏维埃政权大力促使游牧户和半游牧户转入定居生活。

中亚第二轮大规模土地改革从1925年开始。这时的中亚经过民族国家划界，由原先的突厥斯坦、吉尔吉斯（哈萨克）、布哈拉、花剌子模四个共和国改组为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共和国。这次土地改革主要任务是消灭巴依、贵族、官吏、富商、高利贷者及教会寺院的中世纪式庄园，限制富农经济。也就是说，要消灭本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限制资本主义农业，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对象是当地大土地所有者，因此难度比第一阶段大得多，拖的时间也长得多，到1929年才基本结束，而这时新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接踵而至了。

1925年5月23日，土库曼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土地国有化法令，接着开始进行土地改革（20年代初，土库曼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12月2日，乌兹别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土地和水利国有化法令，各级均成立专门委员会促进土地改革的深入。1926年5月，哈萨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分配牧场和耕地的决定，确定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1928年8月27日，哈萨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把大牧主的牲畜分给农牧民的决定。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个共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56页、367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和国也作出了土地改革的决定。

20年代末，土地改革的结果，中亚南部约有2.3万个庄园被消灭，两万余户富裕农民和巴依的多余土地被没收，加上国家划拨的储备土地，用于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数量很大。乌兹别克共和国总共32万多俄亩土地分给了近9万农户。土库曼共和国把4万余俄亩灌溉地分给了2.5万多农户。吉尔吉斯共和国有1.6万多户农民分得了6.8万多俄亩土地。[①]塔吉克共和国由于巴斯马奇作乱，土地改革没有全面铺开。

哈萨克共和国到1928年，已有136万公顷牧场分给了农牧民，其中贫困户得到61.6%，中等户得到29.8%，富裕户得到8.6%；还有125万公顷耕地分给了农民，其中贫困农户得到66.3%，中等农户得到26.2%，富裕农户得到7.5%。大约700户大牧主的14.5万头牲畜（折合为牛计算）被没收，除交土地机关、国营农牧场和留给原牧主以外，还有84600头分给了2.4万多户牧民，其中无畜户和有5头牲畜以下的贫困牧民户分得的占分配牲畜总头数的95.4%。[②]

在完成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中亚各共和国注意引导和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由于中亚农业对引水灌溉依赖较强，因此自古就有合作耕作的传统。土地改革时期，政府出面组织的和更多的由农民自愿联合的"合作社"越来越多。迄至1926年10月1日，乌兹别克共和国参加各类合作社的农户达到67%，吉尔吉斯共和国占31%，土库曼共和国占25.6%，而哈萨克共和国因为游牧户比重较大，因此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只占总农户数的15.6%。[③]应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464~46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塔赫什雷格尔：《1921~1928年哈萨克阿吾勒社会经济改造的特点》，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61年第6期，第27页。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262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当指出，这些合作社绝大多数是为了摆脱高利贷盘剥的农民信贷合作社，因为当时私人信贷的年利率高得惊人，在75%~350%之间。

除土地改革外，中亚各共和国还在许多经济领域开展民主改造。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都陆续宣布对银行、铁路、外贸和工商企业实行国有化，从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由于内战和特殊的社会结构等因素，中小企业的国有化实际上没有得到执行，而且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亚的私营小工业（手工业）和零售商业还有明显的发展壮大。据统计，1925~1926财政年度中亚零售商业中的私人资本占到67%（全苏联为40.7%）。农村商业中私人资本比例更高，例如撒马儿罕州1925年农村零售商业中私商比重高达90%。

20年代，中亚地区的经济政策逐步放宽，然而社会方面的政策一步步收紧。中亚各共和国陆续采取措施，剥夺苏维埃政权"异己分子"的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和被选举权。"异己分子"的范围很广，包括旧政权的官吏、本地僧俗贵族、巴依、高利贷者、富商直至部分富裕农民等等。

突厥斯坦和吉尔吉斯（哈萨克）两个自治共和国采取这类措施较早。1923年10月，布哈拉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修改宪法，剥夺王族、旧官吏、高利贷者、大商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富农和小商人享有充分的公民权。[①]同是1923年10月，花剌子模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宪法规定剥夺王族、教士、旧官吏、"反革命分子"及剥削阶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

但是，苏维埃政权"异己分子"的势力并不是一纸法令就

① Г.涅佩索夫：《花剌子模革命简史（1920~1924年）》，第364页，塔什干1960年俄文版。

② M.瓦哈博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第384页，塔什干1961年俄文版。

能取缔的，在传统宗法势力和教会影响很深的中亚穆斯林社会更是如此。事实上这些人在中亚基层特别是农村的政治生活中还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只是到30年代完成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亚传统的上层人物才被最终赶出政治舞台。

第二节　民族国家划界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前期，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分权的市场化，与此同时，苏俄的政治体制却一直沿着权力不断集中的方向发展。结果，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苏维埃俄国逐步定型。1922年底苏联的建立，标志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中亚的民族国家划界和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历来强调“民族自决”，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领土上先后出现过许多个“民族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只是其中一个。后来，这些民族共和国正式联合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CCCP）。加入苏联的各民族共和国实际上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成了一级地方行政单位。

苏联的成立过程，实际上也是俄共（布）民族政策发生转变，即由主张“民族自决”到“民族联合”再到对各民族进行集中统治的过程，因此它对苏联境内各少数民族包括中亚各族人民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俄国革命和内战期间，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5个国家脱离了俄国，成为独立国家，它们的独立也得到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承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名义上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如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格鲁吉亚，以及布哈拉、花剌子模两个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远东共和国，但是在这些“独立的”共和国执政的共产党不是独立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俄共（布）的民族地方组织。此外，还有一类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国家——自治共和国，当时共有8个，而中亚的两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是其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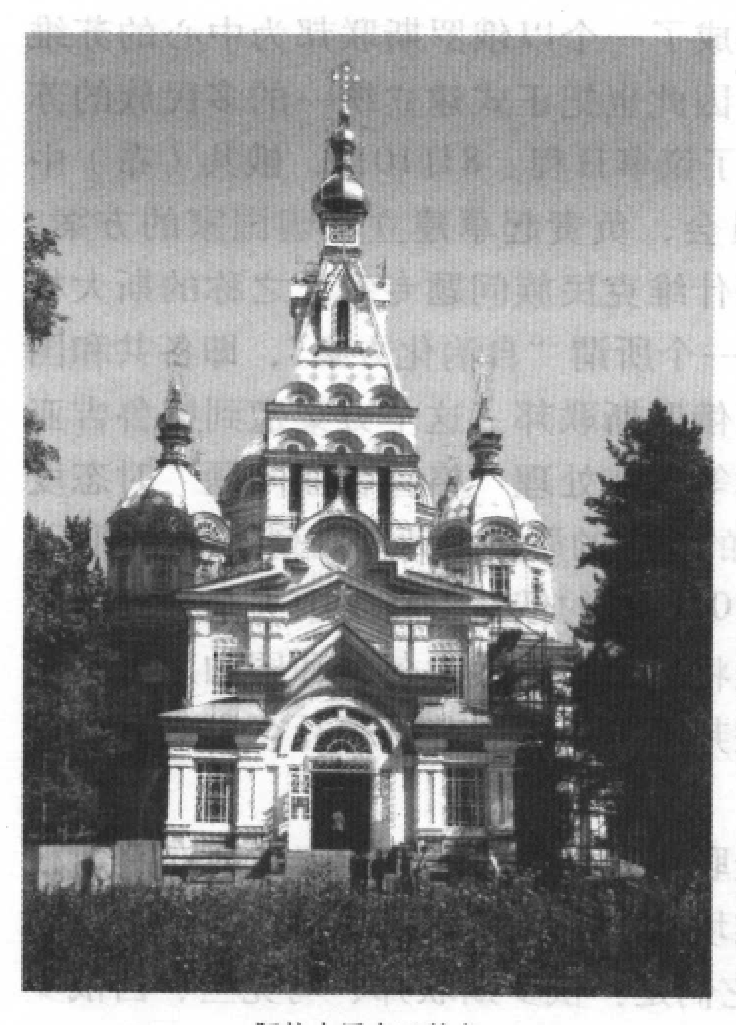
在这里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列宁和俄共（布）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策略和政策均发生了明显而重要的变化，即由过去强调“民族自决”，直至“分离”建立独立国家转为强调各民族的“自愿”联合。

1917年4月，列宁写道：“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的接近以至进一步的融合，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不是暴力，而仅仅是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自由的和兄弟般的联合。”[①]但是这类任务说起来似乎比较简单，要真正落实就十分困难了。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俄国的民族问题，萨法罗夫代表突厥斯坦代表团就此作了一个副报告（正报告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作的）。他在报告中列举了中亚地区种种民族不平等的现象，斥责了俄罗斯党员欺压本地百姓的行为。[②]最后，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任务，并且指出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有害倾向：“一种是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决议强调：“必须指出第一种倾向即大国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第49-5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主义、殖民主义倾向是特别危险和特别有害的。”[①]尽管有了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譬如在苏联的建立过程中，上述倾向在不少俄共（布）领导人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阿拉木图东正教堂

十月革命特别是内战爆发以后，俄共（布）加强了对各民族共和国的领导和控制。在俄共（布）统一部署下，各共和国加快了联合的步伐。1919年6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各共和国的军事、工业、铁路、财政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1920年12月至1921年5月间，俄罗斯联邦先后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5个苏维埃共和国签订联盟性质的条约。在这期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同花剌子模和布哈拉两个人民共和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接着，各共和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开始了事实上的合并。1922年2月22日，俄罗斯联邦和其他7个苏维埃共和国（包括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议定书，共同授权俄罗斯联邦在热那亚国际会议上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04~10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代表和维护所有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并且代表它们与外国缔结与会议有关的各种条约和签署各种文件。[1]这样，从法律上完成了把各共和国外交权移交给俄罗斯联邦的手续。

到1922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俄罗斯联邦为中心的苏维埃国家联盟，俄共（布）因此也把正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苏维埃联盟国家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8月10日，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建立联盟国家的方案，委员会的主席由有“布尔什维克民族问题专家”之称的斯大林担任。斯大林很快提出了一个所谓“自治化方案”，即各共和国一律改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个方案遭到格鲁吉亚的坚决反对，加上斯大林等人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时态度粗暴，结果受到重病卧床的列宁的严肃批评。在列宁的干预下，“自治化方案”被否决。10月6日的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经过修改的方案。新方案将自治化方案中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改为它们同俄罗斯联邦平等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22年12月30日，全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的苏联由4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它们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联合组成）。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中亚突厥斯坦和吉尔吉斯（哈萨克）两个自治共和国的多名代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突厥斯坦执行委员会主席伊纳姆占·希德拉利耶夫（Инамджан Хидыралиев）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后为委员）。联盟中央一级的政府——人民委员会没有在这次大会上成立，暂由俄罗斯联邦人

① С.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第355~356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民委员会代行其职权。

中亚的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和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没有正式加入苏联，但是实际上完全受苏联中央政权的领导。出席苏联成立代表大会的布哈拉代表和花剌子模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对苏联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并且保证同苏联保持密切的关系。

1923年7月6日，第一部苏联宪法开始生效。随后，苏联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已经丧失了说话和行动能力的列宁仍然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1月24日，也就是列宁去世后第三天，全联盟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苏联宪法。这部宪法包括《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盟约》两部分。《宣言》宣布："这个联盟是各主权民族的自愿联合。"盟约第三条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宪法规定的限制范围以外享有主权，苏联"保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第四条规定："每一加盟共和国均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①]

苏联建立起来了，但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宪法规定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联邦制不过是最终走向单一制的过渡形式。可是，苏联后来的实践证明，苏联的联邦制连这种"过渡形式"都不是，而是直接的实实在在的单一制。

因此，苏联建立以后，无论是吉尔吉斯（哈萨克）和突厥斯坦两个自治共和国的"自治权力"，还是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两个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反而明显削弱了。它们当时都还没有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中央政权非常重视在它们成为加盟共和国之前纳入单一制的国家体制。

从1922年开始，俄共（布）中央加紧了对中亚局势的控制，

①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第869页，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泛滥。1922年2月，布哈拉共产党和花剌子模共产党并人俄共（布）以后，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改组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仍由鲁祖塔克担任主席。8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也是鲁祖塔克）停止活动，由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统揽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除外）的所有党政军大权。

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С. К.Орджоникидзе）以俄共（布）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中亚，他的任务是加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统一领导权威，这项任务本身就含有整肃"地方民族主义"的内容。8月，奥尔忠尼启则在布哈拉一次会议上批评共和国领导人："迄今为止，费祖拉（霍贾耶夫）一直是根据民族和裙带关系选配干部。"他还提出，布哈拉共产党的书记不一定由本地人担任，可以让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担任。①

除了政治上加强集中统一，中亚的经济也要加强合作与统一。1923年3月，突厥斯坦、布哈拉、花剌子模三国代表在塔什干举行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亚经济委员会，其职能是协调三国经济财政政策和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受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领导。

1923年10月，花剌子模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花剌子模由人民共和国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声明要求加人苏联。1924年9月，布哈拉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同样宣布，布哈拉由人民共和国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提出加人苏联的要求。这样，在中亚所有地区都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后，苏联当局便马上着手在

① M.瓦哈博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第378页，塔什干1961年俄文版。

中亚开展民族国家划界和组建新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

中亚的行政区域（包括国家）从来不是按民族居住区划分的，而是由地形、政治力量对比乃至外来势力干预所决定的。俄国征服中亚以后，无论是突厥斯坦总督区、草原总督区，还是布哈拉酋长国、希瓦汗国，其境内都是多民族杂居。与此相对应，就是同一个民族的居住区为好几个国家或总督区所分割。沙皇俄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考虑中亚穆斯林的民族构成，更没有打算按民族居住区来划分行政区。只是在进行人口统计的时候，标出了诸如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名称，而且讹误不少。

中亚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在两个总督区和两个君主国的基础上组建了4个共和国，因此每个共和国都是多民族杂居，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共和国。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民族成分尤其复杂。20年代初，突厥斯坦的居民中，乌兹别克人占32.9%，哈萨克人占19.5%，吉尔吉斯人占13.5%，塔吉克人占7.3%，土库曼人占4.9%，卡拉卡尔帕克人占1.3%，维吾尔人占1%，库拉姆人（Курам）占0.8%，基普恰克人（Кипчак 乌兹别克人一支）占0.7%，东干人占0.3%，俄罗斯人占9.1%。布哈拉的居民中，乌兹别克人占50%，塔吉克人占31%，土库曼人占10%，其余9%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俄罗斯人等。在花剌子模的居民中，乌兹别克人占60%，土库曼人占25%，其余15%为哈萨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和俄罗斯人等。[①]在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民族结构比较简单，基本上由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组成。

早在1920年，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当局就提出了民族划分

① P.T.沙姆苏特季诺夫：《苏维埃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形成和发展的特点问题》，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85年第5期，第79页。

和按民族重新组合共和国的问题。不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为时尚早，因为民族划界不能只限于突厥斯坦，而要把整个中亚都包括进来。所以列宁1920年6月13日在关于突厥斯坦的一份决议草案上作第一次批示时写道："1.指派人员绘制土耳其斯坦地图（民族志图和其他图），将其分为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2.更详细地阐明上述三部分合并或分开的条件。"[①]这里有赞成在突厥斯坦划分民族国家的意思，但是9天后列宁在同一决议草案上的指示要谨慎多了。他明确指出："不要预先决定把共和国划分为三部分。"[②]6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结合列宁的批示，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突厥斯坦的专门决议和指示，明确了不急于在突厥斯坦划分民族国家的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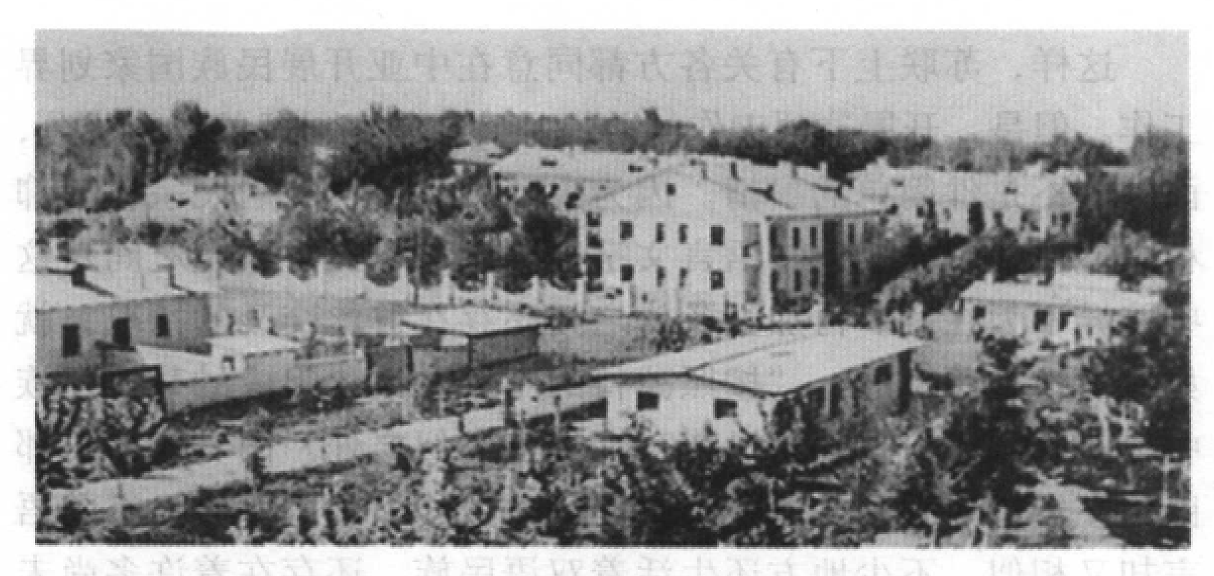
不过，在中亚各共和国内部，建立民族机构和设置单独的民族行政区的工作也在进行。1921年，花剌子模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了土库曼、卡拉卡尔帕克和哈萨克事务机构，布哈拉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了塔吉克、土库曼和吉尔吉斯事务机构。突厥斯坦的外里海省更名为土库曼省。1922~1923年，突厥斯坦东部山区成立了吉尔吉斯人的自治区域。在布哈拉，专门为土库曼人单独设立了一个行政区。而东布哈拉实际上成了塔吉克人的自治区。花剌子模则按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和哈萨克—卡拉卡尔帕克族划分了新的行政区。[③]

苏联成立以后，中亚的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巴斯马奇的败局已定，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独立倾向也被压服，从而为改变历史上形成的中亚各民族混居和分割并存的局面提供了条件。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列宁文稿》，第3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 С.Б.贝塞姆巴耶夫主编：《跨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第121页，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



费尔干纳住宅区

中亚各共和国也提出了在中亚进行民族国家划界，组建民族共和国加入苏联的要求。1923年春，突厥斯坦党的领导机关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夏季，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也提出民族国家划界的要求，并且建议将突厥斯坦境内哈萨克人聚居区划归吉尔吉斯（哈萨克）共和国。

1924年1月底，俄共（布）中央决定委派中央书记、中亚局主席鲁祖塔克召集各共和国党组织负责人讨论民族国家划界问题。2月25日，布哈拉共产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决议，赞成按民族特征把中亚领土划分成若干个共和国。3月10日，在塔什干召开的突厥斯坦党政领导人联席会议上，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拉希姆巴耶夫作了题为《关于突厥斯坦民族国家划界》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肯定了在突厥斯坦进行民族国家划界的必要性。接着，在希瓦城召开了花剌子模党政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拉希姆巴耶夫的报告后决定："花剌子模共和国根据民族特征进行划界，有关的区一旦划出来就要列入新成立的（乌兹别克、土库曼等）中亚共和国。"①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32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这样，苏联上下有关各方都同意在中亚开展民族国家划界工作。但是，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确定中亚居民的民族成分，而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中亚原先的各族居民宗教信仰相同、风俗习惯接近、语言文字差异不大，而且彼此之间对这些差异不大在意。再加上各族之间还存在彼此交叉的情况，就如一位作者所说的："按照独特的习惯和文化组成的某一民族中，有些部落与相邻的民族存在许多类似之处。而有些与相邻民族在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方面毫无共同之处的民族，讲的语言却又相似。不少地方还生活着双语民族，还存在着许多尚未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氏族和部落。

例如在费尔干纳盆地，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各自使用的语言截然不同。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都可以分为游牧者和农耕者两大群体。所谓'库拉姆人'（Курамы），是指那些保持乌兹别克人一样的经济制度却讲哈萨克语的居民。'萨尔特人'（Сарты）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乌兹别克人及塔吉克人。卡拉尔帕克人和阿姆河下游的乌兹别克人尽管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在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经济特征方面有许多相似性。"①

所以，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突厥语诸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党员中间，这种观

① M.瓦哈博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第387~388页，塔什干1961年俄文版。

念也颇有市场。

例如，在讨论中亚民族国家划界问题的会议上，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霍贾诺夫（С.Ходжанов）就反对把突厥斯坦划分给不同的共和国。他说，并不存在什么“乌兹别克”、“土库曼”等民族，只有统一的“突厥族”。如果进行民族国家划界，就会给“突厥族”贴上“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一类的标签。[①]“大突厥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塔吉克人讲伊朗语族语言的权利。1924年1月2日的《突厥斯坦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使用塔吉克语就意味着使用一种无益的和多余的语言，塔吉克人应当尽快使用乌兹别克语（也就是突厥语），不要再死抱住塔吉克语不放”，因为“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决定了它的命运”。[②]当然，这类意见都被中亚执政当局所否决。

1924年4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中亚各国共产党组织关于开展民族国家划界的建议，会议责成俄共（布）中央中亚局拟出在中亚建立民族共和国的方案，并且连同地图附件提交中央政治局审定。4月28日，中亚局和突厥斯坦党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划界事宜，后来在委员会之下设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分委员会。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具体建议。

5月11日，俄共（布）中亚局开会详细讨论与民族国家划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在专门委员会建议基础上提出了初步方案：“1.有必要在布哈拉人民共和国、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花剌子模苏维埃共和国按照民族居住区划界。2.组建：a.独立的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加入苏联；б.塔吉克自治州作为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组成部分；в.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32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Н.Н.杰格季亚连科：《塔吉克苏维埃国家的发展》，第65页，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г）居住在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人加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①具体的领土归属问题留待领土委员会解决。

6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了鲁祖塔克代表中亚局提交的建议方案，通过了《关于中亚共和国（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民族划分）的重要决定，内容如下：“1.由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土库曼人地区组建独立的土库曼共和国；2.布哈拉、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人地区组建独立的乌兹别克共和国；3.花剌子模共和国在划出土库曼人居住区以后继续保留在原先的边界之内；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人地区应当划归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建立卡拉—吉尔吉斯（吉尔吉斯）自治州作为俄罗斯联邦的组成部分，建立塔吉克自治州作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后来，考虑到中亚某些民族的意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5日开会作了一个补充决定：否定花剌子模领导人把花剌子模作为“古花剌子模象征”保留下来的要求，把整个花剌子模苏维埃共和国列入划界计划，组建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作为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组成部分，把塔吉克自治州改为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作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组成部分。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会议以后，中亚局发布了一个宣传提纲，解释在中亚进行民族领土划分的意义和必要性，提纲强调，在划分过程中，“要给予那些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最大的关注”，“每个共和国和州都应该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③提纲宣布10月在中亚进行民族国家划界工作，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由各方代表组成的领土委员会，负责与划界有关的各种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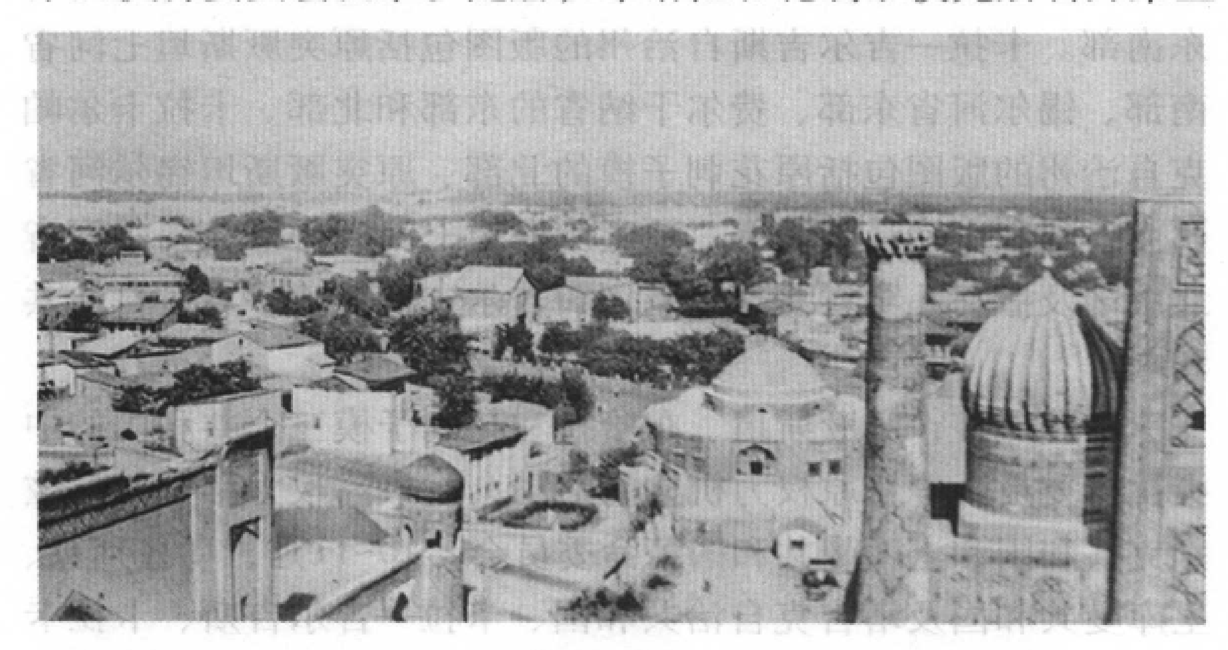
① H.D.杰格季亚连科：《塔吉克苏维埃国家的发展》，第65页，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② C.Б.贝塞姆巴耶夫主编：《跳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第122~123页，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

③ M.瓦哈博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第391页，塔什干1961年俄文版。

工作。

提纲的主张得到了各共和国共产党组织与政权机关的支持，各项工作加紧进行。7月8日，东布哈拉非常委员会完全停止工作，代之成立东布哈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组建工作。9月15日，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在本国进行民族国家划界的决定，10月14日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随后，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先后召开第五



撒马儿罕鸟瞰

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意在本国进行民族国家划界。8~9月间，中亚各地紧张地开展确定共和国和州的界线、确认某些地方的居民的民族属性以及分配各类公共财产等工作。

10月2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在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花剌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建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成立了属于乌兹别克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10月14日）、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10月14日）和属于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1925年2月16日）。

这次中亚民族国家划界使中亚原行政区划版图变动极大。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版图包括原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锡尔河省东南、西南各一部，费尔干纳省中西部、撒马儿罕省中西部，原布哈拉共和国中部和西部，原花剌子模首都希瓦城附近地区。土库曼共和国的版图包括原花剌子模共和国中南部、布哈拉共和国的阿姆河右岸沿岸、原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土库曼省绝大部分。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版图包括东布哈拉和撒马儿罕省东南部。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的版图包括原突厥斯坦七河省南部、锡尔河省东部、费尔干纳省的东部和北部。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的版图包括原花剌子模的北部、原突厥斯坦锡尔河省西南一隅和土库曼省北部。原突厥斯坦七河省中部、锡尔河省北中部及撒马儿罕省北部一隅划归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

11月18日，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三个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停止原权力机构的活动，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乌兹别克共和国和土库曼共和国革命委员会。10~11月，乌兹别克、土库曼共和国及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卡拉—吉尔吉斯、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原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涅季尔巴伊·艾塔科夫（Недирбай Айтаков）任土库曼革命委员会主席，费祖拉·霍贾耶夫任乌兹别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2月，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由塔什干迁至皮什佩克办公。11月成立的塔吉克革命委员会在1925年2月5日正式接管了东布哈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

1925年2月13~17日，乌兹别克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布哈拉城召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М.И. Калинин）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宣言，宣言提出以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的要求。大会选举产生了最高立法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最高行政机关

人民委员会，尤尔达什·阿洪巴巴耶夫（Юлдаш Ахунбабаев）和费祖拉·霍贾耶夫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2月14~20日，土库曼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波尔托拉茨克举行。大会通过了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宣言和土库曼自愿加入苏联的决定。大会选举涅季尔巴伊·艾塔科夫为土库曼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选举凯吉锡兹·阿塔巴耶夫（Каигисыз Сердарович Атабаев，原突厥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为土库曼人民委员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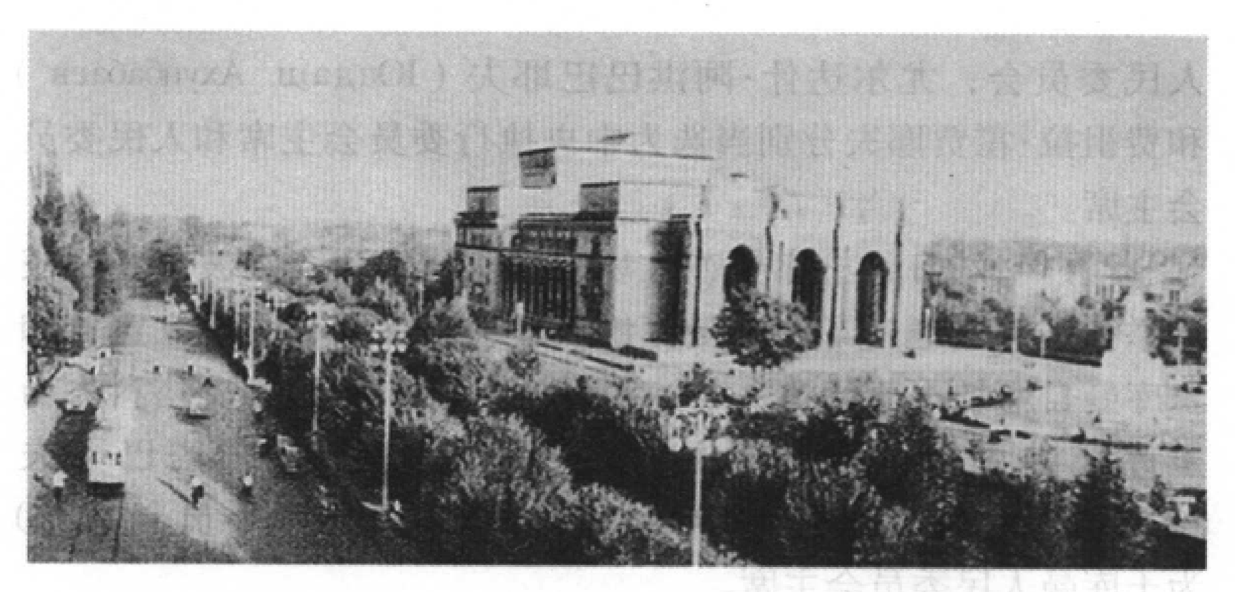
1925年5月13日，全联盟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接纳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两个共和国加入苏联的决定，因而乌兹别克和土库曼成为继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之后的苏联第五和第六个加盟共和国。

由于塔吉克境内红军与巴斯马奇武装战斗持续，因此塔吉克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直到1926年12月1日才在久尚别开幕，大会通过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宣言。后来，考虑到塔吉克民族的特殊性（例如其语言不属于突厥语族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6月12日作出把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注意到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从其经济、民族和地理特点上看，是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不同的特殊单位，因此，认为为了使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和文化更顺利发展，而提出关于划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使它们作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的问题是及时的。"①

1925年10月16日，塔吉克苏维埃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在久尚别开幕，大会通过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宣言，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327~32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塔什干纳瓦依广场

提出加入苏联的要求。大会选举努斯拉图拉·马克苏姆（Нусратулло Максум Лутфуллаев）为塔吉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卡德尔·毛希丁诺夫（Авдукадыр Мухитдинов）为人民委员会主席。12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塔吉克共和国成为加盟共和国。1931年3月，全联盟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塔吉克共和国正式加入苏联，成为苏联第七个加盟共和国。

1925年3月27日，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皮什佩克开幕。大会决定卡拉—吉尔吉斯族恢复吉尔吉斯的族名，并宣布吉尔吉斯自治州正式成立。阿·乌拉兹别科夫（А. Уразбеков）当选为自治州执行委员会主席。4月，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新首都克孜勒-奥尔达（新近由佩罗夫斯克改名，奥伦堡省刚刚划入俄罗斯联邦）召开，大会决定将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改名为哈萨克自治共和国。5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恢复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正确族名。

1926年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将吉尔吉斯自治州升格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1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了这一决定。1927年3月7日，吉尔吉

斯自治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伏龙芝（1926年皮什佩克改名为伏龙芝）开幕，大会通过自治共和国成立宣言。4月，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并接纳其加入俄罗斯联邦。

根据1936年6月公布的苏联新宪法草案，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同时改为加盟共和国。全联盟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36年12月5日批准成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接纳两国加入苏联。同日，外高加索联邦解散，成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这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7个增至11个。

此外，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2月召开，2月16日正式宣布成立自治州，属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1930年7月20日，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划归俄罗斯联邦。1932年3月20日，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1936年12月5日，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从俄罗斯联邦划归乌兹别克共和国。

20年代后期，中亚各共和国都陆续完成了行政区划的调整，把原先的省（州）、县两级调整为州（专区）和区两级，区下面再设村。

1924年成立的乌兹别克共和国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塔吉克自治共和国），1927年分设为10个州：塔什干、撒马儿罕、布哈拉、浩罕（费尔干纳）、安集延、花剌子模、泽拉夫善、苦盏、苏尔汉河、卡什卡河。开始首都在撒马儿罕，1930年迁至塔什干。

土库曼共和国面积48.8万平方公里，设有波尔托拉茨克、麦尔夫（今马雷）、列宁（查尔朱伊）、凯尔基、塔沙乌兹5个州。首都波尔托拉茨克（1927年改名阿什哈巴德）。



阿什哈巴德列宁纪念碑



阿什哈巴德图书馆

塔吉克自治共和国成立后，1925年1月2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将整个帕米尔地区（包括原费尔干纳省东南部）划给塔吉克，成立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除此之外，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分为久尚别（吉萨尔）、库尔干秋别、加尔姆、库利亚布、乌拉秋别、宾吉肯特6个州，首都是久尚别

（1929年12月1日改名为斯大林纳巴德）。1929年10月，苦盏州从乌兹别克划出，成为塔吉克的一个州。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面积从此达到14.3万平方公里。

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在中亚民族国家划界以后面积增至280万平方公里（未包括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1928年行政区划调整完成，分为13个州：阿达耶夫、阿克莫林斯克、阿克纠宾斯克、阿拉木图、古里耶夫、乌拉尔斯克、克孜勒—奥尔达、卡尔卡拉林斯克、库斯塔奈、巴甫洛达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锡尔河。1929年，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首都由克孜勒奥尔达迁至阿拉木图。

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自治共和国）面积16.6万平方公里，1928年分成图尔特库尔、钦拜、霍杰伊利、昆格勒4个州。首都图尔特库尔（1920年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改名图尔特库尔），1939年迁都努库斯。

吉尔吉斯自治州（自治共和国）面积19.9万平方公里，分为7个专区，首都伏龙芝。

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完成以后，民族杂居的状况有明显改变。按当时的统计，全苏联82.6%的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同时该国居民的72.4%为乌兹别克人；全苏联94.2%的土库曼人居住在土库曼共和国，该国居民中71.9%是土库曼人；全苏联75.2%的塔吉克人居住在塔吉克自治共和国，该国居民总数的71.2%是塔吉克人；吉尔吉斯自治州居住着全苏联86.7%的吉尔吉斯人，自治州居民中吉尔吉斯人占66.2%；全苏联79.3%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居住在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自治州居民中卡拉卡尔帕克人的比重为38.1%；全苏联94%的哈萨克人居住在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哈萨克人占自治共和国总人数的53.4%。[①]

① С Б.贝塞姆巴耶夫主编：《跳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第124页，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

苏联官方十分重视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国家划界工作。斯大林认为，这次划界的成功“只是说明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把能满足东方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钥匙，说明苏维埃联盟是世界上惟一的不同民族劳动群众的自愿联合”。[①]此外，前苏联理论学术界主流意见长期认为，在中亚进行民族划分和重新组建民族共和国的重要意义在于：只有把每个民族相对集中在各自的“政治实体”中，才能消灭民族不平等现象，才有可能取得与俄罗斯民族同等的地位。同时，民族国家划界是消除中亚普遍存在的中世纪残余因素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措施。它不仅对中亚各族的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苏联在中亚顺利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乃至保证整个苏联的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苏联重视中亚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共和国的组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了在政治上消除伊斯兰教会的强大影响。自从帖木儿死后，中亚再没有建立过强大的世俗政权，也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政治实体，只是靠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维系着中亚一定程度的“统一”，所以伊斯兰教会在中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中亚居民历来不是以某一民族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以统一的穆斯林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种现实对“欧洲的”和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十分不利，因此将“穆斯林整体”划分为多个民族，统一的教会也将分割成几个部分，这样就有利于苏维埃政权对中亚各族实行分而治之。其次，各民族“分居”以后，就会逐渐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是冲击传统的中亚政治统一性的有力武器。中亚居民原有的文化政治统一性的基础，除了古老的伊斯兰教信仰以外，还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股思潮。它们在中亚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的广泛传播为外部势力（土耳其等）向苏联的中亚领地进行渗透提供了便利（恩维尔帕夏就是一例）。把中亚民族划分清楚，发展它们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利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根据苏联的宪法（无论是1924年宪法还是1936年宪法），组成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当然也是一样。可是实际上苏联不仅根本不允许任何共和国真正行使这一宪法权利，甚至把加盟共和国要求增加自主权力也看做民族分离主义的表现而予以压制和打击，结果在法理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乃是苏联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国家体制方面的根源。因此，中亚完成民族国家划界、组成五个加盟共和国以后，并没有实现苏联当局解决中亚民族问题的初衷，只是把问题暂时掩盖起来或者说暂时得以缓解罢了。

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完成以后，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最终健全起来，而且像整个俄共（布）一样，形成了党内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同时，各共和国的权力重心逐步由政权机关向党的领导机关转移。

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基本上确立了一党制。到1923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残存组织“自动解散”，于是苏联政治舞台上只剩下惟一一个政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12月，俄共（布）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一党制的确立过程同时又是苏联党内集中统一体制的强化过程和权力重心由政权机关向共产党领导机关转移的过程。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强化中央机关的集中权力。从此，政治局成了党内最高领导机关，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都是其成员。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严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许多人就是被扣上“派别活动”的罪名而身败名裂的。

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由原先主要通过政权机关完成转为由俄共（布）党内高层——政治局完成，政权机关的职能主要是给这些决策赋予法律形式。

中亚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共产党组织还很不健全，几乎所有重大的决定都是由政权机关作出的，精英人物都是以政权机关领导人的身份进行活动的，专门从事党务活动的领导人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因此，1920年6月列宁在给政治局的决议草案的简短批示中反复强调，“土耳其斯坦共产党更多地参加管理”，“提出一系列保证逐步扩大土耳其斯坦共产党权利……的实际措施……”[①]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和后来的中亚局）以及俄共（布）中央吉尔吉斯局，在健全中亚的共产党组织和加强它们的权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完成以后，各民族共和国（自治州）的共产党组织进行了重大调整和重组。最初，建立了两个共和国共产党（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和三个俄共（布）州级组织（塔吉克、吉尔吉斯、卡拉卡尔帕克），哈萨克斯坦的俄共（布）组织由州级升为边区级。后来，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三个共和国共产党陆续建立。

1924年11月，俄共（布）中央批准成立土库曼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组建土库曼共产党。1925年2月14~19日，土库曼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波尔托拉茨克举行，选举梅日拉乌克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283-28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И.И.Межлаук）、萨哈特姆拉多夫（Х.Сахтмурадов）为土库曼共产党中央书记。

1925年2月6~12日，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布哈拉召开，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阿克马利·伊克拉莫夫和伊万诺夫（В.И.Иванов）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书记。

1925年3月，塔吉克共产党组织局成立，负责党组织建设。1927年10月，成立乌兹别克共产党塔吉克州党委会。1930年6月6~15日，塔吉克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首都举行，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古谢伊诺夫（М.Д.Гусейнов）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希林绍·绍捷莫尔（Ширинщо Шотемор）当选为第二书记。

1925年2月，俄共（布）中央决定将吉尔吉斯（哈萨克）党组织由州级升为边区级，任命戈洛谢金为边区党委会第一书记。随后，俄共（布）中央吉尔吉斯局停止活动。1937年6月5~12日，哈萨克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阿拉木图举行，宣布哈萨克共产党正式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米尔佐扬（Л.И.Мирзоян，于1933年接替戈洛谢金担任哈萨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1937年6月5~16日，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伏龙芝召开，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沙赫莱（А.О.Шахрай）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这样，中亚五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全部建立起来了。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亚各共和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政权机关的有效领导，成为真正的决策中心。1934年10月3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以及中亚经济委员会和其他中亚机关。

第三节 中亚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建设的开始

1924年1月21日，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宁因病去世。在这前后，苏联共产党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斗争和争论既涉及苏联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也与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纠结在一起。到1929年，长期担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重要对手，从而确立了他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个人领导地位。苏联历史从此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所谓“斯大林时期”。也正是从斯大林确立个人领导地位时开始，苏联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推行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并且实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果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苏联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来被苏联领导人视为自己的重要历史使命，总想早日促使其完成。20年代是苏联个体农业的黄金年代，不过在农村也出现了合作社一类的集体经济形式。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任务，考虑到苏联农业落后的现实，代表大会指出，实现这一任务要作长期的思想准备，而且强调必须遵循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可是1928年爆发的购粮危机促使斯大林抛弃代表大会的方针，他决心用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苏联的粮食短缺问题。

1929年11月，斯大林亲自发动前所未有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在《大转变的一年》的文章中提出了全苏联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主张。遵照斯大林的意旨，联共（布）中央紧接着于1930年1月5日通过了一个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决议，规定苏

联的“主要产粮区”和“其他产粮区”应分别于1931年春、1932年春完成农业集体化，其他地区未作明确规定。[①]而且苏联推广的集体化的形式是公有化程度相当高的“劳动组合”，即生产资料公有、农民集体劳动的集体农庄。

这个决议刚一下达，苏联全国就掀起了一场集体化狂澜，各地领导人竞相比赛，根本没有尊重农民的意愿，完全靠强制手段驱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任务已经完成，苏联已由小农国家变成了拥有规模最大的农业的国家。”[②]据统计，当时全国60%以上的农户（1500万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在主要产粮区，这个比例达到80%以上。

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时也是消灭富农的过程。集体化前夕，苏联全国约有100万户富农，经过集体化时期的剥夺、清洗和流放，到1932年底，94%的富农被消灭了。

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以及理论界长期认为，农业集体化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一举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彻底胜利。其实，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由于指导思想、实现方式乃至集体化形式等方面存在的偏差与错误，结果带来的不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而是直接导致了30年代初的连年饥荒。不过，通过集体化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后，苏联党政当局把千百万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了，保证了国家大规模建设所需的全部粮食和其他农牧产品。

苏联在迅速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同时，开始了全面的工业化建设进程。从1928年秋季起，苏联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2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计划，重点是工业化建设。各项工业发展目标本来就订得很高，实施过程中又不断加码。到1932年苏联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1500个大中型工业交通项目竣工投产。这样，使工业生产总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28年的51.5%上升到1932年的70.7%。[①]苏联在向工业强国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仅是苏联工业高速建设和发展时期，而且是苏联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在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国家只掌握着为数不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银行、交通、外贸等）和一批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而大量的小型工业企业和零售商业由私人资本经营。从1928年开始，除了新建的项目全都属国家所有以外，原先的私营工商业遭到了限制、取缔和没收。与农村消灭富农一样，苏联在城市里也开始了消灭资产阶级的行动。国家在信贷、税收、价格乃至运费等方面对私人资本实行歧视性限制，然后发展到实行收回租赁企业、没收私人资本等严厉措施。到30年代初，苏联的私营工商企业绝大多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重要的工业部门和批发商业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包括手工业）和零售商业多由集体经营。1930年，注册工业企业（即大中企业）中，国营的占56.4%，合作社（集体）占43.5%，私营的仅占0.1%。1928年，私人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苏联工业总产值的17.6%，而1932年下降到只有0.5%。[②]

从20年代末开始的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汹涌浪潮遍及全国各地，偏远落后的中亚地区也不例外。如果说，在以往历次革命改造的社会运动中，中亚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存在着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情况，因而要比俄罗斯地区明显滞后的话，那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33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348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么在这次空前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中亚地区几乎与俄罗斯同步进行，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甚至走到了苏联的“前列”。

在斯大林发动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时候，中亚地区刚刚基本上完成农业的“民主改造”——土地改革，有些地方甚至连土地改革也还未完成，还来不及喘一口气，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按联共（布）中央1930年1月决议的安排，中亚地区除哈萨克斯坦农耕区1932年春完成集体化以外，其他共和国均列入三类地区，也就是说，到1933年以后完成集体化也不算晚。

1930年2月17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作出决议，决定在这个农业最为发达的中亚共和国加速实现集体化。决议规定，1930年内乌兹别克全国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要达到36%~42%，农业发达的17个区要全盘集体化。[①]其他共和国也作出了类似加速农业集体化的决定。

在集体化运动年代，哈萨克边区党委会第一书记戈洛谢金爱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做得过火胜过欠火。”他还提出了“十月革命的铁扫帚将横扫哈萨克村庄”的口号。[②]此外，苏联政府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等地选派大批人员，作为推进集体化的全权代表来到中亚。于是，利用行政命令甚至动用武力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事成了家常便饭。就连1930年春联共（布）中央乃至斯大林本人关于“制止过火行为”的指示也阻止不了中亚地区的集体化浪潮，就在当年夏天，中亚地区强迫农民集体化的做法又风行起来了。

这样一来，在落后的中亚地区，有些区原先连一个集体农庄都没有，几个月以后当地领导机关上呈的报告就称“百分之

① P.X.阿明诺娃：《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集体化简史》，载《苏联历史》，俄文版，1991年第4期，第45页。

② H.A.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百集体化了"。例如，哈萨克自治共和国1928年仅有2%的农户为集体农民，到1930年4月1日，这个比例达到了50%，到1931年10月高达65%。[①]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到1932年春就结束了，据统计，当年4月有74.9%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②]据另一份统计资料，到 1932 年 7 月，中亚各共和国集体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分别为：乌兹别克——82.6%，吉尔吉斯——67.4%，土库曼——73%，塔吉克——41.9%，哈萨克——73.1%，平均起来明显高于全苏联同期集体化农户平均比例——61.5%。至于中亚农业集体化高速发展的原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是这样解释的："苏维埃国家掌握了灌溉系统，农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和合作社紧密联系，几乎把贫农和中农植棉户都包括在预购之中。"[③]这里没有提行政强迫的作用。

迄至1932年，中亚地区农业集体化的比例农耕区高于游牧、半游牧区，平原低丘区高于高山区，而农耕区的植棉地带要高于种粮地带。到1932年底，乌兹别克产棉区实现了全盘集体化。这说明，中亚地区产的棉花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亚地区如此高速度地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会违背苏联党和政府一再许诺的"自愿原则"，从而侵犯农民的切身利益。集体化的结果，不仅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变成了集体农庄的财产，就连小家畜、家禽及某些房屋等有时也要归集体所有。农民如果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抵制参加集体农庄，那么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从加重赋税负担、剥夺选举权直至当做富农被消灭。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59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苏联历史》，俄文版，1991年第4期，第48页。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487、488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在集体化运动年代，中亚地区剥夺富农的做法是普遍的。关于塔什干附近扬吉尤尔区集体化情况的一份报告是这样描述“剥夺富农”的：“夜间，全副武装的特派员在武装警察的陪同下闯进被剥夺者的家中，拿走了所有的东西，首先是牲畜，然后是钞票、衣物、食品直至碗碟等等。有时连收条也不开一张。这个区总共剥夺了500人，他们全都被送进了警察局，一共关了8天，结果绝大部分被捕者是无辜的。”[①]

实际上，在中亚不少中农甚至贫农也被当成富农遭到了剥夺，有些被剥夺者全部家产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卢布。这是因为：第一，中亚众多农民以种植棉花为主，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市场的关系比较密切，不少中农、贫农兼做些小买卖，而经商正是划分富农的标准之一。第二，许多并不富裕的农民是因为抵制集体化而划成富农的，这里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是依据经济状况，而是取决于“政治态度”。

进行剥夺之后，多数“富农”就地安置，而对其中的“顽固分子”进行流放，流放到中亚偏僻荒凉的边境地区。乌兹别克共和国总共流放了5550人。[②]官方统计，哈萨克共和国总共流放了6765人，而有些历史学家统计的流放人数达到11063人。[③]在1930~1933年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共和国共消灭富农10万户左右。[④]

狂风暴雨般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给中亚农村经济带来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亚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畜牧业，数以百万计的牲畜在它们变成集体财产之前被农民屠宰掉

① 《苏联历史》，俄文版，1991年第4期，第46~47页。

② 《苏联历史》，俄文版，1991年第4期，第49页。

③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26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④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49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了，还有几百万头牲畜因无人照料而死亡。在全苏联最重的牧区哈萨克斯坦，到1932年2月，87%的集体农牧户和51.8%的个体农牧户没有一头牲畜。集体化前夕，哈萨克共有各类牲畜4050万头，到1933年1月1日仅剩下450万头。[①]苏联学者90年代统计，在以农耕为主的乌兹别克1928年有牛、骡马、骆驼等大牲畜2744300头，1932年锐减到170900头（同期羊只饲养却有大幅度增加）。[②]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更为悲观，1928 年的乌兹别克有牲畜约560万头，其中羊290万只，到1932年，分别减少到340万头和160万只。[③]有人估计，直到1960年，中亚各共和国牲畜总头数才恢复到集体化前夕的水平。[④]

粮食减产也是非常严重的。集体化运动之前，中亚最大的产粮区哈萨克斯坦每公顷的小麦产量在285~315公斤之间，1931年却降至200公斤，1932年也只回升到220公斤。[⑤]其他共和国同样出现了严重的歉收。乌兹别克等共和国因扩大植棉面积而更加重了缺粮。可是在同期，国家的征购储备粮和出口换汇的粮食却大幅度上升。这样一来，中亚地区普遍出现了缺粮和饥荒。

30年代初，中亚城乡居民口粮严重短缺，肉类更是难得一见。这种情况在撒马儿罕城郊一个集体农庄给上级的告急信中可见一斑："人们只能吃到面包和水，有时连面包也没有，而且不识字的居民的口粮常常遭到克扣。这样，每天至少少称给我们农庄40公斤面粉，而这些面粉都是已经付了钱的。"[⑥]哈萨克斯坦的饥荒特别严重，有人估算，1932~1933年的大饥荒夺去

① E.K.益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59~160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苏联历史》，俄文版，1991年第4期，第49页。

③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英文版，第299~300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④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⑤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⑥ 《苏联历史》，俄文版，1991年第4期，第51页。

了139万到175.9万哈萨克人的生命，这个数字占到当时哈萨克自治共和国总人口的35%~42%。[①]

饥馑、剥夺、逮捕、流放、镇压……使中亚社会再次陷入动荡。许多农牧民（有富农也有中农和贫农）参加了抵抗强制集体化的骚动和暴动。在哈萨克斯坦，农民抵抗事件达400起之多。最大的骚动发生在南哈萨克斯坦的苏扎克区，共有5000多农民参加了反抗。[②]据官方的资料显示，哈萨克总共有5551名“叛乱者”被捕，其中883人遭枪决。[③]还有不少中亚居民（主要是农牧民）因“偷窃”、私藏粮食充饥而触犯了苏联1932年8月7日颁布的特别法律遭到逮捕。

为了逃避饥馑和镇压，中亚穆斯林农牧民成批成批地逃亡，这是继1916年中亚民族大暴动失败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人口外流。许多人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新疆、阿富汗、伊朗、蒙古，甚至远逃到了土耳其。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逃亡规模最大（因为除饥荒、镇压等因素外，许多牧民不愿受集体农庄定居生活和计算劳动日的束缚而加入逃亡队伍），占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103万农牧民逃到了共和国境外。后来，只有41.4万人返回了故土，而其余61.6万人永远离开了哈萨克斯坦，这当中大约有20万人逃到了苏联境外。[④]“据1926年全苏人口普查资料，共和国哈萨克人口近362.8万人，而据1939年全苏人口普查资料，哈萨克人口只勉强接近200万。仅饥饿就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有150万哈萨克人迁往哈萨克斯坦境外，其中约有40万人未返回。”[⑤]

①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30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60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③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29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④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30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⑤ H.A.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为了弥补中亚人口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同时也为了安置从俄罗斯地区驱逐出来的大批富农和反对集体化的其他农村居民，苏联政府从1929年起重新恢复自1917年革命以来中止了十余年的向中亚大规模移民的做法。

十月革命前后，经过数十年努力，移居中亚地区的斯拉夫移民及其后裔总共200余万。十月革命到集体化运动前夕，从俄罗斯地区向中亚的移民活动几乎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出现了一些移民回流现象。可是在1929年到1936年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从俄罗斯向中亚移民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着，短短七八年内共有170万斯拉夫移民定居中亚，其中农业发达的乌兹别克斯坦接纳的移民最多，达78.6万人，迁入土库曼斯坦的移民有15.6万人，迁入吉尔吉斯斯坦的移民为29万人，迁入塔吉克斯坦的为20.2万人，其余26.6万人迁入了哈萨克斯坦。[①]这当中最多的是被当做富农流放到中亚的农民。此外也有不少工人、技术人员，他们来到中亚主要从事工业建设。

苏联向中亚地区大规模移民，对当地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同时民族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第一，移民使得中亚居民中的非穆斯林“欧洲人”比重明显提高，从而有利于加强苏联中央政权对中亚这一辽阔的边远地区的管理。尽管移民当中多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甚至有不少“苏维埃制度的敌人”富农，但是他们与俄罗斯母体之间的各种联系是割不断的。同时，他们来到中亚，社会处境较之其家乡要好，因而逐渐成了苏联政府巩固国家统一、防止民族分离的社会基础。第二，移民运动进一步加强了中亚地区和俄罗斯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来自欧俄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来到中亚，成为促进中亚经济现代化的骨干力量。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受到来自欧洲的基督教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东正教）文化的强大冲击和有力渗透。这种冲击和渗透过程也有利于强化苏联中央政府对中亚的管理。

中亚地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比农业顺利得多。因为在中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而且比较重要的工业企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陆续收归国有了，20年代中亚新建的工厂基本上是国家投资兴办的，因此当地私营工业主要是小型加工企业和手工业。到1925~1926财政年度，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工厂82.4%为国家所有，5%为合作社所有，私人企业只占12.6%；国营工厂就业工人占了94.8%，合作社企业职工占2.7%，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仅占2.5%；国营企业和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97%，合作社企业占1.6%，私人企业只占1.4%。土库曼共和国的情况也差不多。[①]这些数据说明，在中亚进行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牵涉面不大，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无法与农业集体化相比。同时，由于中亚私营的小企业占绝对多数，因此改造的手段主要不是没收、国有化，而是组织合作社。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应特别注意发展苏联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域的合作社，国家以及各级国家机关和中心合作社应给予组织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帮助，并应吸收当地居民参加合作社的建设。"[②]这里提到的合作社，既包括农业合作社，也包括工业（手工业）合作社。由于原业主可入股合作社经营，他受到的损失就更小一些，所以对抗也就不是很激烈。

事实上也是如此，中亚各共和国在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出现过大的骚动，几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了。1932年，工业产值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即国营和合作社企业的产值）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占98.5%，在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占98.9%。[③]其他几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455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333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个共和国的情况也相差不大，都是“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

中亚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迅速完成了。20年代中期，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资本占有极大优势，但是从1928年起，私营零售商业急剧下降。到1930年，私人商业完全被排挤出中亚的整个商品流通行业。

中亚地区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是迟至1928年才基本完成的，紧接着便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主要是现代工业和交通的建设。这种建设是在一个极其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因为中亚地区原先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结构单一，技术水平低下，90%以上的劳动力在手工作坊做工等等。但是经过几年努力，中亚地区各共和国的工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中亚不是这个宏伟计划规定的重点投资和建设地区，但是国家还是投人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建设资金，结果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成倍增加，基本建设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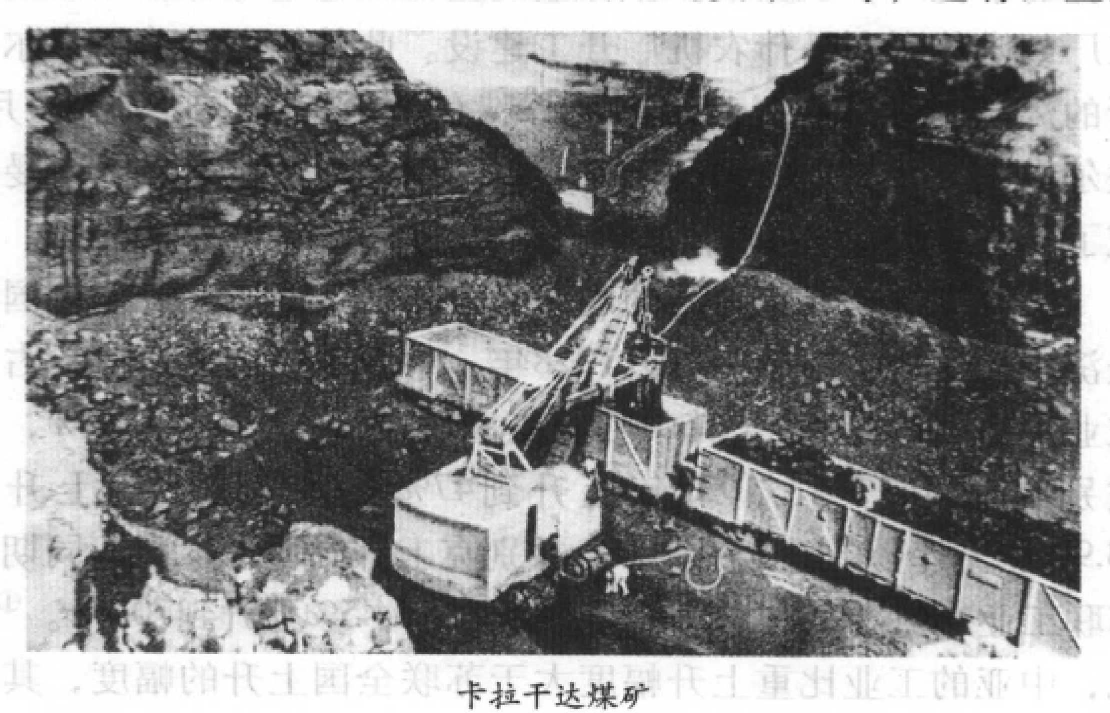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执行期间（1928年10月至1932年12月），中亚各共和国的国营和集体工业投资为12390万卢布，占苏联全国同期工业总投资的4.3%。看起来不算大，但是与此前10年间中亚工业投资总额4950万卢布相比，增加了150%。其中，哈萨克自治共和国为中亚地区工业建设的重心地区，共投资7680万卢布，超过其他4个共和国工业投资的总和4710万卢布的60%。这4个共和国的投资额依次为乌兹别克2920万卢布，塔吉克800万卢布，土库曼640万卢布，吉尔吉斯350万卢布。[1]

大规模投资带动了工业的快速增长。1932年与1928年相比，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320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哈萨克的工业产值增长了110%，乌兹别克增长了67%，土库曼增长了82%，吉尔吉斯增长了180%，塔吉克也增长了40%。这期间，中亚各共和国工业产值平均增长了96%，虽然低于全苏联平均108%的增长速度，但也是很快的。而且中亚地区大工业的增长更快，同期增长了256.2%，远远高于全苏联131.5%的增长速度。中亚五国大工业具体增长幅度如下：哈萨克219.5%，乌兹别克117.7%，土库曼110.9%，吉尔吉斯400%，塔吉克432.9%。[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亚建成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其中哈萨克共和国建设成就最显著，有377座重要工厂投产，主要包括：修复和扩建了里杰尔（1941年改名列宁诺戈尔斯克）和卡尔萨克派的金属冶炼厂、额尔齐斯炼铜厂，新建奇姆肯特（今希姆肯特）炼铅厂、巴尔喀什炼铜厂、阿奇赛联合冶炼厂，以及塔尔迪库尔干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皮革厂等，还有巨型的



卡拉干达煤矿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32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卡拉干达煤矿以及连格尔、别尔乔古尔、恰克帕克等煤矿。此外，还有14个大型工厂开工建设，有色冶金企业仍然是建设重点之一。此外，中断了10年之久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大铁路（卢戈沃伊—塞米巴拉金斯克）也于1927年4月重新开工了。成立了主持铁路建设的委员会，主席是时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雷斯库洛夫。在苏联和中亚政府的努力下，经过3年零9个月的紧张施工，这条全长1470公里的铁路干线于1931年春建成通车了。此外，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到煤城卡拉干达的干线铁路也在1930年通车了。

中亚其他4个共和国建成的工业项目多为轻纺工业，主要有费尔干纳和阿什哈巴德的棉纺织厂，马尔吉兰、斯大林纳巴德（今杜尚别）、霍德任特、查尔朱伊的缫丝厂，吉尔吉斯糖厂、卡翁奇罐头厂，费尔干纳、卡塔库尔干和库尔干秋别的油脂厂，库瓦赛水泥厂，以及卡拉布加兹的盐化工基地等等。一批重要工厂如塔什谢利马什农机厂开工建设。此外，还扩建了吉尔吉斯的煤矿，发展了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手工业。1929年11月，铁尔梅兹至久尚别的铁路竣工。此外，在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修筑了不少大型灌溉工程，如全长270公里的大费尔干纳渠道。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亚地区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1928年，中亚地区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3%（其中哈萨克占16.8%，土库曼占23%，乌兹别克占30.2%），1932年上升到47%（其中哈萨克上升到43.9%，土库曼上升到44%，乌兹别克上升到53.1%）。而同期全苏联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4.5%上升到70.7%。[①]可见，中亚的工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苏联全国上升的幅度，其中又以哈萨克的上升幅度最大。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328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中亚地区在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建设中取得了令了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提高了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缩小了同全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同时加强了苏联南部边境地区的国防安全。

但是，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同苏联全国一样，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一是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落后，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二是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随工业化的进展而不断提高，反而呈下降和恶化的趋势；三是发展工业存在重规模，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的倾向，对中亚工业长期健康发展不利。除了这些与苏联全国类似的问题以外，就是中亚地区直到1932年还没有形成一支民族产业工人队伍，更不用说民族知识分子技术队伍了。中亚现代工厂里的工程师、技术员、熟练工人基本上是俄罗斯人，当地穆斯林进厂当工人的还不多。例如，1934年在塔什干纺织联合企业这个大型工厂工作的工人几乎全是俄罗斯人。[①]

20年代后期，苏联党和政府不仅在中亚地区开始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而且加快进行文化风俗方面的变革。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建立以后不久，就一反过去沙皇政府不过问中亚穆斯林内部社会风俗和文化生活的政策，对他们的宗教习俗和传统文化主动进行改革，进而推行民族“融合”政策。

苏维埃政府在中亚推行文化改革和民族融合政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开展文字改革。原先，中亚各民族文字都是使用阿拉伯字母进行拼写。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当局以阿拉伯字母辨认、书写太复杂，不利于扫除文盲（当时中亚居民95%以上是文盲）为由，从1922年起在中亚提倡使用拉丁字母，当时基本

①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159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上采取说服和劝导的方式。但是从1926年开始，苏维埃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推行拉丁字母拼写和统一的书写形式，并且在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下面设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此事。1928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推广新文字的委员会。同年，土耳其政府同样进行文字改革，废止阿拉伯字母，代之拉丁字母。此举对历来与土耳其有着密切的语言文化及宗教联系的中亚各族穆斯林使用拉丁字母来说，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不过，文字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中亚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革直到30年代后期才最终宣告完成。

这次文字改革，除了前述的“实用”原因以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首先就是为了清除“封建—教权主义文化”。[①]苏维埃政府当局认为，阿拉伯字母与伊斯兰教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成了伊斯兰教会控制中亚居民社会生活的工具，不利于苏维埃新思想、新文化在中亚的传播。此外，与中亚毗邻的阿富汗、伊朗，还有近代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诸民族的“中心”土耳其都是使用阿拉伯字母，这为外国势力向中亚进行渗透提供了方便。还有，阿拉伯字母与俄文西里尔字母相距太远，中亚居民无法通过这种文字接受“先进的俄罗斯文化”，也就不利于苏联党和政府对中亚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

然而，拉丁字母刚刚在中亚得到普及，苏联官方又以26个拉丁字母难以标出中亚本地语言中丰富的语音为理由，大力推行用32个西里尔字母取代拉丁字母的新一轮文字改革。对这次文字改革，苏联政府没有上次改革时那么有耐心，用行政手段迅速推广使用西里尔字母，结果在短短三五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拉丁字母的各种出版物很快销声匿迹了。随着西里尔字母的广泛应用，大量的俄语词汇进入了中亚各族居民的语言当中，

① С.Б.贝塞姆巴耶夫主编：《跳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第316页，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

而传统的突厥语词汇的比重明显下降。

关于中亚进行的第二轮文字改革的意义，有位苏联学者是这样论证的，苏联各族人民的语言“采用了俄文字体后，不仅使自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使苏联各民族在成功掌握俄语和吸收俄罗斯文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帮助”。[①]也就是说，改革可以促进中亚各族人民同苏联境内其他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进行文化交流。但是实际上苏联领导人急于完成使用西里尔字母的文字改革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图。中亚采用拉丁字母以后，苏联政府又觉得拉丁字母属于西方文化序列，同样是俄罗斯文化的“异己成分”。加上土耳其后来也采用拉丁字母，使好不容易初步阻断了中亚与土耳其的传统联系又将恢复。再则，苏联要在中亚着力培育的民族新文化是“苏维埃文化”，而产生苏维埃制度与苏维埃文化的俄罗斯文化要借助西里尔字母才能成为中亚新型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

从此以后，中亚各共和国都在法律上把俄语定为第二母语（在许多场合实际上俄语成了第一母语）。原先中亚各族居民完全可以用本族语言和阿拉伯字母直接进行交流，而现在中亚族际之间的交流都使用俄语。19世纪俄国征服后，中亚本地人士中陆续有人仿效俄罗斯方式给自己取姓。文字改革后，中亚各族居民的姓名统统改用俄罗斯人的范式，共由三个部分组成，依次为教名、父名和姓氏，而且绝大多数姓氏都加上了“夫”、“娃”之类的俄罗斯式后缀。

当时的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书记阿克马利·伊克拉莫夫谈论这次文字改革的意义时说道：“新字母是苏维埃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迅速掌握文化的必要条件，并给他们赶上先进得多的俄罗斯中央地区的民族提供了可能性，因而也是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武器。”[②]

---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69~70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З.Х.阿里夫汉诺娃等：《乌兹别克斯坦民族问题的解决》，第72页，塔什干1979年俄文版。

除了这些政治意义以外，文字改革对中亚各族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人们识字更容易一些，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到1939年，中亚各共和国居民识字率达到77.7%~83.6%，接近苏联居民平均识字率的87.4%。[①]这样，中亚文盲比例比邻近的伊斯兰国家都要低得多，而且在穆斯林世界历来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妇女也能上学读书了。30年代以来，乌兹别克每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土耳其高出7倍，比伊朗高出28倍，甚至比法国高出2倍。[②]各种各样的现代文化事业也在中亚迅速发展起来了，诸如报刊、广播、电影、戏剧等等，都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中亚的文化教育发展与俄罗斯化的进程是同步进行的。由于改革了传统的文字，中亚各族与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联系被割断了，中亚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受到了不少限制。

同时，苏联当局以及不少苏联学者反复强调，中亚各族人民无论在种族还是在宗教、文化方面都与邻近的伊朗人、土耳其人没有渊源，他们是阿拉伯人入侵以前的中亚上古文明民族的直系后裔，所以在文化上比土耳其人甚至伊朗人更加优越。现在，中亚各民族成了苏维埃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所以他们的新文化建设主要是吸收来自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文化。

追求中亚与俄罗斯的文化同一与排斥中亚传统宗教伊斯兰教也是同时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对伊斯兰教比较宽容，宗教活动只要不危害苏维埃政权和国家统一就合法。可是从1929年强化以农业集体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伊斯兰教的限制和批判加强了。本来，清除伊斯兰神权是一种

① С.Б.贝塞姆巴耶夫主编：《跳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第319页，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

② В.Я.涅波姆宁等：《跨越资本主义》，第11~12页，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

进步，对此中亚广大穆斯林也能理解和接受，但是苏联政府对他们的正常的宗教活动滥施限制，横加干涉，结果引起信教群众的强烈抵制与反抗。因此处在政治高压之下的宗教观念尽管处于抑制潜伏状态，但是一有机会就会显示出它的力量。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伊斯兰教在经过几十年宗教清洗和无神论灌输的中亚各国迅速复活与广泛传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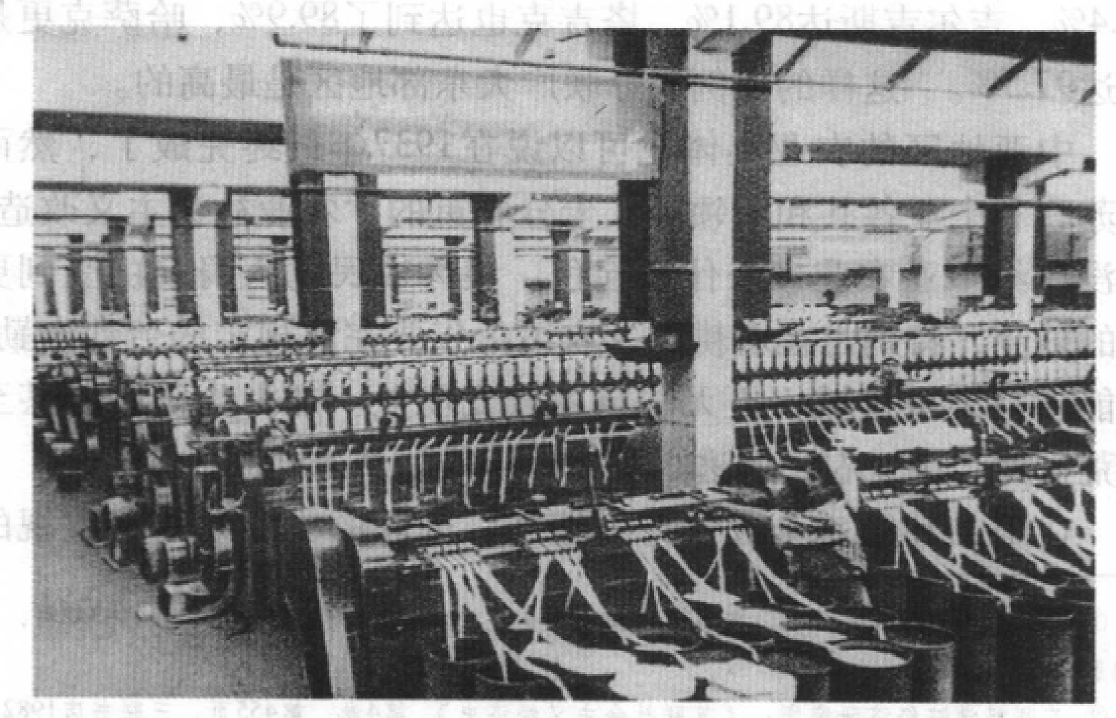
第五章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的中亚

第一节 中亚工业化建设高潮和政治清洗

苏联宣布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紧接着于193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各项指标要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在执行期间，苏联政府更加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和劳动者技术素质的提高。当苏联政府1937年宣布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不仅表明苏联的经济实力有非常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标志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从1938年开始，苏联马不停蹄地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计划更加宏伟，经济建设规模空前宏大，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工业生产布局更趋合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战争，但是也在作战争方面的某些准备，包括在东部兴建工业基地。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被迫中止第三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宣告完成。

1937年，“集体农庄已联合93%的农户和99%以上的播种面积”。①同时，苏联政府相当重视集体农庄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例如允许集体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称宅旁地）和自留畜。1933年5月，斯大林签发的一份中央文件承认消灭富农运动“伤及了个体农民和一部分集体农庄庄员”，并且下令停止大规模流放富农的行动。不过，苏联政府通过各项制度强化了对集体农庄的控制。从1933年1月起，苏联对集体农庄（及个体农户）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即国家用低廉的价格“收购”农民生产的大部分农牧产品。农民所得不足以抵偿生产成本，只得靠自留地（自留畜）进行弥补，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此外，苏联政府在农村设立机器拖拉机站，用提供耕作服务换取农产品作为报酬上交国家。甚至一度在机器拖拉机站设立政治部，主要任务是督促集体农庄“无条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同抗拒粮食和肉类收购的现象作斗



斯大林纳巴德纺织联合工厂生产车间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第40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争。[1]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亚地区特别是集体化运动“滞后”的游牧区和塔吉克共和国加紧“最后”完成农业集体化任务。考虑到前一段中亚地区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种种近乎发狂的做法，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9月做了一个决议，不允许在哈萨克斯坦等游牧区和半游牧区开展集体化时搞“强迫命令”，而且可以推广公有化程度较低的集体农庄形式共耕社（不一定搞劳动组合）。1933年下半年，联共（布）中央对塔吉克的农业集体化作出指示，允许塔吉克可以从最简单的形式开始集体化。结果，中亚地区低级集体农庄增多。1937年，“最简单的集体农庄”在塔吉克占到67%，在吉尔吉斯占33.8%，在哈萨克占29%。[2]由于政策有所放宽，加上当局的行政压力和对个体农民的种种歧视，中亚地区从1935年起出现了第二轮集体化高潮。到1937年，乌兹别克集体化农户的比例达95%，土库曼达95.4%，吉尔吉斯达89.1%，塔吉克也达到了89.9%，哈萨克更是高达97.5%。[3]这样的比例在苏联广大东部地区是最高的。

中亚地区的农业集体化可以说在1937年最终完成了，然而被苏联和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十分看重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给中亚农业带来什么起色。集体农民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在农耕区，农民每年要完成规定的劳动出勤，不能擅自离乡进城，更无法自由改变职业。加上生活困苦甚至饥荒折磨，中亚农民的逃亡直到40年代初从未间断过。

在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党和政府最重视的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41-34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第45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③ C.B.贝塞姆巴耶夫主编：《跳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第273页，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

经济部门当然是工业，不仅重视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且非常重视工业的科学布局，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原先工业落后而资源又十分丰富的东部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加快工业化建设。1932年2月，联共（布）中央在关于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指出："在苏联东部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巴什基里亚、远东地区、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大力发展机器制造、冶金、煤矿、石油、电力等工业部门。"[①]1939年3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决议禁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顿河罗斯托夫、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等老工业城市新建工厂企业，但是"规定在苏联东部和远东地区更迅速地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建立新的企业"。目的是"保证进一步提高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的经济和文化"。[②]这种重心东移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对中亚各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来说，实在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在1933~1941年6月的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工业投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哈萨克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19360万卢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增加152.1%，其他4个共和国相应的数据为：乌兹别克投资为9950万卢布，增加240%；土库曼投资为2210万卢布，增加245.3%；塔吉克的投资为1980万卢布，增加147.5%；吉尔吉斯的投资为1510万卢布，增加331.4%；均高于全苏联投资的平均增长幅度120.1%。[③]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多，中亚的工业投资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第34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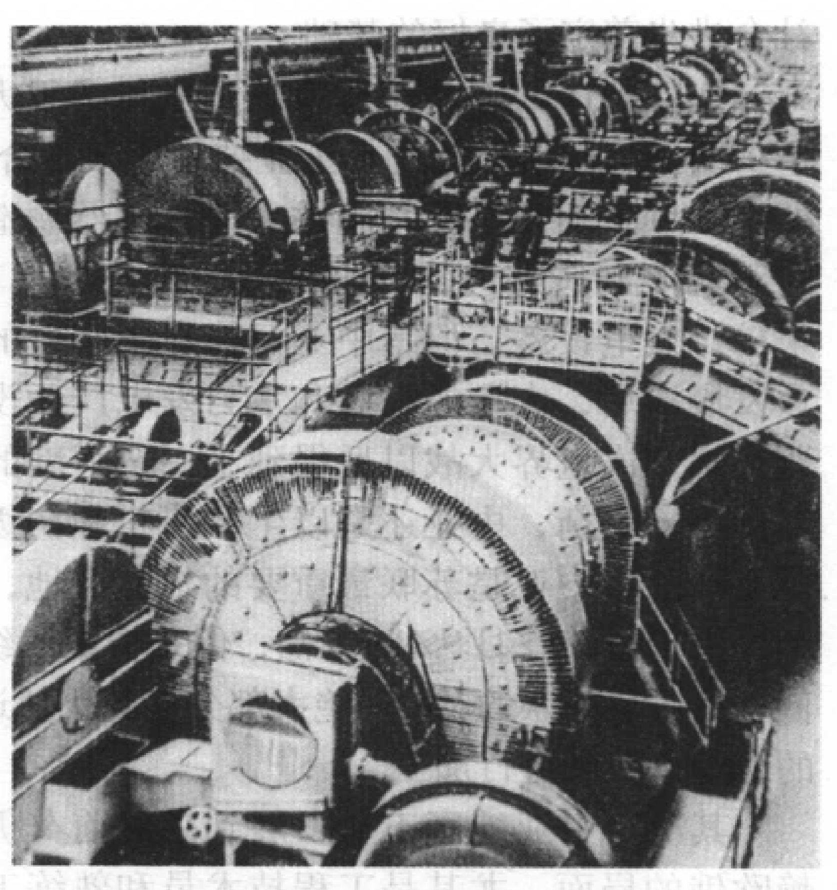
继续增加。

在这期间，中亚地区建成了一大批重要的工业交通项目。地域辽阔和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仍然是苏联在中亚地区投资建设的重点，扩建与新建投产的主要项目和企业有：奇姆肯特炼铅厂，杰兹卡兹甘、巴尔喀什和额尔齐斯炼铜厂，里杰尔金属冶炼联合企业等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卡拉干达、阿拉木图、奇姆肯特、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巴尔喀什发电厂和乌利宾水电站等电力企业，恩巴河、库里萨尔、萨吉兹、贾克瑟梅等地的油田，古里耶夫-奥尔斯克输油管道，阿克纠宾斯克化工厂等等。投入使用的铁路线有：乌拉尔斯克-索利伊列茨克、卡拉干达-巴尔喀什、里杰尔-鲁布佐夫卡、扎雷克-杰兹卡兹甘等干线，以及阿克莫林斯克-卡尔塔雷、古里耶夫-奥尔斯克的一些路段，还有一些支线。贯穿哈萨克斯坦东部的环行公路也通车了。

其他4个中亚共和国也建成了不少重要企业和项目。其中包括：乌兹别克的奇尔奇克水电站和化工联合企业、阿尔马雷克炼铜厂、塔什干棉纺织厂和农机制造厂、库瓦赛发电厂、费尔干纳棉纺织厂、塔什干-铁尔梅兹公路（乌兹别克大道）等等；土库曼的阿什哈巴德纺织厂和玻璃厂、马雷造纸厂、内比特达格油田等；塔吉克的上瓦尔佐布水电站、斯大林纳巴德（今杜尚别）肉类联合加工厂、列宁纳巴德（今苦盏）棉纺织厂和新帕米尔公路等；吉尔吉斯的制糖企业和稀有金属、煤矿开采等。

大批企业和项目投产，使中亚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成倍增加。1937年，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五个共和国的工业产量分别相当于1932年的2.4倍、2.4倍、2.3倍、3.7倍和2.2倍，其中大工业增长更快，分别相当于1932年的2.7倍、2.4倍、2.4倍、4.2倍和2.3倍，均高于同期全苏联的平均值2.2倍和2.3倍。[①]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提高。以中亚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第34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巴尔喀什钢铁联合企业选矿厂

工业建设最迅速的哈萨克共和国为例，1930年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产品总额的6%，1940年猛增到60%。[①]到1940年，中亚生产的有色金属在全苏联十多个经济区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乌拉尔），其中铅居第一位，煤炭产量居第三位（仅次于乌克兰的顿巴斯和西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石油产量也居第三位（仅次于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和乌拉尔—伏尔加河之间的“第二巴库”），但中亚石油产量到当时仅占全苏联石油总产量的4.7%。

随着工矿业的发展，中亚地区一大批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主要有哈萨克的卡拉干达、里杰尔、巴尔喀什、阿亚古兹、阿拉尔斯克等，乌兹别克的奇尔奇克、安格连、努库斯等。

30年代苏联在中亚各共和国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地区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局面，工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同时大大改观了中亚地区的社会面貌，新的城镇、工厂拔地而起，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四通八达，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这一切为中亚地区以后经济发展和

① B.Я.涅波姆宁：《跨越资本主义》，第83页，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

社会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存在着不少明显的问题。首先是工业结构还很不合理，40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领土上几乎没有钢铁企业；机器制造业也十分落后，当时苏联能制造先进的电力机车、飞机、汽车以及成套的冶金、采矿、发电设备，但是中亚只能造中小型的农业机械；电力工业发展滞后，大型的火力和水力发电厂还没有建起来。这些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平衡，中亚还是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轻工业也是如此，中亚是苏联最重要的棉花产地，1937年仅乌兹别克就提供了全苏联41.9%的皮棉，但是中亚棉纺织工业生产能力很低，只占全苏联的2%。[①]绝大部分棉花仍然运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区进行加工。

其次，中亚地区工业发展到战争前夕仍然没有摆脱严重依赖欧俄的局面。尤其是工程技术员和熟练工人仍然以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占压倒优势，中亚本地民族出身的工人没有超过工人总数的一半，而且绝大多数是初级工。因此，俄罗斯人在中亚人口中的比重继续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发展最快的哈萨克特别明显。1939年，在哈萨克的城市人口中，哈萨克族居民只占21.9%，俄罗斯人却达到57.7%。[②]

此外，中亚地区的工业在体制方面存在着与全苏联类似的问题，如管理权力过于集中、产品质量差和企业效益低、机制缺乏活力等等。这是“斯大林经济模式”的通病，而且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1936年1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联盟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他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第327、34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55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在报告中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经济不会有危机和失业，不会有贫困和破产。”[①]这里指的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正是“斯大林经济模式”两个最主要的特征。

12月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新宪法。这部宪法把斯大林模式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后来，这个模式更是成为不容怀疑、不能改革的神圣之物。

“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俄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折射，是对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孤立状态的一种对抗，是苏联国内乃至党内日益尖锐的斗争的结果，是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希望国家尽快强大的强烈愿望的产物。应当肯定，斯大林模式把相当落后的苏联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国，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留下了不少隐患。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无视基本经济规律，为了速度和产量，可以不计成本，不顾代价，把经济建设纯粹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此外，斯大林模式是一个“见物不见人”的体制，苏联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全面进步。而且，相对经济增长速度来说，30年代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却呈下降趋势。还要指出一点，在苏联经济全盘公有的体制下，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并没有得到实现，经济的决策权力甚至具体到生产过程都由国家和各级领导人说了算。

1936年的苏联新宪法颁布以后，包括中亚各共和国在内的11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自己的新宪法。中亚五个共和国批准新的共和国宪法的时间具体如下：乌兹别克——1937年2月14日，塔吉克——1937年3月1日，土库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0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曼——1937年3月2日，吉尔吉斯——1937年3月23日，哈萨克——1937年3月26日。[①]

中亚各共和国（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新宪法的原则和内容与苏联新宪法是一致的。这些宪法都宣布社会主义在共和国取得了胜利，由于中亚各共和国此前都未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以苏联理论界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苏联风行了几十年。

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列宁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列宁说："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②]苏联理论界后来不断发挥列宁的上述"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

196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亚地区跨越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代表著作这样写道：在各族劳动人民中间千方百计培育民族联合思想并推动他们走上联合道路的苏维埃制度，是吸引那些还没有经历过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强大推动力"。[③]该著作在进一步论述中亚地区各民族"跨越过渡"时写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苏联其他民族兄弟般的帮助下，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建设新生活的列宁主义路线，遵循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同规律，并且考虑了各自共和国的历史和民族特性。这些特性是在贯彻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有最重要的措施——即以执行苏维埃政权关于土地和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为

① 各加盟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一样，规定最高苏维埃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取代原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③ B.Я.涅波姆宁：《跨越资本主义》，第4页，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

开端，以完成共和国工业化、农牧民的集体化和实现文化革命而告终的那些措施中显现出来的。”[①]

也就是说，原先处于前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中亚各族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俄罗斯等先进民族的帮助下，可以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顺利地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任务。到30年代中后期，中亚各共和国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理论界认为这是中亚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飞跃，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和民族学说在中亚乃至整个苏联东方地区的一大胜利，对世界上所有不发达地区、国家和民族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跨越历史发展阶段不仅从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上跨越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或国家并不鲜见。成功的关键在于，这种跨越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的“跨越”上。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中亚地区实行的历史发展的跨越在很大程度是生产关系的“跨越”，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把封建的甚至部落氏族的所有制度变成了公有制。在公有制确立前后，苏联领导人考虑最多的不是如何使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互相协调，互相适应，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防止旧制度“复辟”，放在抓阶级斗争上面去了。

从20年代后期，也就是苏联清除布哈林“右倾集团”和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苏联领导人十分强调阶级斗争。1933年1月，斯大林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②]这种极端的“辩证法”人为地激化了社会上和党内的“阶级斗争”。

① В.Я.涅波姆宁：《跨越资本主义》，第9页，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在缩小，在消失”。[①]按照斯大林的报告，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到30年代中后期至少是从根本上缓解了。可是没过多久，斯大林就阶级斗争发表了空前严厉的讲话。他在1937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②]对于这些敌人，必须采取“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

在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苏联从30年代后期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揭露和镇压“人民的敌人”的运动逐步升级。先是在党外抓阶级敌人，30年代以后转入党内抓敌人为主，镇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批“反对派”人士以后，又对不满苏联社会主义激进改造措施和无情镇压阶级敌人做法的干部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正是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对立的时候，苏联残酷的政治清洗运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苏联持续的政治清洗过程中，中亚地区并没有因地处偏远而得以幸免，甚至政治清洗开始得更早，而且更彻底。中亚地区漫长的政治清洗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因犯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行遭到镇压的，也可以说是苏联“大俄罗斯主义”的一贯政策的牺牲品。

早在1922年秋冬苏联宣布成立的前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就暴露出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列宁当时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苏联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在病床上口授了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03页、10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严厉批评苏联一些领导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被批评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实际上并没有在思想上真正引起重视，大俄罗斯主义一直是主导俄共（布）民族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

1923年4月，俄共（布）举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民族问题是此次大会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在讨论斯大林所作的报告时，原突厥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雷斯库洛夫等人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不平等现象作了发言。最后，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宣称："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作坚决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一项任务。"并且为确保这一任务的完成确定了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一系列原则（作为第二项任务）。但是代表大会在确定了第一和第二项任务后并没有忘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把这作为"我们党当前的第三项任务"。[①]结果在两个月以后召开的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上，"第三项任务"成为真正的"第一项任务"。

1923年6月9~12日，俄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第四次会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各民族共和国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亚地区代表有突厥斯坦的雷斯库洛夫、柳比莫夫、希德拉利耶夫、盖基西兹·阿塔巴耶夫（Кайгисыз Атабаев，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克马利·伊克拉莫夫、拉希姆巴耶夫、霍贾诺夫（С.Ходжанов）等，布哈拉的费祖拉·霍贾耶夫等，还有吉尔吉斯地区的代表。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口诛笔伐鞑靼共产党活动家米尔萨乌德·苏丹-加利耶夫（Мирсауд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他被认为是党内"地方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这次会议对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势必产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84、28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生重要的影响。

会议一开始，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就“苏丹-加利耶夫事件”作报告，他说：“这次会议采取的不是和平手段，而是要拿起剑。”[①]在他的鼓动之下，会议掀起了声讨被告的浪潮，包括来自中亚的大多数与会者赞成古比雪夫的意见，要求“严惩”苏丹-加利耶夫。但是第一个发言的雷斯库洛夫反对这种做法，他担心这样做不利于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霍贾诺夫则公开说苏丹-加利耶夫的罪名难以成立。特别是在中亚战斗多年的伏龙芝指出，古比雪夫的决议案有缺陷，苏丹-加利耶夫的问题不构成“案件”，最多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②]乌克兰国务活动家斯克雷普尼克（Н.А.Скрыпник）也持怀疑态度。伊克拉莫夫还对斯大林提出废止“殖民主义”的诚意表示极大怀疑。[③]反对的声音终究是微弱的，会议通过的决议给苏丹-加利耶夫所加的罪名是“建立秘密组织”和同巴斯马奇匪帮“建立联系”。[④]

这次中央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的另一个决议提出：“清洗国家机关和党机关中的民族主义分子（首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民族主义分子）。”[⑤]实际上会后俄共（布）集中力量清洗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自从1923年“苏丹-加利耶夫事件”以后，中亚面临的反对

①《米尔萨乌德·苏丹-加利耶夫文集》，第15页，喀山1992年俄文版。

② Б.Ф.苏丹别科夫编：《俄共中央民族政策的秘密》，第24页，第44页和第52~53页，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

③ 杰弗里·惠勒：《苏维埃中亚现代史》，第143页，伦敦1964年英文版。

④《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40~34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⑤《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45~34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民族主义的压力明显增加，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中亚还没有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相反，由于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有这样的规定：“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①]而且这个决议在当时还是相当起作用的。因此，1924年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后，新成立的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是由本民族干部担任，在州、区等地方机关也是如此。各共和国共产党及联共（布）的边区（或州）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同样多由本民族党员担任，只有联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戈洛谢金是俄罗斯人。另外俄罗斯人伊万诺夫和梅日拉乌克曾经分别与本地共产党员共同担任过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的书记，不过他们没工作多久便离开了中亚。

从1925年起，苏联对中亚各共和国共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开始进行清洗，一批高中层官员因涉嫌“民族主义”错误而遭批判和免职。进入30年代以后，苏联在中亚地区镇压民族主义的运动急剧升级，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大清洗。许多党政官员甚至普通党员群众在这场清洗中遭到了灭顶之灾。

在哈萨克共和国，被当代哈萨克史学家称为“斯大林的代理人”的戈洛谢金对清洗民族主义十分卖力。他认为十月革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进行得很不彻底，因此要来一次补课。1927年12月，哈萨克边区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清除了不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戈洛谢金控制了边区党委书记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哈萨克共和国揭露了许多“反革命组织”：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929年揭露了31个，1930年为82个，1931年为80个，共有9906人因此被捕。[①]原阿拉什党人成为这轮镇压的主要对象，其中包括布凯汉诺夫、巴伊图尔西诺夫、杜拉托夫、朱马巴耶夫（М. Жумабаев）、艾马乌托夫（Ж. Аймаутов）、塔内什巴耶夫等知名人士。

1931~1932年，因为狂热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哈萨克斯坦爆发大饥荒，许多干部就此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当时的政策。巴甫洛达尔出现了"五人信件"。穆斯列波夫（Г. Мусрепов）等5名干部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反映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严重情况，要求改变政策。同时，雷斯库洛夫给斯大林写了类似性质的信件。1932年5月，哈萨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У. Исаев）签署的政府公报也披露了哈萨克斯坦发生饥荒和居民逃亡的情况。这些人在后来的清洗高潮中没有一个得以善终。

尽管戈洛谢金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路线，但是联共（布）中央对他的"工作成效"不满意，尤其是他没能控制30年代初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因此1933年戈洛谢金被调离，亚美尼亚人米尔佐扬（Л.И.Мирзоян）接替他担任联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935年，哈萨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库卢姆别托夫（У.Кулумбетов）被控犯有"民族主义"错误，他虽然暂时没有被撤职，但是受到株连的人很多。经过这次清洗，1924年民族国家划界以后形成的哈萨克民族领导集团不复存在了。

1937~1938年的大清洗高潮中，哈萨克共和国现任领导人全部被当做"人民的敌人"消灭了。其中包括：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米尔佐扬，哈萨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代主席叶斯卡拉耶夫（С.Ескараев）和前主席努尔马

① Е.К.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63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科夫（Н.Нурмаков），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库卢姆别托夫、前主席缅捷舍夫以及霍贾诺夫等等。连戈洛谢金（调离哈萨克以后任国家仲裁委员会负责人）后来也死于大清洗（1941年）。

乌兹别克共和国同样是政治清洗的重灾区。1924年民族国家划界以后，原贾迪德运动人士和青年布哈拉党人（他们都已加入了共产党）掌握了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实权。他们推行积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政策，反对无限制地扩种棉花，主张某些民族部落恢复使用察合台语等，结果引起莫斯科的猜疑。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费祖拉·霍贾耶夫和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首当其冲。

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人费祖拉·霍贾耶夫是中亚现代史上一位相当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他1896年出生在布哈拉一个乌兹别克族富商家庭。1917年，费祖拉·霍贾耶夫加入青年布哈拉党，积极从事反对埃米尔统治的斗争，后逃亡塔什干，成为该党左翼的领袖。1920年加入共产党。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他一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兼任俄共（布）中央中亚局委员、东布哈拉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4年，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费祖拉·霍贾耶夫一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年，他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主席之一。费祖拉·霍贾耶夫不仅积极投身政治活动，而且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政论、经济和历史著作。

在大清洗运动开始后，乌兹别克共青团中央书记揭发费祖拉·霍贾耶夫包庇他的兄弟在生活中“遵循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1]1937年6月，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解除费祖拉·霍贾耶夫的职务。接着他奉命去莫斯科，就在那里被捕。

伊克拉莫夫1918年2月就加入了共产党，1921~1922年任突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63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厥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1925年起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书记，1929年起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乌兹别克工作期间，伊克拉莫夫与费祖拉·霍贾耶夫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1931~1934年，他还兼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书记。1937年9月，伊克拉莫夫被人指控在报刊文章中宣扬民族主义而被开除党籍，不久被逮捕。

奇怪的是，费祖拉·霍贾耶夫和伊克拉莫夫被苏联检察机关纳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同布哈林、李可夫（А.И. Рыков，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1925~1927年担任过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书记的弗·伊·伊万诺夫等被告一起出庭受审。

在1938年3月举行的审讯中，乌兹别克领导人承认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类的所有指控。费祖拉·霍贾耶夫供认参加了“布哈林集团”，因为后者曾向他保证使乌兹别克斯坦脱离苏联独立。他在法庭上说：“……即使那件事在付出了阴谋变节、背叛祖国的代价后竟然可能实现……这种虚假的独立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来说，毫无疑问会是一场新的灾难。”[①]法庭最后判决费祖拉·霍贾耶夫、伊克拉莫夫、伊万诺夫死刑，布哈林、李可夫等另外15名被告也被判处死刑。3月15日凌晨，18名死刑判决者被执行了枪决。

费祖拉·霍贾耶夫被撤职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乌兹别克共和国又有三位人民委员会主席遭到镇压：阿卜杜拉·卡里莫夫(Абдулла Каримов)、托拉别科夫（Торабеков）、索尔坦·塞吉斯巴耶夫（Солтан Сегисбаев）。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追随同族政治活动家雷斯库洛夫的领导人很多，他们对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强制实行牧民定居的做法心怀不满。1935年，吉尔吉斯共和国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88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计划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克里姆·苏杜科夫（Абдулкерим Судуков）被指控从事“反对集体化的反革命活动”而遭到清洗，结果一大批吉尔吉斯领导干部被划成了“苏杜科夫分子”而备受打击。1937年，苏联开始了大清洗运动，随着雷斯库洛夫在莫斯科被捕，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大清洗运动达到了高潮。

图拉尔·雷斯库洛夫1894年生于锡尔河省奥利耶—阿塔县一个吉尔吉斯人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雷斯库洛夫担任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0年初任主席。1921年，雷斯库洛夫奉调到莫斯科在斯大林为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又回到塔什干，任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并成为俄共（布）中亚局委员。1923年6月，在中央全会上雷斯库洛夫对“苏丹-加利耶夫事件”提出了质疑。1924年中亚实行民族国家划界后他离开了中亚。1926年起，雷斯库洛夫一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20年代初，雷斯库洛夫因主张建立“突厥人共产党”和“突厥人共和国”而受过列宁的批评。30年代政治清洗期间旧事重提，雷斯库洛夫只得再次认错和辩白。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我为首的一批党员，曾奉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革命开始时帮助团结当地的劳动人民来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在1920~1921年间犯了几个严重错误。我们在克服了所谓‘殖民地偏差’和控制了土尔克斯坦（即突厥斯坦——引者注）共和国之后（我当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我们被民族主义口号引入歧途，想充当‘民族领袖’，低估了国际主义问题，竭力把我们本民族的干部安插进公众生活的机关等等。过去15年中，党对我进行了足够的考验，我一次也没有背离党的路线。我1920~1921年所犯的错误教训了我，应当在日常工作中成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我相信，我决不会背离这一路

线。”[1]但是这样的申辩在当时是毫不起作用的。1937年雷斯库洛夫被秘密处决。

在1937~1938年苏联大清洗高潮中，吉尔吉斯共和国领导层损失惨重。在这期间遭镇压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乌拉兹别科夫、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赫曼诺夫（Абдурахманов）及其继任者伊萨凯耶夫（Б.Исакеев）和萨利霍夫（Салихов），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三任第一书记沙赫莱、别洛茨基（М.Л. Белоцкий）和阿莫索夫（М.К.Аммосов），还有原吉尔吉斯自治州党委书记、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委员萨达耶夫（Д.С. Садаев）等。

土库曼共和国的大清洗同样是十分残酷的。1924年以后，一直担任土库曼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阿塔巴耶夫和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阿伊塔科夫都未能幸免于难。此外，土库曼中央书记穆罕默多夫（К.А.Мухамедов）、原中央书记萨哈特姆拉多夫和梅日拉乌克（后来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等职）也都遭到了镇压。

1933年，塔吉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纳斯拉图拉·马克苏姆（Насратулла Максум）及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希姆·哈吉巴耶夫（Абдурахим Хаджибаев）被联共（布）中央指控为“丧失警惕”，并且要对共和国农业损失负责，再就是犯有包庇反俄罗斯情绪的“民族沙文主义”罪过，所以被撤职。随后，在塔吉克开展一场不事声张的清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

1937年，塔吉克斯坦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塔吉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绍捷莫尔、人民委员会主席拉希姆巴耶夫、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原第一书记古谢伊诺夫被指控为从事“民族分裂”的“托洛茨基分子”，惨遭杀害。同时，还有一

[1] 鲍里斯·列维茨基：《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大批塔吉克政府高级官员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

此外，还有很多曾在中亚地区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而在大清洗前调离了中亚的人士也成了大清洗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担任过突厥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科列索夫、柳比莫夫，担任过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的科博泽夫，担任过俄罗斯联邦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埃利亚瓦、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以及担任过委员的博基、索科里尼科夫、萨法罗夫和彼得斯等，担任过俄共（布）—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书记的鲁祖塔克、鲍曼（К.Я.Бауман）、泽连斯基（И.А.Зеленский）等，以及在中亚担任过重要军事指挥职务的伊·别洛夫、科尔克、库兹明等。他们都是在1937~1940年间遭镇压的，只有托姆斯基是1936年自杀身亡的。另外，曾任苏联党和政府派驻中亚的全权代表的奥尔忠尼启则也于1937年2月自杀，以示对大清洗的抗议。

应当指出，中亚地区发生的政治清洗同苏联全国一样，所有判决的监禁、流放、枪决都不是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而是由国家安全机关（联盟和共和国内务部）一手操办的，都是冤假错案。斯大林1953年去世以后，苏联陆续为全国及中亚的大清洗受害者平反，给他们恢复了名誉。

经过30年代的大清洗，中亚各共和国的干部短缺，苏联党和政府紧急起用一大批年轻人填补留下的空缺。这一代新人多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成长起来的，受过专业教育，但是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工作能力。此外，苏联还从外地调配许多俄罗斯青年干部来中亚担负领导工作。这一切对中亚地区日后的政治局势和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节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中亚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集中强大的兵力，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方面把这场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

德国自1939年9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占领了十几个欧洲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空前强大，而苏联方面过分倚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备战工作做得相当欠缺，所以战争初期德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消灭了苏联军队数以百万计的有生力量。但是到1941年冬季，德国侵略军遇到了苏联军民越来越顽强和有效的抵抗，消耗了大量兵力。从1942年冬季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苏德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苏军连续发动大规模反攻。在苏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入侵的德军节节败退。经过历时数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苏联人民终于把德国侵略军赶出了国土。1945年5月1日，苏军攻占德国首都柏林。不久，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及反纳粹同盟国取得了对德战争的最后胜利。

应当说，苏联是在极其不利和险恶的条件下挫败了德军的进攻势头的。截至1941年11月，在德军占领的苏联领土上的居民约占战前苏联全国人口的40%，煤炭产量为战前全国的63%，生铁为68%，钢为58%，铝为60%；沦陷区的粮食产量占到战前苏联全国的38%，食糖产量占84%，牛占38%，猪占60%；敌占区的铁路长度占苏联全国铁路总长的41%；苏联的工业总产量因此下降了52%。[1]如此惨重的损失，要是发生在其他国家，就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但是在苏联，由于有无比辽阔的战略后

①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45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方，即包括中亚在内的苏联东部地区，而且这里在战前就建立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因此能迅速弥补因大片国土沦陷而丧失的巨大生产力，为前线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所需物品。

战争爆发以前，苏联的工业仍然主要集中在西部。德军侵入苏联后，苏联政府马上竭尽全力将西部许许多多重要的工厂企业搬迁到东部地区去，结果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迅速成为强大的军火和其他工业品生产基地，以及重要的农产品基地。

战争爆发以后，苏联整个国民经济旋即转入战时经济体制，而大规模向东部地区搬迁企业和疏散人员就成了苏联政府的当务之急。1941年6月24日，苏联成立工业疏散委员会。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它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①]疏散委员会的主席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Н.М.Шверни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柯西金（А.Н.Косыгин）和别尔乌辛（М.Г.Первухин）任委员会副主席。接着，苏联政府又成立了居民疏散局、劳动力调配委员会和中央遣送事务委员会等，负责向后方疏散城镇居民和政府工作人员。

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险恶，工业疏散委员会等机构在苏联人民的积极配合下还是取得了可观的工作成效。仅仅在1941年下半年，就有1523个重要的工业企业（其中有1360个大工厂）从苏联西部搬迁到了东部。这些企业当中226个搬迁到伏尔加河流域，667个搬迁到乌拉尔，244个搬迁到西西伯利亚，78个搬迁到东西伯利亚，搬迁到中亚各共和国的企业有308个。同时，这些企业30%~40%的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也随工厂迁移到了东部地区。除工厂外，还从苏联西部往东部转移了大量储备粮

① 1941年5月，斯大林取代莫洛托夫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6月30日任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主席。

食、几万台拖拉机以及239.33万头牲畜。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大学、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中学从苏联西部撤退到了东部。为完成如此巨大的搬迁工作，仅是火车车皮就装满了150万节。[①]向东部疏散人员的规模超过1000万。这种大规模搬迁和疏散的速度是十分罕见的，而且所有搬迁的工厂很快就在苏联东部各地建设起来，投入生产，有的工厂甚至等不及厂房完全建好，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苏联政府注意在工厂东迁的基础上加快东部工业基地的建设。1941年8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地区1941年第四季度和1942年军事、经济计划》的决议。这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Н.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主持制定的第一个"战时经济计划"。决议详细规定了在上述地区进行工厂搬迁、工业基建的目标，规定了在这一时间内工业、农业和交通的生产任务。12月25日，苏联政府颁布的计划要求："1942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重建被疏散到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哈萨克、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的企业，并使之开工。"[②]后来，苏联政府在上述地区加大投资，兴建了许多重要的工厂企业，使这里成为战时苏联最重要的军火和工业生产基地。据统计，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仅中央基建的拨款用于东部地区的达366亿卢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将近一半。除迁来的一千多个大工厂以外，东部地区还新建投产了2250个大型企业。[③]东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由1940年的394亿卢布增加到1944年的912亿卢布。[④]

① Н.Г.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第245–2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第272–27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455–45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47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地处苏联东部地区范围之内的中亚，卫国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苏联重要的后方基地之一。

战争爆发后，中亚各共和国陆续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例如，1941年6月25~26日召开的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决定将共和国经济整体转入战时轨道。同年12月，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全会的决定提出了改组共和国工业的具体措施，以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保证前线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

在迁入中亚地区的308个西部企业中，哈萨克共和国接收了150个，其他四个共和国接受了158个。[①]到1942年下半年，这些企业全部开工生产。为了使迁入的企业尽快开工生产，中亚各共和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接纳搬迁工厂最多的哈萨克斯坦，时任哈萨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库纳耶夫（Д.А. Кунаев）描述当时的情形时写道："为接收和安排疏散的工厂以及掌握其生产工艺进行了大量工作。所有这些工厂短期内就在新地区开工，并开始向苏联许多地区的重工业企业供应设备，供应前线用的产品。"哈萨克人民像亲人一样迎接疏散来的欧俄各族人员。[②]

除了几百个工厂搬迁到中亚以外，苏联政府还在中亚投资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工厂、矿山和电站。与1940年相比，中亚各共和国1945年的工业固定资产值均有大幅度增长，其中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几乎增长了1倍。[③]卫国战争期间，中亚地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到67亿卢布，1943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66亿卢布（1940年为48亿卢布）。[④]

通过搬迁、重建和新建，卫国战争期间，中亚新增了一大批重要的骨干工业企业。其中最重要的冶金企业有：1944年投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43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22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44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④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459~46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产的中亚两座大型钢铁厂——哈萨克冶金厂（在撒马尔罕镇，今铁米尔套）和乌兹别克冶金厂（在别戈瓦特，今别卡巴德），还有阿克纠宾斯克铁合金厂、铁克利铅锌冶炼厂、乌拉尔斯克钢管厂和全苏联最大的巴尔喀什炼铜厂的扩建工程，以及杰兹金锰矿、吉尔吉斯境内多座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矿山。重要的机器制造企业有：哈萨克重型机器制造厂（阿拉木图）、卡拉干达矿山机器厂、奇姆肯特锻压设备厂、阿克莫林斯克农业机械厂、乌兹别克化工机械厂（奇尔奇克）、乌兹别克农业机械厂（塔什干）等。其他重要的工厂有：斯大林纳巴德水泥厂和纺织联合企业、乌兹别克的法尔哈德水电站和卡拉干达区域电站等发电企业、奇尔奇克氮肥厂的扩建工程，以及卡拉干达、安格连煤矿的扩建，恩巴河和土库曼里海油田的开采和古里耶夫炼油厂、乌兹别克文诺夫斯基车站炼油厂的兴建。还有一大批重要的轻工纺织企业（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丝织厂、哈萨克和土库曼的毛纺厂、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的麻纺厂、各共和国的棉纺织厂和糖厂等）建成投产。

战争期间，中亚地区各共和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显著上升。例如，哈萨克的工业产值在卫国战争期间增长了40%，而重工业产值增长了90%，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0年的51.5%上升到1945年的66%。乌兹别克的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0年为24.3%，1944年上升到52.4%。吉尔吉斯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1年的50.2%增长到1945年的67.5%。[①]

战前中亚几乎没有钢铁工业企业，战时迁来和新建了好几座大型钢铁冶炼和轧材工厂。战前中亚十分薄弱的机器制造工业在战时得到了根本改观。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建立了门类相当齐全的工业体系，冶金、机械、电力等部门从无到有、从小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467~46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到大发展起来了。乌兹别克到战争后期拥有了钢铁、机械、化工等新的工业部门。

战争期间，中亚地区许多工业产品在苏联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哈萨克斯坦生产了全苏联85%的铅、30%的铜、65%的铋、60%的钼和70%的混合金属。[①]哈萨克斯坦还是制造武器装备所需的特种钢的生产基地。吉尔吉斯斯坦生产的稀有金属在苏联居第一位。

但是，战时中亚工业的发展很不均衡。在军火、机械、金属生产较发达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工业产值有增长。1945年三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比1940年分别增长了40%、7%和22%。而在以纺织等传统工业为主的土库曼和塔吉克共和国，同期的工业总产值却分别下降了13%和26%。[②]在哈萨克尤其是在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与军火关系不密切的工业部门也都明显减产。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以重工业为主的塔什干市，1945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40年的201%，塔什干州也有148%，而其他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为主的州，产值大幅度下降：纳曼干州1945年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的49%，安集延州为80%，撒马尔罕州为76%，卡什卡河州为58%，花剌子模州为49%，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为53%。[③]

由于搬迁企业、疏散人员，还有基本建设所需建筑材料的运输，以及大量武器和其他产品运往前线，都给中亚地区原有的交通系统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为了满足迅速增加的运输周转量，战时中亚的交通设施建设发展很快。

中亚地区战时贯通的重要铁路有：阿克莫林斯克—卡尔塔雷、奥尔斯克—坎达加奇（今十月城）—古里耶夫两条干线以

① E.K.圣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70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465-466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及江布尔（原名奥利耶-阿塔，1936~1938年叫米尔佐扬）—丘拉克套、塔尔迪库尔干—铁克利、塔什干—安格连等支线。这期间，古里耶夫-阿斯特拉罕公路通车，土库曼铁路扩能竣工，克拉斯诺沃茨克港经过扩建成为重要港口。

1942年夏，由于德军进抵到伏尔加河岸边，巴库油田与俄罗斯中央地区的联系受阻，油品只得绕道经古里耶夫或克拉斯诺沃茨克港运往中央地区。纳尔蒙达拉克至马卡特的输油管也建成了。

战争时期，苏联国家的粮食需求量大增，而西部乌克兰等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因此要求东部地区扩种粮食。中亚地区的棉花及饲料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改种粮食作物。同时，在哈萨克斯坦等地的草原垦殖荒地，扩大粮食播种面积。1942年，中亚的粮食播种面积比1940年增加了20%，其中秋粮种植面积比1940年增加44%，马铃薯和蔬菜种植面积同期增加了32%。①

卫国战争期间，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为苏联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牧产品。1941年，哈萨克共和国储备和提供的谷物为1亿普特。同年，哈萨克集体农庄饲养的牲畜比上年增加20.9%，为前线提供的肉、奶以及为工厂提供的羊毛、皮革都为数可观。苏联政府在1942年5月12日的《真理报》撰文表扬道："在危急的时候，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的食品供应并不严重短缺，在这方面，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体农庄庄员、共产党和苏维埃组织作出了巨大贡献。"②

乌兹别克等共和国战前要从外地输入粮食，战争爆发后不仅不能输进粮食，还要养活战时流入的大量俄罗斯人、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其中还有不少难民。

实际上，中亚各共和国人民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战时生活状况明显恶化。工厂的搬迁和人员的疏散使中亚地区许多城

① 《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第486~48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70~171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市人口激增。例如，塔什干的人口由1939年的58.5万增至1944年的100万，撒马尔罕的人口也由15万增加到30万。[①]城市居民住房十分简陋拥挤，卫生状况很差，经常发生疾病流行。市民们的食品配给根本填不饱肚子，黑市上的食品价格则贵得惊人。此外，当地生产的轻工产品大多运往前线，中亚居民的生活日用品也时常短缺。

生产粮食的农村情况似乎更糟，上缴国家的粮食一粒也不能少，农民们经常挨饿。官方的材料也承认，1942~1943年，集体农庄给每个劳动力日发放的粮食报酬比1940年平均减少了50%。[②]肉类更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战争期间，有关中亚地区发生饥荒的报告不止一次送到了斯大林手里。塔吉克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的报告这样写道："在列宁纳巴德州……发现有20人极度虚弱致死，有500人因吃不饱而浮肿。在斯大林纳巴德州——拉米特区、帕赫塔巴德区、奥比哈尔姆区以及其他地区，极度虚弱致死的超过了70人。也有身体亏虚和浮肿现象。这样的事实在库尔干秋别州、库利亚布州、哈尔姆州也都有发生。当地给这些区提供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③]在盛产粮食和肉类的哈萨克斯坦，1944年哈萨克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向斯大林报告了饥荒肆虐的情况："在东哈萨克州济良诺夫斯克区23个集体农庄中进行调查的110个前线战士的家庭中，大部分长期领不到食物；许多集体农庄的儿童都得了浮肿病，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很难救活了……在西哈萨克州泽列诺夫斯克区'12月5日'集体农庄，庄员们在疫畜埋葬场挖出了马尸，然后分而食之……"[④]报告还汇报了居民们拾野果、拣垃圾、吃猫狗肉充饥直至因走投无路，得不到任何援助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500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第1185~118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第120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而自杀的惨状。

生活是如此艰难困苦，但是劳作却十分繁重。在中亚，工厂里“十二小时工作日”已不是特殊现象。此外，中亚的青壮年男子成批成批地应征入伍了，因此很多妇女被征召进工厂做工。乌兹别克女工的比例由1940年的34.1%上升到1943年的63.5%。[1]还有大批儿童被送进技术学校进行劳动培训，有些地方的工厂则直接使用童工劳动。

战争开始以后，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实行了大规模军事动员，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上前线。在哈萨克共和国，战争期间组建了20多个步兵师和骑兵师（旅），还有许多其他战斗部队。其中潘菲洛夫（И.В.Панфилов）少将指挥的由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官兵组成第316师建功卓著，多次获得奖励。1941年11月18日，潘菲洛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该师即以“潘菲洛夫”命名，并且改组为第八近卫师。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乌兹别克共和国先后组建了十多个步兵师和骑兵师（旅），还组建了其他一些战斗部队。土库曼共和国也组建了十多个师（旅）。此外，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个共和国分别组建了不少战斗部队。这些部队都是由各民族官兵混合编成，军事指挥官以俄罗斯军人为主。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兼任政治工作人员的不少，例如北哈萨克斯坦州党委书记阿列耶夫（Н.Л.Алеев）和库斯塔奈州党委书记别尔尼亚佐夫（Б.Берниязов）分别担任了第101旅的革命军事委员（即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乌拉扎林（К.Уразалин）兼任该旅党委会书记。

中亚组建的军队参加了卫国战争一系列重要战役，如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等生死攸关的战役。许多部队和官兵获得苏联政府的各种奖赏。卫国战争中获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得各种勋章和奖章的哈萨克人有9.66万，乌兹别克人有8万，土库曼人有1.5万，塔吉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也不少。苏联全国获得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有11618名，其中哈萨克人96名，乌兹别克人69名，土库曼人18名，吉尔吉斯人12名，也有塔吉克和其他民族的军人。[①]还有很多生活在中亚各共和国的苏联其他民族的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和其他奖赏。例如，从哈萨克共和国应召入伍的官兵中共有500多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②]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中亚各共和国应征上前线的人达三四百万。仅哈萨克共和国就有1196164人被征召参加作战部队（另有67万人被动员从事军用品生产）。[③]乌兹别克约100万人上了前线。其他三个共和国各有数十万人应征入伍。据不完全统计，仅哈萨克共和国应征入伍上前线的作战人员中有一半阵亡，约60万人。[④]

但是，在苏军部队中作战的中亚各共和国官兵也有逃兵和被俘投敌的，苏联领导人对此有所顾忌。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中亚组建的部队直接参战的减少了，不少人转入后勤供应和军火生产部门。1943年以后，德军将苏联战俘中的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变节者和难民组建成反对苏联的"志愿军"，有穆斯林师、突厥斯坦军团等番号。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卫国战争前后，中亚地区成了被赶出家园的十多个苏联少数民族居民的新家乡。那时，苏联沦陷区的许多民族（大多是穆斯林民族）受到来自苏联政

---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第467~46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77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③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78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④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31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府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无端迫害。这些民族的居住区从纳粹德国占领之下解放出来以后，苏联政府借口它们当中有些人同德国占领者进行过“合作”，于是对这些民族实行严厉惩罚，有的甚至被当做“通敌民族”看待。惩罚的主要手段就是把这些民族的全体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出家园，就连本民族出身的当地共产党和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前线回来的立功受奖的军人也不能例外。后来，一些居住区的从未沦陷过的外高加索民族也莫名其妙被整体迁走了。这场“驱逐民族”运动总共涉及十多个少数民族，被迫离开家园的总人数达300多万。他们被国家安全机关武装押送到遥远的东部地区，其中以中亚地区接纳的移民最多，其次是西伯利亚。

其实，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早在战争爆发前的苏联就出现了。1936年，苏联政府将境内35820名波兰难民从欧俄迁至西伯利亚和中亚。1937年，苏联为“防止朝鲜人勾结日本”，把居住在远东地区的20万朝鲜人全部迁至中亚的哈萨克共和国。还有为了防止“巴斯马奇”残余势力从境外渗透，30年代后期苏联当局在中亚将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某些居民后迁。这类迁徙都是秘密进行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德意志（日耳曼）人受到普遍怀疑，当局认为他们当中隐藏着数以万计的德国间谍和破坏分子。1941年8月28日，苏联政府（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将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全部迁走，撤销伏尔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国。接着，居住在自治共和国以外（主要是在大中城市）的德意志人也被强行迁走。德意志族的苏联军人同样离开前线，限期到达迁入地。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Л.П.Берия）的副手谢罗夫（И.А.Серов）1941年9月20日呈送的报告称：“从原共和国运出了438280名德意志人，另外通过水路运送了8200人。”可见，一个月不到，就把将近45万名德意志人赶出了故土。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资料，到1942年初总共有108万德意志人被迁往东方。

接收德意志移民最多的是中亚的哈萨克共和国，早在1941年初就有238311人到达了那里。后来陆续又有德意志人到来。哈萨克共和国总共接纳了467700名德意志人。其余的德意志移民大多在西西伯利亚定居下来。

1942年5月，数千名北高加索的希腊人迁入哈萨克共和国的北部和西部。同年，又有一批波兰人离开伏尔加河流域。11月，2014名波兰人（其中318名儿童）从萨拉托夫来到哈萨克斯坦。

1943年，德国侵略军被赶出北高加索，但是当地的各族穆斯林等来的不是解放，而是被驱逐。10月12日，苏联政府下令撤销卡拉恰耶夫自治州。到11月6日，全体卡拉恰耶夫人被强行迁走，总共为62842人。其中迁往哈萨克共和国的有35491人，迁往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有26432人，另外几百人安置在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共和国等地。

卡尔梅克人信仰佛教中的喇嘛教。1943年12月28日，苏联政府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1944年1月2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就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已完成卡尔梅克族人向国家东部地区迁徙的事宜。"[1]总共迁走了91919名卡尔梅克人，因为他们不是穆斯林，因此迁到中亚的只有2268人，全部安置在哈萨克共和国。

1944年3月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人一举将32887名巴尔卡尔人从北高加索强行迁走，后来有不少正在前线作战的巴尔卡尔官兵也被流放。哈萨克共和国共安置了18219名巴尔卡尔人，其他多安置在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中亚共和国。5月29日，苏联政府把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其实，当年有1672名卡巴尔达人也被迁到了中亚。

与此同时，苏联当局对北高加索最大的穆斯林民族车臣

[1] 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第394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人及印古什人采取驱逐行动。1944年2月23日，苏联政府开始强行迁徙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近40万人被塞进火车运往东方。后来，居住在邻近地区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和在前线打仗的车臣人和印古什军人也加入了迁徙行列。他们全都安置在中亚各共和国，包括310094名车臣人和80930名印古什人。其中哈萨克接收了239768名车臣人和78479名印古什人，吉尔吉斯接收了70089名车臣人和2278名印古什人，乌兹别克接收了175名车臣人和169名印古什人，塔吉克接收了62名车臣人和14名印古什人。3月22日，苏联政府宣布撤销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1944年5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下令将克里半岛的鞑靼族居民迁走。5月18日，内务部队一天之内将他们全部运走，共有19万余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出家乡。他们当中151604人迁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其他多迁到吉尔吉斯共和国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等地。同时，居住在克里半岛的几万名德意志人等民族居民迁入了哈萨克共和国。6月30日，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正式撤销。

鞑靼人刚离开克里半岛，6月2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又下令迁走半岛上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迁徙总规模达到3.7万余人，其中4497人迁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4289人迁到了哈萨克共和国的古里耶夫州，其余多数迁到了乌拉尔地区。8月3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又下令将格鲁吉亚境内的土耳其-麦斯赫特人、库尔德人和赫姆希德人东迁哈萨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结果有46516名土耳其-麦斯赫特人、8694名库尔德人、1385名赫姆希德人以及29505名临时特别迁徙的其他民族居民迁往了上述三个中亚共和国。

卫国战争前后，苏联政府强行迁徙的少数民族居民总数达322.6万多人，其中中亚安置了130余万人。中亚五个共和国当中，哈萨克斯坦接收的移民最多，战争期间共安置了10.25万名

波兰人，36.1万名德意志人，50.7万名北高加索穆斯林居民。[①]还安置了数以万计的其他民族的移民。乌兹别克共和国接纳的被驱逐民族居民人数仅次于哈萨克斯坦，迄至1944年夏季共安置了154424人。吉尔吉斯共和国安置了10万余人。塔吉克共和国接收的这类移民很少。土库曼共和国基本上没有接收。[②]

应当说明，有关驱逐上述民族的决定都是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或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名义颁布决定或命令。具体执行则由苏联的内务和国家安全部队完成，光是迁徙北高加索的居民就动用了10万官兵和1.9万名内务、安全工作人员。[③]各接收地包括中亚各共和国在"完成安置任务"方面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被驱逐民族居民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们都是被紧急赶出家园和运走的，因此赖以维持生计的牲畜、农具、食品及其他日用品都没法带走，许多人尤其是老人儿童死在迁徙途中。这些人都是戴着"通敌"帽子来到新的居住地的，尽管接收地居民并不蓄意歧视他们，不少地方如哈萨克斯坦的居民还对外来者表示出相当的善意，但他们在当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眼中仍然是"异己分子"。[④]而且，随着后来民族情绪在中亚各地的"复兴"，"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为争夺各种资源的矛盾逐渐显现和激化，成为苏联政府和中亚各共和国当局十分头痛的问题之一。

---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71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上面介绍的数字及其他情况，除已经注明的以外，都是引自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布加伊（Н.Ф.Бугай）博士的论文：《论30–40年代苏联驱逐民族出境的问题》。载《苏联历史》，俄文版，第135–144页，1989年第6期。这篇文章是迄今能找到的有关苏联民族驱逐问题的最完备的综合资料。

③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第995~99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④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33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71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第六章 1914~1945年苏联中亚与邻国的关系

第一节　中亚与阿富汗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俄属中亚的南方伊斯兰教邻国阿富汗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它是英国的保护国之一，阿富汗的对外交往权力掌握在英国手中，双方的这种关系是1905年3月签订的英国-阿富汗条约确定的。俄国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当时它需要英国支持其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在巴尔干和中欧进行争夺，因此1907年8月31日两国签订英俄协约，与法国一起结成协约国集团。根据英俄协约，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特殊地位”。但是这个协约的签订事先没有同当事国阿富汗（还有伊朗和中国）商量，所以阿富汗埃米尔哈比布拉·汗（Habibulla Khan）不承认英俄协约的合法性，而以大国自居的英国和俄国认为这个协约无须征得阿富汗同意，只要英俄两国批准就可生效。

尽管阿富汗划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阿富汗与俄属中亚地区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而且有几个跨界民族（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因此俄国尤其是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

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方发生的事件对对方总能发生影响，这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可以充分看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比布拉·汗排除内外压力，1914年8月24日在首都喀布尔宣布阿富汗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后来，他又重申了中立立场。阿富汗的中立至少使英国和俄国感到放心。对于土耳其宣布加入德奥同盟国一方参战，哈比布拉·汗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遗憾”。但是，作为当时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土耳其卷入世界大战，进一步激发了阿富汗国内的反英情绪，因而给阿富汗维持中立增添了不少困难。

大战期间，同盟国企图争取阿富汗（以及伊朗）站到自己一边，以便攻击英俄的后院英属印度和俄属中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国和土耳其派遣了一个联合代表团于1915年8月抵达喀布尔，对阿富汗当政者进行游说。代表团向哈比布拉·汗提议缔结一个秘密条约，由德国向阿富汗提供10万枝来福枪、300门大炮和2000万英镑的财政援助，换取阿富汗出兵进攻英属印度。在这种“优厚”条件的诱惑下，哈比布拉·汗不免动心了，暗示可以接受，但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向印度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由得胜的德国和土耳其军队打头阵。[①]

在当时阿富汗当权集团中间，主张支持同盟国、反对协约国的“民族主义者”不乏其人，因为英俄两大协约国是压制阿富汗的主要势力。但是，哈比布拉·汗经再三权衡，决定力排众议，继续保持阿富汗的中立。因为他知道，阿富汗如果投入同盟国怀抱，势必招致英国和俄国的联合进攻，德国和土耳其的支援鞭长莫及，他的国家到头来就会毁于一旦。

1916年3月，俄国军队在外高加索重创土耳其军队，并且一举攻占了土耳其东部重镇埃尔祖鲁姆。接着，俄国把在伊朗境

① 路易斯·杜普里：《阿富汗》，第434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

内活动的德国人全部驱逐出去。面对这样的形势，哈比布拉·汗赶紧在当年5月把德土代表团打发回国。从这时直至大战结束，阿富汗的中立立场再也没有动摇过。

1917年俄国接连发生革命，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国内局势很不稳定，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地区更是一片混乱，因此，俄国无力过问和干预阿富汗的事务。来自北方的威胁解除以后，压制阿富汗的外部势力就剩下英国一家了。这形势就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的："1917年俄罗斯帝国瓦解后，使阿富汗留在英国轴心内的惟一因素已经消失了，至少暂时如此。"①

大战结束后，东方各国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阿富汗也不例外。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左右阿富汗的政治生活，其中尤以"青年阿富汗"人士影响最大。青年阿富汗领袖马赫穆德·塔尔齐（Mahmud Tarzi）鼓吹民族争取完全独立、国家实行现代化改革等进步主张，得到了阿富汗民众直至上层集团的广泛支持。哈比布拉·汗的儿子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是塔尔齐的女婿，也是其忠实信徒。

战后阿富汗的形势对有亲英倾向的哈比布拉·汗不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向巴黎和会写信，要求列强承认阿富汗的"绝对自由和永久独立"。但是埃米尔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操纵和会的英国根本不理睬阿富汗的正当要求。

1919年2月20日，哈比布拉·汗遇刺身亡。2月21日，阿曼努拉·汗宣布即位为阿富汗埃米尔，并且很快挫败了反对势力。阿曼努拉·汗即位后，起用青年阿富汗党人执掌国家大权，塔尔齐出任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纳第尔·沙赫（Muhammad Nadir Shah）出任国防大臣。在加冕典礼上，阿曼努拉·汗发表了一个

① 珀西·赛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第2卷，第112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充满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告，文告宣布："阿富汗王国无论对内对外都应该独立自由，这就是说世界上其他独立国家的政府的各种权力，阿富汗也应全部具有。"①

3月3日，阿曼努拉·汗依惯例致信英国驻印度总督，通报自己已经继承阿富汗王位。信中阿曼努拉·汗以"阿富汗独立和自由政府"的名义，要求英国结束对阿富汗的"保护"，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同时，阿曼努拉·汗答应独立后的阿富汗愿意与英国签订"有益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商业利益的协定和条约"。②但是，英国方面没有答应阿富汗的独立要求，于是双方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


阿曼努拉·汗像

4月中旬，阿曼努拉·汗号召对英国开展"圣战"，阿富汗人民的反英情绪空前高涨，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毗邻地区的普什图人（普什图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各部落也纷纷响应。而此时印度全境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高潮，而且印度西北部的反英运动更是如火如荼，这对英国采取军事行动起到了制约作用。阿曼努拉·汗决定利用这样的有利时机，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途径来达到阿富汗的独立。他一边鼓动印度境内的普什图人造反，一边往阿印边境派兵。英国方面想方设法调集30万大军开往前线。

① 珀西·赛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第2卷，第109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② 珀西·赛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第2卷，第1104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5月3日，双方军队在北线战场开伯尔山口发生交火，被称之为第三次阿富汗战争的阿富汗独立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阿富汗军队最初冲过了开伯尔山口，但是不久就被强大的英军击退。接着，英方大军乘胜追击，进入阿富汗境内，并且准备直捣喀布尔。但是，边境两侧的普什图部落武装展开了抗英游击战，加上英军在中线战场失利，只得暂时放弃攻取喀布尔的计划。

中线的阿富汗军队在国防大臣纳第尔·沙赫率领下主动出击。5月21日越过边界，数天后出现在印度边境重镇塔尔城下，并且用重炮轰击守军。直到英方援军从北线赶来，纳第尔·沙赫才往回撤。在南线战场，英军一路攻入阿富汗境内，威胁阿富汗南方重镇坎大哈。

在反复掂量战争进展情况之后，阿曼努拉·汗觉得要在战场上取胜不大可能，于是在5月底向英方提出和谈建议。英国方面深知，要用武力彻底征服阿富汗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印度国内的反英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伊斯兰国家抗议英国侵略、声援阿富汗的浪潮继续高涨，加上不堪战争重负（一个月战事耗费了1600万英镑），于是尽管拥有军事上的优势，英国还是放弃了继续打仗的计划，同意与阿富汗举行停战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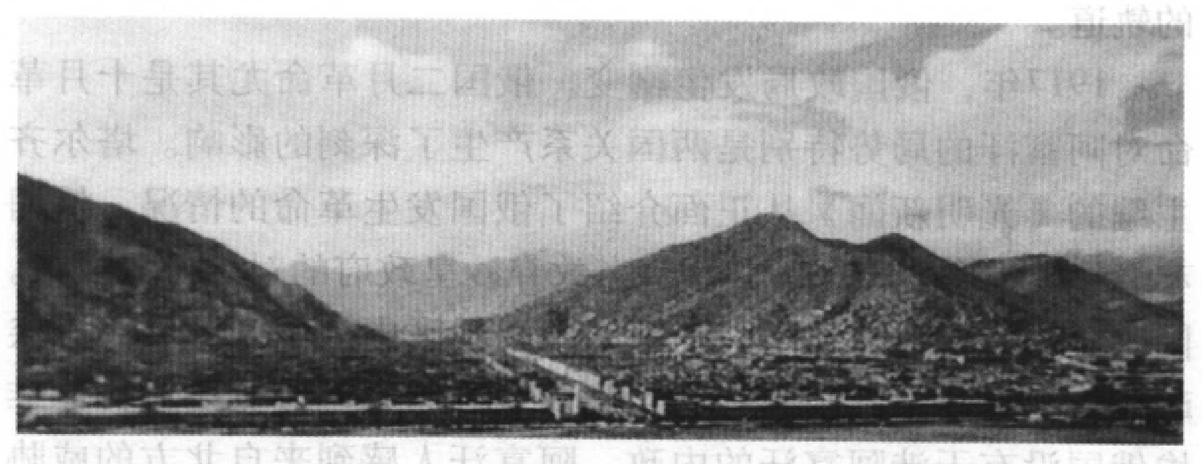
第一轮谈判在印度拉瓦尔品第举行。会谈伊始，阿富汗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阿里·阿赫马德·汗（Ali Ahmad Khan）就提出除了双方停战以外，英国应当放弃对阿富汗外交的控制，同时不得借机割占阿富汗领土。英国首席代表汉密尔顿·格兰特（Hamilton Grant）理屈词穷，只好拖延。经过艰苦谈判，1919年8月8日，阿富汗和英国和约签字。和约规定恢复双方的和平、标定印阿边界等，却没有明确规定废除英国对阿富汗的保护权。尽管格兰特在一封信中认为："该和约和这封信已使阿富汗在国内和外交事务方面正式地自由和独立了。还有，这次战争已

使以前的所有条约全部作废了。”[①]然而，阿富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正常化。

1920年4月至1921年8月，阿富汗和英国继续举行了三轮谈判，终因分歧太大，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可是在这期间，阿富汗与苏维埃俄国、伊朗、土耳其分别签订了友好条约，而英国在上述三国的外交遭到了失败，因此双方的谈判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

经过最后的讨价还价，1921年11月22日，阿富汗外交大臣塔尔齐和英国特命全权公使亨利·多布斯（Henry Dobbs）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阿英条约上签字。在喀布尔签订的这个条约正式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宣布英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规定开展平等互惠的双边贸易。

条约签字以后，阿富汗与英国的关系逐渐趋于正常。1926年，阿富汗正式定名为王国，阿曼努拉·汗称国王。1927年12月至1928年6月，阿曼努拉·汗偕王后出访了欧亚非十余个国家，包括印度、德国、英国、苏联、伊朗和土耳其。他在英国受到了热情款待，通过对伊朗和土耳其的访问则加强了对阿富汗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决心。但是由于阿富汗长期封闭落后，阿曼努



喀布尔远眺

① 珀西·赛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第2卷，第1244页，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

拉·汗的改革遭到了伊斯兰教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与反对，终于引发了地方叛乱。1929年1月13日，阿曼努拉·汗被迫退位，后来流亡欧洲，定居在意大利。

阿曼努拉·汗退位后，阿富汗政局陷入混乱，战事频仍。10月，原国防大臣纳第尔·沙赫平定了全国局势，即位为阿富汗国王。纳第尔国王采取比较温和和稳健的现代化策略。1931年，阿富汗王国宪法颁布。1932年11月，国王发布一份政策宣言，宣布在社会生活方面恪守伊斯兰教规，同时要组建现代军队，发展现代教育等。在位期间，纳第尔·沙赫率英倾向比较明显，同苏联的关系则明显冷淡了。

1933年11月8日，纳第尔·沙赫遇刺身亡，他年轻的儿子查希尔·沙赫（Zahir Shah）即位，但是实权掌握在首相哈希姆·汗（Hashim Khan）手里。查希尔在位期间，阿富汗王国建立了类似君主立宪制的政体，立法权由国王、参议院和民选的国民会议共同掌握。从此，阿富汗开始了向现代型国家过渡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从俄国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富汗同北方邻国俄国—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关系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比较正常的轨道。

1917年，俄国政局发生剧变。俄国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对阿富汗的局势特别是两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塔尔齐主编的《光明新闻》从正面介绍了俄国发生革命的情况。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公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同时，与阿富汗一水之间的俄国中亚地区内战不休，反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奇武装直到30年代中才被彻底肃清。因此，苏维埃俄国没有干涉阿富汗的内政，阿富汗人感到来自北方的威胁中断了。

1917年12月3日，苏维埃俄国政府颁布了《告俄国和东方全

体穆斯林劳动者书》，鼓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东方伊斯兰教徒”起来反抗“欧洲贪婪的掠夺者”强加给自己的殖民压迫，号召他们“不要坐失时机，起来打倒几百年来强占你们土地的占领者吧！”[①]阿富汗人民从这里得到了鼓舞，同时也感受到了苏俄对阿富汗采取的友好行动。

阿曼努拉·汗即位不久，1919年3月27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宣布承认阿富汗的新君主的地位，承认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的国家。

4月7日，阿曼努拉·汗致信苏俄领导人，信中写道：“我通知您我已继承王位的消息，我已于1919年2月21日在喀布尔即位，为了全世界的合作、和平和人类的福祉，我认为宣布结盟和友谊有着刻不容缓的必要性。尽管按自己的本性和天赋来说，阿富汗从其诞生和奠基时起就一直是各民族自由和平等事业的合作者，但是迄今为止的情况是，我们同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任何交往和关系，我们被遗弃在一旁。由于您和您的同志、人类的朋友共同关心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宣布了全世界所有民族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因此为了阿富汗人民所渴望的进步，今天我第一次以独立自由的阿富汗的名义给您写了这封友好的信件。”[②]

苏俄领导人收到信件不久，阿富汗独立战争就已打响，苏俄政府对阿富汗表示声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复信给阿曼努拉·汗，复信说：“以自由独立的阿富汗民族的名义向俄国人民致敬并通告陛下登基的第一封信已收悉，我们谨以工农政府和全体俄国人民的名义匆草复信，向独立的、英勇捍卫其自由免遭外国

① 谢·谢·斯图坚尼金主编：《苏维埃宪法史——文件汇编》（1917~1957年），第1分册，第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Б.Г.加福罗夫等编：《现代历史文选》，第1卷，第805页，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奴役者侵犯的阿富汗人民致敬。对陛下于1921年2月21日登基，我们谨表贺忱。……对陛下想同俄国人民建立亲密关系的意图，我们表示欢迎，并请您派出正式代表前来莫斯科，而我们也下令派工农政府的代表前往喀布尔，请陛下晓谕各级政权机关迅速放行。两大民族之间建立持久的外交关系，将为相互援助反对外国强盗对别国自由和财富的任何侵犯开辟广泛的可能性。”[①]

收到这封信后，阿富汗政府派遣以穆罕默德·瓦利·汗（Muhammad Wali Khan）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寻求北方大国苏俄的支持，另一方面显示出阿富汗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姿态，以便增加在同英国谈判时的筹码。代表团抵达塔什干以后，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政府达成了维护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独立地位”的协议。穆罕默德·瓦利·汗还向塔什干当局发出了访问阿富汗的邀请。

由于当时俄国内战正酣，中亚与俄罗斯地区之间的交通被白卫军切断，所以阿富汗代表团在塔什干滞留了一段时间，10月才到达莫斯科。列宁会见了阿富汗代表团。穆罕默德·瓦利·汗向列宁转交了阿曼努拉·汗的一封信，列宁再次表示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

应阿富汗方面的邀请，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驻突厥斯坦特派员布拉温（Н.З.Вулавин）作为苏俄政府特使于9月初从塔什干启程到达喀布尔。布拉温企图说服阿富汗政府在中亚内战中支持布尔什维克，作为交换，苏俄保证在阿富汗与英国发生冲突时支持阿富汗。[②]可是阿曼努拉·汗另有所图，他看到中亚和整个俄国境内叛乱四起，苏维埃政权有可能被推翻，于是乘机向布拉温提出从俄国收回潘狄绿洲的要求。由于双方意

① 《列宁全集》，第48卷，第76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路易斯·杜普里：《阿富汗》，第443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

见不一致，会谈没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年底，苏里茨（Я.З. Сурнц）接替布拉温的使命，但是谈判仍无进展。1920年，阿富汗军队甚至一度开到突厥斯坦外里海省的麦尔夫—库什卡地区。

1920年夏秋，苏维埃军队控制了包括希瓦和布哈拉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的局势，阿曼努拉·汗的中亚"扩张"计划落空，于是阿富汗与苏维埃俄国的谈判才有了转机。

1920年12月1日，阿曼努拉·汗再次致信列宁，信中写道："认识到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打算扫除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政策，特别是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暴政下解放东方各民族并建立一种允许一切民族以独立国家的资格来决定自己命运的制度，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原因极为高兴地愿意调整我们帝国政府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①英国得知这一信息后极力阻挠阿富汗与苏俄达成协议，但是无济于事，正如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谈到同阿富汗的谈判时指出的："……我们共同的谈判表明，在亚洲各国人民争取自决权、反对野蛮和不择手段的奴役者的斗争中，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②

1921年2月28日，阿富汗和苏维埃俄国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两国友好条约，穆罕默德·瓦利·汗等和契切林等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条约宣布："缔约双方互相承认和拘束自己尊重彼此的独立，现在进入正常的外交关系。"条约规定双方除互派公使以外，还在对方领土上互设领事馆。苏俄在阿富汗领土上设领事馆五所（赫拉特、迈马纳、马扎里沙里夫、坎大哈、加兹尼），阿富汗在苏俄领土上设领事馆七所，"其中五所应设在俄国的中亚细亚境内"：总领事馆设在塔什干，领事馆设在彼得格勒、喀山和库尔干秋别、撒马儿罕、麦尔夫和

① H.鲁宾斯坦：《1921~1922年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第76页，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

② 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第307~308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克拉斯诺沃茨克。条约还规定俄阿两国承认布哈拉和希瓦的“独立和自由”，俄国将边疆一些地方（如潘狄绿洲）“归还给阿富汗”。条约还有允许阿富汗进口货物在俄国免税过境、苏俄向阿富汗提供财政援助等条款。[①]缔约同时，苏维埃俄国答应每年向阿富汗提供100万金卢布补助金，帮助阿富汗铺设库什卡—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之间的电报线路，并且向阿富汗供应军火。

苏俄和阿富汗友好条约签字以后，英国大为震惊，因为英阿条约的谈判正陷入僵局。英国向阿富汗政府施加压力，要后者废止同苏俄签订的条约，援助中亚反苏维埃政权的势力。同时，英国政府提出，阿方如果答应这些要求，则能得到英国大量的军火援助和总共4000万卢比的补助金。[②]

有鉴于此，列宁在4月下旬再次复信阿曼努拉·汗，信中说：“我荣幸地通知您，两国友好条约已于1921年2月28日由两国全权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并经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们相信：我们的最诚挚的愿望必将得到实现；为了造福于两国人民，俄国将永远是大阿富汗国的第一个朋友。”[③]

苏维埃俄国政府同时对驻阿富汗公使苏里茨指示：“我们的东方政策不是侵略政策，而是和平与友好的政策。在各项工作中，你们要一贯地重视这一关键问题，特别是在喀布尔，更应该把发展我国同阿富汗的友谊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目标。”[④]经过苏俄方面的努力，阿富汗政府否决了英国的意见，于7月批

①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380~3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H.鲁宾斯坦：《1921~1922年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第79~80页，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

③ 《列宁全集》，第50卷，第523~52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第308~309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准了阿俄友好条约。

可是，条约并没有使苏俄和阿富汗的双边关系有实质性好转。当时，俄国全面内战刚刚平息，百废待兴，因此答应给阿富汗的援助无法兑现，潘狄绿洲也没有归还，而邻近阿富汗的俄国中亚地区巴斯马奇活动猖獗。阿曼努拉·汗则把巴斯马奇看做穆斯林反抗布尔什维克"无神论"政权的举动，对巴斯马奇分子十分同情。他允许战败后走投无路的巴斯马奇分子来阿富汗避难。1921年3月，布哈拉原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为逃脱红军的追击进入阿富汗，同时还带来了不少乌兹别克难民，阿利姆·汗定居在喀布尔，从此，喀布尔成了巴斯马奇运动的境外活动和指挥中心。后来，陆陆续续有不少巴斯马奇首领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退人"阿富汗，如库尔-希尔马特、易卜拉欣、朱奈德汗以及土耳其军官赛里姆帕夏等。

阿曼努拉·汗不仅收留这些被红军打败的巴斯马奇人员，有时还暗中给他们援助，让他们回中亚去打游击。此外，阿曼努拉·汗允许英属印度和阿富汗境内的穆斯林志愿者开赴中亚协助巴斯马奇武装作战。1922年，阿富汗政府甚至命令一支精锐部队进驻同中亚接壤的北方边境地区，而当时正是巴斯马奇运动声势最大的时候，因此不排除阿曼努拉·汗怀有干涉俄国中亚事务甚至夺取中亚领土的意图。

阿曼努拉·汗接着与来喀布尔拜见阿利姆·汗的巴斯马奇新任指挥官恩维尔帕夏见面，对这位立志在中亚建立泛突厥主义政权的土耳其流亡者表示支持。可是恩维尔不久被红军击毙，他的继承人赛里姆帕夏也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逃进了阿富汗。阿曼努拉·汗迫于苏维埃俄国的强大压力，不敢收留赛里姆帕夏，让他去了伊朗。至此，阿曼努拉·汗干涉中亚的全部打算统统失败了。

在这种形势下，苏俄方面强烈要求阿富汗把驻扎在北方边境地区的重兵撤回去，而且要求阿曼努拉·汗发表一个不干涉俄

国中亚地区内部事务的声明。阿曼努拉·汗只得照办。即便如此，双方的关系也没能恢复到两国友好条约所规定达到的那种程度。

1922年底苏联建立以后，两国的关系并没有明显好转。1923年3月，阿富汗政府屈从英国的压力，要求苏联政府把在阿印边境进行"反英宣传"的驻阿公使调离回国。1925年12月，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苏联边防军登上阿姆河河心的乌尔塔—塔盖勒岛，将驻扎在小岛上的阿富汗一支部队赶了出去。这个小岛原先在阿姆河主航道以北，按国际惯例属于俄国，可是后来由于河道变化，主航道移到小岛以北，因此阿富汗认为乌尔塔—塔盖勒岛是自己的领土。事件发生后，阿富汗政府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英国乘机火上加油，国际舆论大多认为苏联不应欺凌弱小邻国。苏联政府不想让事态继续扩大，声明乌尔塔—塔盖勒事件纯粹是一场误会，并且说是一批从阿富汗回国的塔吉克人踏上该岛后与阿富汗驻军发生冲突后造成的。不久，苏联边防军主动撤出乌尔塔—塔盖勒岛，将其归还阿富汗，事件引发的风波由此平息下去了。

为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两国关系，苏联和阿富汗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于1926年8月31日在喀布尔城郊帕格曼签订。条约规定：缔约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时另一方严守中立；缔约双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不参加敌视对方的集团，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对方的活动；条约有效期为三年，可自动延长。[①]阿富汗驻苏联公使评论这个条约时说道："阿富汗在同外界建立友好关系时遇到的第一个朋友就是苏维埃俄国，它在阿富汗人民为争取自己独立而进行的严重斗争中真诚地同情阿富汗。"[②]条约签订以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阶

①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387~3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B.Г.特鲁哈诺夫斯基：《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卷，第15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段。1927年，喀布尔到塔什干的定期航线开通，后来又延伸到了莫斯科。双边贸易发展较快，苏联还帮助阿富汗建设了一些工厂企业，并且向阿富汗提供了飞机等军火，派遣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28年5月，阿曼努拉·汗访问苏联，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举行了会谈。

纳第尔·沙赫即位为阿富汗国王以后奉行亲英国的外交方针，因此阿苏关系变冷。纳第尔·沙赫把阿曼努拉·汗聘请的苏联顾问、飞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陆续遣送回国。他还以发动“密谋”的罪名处死了原驻苏联大使古拉姆·纳比，因为古拉姆·纳比曾在苏联中亚当局支持下为阿曼努拉·汗复位起过兵。

特别是纳第尔·沙赫一度容忍巴斯马奇武装以阿富汗为基地，发动对中亚地区的袭扰，从而恶化了阿苏关系。例如，巴斯马奇首领易卜拉欣多次从阿富汗潜回塔吉克斯坦，袭击地方军政当局。1930年，苏联边防军在追击易卜拉欣的战斗中南渡阿姆河，深入阿富汗境内达40英里。这样，纳第尔·沙赫不得不跟巴斯马奇决裂，派兵攻打易卜拉欣，迫使他潜回中亚。后来，易卜拉欣终于被苏联边防军抓获并处死。

1931年6月24日，阿富汗外交大臣和苏联驻阿富汗公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喀布尔签署了两国新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条约除了重申1926年条约的规定以外，还增加了缔约双方不得签署与本条约相抵触的条约和协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和争端等内容。[①]条约有效期为5年。1936年3月，双方商定条约又延长10年。这个条约生效后，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阶段。

查希尔国王即位以后，阿富汗在外交上注意在苏联和英国两个大国之间求得平衡。同时，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于1937

①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3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年7月8日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抵制英国、苏联在这一带地区的影响增长。此外，阿富汗还注意与德国（及意大利）发展关系，赢得了法西斯轴心国方面不少的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用经济军事援助、帮助阿富汗扩张领土等条件诱使阿富汗参战，进攻英属印度。但是，阿富汗政府权衡利害以后，没有动摇中立立场。1940年7月，阿富汗与苏联签订新的贸易协定。8月17日，查希尔国王颁布法令，正式宣布阿富汗在大战期间严守中立，不过同德国的关系比较良好。后来，当阿富汗的所有邻国都对轴心国宣战（包括苏德战争爆发）以后，阿富汗仍然标榜其不偏不倚的中立。

苏联参战以后，大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1年8月，苏联和英国联合出兵占领阿富汗的西部邻国伊朗，理由是伊朗纵容德国间谍在其境内自由活动。同样，这些理由也可以成为干涉阿富汗的借口。果然，10月11日，苏联驻阿富汗公使指责阿富汗雇佣的德国人组织恐怖分子多次对土库曼、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等共和国进行武装袭击。10月17日和19日，英国和苏联分别照会阿富汗政府，限其一个月以内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驱逐出境，只有使馆人员除外。①

这个照会逼得阿富汗政府进退两难：如果屈从英苏两国压力，似乎有损于阿富汗的尊严；如果拒绝听从，那就会遭到伊朗同样的结局。阿富汗当权集团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要求所有交战国的非外交人员统统离开阿富汗。不过在执行过程中，明显排挤轴心国。例如，德国在阿富汗工作的本来有180人，结果只允许10人作为“公使馆工作人员”留下来。②最终，有206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月底离开阿富汗，前往欧洲。

① 乔治·柯克：《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40~2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路易斯·杜普里：《阿富汗》，第481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

第二节 中亚与杨增新统治下的中国新疆的关系

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勘分西部边界以及英国和俄国瓜分帕米尔之后，中国的新疆和俄国的中亚地区以及阿富汗直接接壤。从此，新疆成了英俄两国尤其是俄国觊觎的对象。辛亥革命前后，新疆的局势像全中国一样动荡，结果给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入侵以可乘之机。当时在向新疆扩张的列强中，俄国显得更为咄咄逼人，这与俄国占有地理上的便利密切相关。

新疆与俄属中亚有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双方之间的交通比较便利。就当时的条件而言，新疆与中亚的交通要比新疆到中国内地的交通方便快捷得多。新疆通往内地的道路设施落后，要越过干旱的沙漠戈壁和莽莽荒原，加上当时中国内乱不断，这条道路还经常阻断。所以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内地人民往返新疆，包括内地官员赴新疆上任或卸任后离新疆回乡，大多取道俄国。一般都是乘火车至新西伯利亚，再转支线抵达斜米（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然后沿公路经塔城边关进入新疆。新疆与内地的大宗贸易的货物运输也有不少取上述路线。由于新疆与俄属中亚的联系比内地还方便，因此当时新疆与俄国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超出新疆与内地之间的贸易量。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对外联络的这种格局更加强化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以后，反清浪潮席卷整个中国。12月28日，革命党人在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发动起义，没有成功。

1912年1月7日在伊犁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清起义，最终取得了胜利。起义者于1月10日宣布成立伊犁临时政府。3月清朝

末代皇帝宣统逊位以后，伊犁革命政府与迪化政权举行谈判，原新疆巡抚袁大化见大势已去，仓皇离开新疆。4月20日，杨增新就任新疆都督。7月8日，伊犁方面承认杨增新为新疆首脑。

杨增新执政以后，在新疆建立了独裁统治。由于杨增新有一定政治眼光，而且机警过人，行事果断，故而较快地平息了各地的骚乱和反抗，实现了全新疆的统一。对外方面，杨增新对列强尤其是对俄国采取的策略得当，从而保持了新疆的领土完整，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20世纪初，俄国沙皇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在新疆境内享有采矿、修路优先权等无理要求，没有得逞，但是一直不肯善罢甘休。1911年，《中俄伊犁条约》已满30周年，按规定应当进行修订。当年2月16日，俄国方面借修约之机向清朝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包括：俄国商人在新疆（及蒙古）继续享受免税特权，并且有自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的权利，允许俄国在新疆和蒙古增设领事馆，凡涉及中俄两国人民的诉讼，俄国领事必须参加裁判等。俄方并且威胁说："所记六项，有一不允，俄国政府即不认中国政府有维持善邻之谊，将取自由行动。"①

对于这些无理要求，中国代表本想予以拒绝，可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屈服于俄国的外交压力和军事讹诈，在接到俄国方面的最后通牒以后，于3月27日复照表示接受俄方全部六项要求。后来开启的修约正式谈判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断，俄方认为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继续有效。从此，俄国对新疆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了。

在俄国侵略新疆的活动中，俄国驻新疆各处的领事馆起着急先锋的作用。俄国早在19世纪后期就开始在新疆设领事馆，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7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895年在省城迪化设立总领事馆，加上此前在伊犁、塔城、喀什以及1913年在阿尔泰（1919年正式归属新疆）设立的领事馆，共计在新疆设了5个领事馆。俄国领事馆肆意侵犯中国新疆的主权，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甚至干预新疆省各级官吏的任免，为俄国侵略新疆的政策服务。一个俄国领事后来道出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外交代表，领事在其管辖区内，力求达到在那时期我国政府最重要的政治目的。"①

非法发展俄国侨民是俄国领事馆官员干涉新疆内部事务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以"免税"等优惠条件招揽人马，四处公开登记侨民。一个人只需交纳20~25两白银，就可以得到一张俄国国籍证明书，结果许多早期来自阿富汗、浩罕汗国等地的移民后裔纷纷从中国籍转为俄国籍。许多世代土生土长的新疆本地人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也通过购买俄国国籍证明书而摇身一变成了"俄国侨民"。1911年，俄国驻喀什副领事贝伦斯指挥下属在南疆各地搜罗"俄侨"。据统计，当时整个南疆真正的俄侨不足200人，可是俄国驻喀什领事馆总共签发了2000张俄国国籍证明书，其中假俄侨竟达九成。

还有一种诱使和胁迫中国人获取俄侨身份的方式，那就是购买通商票。所谓通商票，本来是俄国商人在新疆境内经商的营业执照，由俄国领事发放，再经中国新疆的外交官员签字方可生效。这通商票本来与国籍证明书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由于握有通商票就可以免税，因此俄国领事无视中国的主权，将通商票当做国籍证明大肆推销。中国人只要肯花5两白银便可以买到一张，就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俄国侨商"了。这样，通商票一发不可收拾，在南疆尤其泛滥成灾，有时竟供不应求，印制不及甚至用白条手书充用。1912年年底《时报》撰文痛陈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2册，第35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通商票泛滥的危害："若长此不止，恐人民去而土地随之，天山南路，不难立沦异域。"[1]新疆省当局虽多次明令查禁通商票买卖，但是最终成效不大。

辛亥革命前后，新疆境内俄侨数量恶性膨胀。1909年，全新疆人口总数仅200万，却有总共达1万余人的"俄国侨民"。[2]这个数字在以后几年间还在不断上升。

此外，根据中俄间的不平等条约，俄国驻新疆领事在新疆专门开辟名叫"贸易圈"的特殊场所。他们先后在伊犁、塔城、迪化、喀什四城购买成片土地，集中建造贸易商行和货栈，供俄国商人经营专用。1895年建成的迪化贸易圈内有八大俄国商行。在这些俗称"洋行街"的贸易圈内，中国政府无权进行管辖，也收不到任何租税，一切掌握在俄国领事手中。因此，新疆的贸易圈如同上海等地的租界一样，成了"国中之国"。

为了协调俄国商人在新疆境内的活动，在俄国领事馆主持下于各地设立了"阿克萨卡尔"，汉译为"商总"或"商约"。有些中国的不法之徒冒人俄国籍以后，被委任为商总之职。他们往往依恃俄国势力，横行乡里，勒索民众，贿赂买通各级官吏，所以商总到官厅办事总是十分方便。

对于俄国商总的种种劣迹，新疆人民无不恨之入骨，他们多次上告官府无效，于是自发开展反对俄国商总不法活动的斗争。1912年爆发的"策勒事件"就是这类斗争的典型。

1912年6月22日，于阗策勒村（今策勒县）的村民不堪俄国商总色依提（赛义德·阿吉）之类的欺压和挑衅，在当地哥老会的协助下，包围色依提的住宅，打死其爪牙28人，其中只有一名真正的俄侨，事后放火焚烧了他的宅院，但色依提本人趁乱逃脱。这就是"策勒事件"的简略经过。

---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2册，第3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6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策勒事件"的根源就在于俄国领事无视中国主权，放肆发展俄侨，并支持他们进行非法活动。英国作者也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因为索柯夫（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总领事）总领事想要把中国的土耳其斯坦（指南疆——引者注）变成沙皇帝国的他自任总督的一个省，所以他才成百地，不，简直是成千地登记假造的俄国侨民，所以才有了策勒村事件。"①

可是，俄国外交官员和媒体歪曲事实真相，大肆渲染有100多名俄侨被杀，并且诬赖中国官民。俄国政府更是以"策勒事件"为借口，派兵500余人由中亚进入喀什，并且要求中国方面道歉，严惩所谓"凶手"，偿付赔款。袁世凯政府最终答应了俄方上述要求。可是俄国政府得寸进尺，提出要处死180多名新疆绅民，遭到新任喀什提督杨缵绪抵制。杨缵绪一边与俄国领事索柯夫谈判，一边整军备战，终于迫使对方放弃原议。索柯夫改口要求将"肇事者"查办判刑，赔偿每名被杀"俄侨"2000卢布，新疆当局接受了这些条件。

按照俄方的要求，喀什地方当局开庭审讯此案。后来，杨缵绪和索柯夫达成如下协议：涉案的4名中国官员撤职罚款或判刑，40名村民判徒刑或苦役，中方向俄方赔偿白银7万两。1913年10月1日，"策勒事件"就这样结案了。

由于享有免税特权的"俄商"人数众多，贸易圈地盘不断扩张，到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商行基本上控制了新疆的内外贸易。俄国中亚经新疆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陷于停顿，而中国内地经俄国中亚与新疆之间的贸易却兴旺起来。例如，新疆所需的茶叶也要从俄国"进口"，是俄商从中国东南产茶地区运来的。

俄国运往新疆的货物，北路以斜米为集散中心，经塔城的苇塘子（巴克图）和伊犁的尼堪（霍尔果斯）两处通道进入新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62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疆；南路以费尔干纳为集散中心，经乌什的伊布拉和喀什的明约洛两处进入新疆。辛亥革命以后，从俄国中亚输入新疆的货物急剧增长。1914年，新疆从俄国中亚等地进口商品总额达到1150.6万卢布，超出1895年372.4万卢布的两倍多。[①]新疆与俄国的贸易被众多俄国商行所垄断，像吉祥涌、德盛、德和、天兴这样的俄国大商行资本都在百万卢布以上。此外，由俄国人控制的华盛银行在新疆各地设立分行，经营汇兑，发行纸币，并且经营贸易，攫取筑路特权。

面对俄国在新疆大肆扩张，与俄国在中亚争夺不休的英国分外眼红。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乔治·马嘎特尼George Makkertne）处处援引俄国成例，侵犯新疆权益。英国领事同样在南疆地区招纳侨民，设立商总。在新疆的英国商人为数亦不少，辛亥革命时达到3000人。不过，这些像俄商一样享有免税特权的英商大多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保护国阿富汗。印度、阿富汗虽然也同新疆接壤，但是中间横亘着高峻的雪山冰原，往来不便，而且英国直到1908年才在新疆设了一处领事馆（喀什），所以与俄国相比，英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原商人更是无法同俄国商人竞争，从内地到新疆，路途遥远，险恶难行，沿途关卡重重，匪盗猖獗，所以中原商人在新疆经营异常艰难，所占贸易份额很小。

当时在新疆的全部进口商品中，俄国货占了90%，新疆的出口货物的75%~80%也是输往俄国的中亚等地。[②]从1881年订立伊犁条约到1920年双方签订平等商约的30年间，俄国商人每年免税使中国损失150万两白银，总共损失达四五千万两，"而英商援例免税，尚未计算在内"。[③]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2册，第3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2册，第36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在向新疆大肆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的同时，沙俄政府还趁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之机，加紧干涉新疆地区的政治事务，并且企图继续侵占中国的领土。特别是它支持外蒙古傀儡政权进犯阿尔泰，结果遭到新疆军队和民众的有力回击。

当时在外蒙古与新疆之间，自东向西有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勒泰及其北的唐努乌梁海几个中国的直属行政区。1911年11月，俄国趁中国革命党人同清政府激战之时，策动外蒙古王公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成立所谓"蒙古临时政府"。第二年，外蒙古政权在俄国支持下向西进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到8月占领了上述两地。俄国同时在中俄边境集结重兵，准备与外蒙古军队合击新疆与阿尔泰。

杨增新当时命令新疆北上增援的军队收复科布多，但是遭到俄国领事无理阻拦，他公开威胁要用武力"回敬"新疆援军。杨增新慑于俄国淫威，下令新疆军队停止前进。但是外蒙古军队得寸进尺，继续西进，企图一举侵占阿尔泰地区。

1913年6月17日，外蒙古军队兵分三路进犯阿尔泰，杨增新命令原增援科布多的军队改援阿尔泰，结果在察罕通古大胜外蒙古军队。7月11日，新疆援军再次获胜。外蒙古政权只得放弃侵占阿尔泰的打算，刹羽而归。

俄国见外蒙古军队惨败而去，便亲自出马。1913年7月，俄国驻阿尔泰领事因滋事寻衅被中国士兵刺伤。俄国政府借此大做文章，派兵入占承化寺（今阿勒泰市），后来又动员中亚300多户俄罗斯农民移居阿尔泰，进行殖民活动。

10月，俄国驻阿尔泰领事胁迫蒙古亲王帕勒塔以"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名义，签订有损中国主权的"临时条约"，条约在划分阿尔泰和科布多边界一事上偏袒后者。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条约中与停战无关的条款。12月，帕勒塔亲王又同俄方擅自签订《中俄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个协定，帕勒塔亲

王遭到撤职处分。

1914年2月，俄国驻中国公使提出从阿尔泰撤出俄军的六项先决条件，内容为俄国人在阿尔泰享有经商免税、控制航运、建造房屋、自由居住与从事渔耕等权利。[①]中国政府作了部分让步，3月间达成中俄蒙三方协议，内容还包括准许外蒙古实行自治。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无力东顾，只得开始从阿尔泰撤军，但是最后两个连的俄军直到二月革命以后的1917年5月28日才撤走。

那时，阿尔泰是处于新疆以外的一块中国领土，北洋政府觉得不便实行传统的直接治理，于是在1919年6月将阿尔泰地区改设阿山道，划入新疆省版图之内，由杨增新统辖。

沙皇俄国自1914年8月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国力有限，加上战争引发的国内危机迭起，所以对新疆的干涉不得不有所收敛，俄国与新疆之间的贸易额也急剧下降。但是俄国特别是中亚地区战时动荡不安的局势对新疆造成明显的冲击。1917年两次革命以后，俄国一时陷入混乱状态，新疆毗邻的中亚地区也是一样，这一切无不危及新疆的稳定。

首先是大战期间发生俄属中亚大批难民流入新疆的事件。19世纪中后期，中国和俄国在中亚草原、山地划分边界以后，哈萨克以及吉尔吉斯等民族居住的地区被一分为二，但是分别居住在中国新疆和俄属中亚境内的诸民族尤其是过游牧生活的哈萨克人依旧往来如故。1916年，中亚爆发反对沙皇政权的民族大暴动，结果失败。参加暴动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维吾尔人、东干人遭到俄国政府军的残暴镇压。在靠近新疆的俄国突厥斯坦七河省，政府的镇压尤其残酷，遭杀戮的农牧民数以万计，甚至中国侨民也难以幸免。在热海（伊塞克湖）附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625-62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近的哈拉湖村一带，有4000名中国籍居民惨遭杀害。[①]七河省的穆斯林居民为逃避追杀，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涌进新疆沦为难民。

新疆当局深知中亚难民潮将给新疆带来严重冲击，杨增新一再电令各边防关卡竭尽全力予以堵截。尽管边卡守军昼夜拦截，无奈难民人如潮涌，怎么也阻挡不住。结果，从塔城边境涌进哈萨克难民六七万人，伊犁地区麇集的哈萨克难民多达16万人，乌什、喀什一带也流入了五六万吉尔吉斯及维吾尔、东干难民。当年，流入新疆的俄属中亚难民总数高达30余万人，牲畜数量则两倍于难民。[②]

中亚难民逃难的景象惨不忍睹。1916年10月19日清晨，大群哈萨克人逃至伊犁特克斯河中国边卡外侧，遭到追击俄军的炮火连续轰击，死伤无数。为了逃命，难民们冲破中国边卡官兵的防线，蜂拥而入。吉尔吉斯难民逃往新疆，要翻越乌什、乌恰一带的冰峰雪岭，路途万分险恶，不少人因冻饿身亡。

几十万难民短时间内涌进新疆，并且赶着畜群，或滞留边境地区，或迤逦内迁。在北疆，中亚难民径直流入阜康、奇台，甚至远达镇西（今巴里坤）；南疆的喀什、阿克苏两道诸县到处都是中亚难民。涌入新疆的难民免不了挤占新疆的牧场，其中的不法之徒甚至劫掠中国牧民的牲畜，因此经常发生冲突，给新疆的治安构成严重威胁。

新疆各地政府遵照杨增新的命令，对中亚难民采取安抚与防范并重的方针，在难民聚集之地派兵看守，严防其继续盲目内流，对于穷困陷于冻饿境地的难民则给予适当救济。同时，新疆政府与俄方当局主动进行接触交涉，商谈难民遣返事宜，敦促俄方允许中亚穆斯林难民返回家园。可是当时经常发生俄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27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28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国政府讨伐军在途中屠杀抢掠返回中亚的难民的事件，所以遣返严重受阻。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突厥斯坦政府才宣告对难民实行大赦，但是难民回家之路还是杀机四伏，一直拖延到次年秋冬，难民才大量返回中亚。不过，到最后仍有很多哈萨克人滞留新疆，游牧不归，杨增新只得指示发给他们护照，以便管辖治理。

中亚难民流入新疆的事件尚未了结，俄国接连爆发了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在俄属中亚胜利以后，对新疆的局势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俄国苏维埃政府多次郑重宣告，俄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皆有自决或自治之权，中亚穆斯林民族的地位在法律上明显得以提高。同时，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根据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在华全部特权。这样，自19世纪中叶以来新疆面临的外部主要威胁基本消除了。中国新疆同俄国及其中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乃至政治外交关系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俄国国内形势骤变使得在新疆经营的俄商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顿时失去了基础。新疆当局陆续接管了各地贸易圈的治安管辖权。昔日的"国中之国"变得人心浮动，生意冷清。许多俄国商人担心在国内会遭革命政府清算，于是把资金和家眷转移到新疆，改营新疆省内贸易，不少人干脆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不过，杨增新不轻易答应他们的申请。这样，新疆同俄国及其中亚地区的双边贸易急剧萎缩。1918年，新疆省政府封锁两国边界，苏俄的法律亦不允许私商经营对外贸易，所以双方正式贸易遂告断绝。

俄国中亚的苏维埃政权当时处境困难，它与苏俄中央地区的联系被白卫军队切断，于是迫切需要同新疆进行贸易，而且通过各种渠道，在新疆采购了一些急需商品。1919年，从新疆运往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各种商品总共为189429普特，从突

厥斯坦运往新疆的货物为2185普特。[1]通过多次接触，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于1920年1月向新疆省的代表提出举行贸易谈判，不久，得到新疆方面回应。

3月下旬，伊犁道尹许国桢受权与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外事局全权代表利马列夫（И. Е. Лимарев）等开始正式谈判，后俄方又派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外贸局全权代表列维塔斯（A.P. Левитас）作为谈判代表。中方坚持要废除中俄旧商约中俄商在新疆经商免税的条款。经过反复谈判，1920年5月27日，中俄《伊犁临时通商协定》（又称《伊犁会议定案》）正式签字。协定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项：（一）双方在伊宁与维尔内（即阿拉木图）互设商务兼交涉机关，处理两国外交与通商事宜。（二）苏俄在伊犁进、出口各货物，均依新疆现行税则征税。（三）以霍尔果斯（尼堪卡）为两国通商关卡，其他道途运送之货物一律视为私运品。（四）一切争讼由争讼发生地国司法机关审理之（即废除俄商享有之领事裁判权）。（五）两国公民往来出入国境应持有两国当局发给之护照。[2]

这是中俄双方地方政府也是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平等协定。协定废除了俄国商人在新疆享有的免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对维护中国主权、建立新疆与突厥斯坦进而建立中俄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6月18日，苏俄突厥斯坦驻伊宁商务处宣告建立。8月14日，中国新疆驻维尔内商务专员赵国梁到任。在此前的7月1日，伊犁尼堪税关正式开关。不过，当时中俄双边贸易仍然多为原先的俄商掌握，因为他们拥有较雄厚的资金。但是从9月1日起，侨居新疆的俄商一律照章向当地税务机关纳税。不久，通商票

① Б.П.古列维奇：《1918~1921年苏维埃共和国与新疆省的关系》，载《苏联汉学》，俄文版，1958年第2期，第102页。

②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7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被废除，只有持中俄各自的合法护照才能经营两国间的贸易。后来，新疆方面又陆续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到1928年初，喀什、塔城、迪化、承化相继成立俄国商务处，新疆在中亚各地也不断增设商务机构。

随着中俄双方正常贸易的恢复和发展，苏俄方面提出恢复同中国新疆的外交关系的建议。早在1918年春，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要求新疆将原先的俄国领事引渡回国，同时任命佐利克（Золик）为新政权驻塔城领事，但是杨增新以未接中央政府通知为由拒绝接收，结果佐利克在边境被白卫分子杀害。

1918年5月20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止前政权委派的驻华公使及驻中国各地的领事，两天后将此决定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对于新疆，苏俄要求重开沙皇政府设立的5个领事馆（迪化、伊犁、喀什、塔城、承化），新疆省政府向对方提出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斜米、斋桑五地开设领事馆。但是当时中国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干涉苏俄的政策，因此中俄互派外交人员的事情搁置下来了。

1924年5月31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签字，中国和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新疆与苏联中亚方面的谈判从此有了转机。10月，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在原旧俄设领事的五城设立领事馆，中国亦在前述中亚五城设领事馆。1925年8月，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贝斯特洛夫到任，中国驻斜米总领事刘长炳同时赴任。随后，双方各位领事陆续走马上任。从此，杨增新一直努力维持与苏联的正常关系。

俄国革命和政局的激变除了给新疆带来上述积极变化以外，也给新疆造成了负面冲击。俄国中亚地区十月革命特别是1918~1920年内战的后果一时间严重威胁着新疆的稳定和安全。

革命和内战期间，被苏维埃军队击溃的中亚白卫军队、哥萨克和民族主义武装走投无路，纷纷逃往国外，其中很大一部

分逃到了中国新疆。这些残兵败将被中国人称为“白俄”。他们既把新疆作为避难场所，同时想以新疆为基地，重整旗鼓，反攻回国。这是继1916年民族暴动以后又一次涌入新疆的难民潮，但是比上一次危害更大，因为许多人是携带武器进入新疆的，并且在新疆各地流窜。

1918年初，鉴于有几股哥萨克的零星武装窜入伊犁、塔城等地，杨增新下令封锁全部中俄边界。当年冬天，盘踞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白俄军官阿连阔夫（即安年科夫，Б.В.Анненков）在阿亚古兹被中亚红军打败后，率领残部5000余人退往新疆边界，俄国驻迪化总领事迪牙阔夫要求新疆政府允其入境，理由是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有义务支持中亚的白卫军队。杨增新知道，允许白俄武装入境无异引狼入室，除了这些溃兵在新疆滋惹事端以外，还会招致红军追击进来，使战火烧到新疆。因此，他以粮草供应困难为由，拒绝了迪牙阔夫的请求。而且在整个中亚内战期间，杨增新一直奉行“局外中立”的政策。

1919年春，在红军凌厉攻势下再难支撑下去的中亚白俄军队，通过俄国领事馆多次要求新疆出兵援助，英国驻喀什领事和初来新疆的日本“调查员”也怂恿杨增新出兵。喀什提督马福兴同样请求出兵，配合白俄消灭中亚的苏维埃政权。可是杨增新不为所动，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新疆的稳定，另一方面他估计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终将取得胜利。他致电训示马福兴说：“查新疆对于俄乱向取不干涉主义，故俄人未有一兵一卒前来扰害新疆。……万不可误听人言，改变数年抱定之宗旨，以致吃亏。日本调查员及俄领事屡劝新疆派兵赴俄，攻打新党，此间均婉为谢绝。”[①]

1920年1月，中亚几支主要的白俄军队相继被红军打败，在

①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4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国内再无立足之地，于是纷纷逃窜新疆。新疆兵力本来不多，要想在数千公里边境线上完全堵住是不可能的，但是新疆边防官兵坚持白俄必须先解除武装方可入境，同时给他们配发一定口粮，进行抚慰。对于中亚苏维埃政权提出的引渡白俄人员的要求，新疆方面的答复是：既然白俄已经缴械，那么就请苏维埃政府对他们实行大赦，以便动员他们回国。5月，中亚苏维埃政权果真颁布了相应的大赦令。

1920年春夏，白俄将领杜托夫（А.И.Дутов）和阿连阔夫两部三四千人马分别从各处关口窜入伊犁，随他们而至的还有两千余中亚难民。他们拒绝向中国伊犁官厅交出武器，而是将所有完好的枪械埋入地里，新疆军队只好对他们备加防范。后来，有3000余名白俄士兵响应中亚苏维埃政权大赦令回国，最后只乘下700余名顽固分子（其中500人是军官）滞留伊犁。阿连阔夫不愿呆在伊犁，向新疆当局提出要去印度。结果他率部属挖出武器，10月抵达迪化，杨增新怕他闹事不休，令其移驻奇台古城，安置城外。

当时西伯利亚的白俄将军谢苗诺夫（Г.М.Семёнов）兵败逃进外蒙古，在新疆各地的白俄散兵游勇纷纷前往科布多，打算投奔谢苗诺夫。阿连阔夫则企图夺占古城，然后取道科布多返回俄国。1921年1月6日，阿连阔夫发动兵变，攻打古城中国守军，结果遇到顽强抵抗。嗣后，新疆各路援军接踵而至，将阿连阔夫团团围住。到2月下旬，阿连阔夫只得放下武器，被押至迪化关押。

与此同时，留在伊犁的杜托夫等人于1月9日发动兵变，结果很快被当地中国军队平息，杜托夫在交火中中弹身亡，这位来自奥伦堡的哥萨克大统领就这样成了异乡之鬼。杜托夫死后，伊犁地区的白俄侵扰遂告结束。

1920年3月，白俄将领巴奇赤（Бакич）率领的一支中亚白

军主力在中俄边境苇塘子附近与红军展开大战，结果失败。巴奇赤只得带着11000名残兵连同9000匹战马，还有6000多名难民一齐涌进塔城地区。驻防塔城的新疆军队只有2000余人，但是他们据理力争，迫使白俄溃兵缴出大部分枪械，另有部分武器被俄军偷偷埋藏地下。塔城地方官员招募当地牧民编成军队，看管白俄官兵。当年夏季，巴奇赤部下4500余人和大批难民响应中亚政府的赦免令回国。其余5000余名白俄人员在塔城军队监视下驻扎在额敏南山，粮食由新疆当局供给。杨增新称他的这种做法是“礼之为大宾，防之若大敌”。[①]但是巴奇赤并不安分守己，时时想对中亚苏维埃政权发动袭击。

1921年5月，另一白俄军官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率领2000余名残兵要求进入塔城，由于他们拒绝缴械，因此被新疆驻军阻于卡外。而巴奇赤的下属暗中带领诺维科夫的人马绕道越过边界，两股白俄武装在南山会合，势力大增。巴奇赤企图依靠这支军队首先夺占新疆，与窃据外蒙古的谢苗诺夫连成一气，然后伺机杀回中亚。

对于巴奇赤这支白俄大军，新疆省政府想分兵阻抑，却又深感力不从心。正值此进退两难之际，突厥斯坦战线的红军代表向塔城当局提出派兵追歼巴奇赤部的建议，并允诺大功告成后马上撤军回国。杨增新认为别无良策，指示塔城道尹答复时提出如下条件：白俄若肯投降，“不必多所杀戮”；胜利后应将败兵难民，“尽数携带回国”；作战时不得损毁中国居民的房屋，不得征发中国居民的牲畜财物；肃清白俄后，红军应立即“撤回俄境”；整个军事行动期间，“不得向中国有需索供给之事”。[②]

苏俄方面同意这些条件，而且双方约定这是一个君子协定。5月24日，2000余名中亚红军将士兵分三路，经苇塘子、裔桑等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35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5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地入境，攻击巴奇赤的部队，新疆军队则在南路阻击。红军起初连战告捷，只是6月初和什托洛盖一战，让巴奇赤部突破防线，北上进犯阿山地区。红军主力也暂时撤回中亚。巴奇赤突围以后，带领8000人马渡过额尔齐斯河，威胁承化，阿山道尹惧敌自杀。不久，承化和阿山要地布尔津等城陷落。巴奇赤气焰越发嚣张，准备经斋桑攻入中亚哈萨克草原。

1921年7月，苏俄红军攻占库伦，外蒙古境内的白俄武装逐一就歼。巴奇赤于是陷入孤立无援境地。接着，苏俄红军代表与塔城地方政府约定，红军自斋桑取道布尔津进攻承化，新疆军队则负责阻击巴奇赤南窜。双方还商定：一俟战事完结，红军即撤回中亚；新疆政府为入境作战红军免费提供粮草，红军则免费向新疆军队提供若干弹药。

8月28日，红军精锐部队4800人由斋桑开进新疆，巴奇赤四战皆败。几天后，红军攻占布尔津，9月6日进占承化，总计击毙白军四五百人，俘虏2000多人。10月间，巴奇赤、诺维科夫带领少许亲信逃往科布多。红军则遵约于9月末全部撤回中亚。至此，侵扰新疆数年的白俄兵患全部肃清。

1918~1921年间进入新疆的白俄官兵和难民总共有三四万人，他们当中除被歼和回国的以外，还有不少人在伊犁、塔城、迪化等地定居下来，其中又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籍。这些人被称为“归化族”，归化族的壮丁后来组编成军队，称为“归化军”。归化军在20世纪30年代新疆的动乱时期还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1928年7月7日，统治新疆长达17年的杨增新在迪化道尹樊耀南发动的兵变中被打死，但是兵变很快被扑灭，民政厅厅长金树仁被推举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军队总司令。

第三节 中亚与盛世才统治下的中国新疆的关系

金树仁执掌新疆统治权力以后，继续保持同苏联的睦邻政策。1927年12月，中国南京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但是金树仁并没有遵命撤回驻苏联中亚各地的领事，并且向国民党政府反复陈说利害，终于获准驻中亚“五领可不召回，暂维现状”。[①]后来，又经金树仁举荐，蒋介石于1931年2月批准委任牟维潼为中国驻斜米总领事，同时任命了其他四位驻中亚的领事。不久，总领事馆由斜米改移到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

金树仁同时重视继续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发展贸易关系。早在1922年2月，苏俄外贸代表与中国新疆政府就扩展双边贸易开始进行谈判，却又牵扯到政治问题，由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立场距太大，所以一直难以达成协议。但是新疆省当局陆续允许俄方在迪化、塔城、承化等地设立贸易机构，边境贸易也有所放宽，实际上突破了1920年伊犁协定的限制。

20年代后期，苏联把对新疆的贸易纳入中亚地方国营轨道。1925年10月在塔什干成立“中亚俄东商会”主持其事。双方贸易额迅速恢复增长。1927年，苏联和新疆的贸易总额达到2417.5万卢布，相当于1922年37.4万卢布的64倍多，也远远超过1914年的总额。同时，这个数字等于同年新疆与内地贸易总额（267.6万卢布）的9倍。[②]

但是新疆和苏联之间一直没有签订新的贸易协定，这种状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第12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324~32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况制约了双方贸易进一步健康发展。金树仁上台后，逐渐感觉到这种不正常状态带来的压力，于是同意与苏联举行新的贸易谈判。1931年10月1日，新疆省政府与苏联贸易代表在迪化秘密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协定规定开通4个通商关卡（伊尔克斯塘或吐尔尕特、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允许苏联在新疆设领事馆的五城设立商务机关，享受与中国人同等的税率，依照中国法律处置双方在新疆发生的贸易纠纷等。[①]由于新疆同时发生内乱，金树仁不久下台，这个协定成效不著。后来金树仁回到内地，被南京政府关押判刑，惟一的罪名就是未经中央政府批准，擅自与苏联秘密签订通商协定。

金树仁上台不久，新疆局势就出现失控趋势。1931年2月，哈密农民和乡绅发起暴动，暴动领导人和加尼牙孜率部于1933年2月打到迪化城下。金树仁政府全赖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以后经西伯利亚到达新疆）和归化军支撑局面。

1933年4月12日，新疆部分官员策动巴品古特率200名归化军发动兵变，与东北军一起打败金树仁。14日，兵变者推举东路总指挥盛世才出任临时边防督办（即总司令），同时推举教育厅长刘文龙担任省政府临时主席。8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下达了对盛世才和刘文龙的任命。从此，统治新疆的实权握在盛世才手中。10月，盛世才把刘文龙赶下台，另择一人当了傀儡主席。

盛世才上台之际，整个新疆一片混乱。东疆和加尼牙孜的暴动队伍越战越强，而且与1933年1月进入新疆的甘肃军阀马仲英的部队联合作战。据守伊犁的屯垦使张培元拥兵自重，也在伺机向盛世才发动进攻。虽然和加尼牙孜很快接受了盛世才委任的“南疆剿匪总司令”一职，率部去了南疆，但同样不听盛世才指挥。

①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747~7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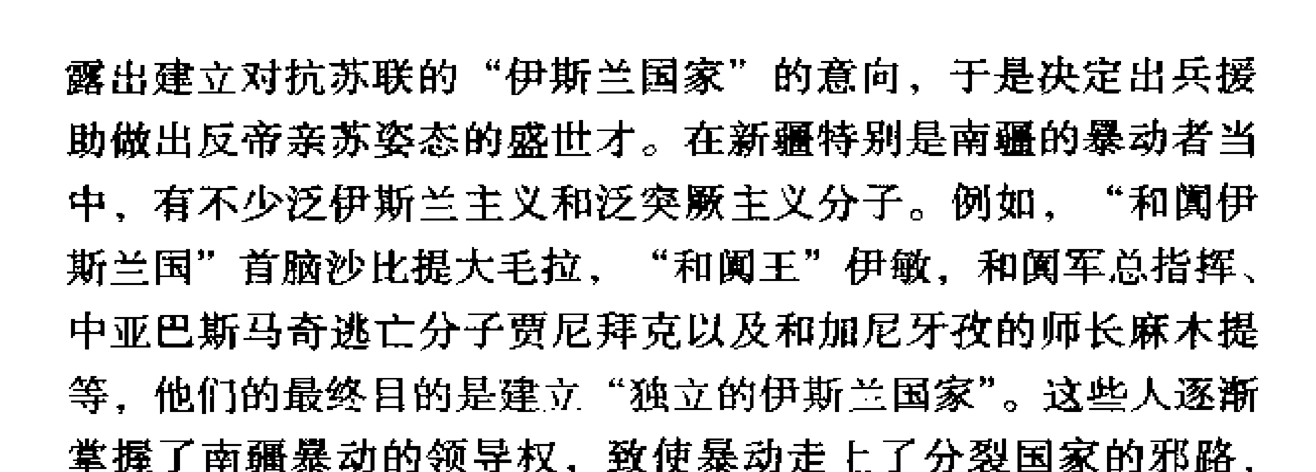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暴动扩及到南疆广大地区。在1933年1月时，铁木耳在库车起事，不久攻占阿克苏。马仲英派部属马占仓联合铁木耳向喀什进军。2月，和阗（今和田）民众在穆罕默德·伊敏率领下举行暴动，连克数城，并且建立“和阗伊斯兰国”，伊敏自称埃米尔帕夏，人称“和阗王”。接着他起兵与马占仓、铁木耳配合进攻喀什。

在这种危急的形势面前，盛世才知道自己实力太小，南京政府又不支持他，权衡再三，只剩下争取新疆邻国苏联支持这一条路了。1933年5月，盛世才委托外交署长、原驻塔什干领事陈德立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会谈，表示愿意在1931年《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双方的友好关系，孜拉肯当即表示赞成。盛世才还邀请孜拉肯到家里吃饭，席间他表白自己早就信仰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必须走苏联的道路才有光明前途。盛世才还说，要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得首先消灭马仲英、张培元之流的反动军队，因此请苏联给予他大力援助。

孜拉肯旋即把盛世才的态度报告了莫斯科，可是苏联政府还不太相信盛世才，所以没有及时给予答复。而盛世才面临的威胁有增无减，马仲英大军打到迪化城下。盛世才在城里捕杀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等人以讨好苏联。同时盛世才派陈德立出使莫斯科，请求苏联出兵援助。

11月，苏联政府终于行动了，派原突厥斯坦外事局长阿布列索夫担任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刚刚上任，就对盛世才说：“斯大林同志向您致意！苏联愿意帮助您平息新疆的内乱。苏联政府支持您！”[①]苏联一方面为盛世才的“诚意”所动，另一方面考虑到马仲英“亲日”，而东疆和南疆暴动的许多首领流

① 《赛福鼎回忆录》，第167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露出建立对抗苏联的“伊斯兰国家”的意向，于是决定出兵援助做出反帝亲苏姿态的盛世才。在新疆特别是南疆的暴动者当中，有不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分子。例如，“和阗伊斯兰国”首脑沙比提大毛拉，“和阗王”伊敏，和阗军总指挥、中亚巴斯马奇逃亡分子贾尼拜克以及和加尼牙孜的师长麻木提等，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些人逐渐掌握了南疆暴动的领导权，致使暴动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邪路，甚至发生了杀害汉族居民的仇杀事件。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传人新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留学土耳其的伊犁人麦斯武德在新疆兴办学校，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要求学生念诵：“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①同时，大量宣扬泛突厥主义的书刊流入新疆，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俄属中亚为“西突厥斯坦”），要在这里建立泛突厥主义的伊斯兰国家。上述活动虽然遭到杨增新的严厉查禁，但是没有被彻底清除，到30年代新疆动乱年代又死灰复燃了。

1933年5月初，铁木耳和伊敏的暴动队伍在守城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部队的策应下攻占了喀什回城（今喀什），马占仓攻占了喀什汉城（今疏勒），囚禁喀什行政长官马绍武。8月，马占武借马占仓之手杀了铁木耳，收复喀什回城。但是沙比提大毛拉在伊敏支持下，集合周围的暴动队伍再次攻占喀什回城。沙比提大毛拉是南疆泛突厥主义者的头面人物，他经过与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频繁接触，炮制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933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沙比提

① 《包尔汉选集》，第128页，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大毛拉等分裂主义者操纵下宣告成立，并且在喀什举行了“独立庆典”。当天夜间通过的政府组织条例共30条，其主要宗旨是：“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是依据伊斯兰教规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并且请求南京政府和国际联盟承认其“永久独立”。[①]与此同时，“政府”组成人员也公布了：“总统”和加尼牙孜，“国务总理”沙比提大毛拉，另外十余个“部长”多系宗教人士、富商、地主、间谍，还有中亚巴斯马奇分子贾尼拜克当了“副总理”，“卫生部长”阿拜都拉哈尼也是中亚流亡分子。他们大多都有泛突厥主义背景。和加尼牙孜当时还在阿克苏，直到1934年1月才到达喀什就任“总统”之职。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得到了英国的大力支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英国一度成了干涉新疆内政的主要外部势力。英国曾收买中东一些穆斯林和逃至新疆的中亚白俄，在新疆各处兜售泛突厥主义。英国人设想，一旦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那就既可以与苏俄对抗，又可以达到分裂中国之目的。沙比提大毛拉后来在狱中写的自白书也承认了英国在背后怂恿的事实。[②]但是英国也担心“东突厥斯坦”事件会在英属印度的穆斯林中间引起独立风潮。此外，英国人看不到“东突厥斯坦”分裂势力有多大前途。所以，尽管英国领事馆官员出席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庆典”，英国政府对它的支持还是不敢那么公开和热心。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它派人到印度、阿富汗等国活动，要求西方列强和伊斯兰国家还有苏联予以承认，并提供援助，但是回响寥寥，只有境外的一些泛突厥主义团体和报刊表示了“声援”。

就在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闹剧上演之际，

① 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第226~227页，正中书局1935年版。

②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2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盛世才先后与张培元、马仲英展开了血战，结果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盛世才彻底击垮了这两个强劲对手，牢牢控制了新疆的政局。

1933年12月，割据伊犁的张培元倾巢而出，企图一举攻占迪化。不料张培元刚刚离开老巢，苏联红军就应盛世才之邀抄了他的后路。中亚红军一个团的精兵假扮塔城归化军经霍尔果斯攻入伊犁，很快占领附近各县。张培元的部队本来与盛世才交战失利，听到红军出兵消息以后，官兵们四散逃亡，张培元绝望自杀。1934年1月下旬，盛世才的军队进驻伊犁，苏联红军撤回中亚。

1月中旬，马仲英部2万多人向迪化发起连续猛攻，在盛世才恳求之下，苏联驻中亚红军两个团精锐部队经巴克图卡进入塔城，在边界换成中国军服，谎称阿山归化军。红军先在附近扫荡马仲英派出的部队，然后挥师南下。

2月上旬，苏联红军抵达迪化城外。同时，另有一路苏联红军自精河方向东进。红军当即与马仲英在迪化城下展开大战，由于红军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参战，终于突破了马仲英的阵地。2月11日，马仲英撤围南逃，苏联红军和盛世才的军队共8000余人紧追不舍，一直把他赶到南疆。

还在马仲英的主力进入南疆之前，他的部将马世明就已攻入南疆。马世明部势如破竹，连克阿克苏等重镇。1934年2月6日马世明与马占仓联合攻占喀什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顷刻瓦解。和加尼牙孜突围以后，在中苏边境接受了苏联的调解，“归顺”盛世才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一职。在苏联的压力下，和加尼牙孜的部队在英吉沙抓捕了正在逃往阿富汗途中的沙比提大毛拉，后来将他移送到迪化。沙比提大毛拉最后瘐死狱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其他头面人物要么外逃（如贾尼拜克逃到了印度），要么躲藏起来，还有些人跟在

和加尼牙孜身边，后来被盛世才安排当了军政官员。

马仲英的主力在南疆撤退途中被苏联红军和盛世才的省军陆续消灭。4月中旬，省军开进喀什，协同省军作战的苏联中亚吉尔吉斯骑兵团在毛兰诺夫团长率领下也越过边境到了喀什。马仲英经过同苏联方面谈判，于7月流亡苏联。其余部由马虎山率领南下和阗，消灭了“和阗伊斯兰国”，伊敏逃往印度。

南疆局势大体平定下来以后，苏联红军主力陆续撤回中亚。但是毛兰诺夫骑兵团留驻乌恰一带，另外还在当地招募了一个柯尔克孜骑兵团。苏联还留下不少军官，为新疆训练省军，也是为了加强对盛世才的控制。盛世才则把新疆省军改称“反帝军”，取消国民党军队的统一番号。

1937年4月，驻守喀什地区的麻木提举兵反抗盛世才。盘踞和阗的马虎山以“平叛”为名出兵，实际上与麻木提的部队联合攻占了喀什，发表反盛宣言。盛世才的军队久战不胜，于是他再次请苏联出兵帮助。

9月上旬，康斯坦丁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ов）指挥苏联驻中亚红军一个团在飞机、坦克配合下，经吐尔尕特口岸进入新疆，汇合驻在乌恰的毛兰诺夫统辖的两个骑兵团，向马虎山发起进攻。马虎山的部队到10月上旬被苏联红军和新疆省军全部歼灭。战斗结束后，红军主力循原路撤回中亚。

由上可见，苏联红军的援助在盛世才剿灭新疆境内各路反对势力，进而统一新疆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盛世才还借苏联红军的力量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势力进入新疆。除新疆境内一直有苏联红军小股部队驻防以外，1938年春，一支苏联红军以“归化军第八团”的番号从霍尔果斯进入新疆，一直开到哈密驻扎下来。这支人称“红八团”的部队实际上是一个配有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集成旅，总兵员超过3000人。盛世才的意图很明显，利用红八团扼守新疆东大门，防止国民党部

队进入新疆。蒋介石认为此举“实现了将新疆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离的苏联计划”。[1]

早在1934年春消灭马仲英的主力、新疆局势基本平定下来时，盛世才加快了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步伐。他派在新疆任军职的中共党员张义吾去莫斯科，请苏联为他提供装备一万人的枪械和被服。为了达到目的，盛世才还请张义吾介绍他加入苏联共产党，并且要求苏联派一批共产党员干部来新疆工作。苏联政府基本上满足了盛世才的要求，而且建议他除了整编军队以外，还要努力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苏联共产党这次没有接受盛世才入党，不过鼓励他继续努力。此外，苏联通过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向新疆派遣了十多位中共党员干部。

从1934年夏季开始，苏联和新疆之间的合作迅速发展起来。苏联方面派出一批军事、财政顾问，帮助新疆整编军队，兴建工厂、公路、医院、学校，新疆的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渲染新疆接受苏联巨额借款，让苏联控制军政机关，盛世才完全投入了苏联怀抱。西方列强特别是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日本格外起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称“新疆已经苏维埃化”，企图以此转移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针对这样的指责，盛世才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声称：既然中央政府无力扶助新疆，那么新疆就只能接受友好邻邦苏联的援助，否则连局面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开展建设了。他强调说，苏联的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他决不会拿领土和主权去做交易。1935年1月15日，盛世才通电内地各省再次声明：“至于新苏关系仅限于商务。世才审时度势，认为与苏联通商，恢复残破，发展经济，两有裨益。”[2]1月2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

① 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第1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25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主席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发表态度类似的演讲，内称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与主权”。①

与此同时，斯大林委派代表团到达新疆，帮助盛世才制订了一个发展经济的“三年计划”，并且签订了苏联向新疆提供贷款、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供应机器设备的协议。②此外，盛世才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委托官办裕新土产公司总经理包尔汉与苏联苏新公司的代表，先后于1935年5月和1937年1月签订两份苏方向裕新公司提供贷款的协议，总金额达750万金卢布。借款除了用于购买军用品以外，还用来修公路、建工厂、购买机器和日常生活用品、医药产品等等。

从这时开始，经营新疆对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贸易的主体由私商逐渐转向官营。双方贸易额不断上升，1941年达到9079.7万卢布（其中新疆对苏出口达4370万卢布），为1949年以前的最高值。③新疆的交通、工矿、文教卫生事业均有长足进步。例如，从伊犁经迪化至哈密总长达1860公里的横贯新疆全省的公路于1937年7月通车，独山子炼油厂等企业也开工兴建。成百名新疆各族留学生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塔什干的中亚国立大学以及奇姆肯特、撒马儿罕、安集延等地的高等或中等专业学校学习。

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同苏联的关系，当时绝非盛世才本人所言的那样，“仅限于商务”，双方的政治关系也相当密切。盛世才自己反复宣传反帝亲苏的主张，还成立了反帝会这么一个庞大的民众团体。新疆的报刊舆论尽量与苏联保持一致，并且主动驳斥国际上攻击苏联的言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苏

①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1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第1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第47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此事引起中国人民的普遍不满和抗议，但是盛世才指示反帝会向各界民众细心解释，为苏联开脱。1935年以后，盛世才本人经常以“李长春”的笔名发表政论文章，主题多是反帝亲苏的一类内容。

盛世才奉行亲苏政策，主要不是因为他真的信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出于维护和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的需要。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有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而且还有五六个跨界民族，盛世才在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援助。正是有了苏联的援助，盛世才才得以打败各种反对势力，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透，逐步把新疆变成他个人的独立王国。

苏联方面不遗余力地扶持盛世才也有自己的盘算，首先是为了保证中亚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进一步就是把新疆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让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所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友好关系”越到后来，越发暴露出相互利用的实质。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盛世才在新疆的个人统治地位已经确定。于是他仿效当时苏联政治大清洗的做法，制造大批冤案，以达到剪除异己或被怀疑对他不忠实的人士的目的。当然，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也是他迫害和镇压的主要对象之一。像苏联一样，盛世才搞政治清洗也是依靠秘密警察机关。最初，盛世才亲自掌握着一批密探。后来成立了政治监察局，由于苏联的坚持，共产党员张义吾担任了代局长。可是到1937年盛世才将该局改组为公安管理处，负责治安。盛世才另外在边防督办公署设立侦查科，这才是真正负责清洗的机关，后来由它一手制造了一连串“阴谋暴动案”。

1937年8月，正值苏联政治清洗高潮之际，盛世才开始了他的镇压行动。许多高级官员包括新疆省政府多名厅长、几个大区的行政长官直至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都遭逮捕，罪名是

在日本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和乌兹别克民族主义者支持下刺杀盛世才，废除六大政策，使新疆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连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索列夫及不少在新疆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员也被诬陷为“托洛茨基匪徒”。结果，一大批被告被处以极刑，阿布索列夫等回国后也被处死，另有很多苏联共产党员被盛世才遣送回国。通过这次审判，盛世才摆脱了苏联对他的控制，消灭了他的不少宿敌和潜在对手。

1940年5月，盛世才下令正式逮捕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接着又逮捕了许多高中级官员，罪名是发动“国际性的阴谋暴动”。同时，盛世才诬陷苏联驻迪化、喀什、承化的领事馆官员是支持暴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苏联两次派人参加审判，都认为这是盛世才指使制造的冤案。6月27日，盛世才致书斯大林，为他的行为申辩，甚至说如果是冤案，“我甘愿以马、列、斯主义信徒的资格，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先生的面前领受任何严重的处罚”。[1]盛世才的阴谋再次得逞，杜重远等一大批无辜者死于非命。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新疆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剧变。一方面苏联在战争初期处境危急，因而削减了对新疆的援助，同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盛世才；另一方面，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关系好转，也不便再阻碍后者统治新疆。蒋介石甚至认为：“1942年4月，在新疆的苏联领事们及其秘密代理人开始筹划政变，目的是抛弃盛世才，用更驯服的傀儡取代他。”[2]总之，盛世才看到再依靠苏联不行了，于是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投靠国民党。经过紧张的接触与磋商，1942年8月，宋美龄亲赴迪化，与盛世才谈妥“归顺中央”的条件。

与此同时，盛世才加快实施疏远苏联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第30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第1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步骤。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交给苏联方面一份备忘录，要求除外交官以外的所有苏联人员包括驻哈密的红八团在三个月之内撤离新疆。苏联方面的撤离工作到次年春夏才完全结束。

接着，盛世才利用1942年3月其弟盛世骐遇刺一事嫁祸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逮捕了100多人。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等中共负责人遭秘密杀害。

投靠国民党以后，盛世才摇身一变，把他过去说过不知多少遍的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抛到九霄云外，说他“经过10年的研究实践，终于得出拯救全世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精神力量并非马列主义，而只能是三民主义”。[1]

但是，国民党并不信任盛世才，一步一步地剥夺他的实权。盛世才本来是靠苏联扶持才在新疆立住脚跟的，现在失去了这一支持，在国民党的进逼面前束手无策。于是他故技重演，于1944年8月逮捕一批国民党“接收”官员，并报告蒋介石说他们是“共产党员”，企图依靠苏联的支持推翻新疆省政府。同时，盛世才报告斯大林，说他逮捕的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指望苏联出面干预。不料苏联将盛世才的报告转给了国民党政府。

这个在新疆当了十年土皇帝的盛世才再也待不下去了。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委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长，命他马上离开新疆到重庆上任。国民党政府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从此，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① 《囊福鼎回忆录》，第201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七章
1945~1964年的中亚

第一节　斯大林晚年时期的中亚

1945年9月，随着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苏联军队不仅解放了本国全部沦陷的领土，而且在追击德军的过程中占领了东欧各国并直捣德国首都柏林。在向日本宣战后，苏军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

根据1945年春雅尔塔会议的安排，邻近苏联的东欧七国和德国东部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上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其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其所处的安全环境较战前更是发生了极为难得的有利变化，而这些都是因苏联是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带来的。

在分析保证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因素时，斯大林指出了几条：首先，“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其次是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第三“是苏维埃武装力量”。[1]无论公开或私下场合，斯大林或其他苏联领导人

① 《斯大林文集》，第475~47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都没有对苏联在战争中所蒙受的无比巨大的损失以及为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进行任何反省，更不用说对苏联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反省。

事实表明，斯大林要原封不动地保留和坚持苏联在战前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惟一要做的只不过是把这种体制从“战时轨道”转到“和平轨道”上来。所以，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没有得到丝毫的触动和变革。相反，由于苏联领导人害怕远征中东欧的将士染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们带回苏联（像19世纪打败拿破仑后出现“十二月党人”那样），由于1947年美苏两国冷战爆发，加上斯大林步入晚年，“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变得更加保守、更加封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国家社会的这种变化（主流是退行型变化），对苏联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同样，苏联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生活，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复杂的变化。

1946年3月，第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常委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把苏联政府的名称由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各人民委员部改称部，人民委员改称部长。斯大林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什维尔尼克（Н.М.Шверни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原主席加里宁退休，不久去世）。在这之后，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召开了新一届最高苏维埃会议，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都改名为部长会议。

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会后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代替过去的政治局，斯大林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

排名第一的书记。在这之前，包括中亚五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也举行了代表大会，选出了各共和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卫国战争结束之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家政权机关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其成员由共和国主体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和中央派来的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及白俄罗斯人）党员干部组成；而且党和政权机关的第一把手由当地民族党员干部担任，第二把手（或副手）则由俄罗斯人党员干部担任。在1945~1953年期间，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的这种民族组合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



哈萨克诗人阿拜·库纳巴耶夫像

中亚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政治局—主席团、书记处）都是由当地民族的党员干部和俄罗斯人党员干部共同组成。不过比例有所不同，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中俄罗斯人最多，塔吉克最少。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均由当地民族的党员干部担任，第二书记则由俄罗斯党员干部担任。例如，50年代初，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是哈萨克人沙亚赫麦托（Жумабай Шаяхметов）。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是乌兹别克人尼亚佐夫（Амин Ниязов），

他的前任尤苏波夫（Усман Юсупов）也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是土库曼人巴巴耶夫（Сухан Бабаев），他的前任巴图罗夫（Батуров）也是土库曼人。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是塔吉克人加弗洛夫（Бободжан Гафулов）。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是吉尔吉斯人拉扎科夫（Исхак Раззаков）。中亚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在1945~1953年期间更换较为频繁，但无一不是俄罗斯人。

苏联领导人的这种人事安排，应当说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由当地人担任一把手，体现了苏联是真正实行"民族自治"的，至少淡化了斯大林民族政策中的"大俄罗斯主义"色彩。由联盟中央派俄罗斯人当二把手，可以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防止真正的危险地方民族主义抬头。

出于同样的考虑，中亚各共和国政权机关领导人的安排与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安排大体上是相同的，即由当地人出任主要负责人，而他的副手中必定有一两个俄罗斯人。

当时，中亚五个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均由本共和国民族干部担任，他的两三名副主席中也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

在实权更大的共和国最高执行机关部长会议中，情形是一样的。主席是当地民族干部，俄罗斯人担任副主席，而且往往是第一副主席。

中亚各共和国部长会议由两种类型的部组成，一种是所谓联盟-共和国部，即联盟中央共和国都设的部，涉及社会政治和某些经济部门，如内务、安全、计划、农业、教育、卫生、纺织等，还设立外交部和国防部，不过纯粹是摆设，外交部长基本上无事可干，国防部则从来没有任命过部长。第二种是共和国部，联盟中央政府没有设相应的部，比如中亚南部乌兹别克、

土库曼等共和国的灌溉部，还有畜牧业部、地方工业部等。这些部长有些由本地民族干部担任，有的由俄罗斯人担任，不过，国家安全部部长都是由俄罗斯人担任。

有一类型的部只有联盟部长会议才设立，共和国没有。这类部包括所有重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电力、冶金、化工等）和外贸、邮电、交通等部门。设在中亚各共和国的重工业骨干企业直属联盟部管理，共和国部长会议无权过问。不过，它们要接受中亚各共和国党中央相关部的政治监督。原来，各共和国党中央除设宣传鼓动、组织教导等政治性的部以外，还设有若干个监督经济生活的部，如重工业、电力、交通、纺织和轻工业、商业、农业等部，共和国部长会议各部及其所辖企业都得接受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相应的部的监督和指导。这种体制一直保留到了80年代中期。

中亚各共和国州、区（市）两级地方党政机构的情况也差不多。多数州、区（市）党委第一书记由本地民族党员担任，第二书记由俄罗斯人担任。但是在某些俄罗斯居民人口比例大的州和区，还有俄罗斯人聚居的中心城市，多由俄罗斯人担任第一书记，本地民族党员任第二书记。据一项统计显示，50年代初期中亚五国州、区两级党委书记中俄罗斯人占有的比例如下：州党委第一书记占30%，第二书记占80%；区党委第一书记占20%，第二书记占90%。[①]州和区两级的政权机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民族干部与上面的比例差不多。

战后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强在中亚各共和国（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要表现，除了由联盟中央派俄罗斯人来担任要职以外，还有由联盟各部直接管理中亚境内所有重要企业和交通运输。所以，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经济的发

①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118页注②，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展与苏联全国发展计划联系得最为紧密。

战争结束后，苏联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国民经济。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了《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即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这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恢复经济”，因此把苏联西部即战时的沦陷区放到了优先地位，投资最多，而且在东部地区的投资重点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中亚各共和国包括历来作为苏联重点建设地区的哈萨克共和国得到的投资比例都明显下降了。

1946~1950年，苏联政府计划在哈萨克安排基本建设投资88亿卢布，其中共和国地方经济投资7.37亿卢布。其他4个共和国相应的数字分别为：乌兹别克39亿卢布和12.66亿卢布，土库曼14.2亿卢布和3.74亿卢布，吉尔吉斯12亿卢布和3.37亿卢布，塔吉克12亿卢布和3.18亿卢布。5个共和国总投资为165.2亿卢布，其中地方经济投资总额为30.32亿卢布。而同期乌克兰一个共和国得到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有495亿美元，其中地方工业投资为54.69亿美元。[①]也就是说，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给乌克兰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中亚五个共和国投资总和的3倍，地方工业投资相当于中亚五国总和的1.8倍。

相对于其他中亚共和国来说，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哈萨克共和国仍然是国家投资的重心。不仅投放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基本建设资金（88亿卢布）超过了投放在其他4国的总和（77.2亿卢布），而且在哈萨克共和国建设的多是苏联中央各部的直属项目，所以地方经济基本建设投资在基建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为8.15%），远远低于中亚其他4国的比重（它们都在1/3以上）。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当中，哈萨克

① 《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第三、四、五个五年计划），第158页，第160页，第175页，第172页，第173~174页，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的上述比例也是最低的。哈萨克共和国的投资主要用于煤矿、油田、有色金属矿山和冶炼厂、钢铁厂、电站、化肥厂、水泥厂及铁路的新建与扩建。

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投资在中亚各共和国中位居第二，但是用于地方经济的投资比例较大，达32.5%。除了建设电力、冶金、农业机械、化肥、石油企业以外，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土库曼共和国重点发展石油、玻璃、鞋袜、食用油等工业部门。1948年10月6日，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苏联政府和土库曼当局努力组织抗灾和重建工作，比较快地恢复了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吉尔吉斯共和国重点发展煤炭、纺织和制糖等工业。塔吉克共和国重点建设的工业部门是水力发电、丝棉纺织、鞋袜等。

中亚各共和国安排用于农业和畜牧业建设的资金是很不够的，而且难以真正到位，所以农业生产指标无法完成。

1951年4月16日，苏联政府发布的公报宣布："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战后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而这计划上所规定的各项主要任务则已大大超额完成。"[①]中亚地区整个地说"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的任务，至少工业交通的建设和生产任务完成了。与1945年相比，中亚各共和国1950年的工业产值都有明显增长，其中哈萨克增长了69%，乌兹别克增长了71%，吉尔吉斯增长了76%，土库曼增长了64%，塔吉克增长了104%，但是综合起来没有达到全苏联平均增长的88%的速度。[②]

在这五年期间，中亚地区建成的重要企业和工程项目包

---

① 《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第三、四、五个五年计划），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239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括：哈萨克共和国境内的塔基巴斯图兹煤矿、卡拉干达煤矿（扩建）、杰兹尔兹甘铜矿（扩建）、恰拉克套（今卡拉套）碳酸盐矿、古里耶夫石油加工厂（扩建），以及阿克莫林斯克经巴甫洛达尔至巴尔瑙尔和莫因特至楚城的两条铁路干线；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塔什干和费尔干纳棉纺织厂（扩建）、奇尔奇克化肥厂、塔什干农机制造厂（扩建）、费尔干纳灌溉网配套工程等；土库曼共和国境内的阿什哈巴德第二期工程和水泥厂、查尔朱磷肥厂等；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煤矿扩建、坎特（伏龙芝城东）至雷巴奇耶的铁路等；塔吉克共和国境内的斯大林纳巴德棉纺织厂（扩建）和一些水电站等。

此外，哈萨克共和国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境内建成了苏联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场"米什瓦克"试验场。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这里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3年8月12日，苏联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由于条件限制，后来大当量的氢弹试验转到了北冰洋中的新地岛。1965年1月，在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气层核爆炸以后，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经过前后500多次大小核爆炸，塞米巴拉金试验场周围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辐射污染，甚至还发生过核泄露事故，有几十万居民的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91年8月29日，哈萨克斯坦政府下令关闭了这个核试验基地。

斯大林晚年时期，中亚各共和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多是战前那些问题的继续，只不过更加严峻，更加难以解决。而且，中亚战后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经济问题的根源是一致的，是苏联日趋僵化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反映。

战后，苏联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战时经济体制，较战前更加集中，体现为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极力排斥商品货币关

系。尽管斯大林在1952年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承认苏联存在商品生产，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原有体制。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提出改革旧体制的问题。这样一来，战后苏联经济显现出投资效益递减的趋势，经济效益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不仅经济体制落后，而且经济结构陈旧。战后，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掀起了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苏联对此反应迟钝，除了在国防工业采用了某些新科技以外，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对提高国民经济素质，改造过时的经济结构方面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苏联还是一味满足于生产了多少煤炭、钢铁、电力……此外，苏联经济长期与世界经济割裂开来，与东欧各国经济一起封闭在所谓“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之内。这一切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了。

苏联经济的上述弊病，在中亚各共和国也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它们还存在一些特殊的经济问题。

首先，中亚各共和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了。原材料工业和个别重工业行业（如农业机械制造）相当发展，而其他重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农牧业相当落后。中亚地区生产出苏联最多的有色金属，钢铁产量增长也不慢，可是始终没有形成机器制造工业体系。

轻工业和农业落后是苏联经济的通病，但是中亚有自己的特点。中亚地区盛产棉花，可是棉纺织工业相当落后，棉布生产能力大约只有俄罗斯联邦的一半，而后者基本上不产棉花。以哈萨克为例，该共和国在50年代初仅有65个较大的轻工业企业，其中不少是革命前建起来的。当时这个盛产棉花、羊毛的共和国的棉纺织品产量仅占全苏联的1%，毛纺织品产量仅占全

苏联的1.4%，皮革产量也只占全苏联的1.7%。[①]哈萨克共和国历来是苏联重要的粮食和畜牧业生产基地，可是到50年代初，农牧业还没有从20年前农业集体所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1949~1955年的谷物年均收获量还比不上集体化之前的1928年。畜牧业的状况更是比1928年差得远，1951年，哈萨克共和国有牛450万头（1928年650万头）、马150万匹（1928年350万匹）、骆驼12.7万头（1928年100万头），只有绵羊接近1928年的水平，有1803.6万头。[②]

其次，中亚各共和国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这是农业和轻工业落后带来的必然后果。还是以哈萨克共和国为例来加以说明。与1940年相比，战后哈萨克共和国的商品零售价平均上涨了30倍，而工人与职员的工资提高还不到2倍，1950年，他们的平均月薪为62卢布。1947年苏联宣布取消凭证供给制，商店里高档商品相当丰富，可是面包和食糖十分稀缺。工人劳动强度大，大量女工从事重体力劳动，1950年哈萨克共和国工业就业者当中40%为妇女，甚至还有童工。[③]此外，还有大量囚犯在各个劳动改造营从事超负荷劳作。

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居民更加困苦，哈萨克共和国农民从集体农庄得到的收入简直无法维持生存。当时国家采购农庄谷物所付的价款仅能补偿生产成本的十分之一，而畜产品收购价相对来说还要低。1946年，每个哈萨克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平均约为14.3万卢布。1950年约为17万卢布（按当年价格计算），算

① Ж.Б.阿贝尔雷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0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Ж.Б.阿贝尔雷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38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③ Ж.Б.阿贝尔雷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1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下来每个集体农庄农民现金收入还不到40卢布。至于实物报酬，60%的集体农庄一个劳动日可得一公斤多一点的谷物，另外的农庄还不到这个数。[①]好在还有一小片自留地和少量的自留畜，否则哈萨克农民真不知怎么活下去。集体农庄为农民们提供了88.4%的马铃薯、73.4%的蔬菜、85.3%的肉类、97.7%的奶品以及三分之一的现金收入。[②]但是自留地（自留畜）也有按国家收购价交售农牧产品的任务。哈萨克共和国不同地区的交售额有所差别，每个农户每年要交售肉类40~60公斤、奶类120~180公升、禽蛋30~150个。[③]只有一部分农牧产品才能拿到集体农庄的集市上去出卖。

苏联政府总是对农民的自留地规模加以限制。1946~1948年，从哈萨克共和国1600个集体农庄的自留地中划出了“非法占用”的土地536600公顷，追缴罚金2.13亿卢布。[④]

1950年的时候，一个哈萨克农村居民全年消费的食品大体是这样的水平：食糖1.76公斤，白面包3.6公斤，鱼0.87公斤，蔬菜47公斤，肉类15公斤，奶类160公斤，其他就只能吃粗面包和马铃薯了。[⑤]可见，到50年代初期斯大林去世前后，中亚地区累积的经济问题和潜伏的危机非同一般，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战后时期，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

①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1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1~242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③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2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④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2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⑤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2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批判运动。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西方的交往增加和红军出国远征使得资本主义思想渗入了苏联社会生活，必须进行彻底的清洗。

1946年8月，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А.А.Жданов）起草了一个谴责文学刊物《星》和《列宁格勒》的中央决议，从而开始在苏联意识形态各领域进行一场持续多年的清洗。这场清洗从文学领域开始，迅速波及到各个文化学术领域。连自然科学领域也不能幸免（例如批判现代遗传学）。后来，从莫斯科开始的清洗浪潮波及到了中亚各共和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中亚各共和国开展了一场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历史观点”为主要对象的批判运动。

1950年12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地阐述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而斗争》的长文，第一作者是史学硕士邵英巴耶夫（哈萨克人）。这篇很有来头的文章对哈萨克历史学家别克马汉诺夫（Е. Бекмананов）的著作《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提出严厉批判。因为别克马汉诺夫在其著作中肯定了19世纪前期哈萨克贵族盖涅萨勒·卡塞莫夫（Кенесары Касымов）领导的抗俄暴动，所以被批判者认定是“重复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批判文章指出，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可以使哈萨克人民免于封建贵族的奴役，并且保证他们与先进的俄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①]

这篇批判文章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扔进了哈萨克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1951年4月，哈萨克共产党中央专门作了一个决定。

① 邵英巴耶夫等：《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第4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决定称《真理报》刊登的文章是正确的，号召人们要向一切歪曲哈萨克人民的历史，“歪曲它与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之不可分离的友谊的历史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鉴于别克马汉诺夫所犯的“绝大政治错误”，哈共中央责成他所在的党组织“审查别克马汉诺夫同志的党籍问题”。[①]

接着，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三书记奥马罗夫（Омаров）在5月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一个与《真理报》文章题目完全相同的报告，批判别克马汉诺夫的观点。随后，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在哈共中央全体会议和哈萨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两次报告中，批判不断升温。他除了点名批评别克马汉诺夫等一批历史学家、作家和诗人以外，还指责哈萨克作家协会主席、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和电影事业部部长、科学院院长、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失职”。连第三书记奥马罗夫也难辞其咎，因为第一书记指责他不该委托别克马汉诺夫写这一文章。最后，沙亚赫麦托夫本人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②]

这场批判运动当然不会局限在哈萨克一个共和国，声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很快就向其他中亚共和国蔓延。1951年第四期《历史问题》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称：“中亚细亚历史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对中亚细亚合并于俄国的历史意义的评价问题。”[③]社论对中亚地区历年出版的几十部历史著作及论文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些有严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作者也被点名批判。

---

① 鄂英巴耶夫等：《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第21页，第16页和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② 鄂英巴耶夫等：《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第7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③ 鄂英巴耶夫等：《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952年2月，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亚佐夫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说：“许多著作家，在说明沙俄在东方的征服政策的后果时，仅仅强调一方面沙皇制度对乌兹别克斯坦和整个中亚细亚各民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而对乌兹别克斯坦合并于俄国的进步意义则阐述得根本不够。”[①]他除了点名批判一批人以外，也作了自我检查。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加弗罗夫1951年7月在报上发表长文，在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于土库曼和吉尔吉斯两国历史学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苏联中亚共和国也在局部组织文章进行了严厉批判。

20世界5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中亚地区的这场历史学（及其他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既是当时苏联全国意识形态清洗的一部分，也是战前批判中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继续，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斗争，所有的批判文章都是从政治斗争角度进行论述的。而且，思想方面的批判导致政治上的清洗，许多学者、作家失去了党籍，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一批党政官员则因“丧失警惕”、“斗争不力”而丢了职位。

第二节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亚的政治状况

1953年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去世，终年74岁。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苏联在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同时，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与战后世界发展潮流和苏联社会

① 郁英巴耶夫等：《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发展要求已经不相适应了，需要进行认真的改革，因此改革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尼·谢·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ёв）为首的苏联新一代领导集团肩上。

赫鲁晓夫在其执政的十余年时间内，确实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效。同时，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赫鲁晓夫的改革也出现了不少失误。这就给苏联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同样，赫鲁晓夫的执政和改革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当复杂的。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并没有马上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而卷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的权力斗争。1953年6月，赫鲁晓夫联络其他主席团委员清除了掌管秘密警察大权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赫鲁晓夫威信上升，1953年9月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2月，赫鲁晓夫逼迫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ов）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让布尔加宁（Н. А. Булганин）继任。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反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改革苏联旧体制的势力仍然强大。1957年6月，双方公开摊牌，结果赫鲁晓夫获胜。当时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把企图罢免赫鲁晓夫的莫洛托夫（В. М.Молотов）、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1958年3月，布尔加宁被迫辞职，赫鲁晓夫亲自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至此，赫鲁晓夫确立了在苏联的个人领导地位。1960年5月，赫鲁晓夫让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退休，由勃列日涅夫（Н. И.Брежнев）继任。这样，新一代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形成。

赫鲁晓夫掌权以后，对苏联的国家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种种错误。与此同时，苏联共产

党和政府为在斯大林时期遭受迫害和镇压的数百万无辜者平反昭雪，大批党政官员和知名人士恢复了名誉，成千上万的囚犯走出了集中营。这类举措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的改善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苏联领导人新的民族政策对中亚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恐怕要更加直接，也更加深远一些。

赫鲁晓夫掌权以后，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时期那种对非俄罗斯民族的高压政策，谴责"地方民族主义"的调门放低了，行动上也有明显的收敛。苏联政府为斯大林时期被镇压的各民族共和国领导人平了反，为遭到驱逐的民族恢复了名誉，而且让他们当中许多人返回故园。但是，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赫鲁晓夫在民族政策方面迈出的改革步伐是很小的。他深知民族问题在苏联的敏感性，生怕改革引发民族主义意识复兴，从而危害统一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因此，赫鲁晓夫的民族政策在扩大民族自治权力方面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最明显的变化倒是提出苏联各族人民走向融合，而且是以俄罗斯族为核心的融合。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说，苏联各族人民的尊重，甚至说各族人民应高呼"俄罗斯母亲"。[①]因为在批判斯大林以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少数民族自主意识陡然增强并公开流露出来，对此，赫鲁晓夫采取的对策除了压制乃至镇压以外，就是宣传和促进各民族的融合。

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了一个发展国民教育的提纲，其中含有贬低、排斥民族语言，强制在中小学推广使用俄语的内容。[②]1961年10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

①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文件汇编》（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第342~343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次代表大会，重新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党纲强化了这一方针。赫鲁晓夫在大会报告中宣称："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①]但是，苏联领导人的这些目标最终都落空了，包括中亚诸民族在内的苏联各族人民仍然保持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性。

1959年，苏联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统计，中亚成为自上次人口普查（1939年）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区域。在这20年间，苏联总人口数仅增长9.5%，而哈萨克共和国人口增长了53%，居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首；同期，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了42%，居全苏第二位；塔吉克共和国人口增长了33%，排在第四位（第三位是亚美尼亚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人口增长了28%，排在第五位；土库曼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了21%，排在第六



土库曼歌剧《阿勒达尔·阔赛》（1952年）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载《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位。[1]1959~1965年，中亚各国人口继续快速增长，塔吉克人口增长了35.2%，哈萨克增长了32.5%，吉尔吉斯也增长了28.4%，都远远超过苏联总人口增长的幅度11%。[2]

1959年，哈萨克共和国总人口为915.3万人，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居第三位；乌兹别克共和国总人口826.1万人，居第四位；吉尔吉斯共和国总人口206.6万人，排在第十一位；塔吉克共和国总人口198.1万人，排在第十二位；土库曼共和国总人口151.6万人，排在第十四位。中亚五国1959年总人口2297.7万人，占全苏联总人口20882.7万人的11%。[3]而1939年中亚五国的人口占全苏联总人口的9.7%。[4]

中亚各共和国人口快速增长，除了当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较快以外，主要还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其他民族居民的大量移入（在哈萨克共和国尤其是这样），因为在中亚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垦荒运动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例如哈萨克垦荒区1955~1962年间就有120万人迁人。[5]而同期中亚各共和国外迁的人不多。因此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尽管中亚各共和国居民中当地民族的人口增长较快，但是在共和国总人口数的比重却相对下降了。例如，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哈萨克人1959年比1939年增加了21%，但是他们在共和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39年的38%降至1959年的30%；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乌兹别克人增加了23%，而占共和国总人口的比重由65%降至62%；塔吉克共和国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第509~51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第52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泽夫·卡茨主编：《苏联主要民族手册》，第6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赵龙庚、金火妮：《苏联民族概论》，第235~236页，第213页，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

⑤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rule.），英文版，第30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的塔吉克人增加了19%，而占的比重由60%降至53%；吉尔吉斯共和国由吉尔吉斯人增加了11%，而所占的比重由53%降至41%。[①]只有土库曼人在土库曼共和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略有上升。

在1939~1959年20年期间，中亚各共和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苏联平均速度67%。例如，同期哈萨克共和国城市人口增长了242%，塔吉克共和国增长了265%，乌兹别克共和国增长了190%，增长速度分别居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第一、第二和第四位。[②]

1959~1965年，中亚各共和国城市人口继续快速增长，吉尔吉斯共和国增长46.5%，哈萨克共和国增长43.3%，塔吉克共和国增长41.6%，乌兹别克共和国增长35.2%，土库曼共和国增长34.3%，都明显高于全苏联24.9%的平均增长速度。[③]

随着人口的增长，居民社会成分的变化也是明显的。1959年，中亚各共和国居民中工人、职员与农民的比例分别为：乌兹别克共和国39.2%、14.9%和45.7%；哈萨克共和国58.4%、19.9%和21.6%；吉尔吉斯共和国39.7%、16.7%和43.4%；塔吉克共和国29.1%、13.6%和57.1%；土库曼共和国37.3%、18.1%和44.2%。[④]

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亚各共和国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1956~1957年在校大学生人数与1926~1927年相比，哈萨克共和国增加了46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加了48倍，土库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第509、51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第51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第52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④ п.п.雷巴科夫斯基：《苏联人口七十年》，第196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曼共和国增加了63倍，塔吉克共和国增加了68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加了40倍。[①]据赫鲁晓夫在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材料，苏联中亚五个共和国每10万人口中在校高等学校学生为88人，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为73人，这还不包括到中亚五国以外的苏联其他城市求学的青年。[②]虽然中亚地区大学生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还低于苏联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距离在不断缩小。此外，到60年代末，苏联中亚地区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中亚地区居民人口统计中反映出的积极变化（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工人和职员的比重增加、受教育的程度空前提高等）却没有使各民族在使用俄语方面有明显的变化，尽管还有政府的引导与压力、俄罗斯人大量移入等因素的影响，中亚诸民族居民几乎都是以本民族语言为第一语言。1959年，98.4%的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98.9%的土库曼人、98.1%的塔吉克人和98.7%的吉尔吉斯人都以本民族语言为第一语言，与1926年的情况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不会讲俄语。[③]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亚地区接纳了数百万计的来自苏联其他地区的移民，同时也有一些居民移出，最主要的就是卫国战争期间被流放到这里的几个民族返回了他们的家园。赫鲁晓夫指责当年驱逐所谓“通敌民族”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说道：在斯大林时期“出现了一些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苏联民族政策的行为。我们想指出这样一件事，有的民族，整个地区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都被从故乡集体迁往其他地方”。赫鲁晓夫接着质问：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第50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В.Я.涅波姆宁等：《跨越资本主义》，第109~110页，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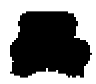
③ 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第162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参见赵龙庚、金火根：《苏联民族概览》，第221~222页，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

"怎么能够说整个民族要为敌对行为负责呢?"[①]

根据这一精神，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决议向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建议：恢复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车臣和印古什等民族的自治共和国及自治州。根据这一建议，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恢复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把切尔克斯自治州恢复为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恢复卡尔梅克自治州（1958年6月改为自治共和国）。命令下达以后，上述各民族居民纷纷离开流放地，返回故土，其中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的几乎全部、巴尔卡尔人的绝大多数离开了中亚各共和国，回到了北高加索地区（卡尔梅克人未流放到中亚）。

但是，流放到中亚两个人口较多的民族——伏尔加河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没能回到他们原先的家园。只是在1955年12月13日取消了对德意志人的管制，给予他们公民权。直到1964年8月28日，苏联政府才给德意志人恢复名誉，但是不允许他们回伏尔加地区。1956年4月28日，苏联政府取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特别管制，承认其公民地位，直到196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才恢复他们的名誉。不过，鞑靼人已经无家可归，苏联政府在1954年2月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联邦划给乌克兰共和国了。数十万德意志人仍然居住在哈萨克及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共和国，几十万鞑靼人则滞留在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共和国。还有被强行迁徙到中亚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朝鲜人等人数不多的民族居民也回不了故土。后来，这些民族的居民为争取返回故园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例如，麦斯赫特土耳其人1964年2月在塔什干举行了民族代表会议，还成立了争取返回家

① 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8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园的组织。不过，上述民族的类似斗争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的。

在评价中亚地区被俄国征服一事上，赫鲁晓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尽管当年作为第一个批判靶子的别克马汉诺夫于1956年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然而他的观点仍然遭到否定。1957年官方组织编写出版的《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历史》还是全盘否定盖涅萨勒·卡塞莫夫领导的哈萨克人抗俄暴动："盖涅萨勒·卡塞莫夫运动是反动的封建君主的运动，它旨在将哈萨克人民拉向倒退，巩固封建宗法制度，恢复中世纪汗的政权，使哈萨克斯坦脱离俄国以及俄罗斯人民。"①

1954年适逢俄国兼并乌克兰300周年，苏联共产党中央为此于12月1日公布了《乌克兰同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1654~1954）纪念提纲》，大力宣传合并有利于乌克兰的进步和发展。从此，"自愿归并"的提法被用来解释俄国对其他地区和民族，包括中亚各族的征服。

进入60年代以后，苏联报刊杂志上宣传各民族"自愿归并"，苏联各民族正在走向"接近"及其"进步意义"的文章明显增多。1962年苏联《历史问题》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和年底召开的全苏联历史科学会议都强调了上述精神。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后一次会议上作报告着重指出："对于某些民族来说，归并俄国在当时是它们免于直接从肉体上被消灭的惟一途径。历史学家从广阔的历史前景着眼来说明各族人民归并于俄国的进步意义，有助于我国各族人民友谊的巩固和苏联各民族的进一步接近。"②1964年8月，赫鲁晓夫在中亚各地巡视的时

① 哈萨克学院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第1卷，第321页，阿拉木图1957年俄文版。

② Б.Н.波诺马廖夫：《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历史学领域干部的培训》，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63年第1期，第16~17页。

候，亲自宣扬“吉尔吉斯自愿加入俄国“的论调。

苏联对各民族地区加强政治思想方面的控制还是不能杜绝中亚地区突发事件的发生。1959年7月29日，在哈萨克共和国卡拉干达市附近铁米尔套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工地爆发了大规模工潮，共有2万余人参加。工人们从事超强度的劳动，却长年栖身在简易工棚里，食品匮乏，连供水也经常中断，于是他们聚众请愿，最后酿成一场骚乱。愤怒的人群捣毁了商店，抢走了食品。“夜里，军队开进了城市，开枪抓人，并宣布宵禁。嗣后，开庭审判了制造动乱的‘肇事者’。”[①]勃列日涅夫奉命来到这里平息事态，在强硬态度不能见效的情况下，他只得许诺惩治那些因失职造成混乱的干部。结果，包括卡拉干达州党委第一书记和哈萨克冶金联合企业经理在内的一批官员被撤职，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哈萨克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也受到严厉批评和处分。

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在斯大林时期遭到非法镇压的中亚各级党政官员、知名人士直至普通群众基本上都恢复了名誉。例如，原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人费祖拉·霍贾耶夫和伊克拉莫夫，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米尔佐扬和伊萨耶夫，塔吉克共和国领导人拉希姆巴耶夫，土库曼共和国领导人阿塔巴耶夫、阿伊塔科夫，以及原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图拉尔·雷斯库洛夫、科列索夫等都平了反。许多还在服刑的人也陆续被释放。到赫鲁晓夫执政年代，苏联政府对犯有各类“政治错误”的人不再实行清洗镇压，即使被当局视为犯了“地方民族主义”错误，一般也只是从政治上进行处理和处分。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变动十分频

① H.A.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4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繁，有的人迅速得到提升，很多干部调进调出，还有不少人被降级、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受处分的人当中有些是犯了“民族主义”错误，有些是其他错误或工作失职。这与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关系甚大。赫鲁晓夫在干部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破除干部终身制。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在例行选举时都要更换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成员，并且就撤销党的各级委员会成员的职务问题做了相应规定。[①]但是，无论在处分犯错误或不称职的干部或提拔有政绩的干部方面，赫鲁晓夫并没有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和程序，因此，在处理和安排中亚各共和国民族干部时，他往往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1954年2月，赫鲁晓夫以反对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开垦荒地为由，撤换了哈萨克共产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哈共中央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被降职，担任南哈萨克奇姆肯特州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6月又被撤职）；第二书记阿丰诺夫（И.И.Афонов）也被贬职，担任巴甫洛达尔州党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文化部部长（原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П. К. Пономаленко）担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二书记。在随之召开的哈萨克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沙亚赫麦托夫被指责的错误包括：一知半解，任人唯亲，还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领导方法”。[②]

1955年3月，波诺马连科被调离哈萨克共和国，出任苏联驻波兰大使，勃列日涅夫代理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8

① 见《苏联共产党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载《新华月报》1961年第12期，第179页。

② 约翰·多恩伯格：《勃格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第166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月，他正式当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哈萨克共和国担任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走向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勃列日涅夫1906年生于乌克兰卡缅斯克城（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一个俄罗斯工人家庭，1931年成为联共（布）党员。卫国战争期间，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战后历任乌克兰州的党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大林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失去中央的职务，降为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接着调到哈萨克共和国任职。在哈萨克共和国工作期间，勃列日涅夫因主持开垦荒地有功而获得列宁勋章。1956年2月，他出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从此步步高升。1957年6月，因支持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0年5月，接替伏罗希洛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7月，米高扬又接任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

1955年3月，哈萨克共和国政府首脑易人。泰别科夫（Елубай Тайбеков）被解除哈萨克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学院院长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 Кунаев）接任。库纳耶夫从此一直长期担任哈萨克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还是勃列日涅夫的亲密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

赫鲁晓夫在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经常到苏联各地视察、参观。他曾多次到过中亚各共和国，与各共和国领导人相当熟悉。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针总的来说是支持的。在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都支持了赫鲁晓夫，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后来因各种原因对他的支持者们进

行处分。

1957年6月，在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中亚五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都发了言，他们一致谴责“反党集团”的成员企图撤换赫鲁晓夫的阴谋，完全肯定赫鲁晓夫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线”，说中亚各族人民和各级党组织“无限热爱和充分信任苏共中央及其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穆希金诺夫（Н. А. Мухиткинов）在发言中是这样颂扬赫鲁晓夫的：“他和各地的积极分子保持着联系。他经常到各州、各地进行分析，提出很高明的建议，帮助地方单位。”[②]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И. Д. Яковлев）赞扬赫鲁晓夫说：“他在党内工作几十年，……他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位党和国家重要的活动家，是一位出类拔萃、有胆有识的组织者和革新家。”[③]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巴巴耶夫在会上说：“土库曼斯坦党组织和共和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热爱和高度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并完全拥护我党在赫鲁晓夫同志领导下奉行的列宁主义政策。”[④]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尔贾巴耶夫（Т. Урджабаев）在发言中表示：“塔吉克斯坦的党组织忠于我们列宁党的领袖的组织者的旗帜。”[⑤]发言最起劲的要数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扎科夫，他除了颂扬赫鲁晓夫和要求撤销“反党集团”成员的职务以外，还提出要严惩背叛赫鲁晓夫的布尔加宁和批判支持“反党集团”的伏罗希洛夫。结果，他的发言赢得了“暴风雨般

①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47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46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55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④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69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⑤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80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的掌声”。[1]这些发言虽然反映了他们的真实立场，但是言语之中不无吹捧之意。这是苏联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现象。不过，中亚五个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尽管争相赞颂赫鲁晓夫，他们的结局，不是受到了严厉处分，就是降了职。

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穆希金诺夫比较幸运，1957年12月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从乌兹别克调往莫斯科工作。但是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只是一名中央委员，后来默默无闻。1958年，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巴巴耶夫因主张土库曼共和国所有重要职务首先应由土库曼人担任而被免职，他和他的一批拥护者最后被开除出党。

1961年4月16日，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解除第一书记乌尔贾巴耶夫的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同时，塔吉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多胡多耶夫（Н. Донудоев）、塔共中央第二书记奥勃诺索夫（П. С.Обносов）受到同样的处分。乌尔贾巴耶夫与多胡多耶夫的错误是在棉花收购方面搞虚报，“欺骗党和国家”。奥勃诺索夫的错误则是在政治上的“无能和无原则”。5月，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扎科夫因“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被解职。据说他赞同在吉尔吉斯的俄语学校中把吉尔吉斯语定为必修课，在高等学校为吉尔吉斯族学生保留一定名额。

调换最厉害的是哈萨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在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11年时间内，哈共中央前后换了七位第一书记。最初是沙亚赫麦托夫，接下来是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调莫斯科以后，哈共中央第二书记雅科夫列夫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1957年，雅科夫列夫因农业歉收被解职，赫

[1]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716–71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鲁晓夫让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别利亚耶夫（Н.И.Беляев）来哈萨克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别利亚耶夫本是赫鲁晓夫的追随者，1955年7月升任中央书记，在反对“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斗争中特别卖力，又升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被打发去了哈萨克斯坦。1959年的铁米尔套工人骚乱断送了别利亚耶夫的前程。1961年1月21日，别利亚耶夫被解除哈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调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5月，他被解除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6月，他又失去了最后一个领导职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接替别利亚耶夫出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是哈萨克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但是哈萨克共和国1962年的粮食收成仍不理想，当年12月库纳耶夫被解除哈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也有人说他是靠私人关系不断升迁的），仍然当他的部长会议主席，南哈萨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伊·尤苏波夫（И.Юсупов）继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因此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于1964年12月让库纳耶夫重新当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直至1986年12月被戈尔巴乔夫撤职。

纵观赫鲁晓夫时期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安排情况，可以看出，除哈萨克共和国以外，其他四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民族成份构成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什么变化。这四个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均由当地民族干部担任（与斯大林时期相比，这些人尤其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权力有明显增强，地位也提高了，例如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两任第一书记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他们的第一副手是俄罗斯人。哈萨克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直由哈萨克族干部担任，但是党中央第一书记变动较大，7人当中只有沙亚赫麦托夫和库纳耶夫是哈萨克人，尤苏波夫是

维吾尔人，波诺马连科是白俄罗斯人，其余勃列日涅夫、雅科夫列夫、别利亚耶夫3人都是俄罗斯人。因此，哈萨克斯坦当代史学家对这些领导人评价不高，说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哈萨克民族的经济、文化和传统”。[①]

总的来说，俄罗斯人（及其他斯拉夫人）在中亚各共和国干部中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1958年，他们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占了58.4%，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占31%，在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占34%，在土库曼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占38.5%，在塔吉克共和党中央委员中占25.3%。[②]但是，在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机关中，当地民族干部的比例要明显高一些。例如，在1955~1964年间的哈萨克共和国，“哈萨克人占共和国州、市、区党委书记的半数，虽然他们仅占党员总数的百36%，人口总数的30%”。[③]

许多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实施的极不稳定的干部政策是导致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政策首先反映在1961年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定期改选相当大比例领导干部的规定中。其次，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州和边疆区一级的党委会一分为二，成立平行的两个党委会——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④]这些政策，再加上赫鲁晓夫处理领导干部时的“冲动”和“随意性”，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不满。结果当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绝大多数委员决定免掉赫鲁晓夫的职务时，没有几个人为他辩护。出席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中亚五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分别是：哈萨克共和国的

①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194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106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③ 泽夫·卡茨主编：《苏联主要民族手册》，第301~30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第55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尤苏波夫、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沙拉夫·拉希多夫（Шараф Рашидов，此人于1961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直到1983年自杀身亡）、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乌苏巴利耶夫（Турабай Усубалиев）、土库曼共和国的奥维佐夫（Бальш Овезов）、塔吉克共和国的拉苏洛夫（Джабар Расулов），他们都是赫鲁晓夫提拔上来的，但是他们一致赞成罢免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

第三节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亚的经济发展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经济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得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由于赫鲁晓夫急于求成，许多改革措施出台突兀，难以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因此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决心很大，却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结果不少改革措施推行不久又得往回收缩，这样反反复复，不仅严重制约了苏联经济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而且使得人们对赫鲁晓夫及其改革逐渐失去了信心。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就是在这么一种复杂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因当时农业的形势十分严峻，1953年苏联谷物收购量为3110万吨，而用于居民供应和国家其他需要的谷物则为3240万吨。[①]而且，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相对简单，所以改革的难度要小一些，容易见到成效。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包括：放宽对农民自留畜的限制、扩大集体农庄某些生产经营自主权、变卖拖拉机站、废除义务交售制、

① В.И.库利科夫：《垦荒在增加苏联谷物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载苏联《历史问题》，俄文版，1979年第3期，第8页。

取消集体农庄债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还有，赫鲁晓夫极力倡导与中亚哈萨克斯坦关系甚大的垦荒运动。

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的改革主要是坚决下放经济决策和企业管理权力。根据1957年2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5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决定撤销绝大多数管理经济的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在苏联成立若干个经济行政区，把工业及建筑业的管理权由各部转到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苏联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由过去联盟中央为主变为以地方为主。但是，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期，苏联又通过各种形式逐渐回到以联盟中央管理为主的经济体制。

在这期间，苏联政府以便于开展经济建设为由，对中亚部分共和国的领土进行了调整，为了增加乌兹别克的棉花生产，苏联政府决定把哈萨克斯坦南部适宜种植棉花的饥饿草原大部分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共和国。1956年1月，哈萨克最高苏维埃按苏联政府的意图发布命令，决定把总共10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转让给乌兹别克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则把500平方公里转让给塔吉克共和国）。不久，哈萨克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边界线也作了调整。1963年1月，根据苏联政府的安排，哈萨克共和国再次让出4.09万平方公里土地，结果乌兹别克共和国得到4.07万平方公里，土库曼和塔吉克共和国各得100平方公里。这种做法就是1961年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所作的断言——“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①]

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亚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过一些重要变更，而且都出于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考虑。第一，中亚地区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划分出若干个经济行政区。1957年，苏联划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其中哈萨克共和国9个，乌兹别克

① 见《新华月报》，1961年第12期，第166页。

共和国4个，其他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三个共和国各一个。后来经过改组，又成立了大经济区。1963年2月，哈萨克共和国成为一个大经济区，中亚其他四个共和国则合并为一个大经济区——中亚经济区（1964年12月取消）。这些经济行政区的划分并没有完全考虑原有行政区划，在地域上是交叉重叠的。从而引起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共和国、州的管理机构的冲突。后来，共和国（及州）的管理权限越来越多。

第二，中亚各共和国内部行政区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主要的是哈萨克在共和国与州之间设置了某些边疆区。首先是为了协调北部各州的垦荒工作，1960年12月成立切利诺格勒边疆区，行政中心设切利诺格勒市（意为垦荒城，由阿克莫林斯克改名而来，即今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边疆区辖切利诺格勒、科克舍套夫、库斯塔奈、巴甫洛达尔、北哈萨克（原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五州。后来陆续成立了西哈萨克边疆区（辖阿克纠宾斯克、乌拉尔斯克和古里耶夫三州，行政中心设阿克纠宾斯克城）和南哈萨克边疆区（辖江布尔、奇姆肯特和克孜勒—奥尔达三州，行政中心设奇姆肯特）。这样，哈萨克共和国一半以上的州纳入了边疆区体系，这种行政设置到赫鲁晓夫下台后取消了。

为了垦荒增设一级行政区，足见垦荒一事与哈萨克共和国的关系有多么密切。因为在苏联领导人（像当年斯托雷平那样）看来，广袤无垠的哈萨克大草原简直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土地资源宝库。

为了解决苏联粮食短缺的问题，赫鲁晓夫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开垦荒地、增加耕地这么一个最简捷的途径来增加粮食产量。而且他把这种想法马上付诸实施。1954年3月2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关于进一步增加全国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熟荒地的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规

定1954~1955年内垦荒面积不少于1300万公顷，收获11~12亿普特谷物，其中要有8~9亿普特的商品粮。[①]而且，规模如此巨大的开垦还只是一个“开端”。决议发布以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马上在全国组织史无前例的大垦荒运动，哈萨克大草原顿时热闹起来了。

赫鲁晓夫当然早就知道哈萨克斯坦有大片可供开垦的荒地。他曾经询问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哈萨克斯坦有多少土地宜于开垦，后者的回答是300万公顷。赫鲁晓夫一听，认为沙亚赫麦托夫不诚实，于是在同哈萨克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谈话以后，做出了成倍扩大开垦规模的决断。此外，赫鲁晓夫认定，沙亚赫麦托夫之所以反对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垦荒，是因为他“染上了民族主义病菌”，害怕非哈萨克族居民大量涌进他的共和国。[②]为了清除障碍，赫鲁晓夫马上决定撤换哈萨克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哈萨克共和国新领导人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到任后，哈萨克斯坦开垦荒地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其实在此之前，哈萨克斯坦一直在开垦荒地，而且规模也不算小。远的不说，仅1946年到1953年，苏联就在哈萨克斯坦开垦了将近370万公顷荒地，从而使其耕地面积由604万公顷增加到972万公顷。[③]但是，苏联这一次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垦荒规模却是有史以来历年开垦总和都望尘莫及的。

在哈萨克草原大规模垦荒困难极大，这里人口稀少，没有城镇，没有现代交通，时间又极为紧迫（苏共中央规定，要在1954年6月1日前划定以供开垦的地段）。因此，苏联共产党和政

①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② 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198~199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1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府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和宣传鼓动，从苏联欧洲各地动员了数十万人（其中多为青年，也有不少工程技术人员）来到荒无人烟的哈萨克大草原。首批垦荒队伍到达时，草原上的春雪还没有融化，垦荒者支起帐篷就工作起来了。

为了使荒地尽早垦殖，当年产粮，苏联政府为垦荒者拨运了成千上万的军用帐篷和大批农用机械。在最初三年间，有18万多台拖拉机、约7万台联合收割机、6万台播种机以及其他机器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

由于基本上是依靠外来移民在国家储备土地上开荒，因此在哈萨克草原上组建了一批又一批的国营农场。在垦荒年代一共建立了500多个新的国营农场，而且每一个农场基本上都是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垦荒者组成。例如，在头两年，乌克兰人在哈萨克斯坦共组建了54个国营农场，白俄罗斯人组建了22个农场，摩尔达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各组建了4个农场，来自莫斯科的垦荒者组建了46个国营农场。[①]

经过广大垦荒者的辛勤劳动，仅在1954年，哈萨克斯坦北部几个州开荒的规模达到800万公顷，占到苏联当年开荒总面积（1900万公顷）的四成多。1954~1956年是苏联大垦荒的高潮年份，共开垦荒地3230万公顷，其中哈萨克斯坦就占了1990万公顷，为苏联垦荒总面积的62%。1957~1960年，哈萨克斯坦又新垦荒地560万公顷，占苏联同年垦荒总面积（950万公顷）的59%。[②]哈萨克共和国开垦荒地总面积达到2550万公顷，比英国全国面积还要大。

垦荒开始的1954年当年，垦区就生产出了可观的粮食。1950~1953年，哈萨克共和国的谷物年平均产量为25100万普特，

①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14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485~486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其中国家收购量为11200万普特。垦荒后的1956~1959年，哈萨克共和国谷物的年平均产量猛增到114800万普特，其中国家收购量达72400万普特。[①]从而使哈萨克超过乌克兰成为苏联第二大产粮共和国（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粮食的商品率则跃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首。

大规模开荒的结果使哈萨克斯坦北部成为苏联最大的小麦集中种植区，哈萨克共和国成为其他多种农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哈萨克斯坦的牧业生产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1954年初牲畜存栏2470万头，1958年初增至3030万头。[②]在由外来移民组建的国营农场里，生猪的饲养量得到迅速增加。

经过几十万垦荒者历时数年的艰辛劳动和努力建设，不仅开垦了哈萨克共和国数千万公顷土地，每年为苏联全国提供数亿普特的商品粮，而且完全改变了垦区的面貌。成百上千的新居民点（有固定住房的农场新村）以及农机站、粮仓等建筑物很快出现在草原上。后来，垦区还陆续建成了许多农产品加工厂、供电站、学校、医院、幼儿园、农业科研机构、俱乐部、商店等配套设施，出现了一些新兴垦区城镇。而且，通往各个垦区的公路很快就通车了，甚至还修建了窄轨铁路和小型机场。勃列日涅夫后来在其《处女地》一书中写道："垦荒有力地推动了哈萨克斯坦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日益发达。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工业中心，兴起了90个新城市。"[③]这里当然有评功摆好的意图，但是多少也反映了垦荒运动使哈萨克共和国经济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的事实。

① 《垦荒在增加苏联谷物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载苏联《历史问题》，俄文版，1979年第3期，第9页。

② В.Я.涅波姆宁等：《跨越资本主义》，第107页，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492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赫鲁晓夫尤其欣赏大垦荒这个得意之举。他事前对垦荒寄予厚望，结果也使他十分满意："迄今为止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就，是我们决定发动的垦荒运动。"[①]他先后6次亲临哈萨克斯坦垦区视察，最后一次视察（1964年8月），还专门带上了英国《泰晤士报》的发行人。他们登上专用列车，跑遍了哈萨克垦区许多地方。在视察过程中，赫鲁晓夫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在哈萨克的这次旅行中，饱受了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也许是由于这次旅行非常适时，因为在1964年，我就要同我作为党的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的长期政治生涯告别了。我所到之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浪滚滚，好像波涛在风中翻滚一样。到处是善良、忠厚人们身上的汗水香气。农民在田里干活时发出欢笑声。他们感到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在为国家劳动——也因为他们知道丰收意味着能得到高额收入。我看到出现了不少新的村庄；房屋是简朴而舒适的；门前有小孩子在玩，并且种有花草。"[②]

这些诗意般的描写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现实，但是反映了赫鲁晓夫对哈萨克垦区的人民和土地的真挚感情。事隔多年以后，赋闲在家的赫鲁晓夫还念念不忘他的垦荒创举："只要一提起我在哈萨克经历过的事情，我就会又一次感到快乐和兴奋。我多么喜欢沉浸在这些回忆中啊！垦荒运动表明，只要我们党相信人民，它就会强大无比。生荒地实际上是我们的救星。……生荒地使我们能够度过最坏的时期，这并不是说笑话。"[③]

其实，赫鲁晓夫首倡的垦荒运动并不像他描述的那么美好，它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赫鲁晓夫在台上时对这些问题也多少了解一些，只是他认为垦荒运动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次要"的，因而没有认真考

① 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198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210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212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虑这些问题的长远影响。

今天看来，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哈萨克草原大规模开垦荒地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次垦荒运动虽然从表面上看是按照国家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的，但是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为了解决粮食严重短缺的燃眉之急的仓促行动。1954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垦荒的决议，当年就有几十万垦荒者开进了没有人烟的草原，因此缺乏相应的规划和论证，许多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有时简直就是乱挖滥垦。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有些开垦的土地并不宜耕种，于是就“另找一块新地”翻耕起来，因为“哈萨克有的是土地”。[①]这样的结果导致土壤严重风蚀沙化。由于草原翻耕以后表土裸露，而哈萨克斯坦风力强劲，一旦刮起强风，肥沃的表土就会被卷走，形成沙尘暴。这种现象最初发生在巴甫洛达尔州垦区，那里1957~1958年连续出现沙尘暴。到1960年，哈萨克斯坦共有900万公顷耕地受到沙尘暴威胁。[②]尽管后来采取了防范和治理措施，但是无法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据一位美国学者估算，这些年苏联每年因风暴而丧失的表层土壤达23亿吨[③]，肯定其中大多数是哈萨克斯坦的草原表土。失去表层土壤以后，土地的肥力和保墒能力急剧下降，因此在1960~1985年的25年中，哈萨克斯坦有23年发生了旱灾。[④]

垦荒运动的第二个后果是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哈萨克斯坦开垦的大片荒地靠天吃饭，由于旱灾和沙尘暴越来越来越频繁，加上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垦荒的经济效益总的来说呈递减趋势。哈萨克草原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但是由于垦荒者采用粗放耕

① 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204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② Е.К.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93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③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8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④ Е.К.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93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作，因此单产不高。1954~1958年，垦区小麦年均单产为每公顷7.3公担，1961~1965年的年均单产更降至每公顷6.1公担。[①]

1962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严厉批评了哈萨克共和国的农业现状，计划任务“完成得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规定这个共和国1961年生产13亿普特谷物，实际生产了9亿普特，而采购的谷物只有4.58亿普特，占计划的57%”。畜牧业生产也没有完成任务。[②]实际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订的七年规划（1959~1965年）农业指标太高，苏联垦荒区只有一年的谷物产量达到了指标。[③]1953~1963年十余年期间，哈萨克共和国的谷物产量情况如下表所示：[④]

年份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产量（万吨）	540	770	480	2350	1060	2200	1910	1870	1470	1590	1060
每公顷单产（公担）	7.7	9.1	2.9	10.6	4.6	9.4	8.7	8.5	6.6	6.5	4.4

这是整个哈萨克共和国的谷物生产情况，产量波动幅度极大，1963年的总产、单产都不如大丰收的1956年和1958年，而垦区谷物产量的波动完全决定了共和国产量的递减趋势。

关于苏联垦荒所取得的经济效益问题，在苏联国内存在着很不一致的看法。有的苏联学者计算出，1954~1960年苏联垦区上缴给国家预算76亿卢布，获得纯收入32亿卢布，因此得出了

①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9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第529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③ 罗·亚·麦德维杰夫等：《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第11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Edwa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rule.），英文版，第30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大规模垦荒“在经济上也是极为有利的”结论。[①]这个结论，当然同样适用于苏联最大的垦区——哈萨克斯坦。中国也有学者根据有关资料计算出，哈萨克斯坦的垦荒“不但没有赔本，而且有利”。[②]但是，有多位哈萨克斯坦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

1992年出版的《哈萨克斯坦历史》一书的作者认为，那种关于垦荒赢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统计学”中至少没有把从全苏联各地来帮助收获庄稼的劳动力费用和消耗的大量能源（油品）列入成本。[③]1998年出版的著作《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的作者们，进一步列举了外来劳动力的数量，例如在大丰收的1956年，约有1.2万名联合收割机手和2万名司机驾驶着他们的收割机和卡车来哈萨克斯坦帮助收获，还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数以千计的运输兵以及数以千计的现役和预备役军人，有时在哈萨克斯坦田野上劳动的人达到100万。[④]

但是，哈萨克斯坦学者们提出的关于垦荒带来了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他们认为，垦荒使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哈萨克斯坦，使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成了“少数民族”，从而给哈萨克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造成了“现实的威胁”，也是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族际关系紧张的根源。[⑤]垦荒确实使哈萨克族人口在本共和国的比例相对下降，这在垦区尤其明显。1962年，哈萨克垦荒区——切利诺格勒边疆区约有300万居民，其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了60%，德意志人占12%，哈萨克人仅占

① 《垦荒在增加苏联谷物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载苏联《历史问题》，俄文版，1979年第3期，第9页。

②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14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39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④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49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⑤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94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19%。[①]

但是，外来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多民族杂居并非必定会引发族际冲突，关键是看苏联政府实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怎样处理各民族间出现的摩擦和矛盾。只要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实行符合多民族杂居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就不会出现大的民族问题和纠纷。平心而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及后来相当长时期内，哈萨克斯坦垦荒区的民族矛盾比中亚其他地区还要缓和一些。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国内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但是由于处理得当也逐渐缓解下来了。

1953~1964年期间，中亚除哈萨克之外的其他四个共和国农业发展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随着苏联对这四个共和国农业投资的增加（1956~1960年的农业投资占全苏联农业总投资的8.8%，哈萨克共和国同期占10.8%[②]），中亚的棉花生产获得长足发展，同时兴修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亚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三个共和国棉花产量占到全苏联的83.8%，其中乌兹别克共和国占65.4%，塔吉克共和国占10.1%，土库曼共和国占8.3%。[③]1960年，中亚地区籽棉总产量达到384万吨，占苏联籽棉总产量429万吨的89.5%，每公顷单产达到20公担。[④]棉花增产幅度在最主要的产棉区乌兹别克共和国也最为明显。1950年，乌兹别克共和国种植棉花约100万公顷，1963年增加到162.8万公顷，籽棉总产量高达368.9万吨，每公顷单产22.7公顷。不过，1963年是中亚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rule.），英文版，第307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594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589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④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7卷，第44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98~9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少有的棉花丰产年。1965年，乌兹别克共和国产棉360万吨。[①]

中亚棉花产量增长除了其他原因（如扩大种植面积、改良品种和耕作技术等）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兴修了一大批水利灌溉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1954年动工兴建的卡拉库姆列宁运河灌溉体系。这是一项引阿姆河水灌溉土库曼境内沙漠绿洲的宏伟工程。运河一期工程是从阿姆河上博萨卡取水口至马雷绿洲，1959年完工。二期工程从马雷修到捷詹绿洲，1961年完工。三期工程从捷詹到阿什哈巴德，1962年竣工。这条水利大动脉全长将近1000公里，灌溉面积达40万公顷。此外，南草原上的灌溉网、阿姆河—布哈拉干渠、查尔朱—卡拉库尔干渠、楚河运河、引泽拉夫善河水的灌溉网，以及锡尔河、穆尔加河、捷詹河上还有塔吉克山区河流上许多水库都在开工建设，其中不少工程在1964年以前建成并通水。

中亚的畜牧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其中哈萨克斯坦发展较快。到50年代末，哈萨克共和国肉、毛、奶等畜产品产量以及一些主要牲畜的存栏数都达到或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从而扭转了自农业集体化运动以来牲畜业生产长期不景气的局面，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在哈萨克斯坦的畜牧业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②]中亚其他共和国的畜牧业发展相对缓慢一些，但是60年代初也开始走出了畜牧业生产长期衰退徘徊的境地。不过，中亚畜牧业的发展达不到苏联"国家计划"的年份也是常有的。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亚各共和国的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不过相对苏联大多数地区同期发展速度来说，中亚地区又算是慢一些了。1951~1955年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欧洲部分老工业区和战时沦陷区的工业投资居高不下，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rule.)，英文版，第291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②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1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而包括中亚在内的东部地区投资比重有所下降。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指示，重新提出了加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发展）的任务："加速开发我国东部地区的富饶的天然资源。保证西伯利亚西部和东部以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建设速度高于全国基本建设的总和速度。"[①]1959年2月9日，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决议，从而把执行中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和下一个五年计划统一起来。决议再次强调："在今后七年内， 生产力配置的主要改变，首先是为了加速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②]但是，从中亚地区在这期间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苏联共产党制定的上述任务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和落实。

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到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苏联对中亚地区的工业投资比重有所增加。哈萨克共和国在1951~1955年期间得到的工业投资占全苏联的3.8%，1956~1960年则上升到4.9%；其他四个共和国相应的比重分别为：乌兹别克1.4%和1.9%，吉尔吉斯0.7%和0.6%，塔吉克0.6%和0.5%，土库曼0.7%和0.7%。[③]就投资总量的增加来说，中亚多数共和国的幅度还是很大的。1951~1960年间，哈萨克共和国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4.5倍，增幅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首，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共和国增长了3倍，居第三、第四位，只有土库曼共和国的增幅低于全苏联的平均值。

但是中亚地区的社会总产品增长量却没有达到相应指标，而是远远落后于苏联西部的几个共和国。[④]这期间，中亚地区工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3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下册），第124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582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④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593~594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低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平均增长速度。196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50年的3.03倍；同年，哈萨克共和国工业产值相当于1950年的3.16倍，乌兹别克共和国相当于1950年2.30倍，吉尔吉斯共和国相当于1950年2.88倍，塔吉克共和国相当于1950年2.85倍，土库曼共和国相当于1950年2.35倍。中亚工业生产这种较全苏为低的增速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也没有得到改变。上述情况说明：要么是中亚地区工业生产效率比较低下，要么是许多投资巨大的大型工程到此时尚未发挥生产效益，或者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亚地区建成了数以百计的重要企业，其中仍然以哈萨克共和国建成的企业最多，乌兹别克共和国次之。中亚地区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设计年产350万吨钢铁的哈萨克卡拉干达冶金工厂第一座大型高炉点火生产。工厂建在卡拉干达附近的铁米尔套。为配合这个钢铁厂的建设，在库斯塔奈州鲁德内建成了大型铁矿采矿选矿企业。哈萨克共和国境内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和库斯塔奈的矿山机器厂相继投产。为了满足垦荒的需要，巴甫洛达尔建成了联合收割机厂，大型拖拉机厂也在加紧建设，江布尔化肥厂竣工，奇姆肯特化肥厂进行大规模扩建。

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奇尔奇克河上法尔哈德等17个梯级水力发电站全部建成，总装机40万千瓦。塔吉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一批大型水电站（如凯拉库姆水电站）已经动工。

到60年代初，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苏联许多工矿产品的重要产地之一。1963年，哈萨克共和国生产煤炭3835.6万吨，石油158.1万吨，铁矿石1250万吨，生铁137.6万吨，钢42.55万吨，发电149.1亿度。[1]其中有些产品比十年前成倍、

[1]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rule.），英文版，第344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成十倍增长。到60年代初期，哈萨克经济区仍然是苏联最大的有色金属产地，煤炭和电力生产居苏联各大经济区的第三位。中亚经济区（其他四个共和国）的棉纺织和丝织工业居全苏联第二位。此外，中亚开始成为苏联重要的天然气和石油产地。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加兹利大气田投产，1965年天然气产量达165亿立方米，所产天然气除了供应中亚各大城市以外，1963年还修通了到车里雅宾斯克的输气管道，向乌拉尔工业区大量供气。土库曼共和国西部的天然气田也开始大规模开发。1963年土库曼共和国石油产量达到780万吨，为1940年产量58.7万吨的13倍多[1]，成为中亚最大的产油地，在全苏联也占有一席之地。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阿尔马雷克铜矿1963年竣工投产。吉尔吉斯共和国成了苏联稀有金属的重要产地之一。这期间在中亚还建成了许多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企业和项目。

1953~1964年是战后中亚铁路建设发展较快的年代。随着切利诺格勒到乌拉尔钢城马格尼拉哥尔斯克铁路竣工，南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此外，哈萨克斯坦境内通往恩巴河油田和曼格什拉克半岛工矿区的铁路通车。查尔朱至昆格勒的铁路干线于1956年铺通，还修通了铁尔梅兹经艾瓦季到杜尚别的铁路绕行线。1959年，从土西铁路上的阿克斗卡到中国边境阿拉山口的铁路建成了。在这些年，中亚地区大部分铁路完全使用内燃机车，从1957年起苏联停止了蒸汽机车的生产。

中亚地区公路建设也取得了可观成绩。其中，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共和国境内公路通车里程更是成倍增加。阿拉木图—伏龙芝—塔什干—铁尔梅兹建成了高等级公路，杜尚别至霍罗格的帕米尔高原公路经过改建等级明显提高。

此外，塔什干机场扩建成大型国际机场，有飞往印度和中

① 爱德华·艾耳渥斯：《俄国统治中亚一百年》(Allworth, Edward,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rule.)，英文版，第335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东国家的定期航班。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还是老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部门中原材料和燃料的生产以及轻工纺织初级产品占的比重很大。例如，中亚生产了全苏联83.8%的棉花，棉布的产量却只占全苏联的8.1%，而消费量占到22.5%。

这个时期中亚经济布局中一个新的问题显得突出起来。中亚工业最发达的哈萨克斯坦北半部地区与中亚其他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联系远不如与俄罗斯联邦紧密，那里的工矿产品绝大多数运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进行深加工。

此外，这期间中亚建成了苏联最重要的宇宙航天基地。1955年，苏联在哈萨克杰兹卡兹甘以西的荒原上兴建航天发射中心，命名为秋拉塔姆科学研究试验场-5，1961年改名为拜科努尔。经过多年建设，拜科努尔基地成为拥有许多套发射装置、火箭和卫星组装车间、航天燃料站、测量站以及机场、专用铁路等设施的世界一流的航天基地。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也是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成功发射。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Ю. А.Гагарин）乘坐“东方号”宇宙飞船从拜科努尔升空，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太空旅行。此外，苏联在拜科努尔发射了数以百计的卫星、飞船和太空轨道站、外太空探测器等。拜科努尔也是苏联新型导弹武器的发射试验场和发射场。1957年8月，在这里开始进行远程弹道导弹发射试验。1958年3月29日，洲际导弹第一次发射成功。

拜科努尔记录了苏联航天事业的光辉历程，同时也发生过一些重大事故。1960年10月24日，拜科努尔发射新型的Р-16洲际导弹时酿成一场大惨剧：导弹在发射塔上发生意外爆炸，引发熊熊烈火，现场有74人葬身火海，其中包括苏联新组建的战略火箭部队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涅杰林（М.И.Неделин）

和电子技术专家叶弗列莫夫（Д. В.Ефлемов）等人。总设计师扬格利（М. К .Янгель）因临时离开而幸免于难。1971年6月底，“联盟-11号”宇宙飞船返回地面时出现故障，飞船降落在拜科努尔以后才发现宇航员已经身亡。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继续租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

第八章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中亚党政机构的膨胀和干部问题

1964年10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同意赫鲁晓夫“辞职”。当天下午，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一个简短而意义非同一般的决议，全文如下：“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①

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公报，批准赫鲁晓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任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这样，就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Л.И.Брежнев）、柯西金（А.Н.Косыгин）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为中心的苏联新的领导集团。由于苏联的政权体

①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第62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制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因此身为苏联共产党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最高领导层处于领导地位。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勃列日涅夫也像他的前任赫鲁晓夫一样，陆续排除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步一步地确立起自己在苏联的个人领导地位。于是，苏联历史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勃列日涅夫确立个人领导地位的进程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要平和得多，表面上看不出发生过激烈的斗争。1965年12月，70岁的米高扬辞职，原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Н.В.Подгорый）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6年春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改名为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地位明显上升。

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最高职位上，勃列日涅夫陆续排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牢固确立了他个人对苏联的领导地位。1977年6月，波德戈尔内被迫辞职，勃列日涅夫亲自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①他同时还是苏联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主席。1980年10月，76岁的柯西金因病重辞职，他的副手吉洪诺夫（Н.А.Тихонов）继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本人则在苏联最高领导人岗位上一直待到1982年11月10日去世，终年76岁。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历史上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年代。在勃列日涅夫当政初期，苏联领导集团锐意改革，国力迅速强大，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领导集团明显转向保守，经济衰退，步入了后人称之为“停滞的年代”。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Ю. В.Адропов）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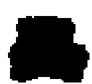
① 因为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时，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一个秘密决定，禁止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见罗伊·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第122页，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

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曾经力图扭转局面，但是15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К.У. Черненко）年迈多病，不思进取，苏联陷入了毫无生气的境况。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М. С. Горбачёв）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之职，苏联历史进入了全面改革时期。

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上台伊始，就宣布了自己的施政大纲。1964年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在欢迎成功返航的宇航员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惟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1]这表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无意对赫鲁晓夫时期确定的大政方针进行根本的修改，不过要看到，在具体政策方面还是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这些调整对苏联以及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是相当重大和深远的。

在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面，苏联领导集团对被认为是赫鲁晓夫"主观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整顿和改正。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把各州、边疆区的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合并为统一的党委会，后来又恢复了统一的工会机构和共青团组织。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各经济行政区和相应的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部门性国家委员会，恢复相应的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统一管理经济。中亚各共和国在苏共中央上述决定通过后，很快就完成了州一级党组织的合并和共和国各部的恢复。此外，哈萨克共和国边疆区一级的行政区划及其机构全部撤销，共和国直接划分为若干个州。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集，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这一时期，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土只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进行过一些细微调整，牵涉到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乌兹别克与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与塔吉克几个共和国之间的边界。调整后哈萨克共和国的面积为271.73万平方公里，除首都阿拉木图外分为19个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面积为44.74万平方公里，除首都塔什干为直辖市外还有一个自治共和国（卡拉卡尔帕克）和12个州；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面积为19.85万平方公里，首都是伏龙芝，另有4个州以及9个直属区；土库曼共和国的面积为48.8万平方公里，首都是阿什哈巴德，另有5个州；塔吉克共和国的面积为14.31万平方公里，除首都杜尚别市以外，还有一个自治州（戈尔诺-巴达赫尚），3个州以及8个直属区。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像苏联全国一样，看上去平淡无奇，死水一潭。官方报道的政治活动尽是些自上而下安排的例行选举，各共和国共产党、苏维埃乃至工会、共青团的代表大会及其他数不清的各种会议，还有就是节日庆典、授勋嘉奖仪式、迎来送往等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对此深有感触，他回忆说："我不能回忆出有哪一年能把时间完全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事务上、工作问题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筹备盛大的节日和隆重的会议上。"[1]就在这一片太平景象下面，苏联包括中亚地区，政治生活中有两种越来越厉害的退行性变化值得注意。

第一种退行性变化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各类机构恶性膨胀。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把赫鲁晓夫时期下放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不断收回到联盟中央而造成的，结果联盟中央的机构不断增加，而共和国和地方的机构并没有减少，相反，

①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为了与联盟中央对口，机构也越设越多。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长期奉行“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老的不退，新的又在提拔，所以，只有靠增设机构来解决。中亚各共和国的党政机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膨胀起来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党政机构最为庞大的年代。首先，苏共中央的常设机构增加了很多，到1982年的时候，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面设了20多个部和办公厅，从党务组织部到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无所不有。苏联部长会议的下属机构就更多了，1982年共有33个联盟部、31个联盟—共和国部、6个联盟国家委员会、14个联盟—共和国国家委员会，还有4个其他部级机关，总共88个机构。[①]苏联最高苏维埃原先除主席团以外，常设机构很少，后来也不断增加。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后，常设机构更多了。1982年，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各有16个常设委员会，而且名称完全相同。此外，还有人民监督委员会、最高法院、总检察院等国家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等20多个社会政治团体。

中亚各共和国虽然没有联盟中央这么多的各类机构，但是列举出来同样令人吃惊。首先看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除了中央局和书记处十多名成员以外，也有十多个部和办公厅。80年代初期，中亚五国共产党中央都设有下列机构：办公厅、党务委员会、党务组织工作部、宣传鼓动部、总务部、行政机关部、商业、计划和财政机构工作部、文化部、科学和学校工作部、建筑和城市事务部、水利和农村建设部、农业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以及机关报社等。有些共和国还设有另一些工业和交通部门。可见，中亚各国党中央不仅设有政治性的部，还有更多的社会性和经济性部门。

① В.Г.帕诺夫主编：《苏联大百科年鉴》（1982年），第11~12页，莫斯科1982年俄文版。

中亚各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机构更多，包括联盟—共和国部或国家委员会与共和国部两类，其中最多的是管理经济的各部。由于苏联已经把重工业基本上收归联盟中央，所以中亚各共和国政府几乎没有设管理重工业的相关部门，共和国境内的重工业企业直接归有关的联盟部管理。

尽管如此，中亚所有共和国不论大小在80年代初都设有基本相同的40多个部或国家委员会。其中联盟—共和国部或国家委员会有：外交部、内务部、司法部、财政部、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肉类和奶品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建筑部、邮电部、农村建设部、农业部、土壤改良和水利部、商业部、采购部、地质部（局）、社会保障部、教育部、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价格委员会、国家劳动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总局）、国家林业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国家电影业委员会、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人民监督委员会以及中央统计局等。属于共和国部的有：地方工业部、居民生活服务部、公共事业部、汽车运输和公路事务部等。有些共和国还设有渔业部、动力和电气化部、森林和木材加工工业部、净棉工业部（局）等。

中亚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的实际职权弱化，表决机器的色彩较浓，除了主席团以外，常设机构很少。但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设了主席和副主席（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副主席），这些职位在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中没有规定，而且主席都不是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成员，所以他们的职权十分有限。同样，中亚各共和国也设有最高法院、检察署、科学院等国家机关和工会、共青团等众多社会政治团体。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包括中亚地区政治生活中第二种退行性变化是片面推行“稳定干部队伍”政策。勃列日涅夫

及其同事认为，干部队伍不稳定从而引起广大干部不满是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以“稳定干部队伍”来谋求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党章》中关于各级党委会在换届选举时必须更换相当比例的成员的规定实际上被废止了。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一共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其中第二十四届、第二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80%以上成为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而《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成员每届要更换四分之一以上。那时苏联的领导干部，只要不犯严重过错并且被“揭露”出来，他就可以安坐其位，而且可以升迁，即使犯了“严重错误”又被人家揭露出来，也很少像赫鲁晓夫时期那样被撤职开除，大多是调离、降职或者体面地退休。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多数领导干部任职时间很长，事实上与终身制相差无几。这种干部队伍“超稳定”的情况在中亚各共和国显得相当突出。

从1964年10月到1985年3月，担任过中亚五个共和国的三个最高职位的领导人（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有36人，其中任职20年（包括在上述三个职位上加起来的时间）以上的有7人，任职10年以上的有11人。这与赫鲁晓夫时期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频频换马恰成鲜明对比。

1964年12月7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尤苏波夫（Исмоил Юсупов）被解除职务，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 Кунаев）重新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直到1986年12月才被免职，总共干了22年（而赫鲁晓夫当政11年间，哈萨克共产党换了7位中央第一书记）。接替库纳耶夫担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是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伊谢巴耶夫（МБейсебаев），他于1970年3月退休。而继位的巴伊肯·阿希莫夫（Байкен Ашимов）当了14年部长会议主席，

直到1984年3月才由纳扎尔巴耶夫接任。从1965年4月开始担任哈萨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萨比尔·尼亚兹别科夫（Сабир Ниязбеков）到1978年2月才退休，任职13年。然后阿卜杜卡里莫夫（Исатай Абдукаримов）、伊马舍夫（Саттар Имашев）先后担任此职。1984年伊马舍夫去世后，原部长会议主席阿希莫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沙拉夫·拉希多夫（Шарав Рашидов）是从1959年3月开始出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直到1983年10月猝死，他在这个职位上总共待了将近25年。接替沙拉夫·拉希多夫担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是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斯曼霍贾耶夫（Инамжон Усманходжаев）。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库尔班诺夫（Рахманкул Курбанов）是1961年上任的，1971年2月被撤职，任职时间长达10年。其后胡代别尔迪耶夫（Нармахонмади Худайбердыев）当了11年部长会议主席，到1984年11月由卡迪罗夫（Г.Кадыров）接任。早在1955年，纳斯里金诺娃（Ядгар Насриддинова）就担任了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70年9月调任他职，前后共15年。接替他的马特恰诺夫（Назар Матчанов）到1978年12月解职也当了8年多。接着，乌斯曼霍贾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将近5年，最后由萨利莫夫（Акил Салимов）接替。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Турдакун Усубалиев）更是一位五朝元老，他从1961年5月出任此职，到1985年11月才卸任，任职时间长达24年。从1961年5月开始担任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马姆别托夫（Б. Мамбетов）到1968年1月由苏尤姆巴耶夫（Ахматбек Суюмбаев）接任。苏尤姆巴耶夫任职将近11年，1978年12月被降职。接替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伊勃莱莫夫（Султан

Ибраимов）1980年12月遭暗杀身亡。1981年1月，杜伊舍耶夫（Арстанбек Дуйшеев）被任命为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库拉托夫（Турабай Кулатов）是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当中任同一职务时间最长的一个，他从1945年9月当选为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直到1978年8月退休，任职长达33年之久。他的继承人任职时间都不长，伊勒莱莫夫到1978年12月当部长会议主席去了，接着杜伊舍耶夫1981年1月也当部长会议主席去了，最后由奥什州党委第一书记科绍耶夫（Темирбек Кошоев）出任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969年12月，担任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已有11年的奥维佐夫（Балыш Овезов）被免去职务，原部长会议主席加普罗夫（Мухамедназар Гапуров）担任土共中央第一书记直到1985年12月，任此职整整16年。加普罗夫是1963年被任命为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1969年12月由奥拉兹穆罕默多夫（Ораз Оразмухамедов）接任。1975年12月，雅兹库利耶夫（Баллы Язкулиев）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978年12月由卡雷耶夫（Чары Каррыев）接替，直到1985年3月去职。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雷切夫（Анна-Мухамед Клычев）是1963年3月当选的，任职15年之久，1978年12月退休，由部长会议主席雅兹库利耶夫继任。

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苏洛夫（Джабар Расулов）自1961年4月就职，直到1982年4月去世，在此岗位上待了21年。接替拉苏洛夫的是原部长会议主席纳比耶夫（Рахман Набиев），他到1985年12月被免职。与拉苏洛夫同时上台的塔吉克部长会议主席卡哈罗夫（Абдулахад Кахаров），到1973年7月由农业部部长纳比耶夫接任，共任职12

年。纳比耶夫当了将近9年部长会议主席，1982年4月由他的副手马赫卡莫夫（Кахар Махкамов）接任。1963年3月，当选为塔吉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霍洛夫（Махмадула Холов）一直任职到1984年，长达21年，然后是帕拉耶夫（Гаибназар Паллаев）继任。

中亚各共和国州一级领导人当中也有不少长期任职的，最突出的典型有阿斯卡罗夫（Асанбай Аскаров）和别克图尔加诺夫（Хасан Бектурганов），他们都是从1959年起在哈萨克共和国任州党委第一书记，直到80年代初期，长达20多年。

苏联及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长期任职甚至实行终身制弊病很多。一是导致干部人数急剧增加，加重国家财政和人民的负担。由于老的长期在位，新人在不断提拔，引起干部总量和机构数目交替上升，结果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人数成倍增加。例如，1981年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多达470人，比第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1966年）成员多出三分之一。中亚各共和国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有些地方甚至更加严重。

弊病之二是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无法胜任本职工作。1981年选举产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14名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晚年的勃列日涅夫老迈昏聩，闹出不少笑话。1980年，勃列日涅夫到哈萨克斯坦参加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纳扎尔巴耶夫目睹当时的情形是："总书记的外表给人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他目光迟钝无神，步履沉重，行走时，身旁总有两个健壮的年轻人搀扶着。"[①]有一次当人们向他祝酒时，他却径直出门钻进了自己的汽车。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后来也一个个成了古稀老人。例如，库纳耶夫下台时已经快75岁了，而在此

①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前不久他还继续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希莫夫67岁刚离开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又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上待了几年。拉希多夫要不是在66岁时因被调查突然身亡，再干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乌苏巴利耶夫66岁还在当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拉苏洛夫是快满70岁的时候在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岗位上病逝的。

弊病之三是许多领导人思想日趋保守和僵化，不思改革进取，而虚荣心却与日俱增。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对如何治国基本上失去了兴趣，只满足于出国访问和国内视察，在盛大的庆典和会议上抛头露面，把一枚又一枚勋章或奖章别在自己胸前。中亚许多领导人何尝不是这样。“在莫斯科权力高层中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毫厘不差地照搬到阿拉木图，而随后又照搬到其他一些州和区。一样的传统、风气、习惯，不论是第一领导人物的打猎爱好，还是他们孩童般追求虚荣的意愿，如把大量的各种奖章装饰胸前，举行豪华的周年庆祝活动等。”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包括中亚地区政治生活中第三种退行性变化就是越来越严重的任人唯亲现象。勃列日涅夫掌权后，把原先不少同事、部属乃至亲戚调到莫斯科，委以重任，最终形成了所谓“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勃列日涅夫曾任该州党委第一书记）。被人们公认为这个“帮派”最重要的成员有：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基里连科（А.П. Кириленк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谢洛科夫（Н.А.Щелоков，内务部长）等，也有人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格列奇科（А.А.Гречко，国防部长）、谢尔比茨基（В.В.Щербицки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里申（В.В.Гришин，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库纳耶夫列入

①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个帮派。此外，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女婿、连襟也当上了苏联政府的部长或副部长。

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各共和国同样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培植亲信。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和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就是这样的典型。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罗·阿·麦德维杰夫（ Р.А.Медведев ）认为：“在勃列日涅夫纵容之下，像库纳耶夫和拉希多夫这类共和国一级的‘领袖’，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不受任何监督的统治。”①

库纳耶夫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是研究有色金属采矿的专家。1942年，库纳耶夫出任哈萨克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任哈萨克科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从此两人成为密友。勃列日涅夫代理哈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库纳耶夫担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0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1962年12月，因为哈萨克斯坦粮食“歉收”，库纳耶夫又回到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1964年12月，刚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久的勃列日涅夫便重新安排库纳耶夫当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直到1986年12月他被免职。如果从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算起，库纳耶夫在哈萨克共和国担任领导人长达31年多。此外，在勃列日涅夫关照下，库纳耶夫在1966年4月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4月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哈萨克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这些地方足以看出库纳耶夫与勃列日涅夫个人关系之密切。

勃列日涅夫也不讳言他同库纳耶夫之间的亲密关系。他曾

① 罗·阿·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第298页，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

几次亲自向库纳耶夫授勋。1982年1月12日是库纳耶夫70岁寿辰，勃列日涅夫亲自批示，把议定授予库纳耶夫的十月革命勋章改为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即镰刀与锤子勋章）和列宁勋章。结果库纳耶夫是惟一一位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共和国领导人。2月25日，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为库纳耶夫授勋举行的仪式上讲话，再次赞扬库纳耶夫，讲话不仅堆砌大量溢美的辞藻，而且语气十分亲昵。全文抄录于下：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我们面临一件喜事——将授予Д·А·库纳耶夫列宁勋章和第三枚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

哈萨克在国民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想特别谈一下谷物生产的稳定增长。这个共和国已经连续四年超额完成计划，提供谷物将近10亿普特，有时还更多一些。库纳耶夫为取得这些成绩付出了自己的许多劳动。

作为一名党的领导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应该见多识广，对事业富有创造性的态度，当然，还要对党的理想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对于一个真正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来说，特别要详细地了解现实生活，了解人们的情绪，善于倾听同志们的意见。

一个名副其实的党的领导人应当具有火热的心肠，具有新事物感，不断努力使今天做得比昨天更好、更多。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同志就具备了这些品质。

库纳耶夫同志，我衷心地祝贺你获得祖国崇高的奖赏。祝愿您，我们真诚的、长期共事的同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祝

你在大量的、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得新成就。[①]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也没有忘记向读者介绍他和库纳耶夫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我同丁穆罕默德·阿赫麦多维奇·库纳耶夫的友谊几乎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当时他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长，我一到阿拉木图，自然就同他认识了。就其所受的教育而言，他是矿业工程师、有色金属专家，但他不囿于狭隘的专业，能从国家全局出发思考问题，思路开阔，又有胆略，对哈萨克的丰富资源和发展远景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此外，这位稳重、诚挚、有魅力的人，还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党性原则。"[②]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这番话，"事实是牢固树立了共和国第一领导人的威望"。[③]

勃列日涅夫对库纳耶夫的支持、呵护还表现在他对哈萨克共和国的特别眷顾。勃列日涅夫当上苏联最高领导人以后曾经先后八次来哈萨克共和国视察和出席会议与庆典。勃列日涅夫还经常亲自打电报给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祝贺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在粮食采购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库纳耶夫对勃列日涅夫当然会知恩图报。例如，在1965年3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但是没有点名，而库纳耶夫和另外两名地方领导人在发言中却公开点名指责赫鲁晓夫。库纳耶夫作为苏联面积居第二位、人口居第三位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勃列日涅夫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8集，第32~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专辑），第15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9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当然，库纳耶夫并不只是一个阿谀奉承之徒，相反，有人发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很少发言，持重谨慎，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同，他不对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总书记恭维起来没完没了。"[①]而且，尽管勃列日涅夫公开把库纳耶夫视为知己，可是库纳耶夫在公开场合"从不称勃列日涅夫为自己的朋友"。[②]即使撇开库纳耶夫与总书记的关系来看，他也不是无能之辈，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进步无疑有他一份贡献。

到底如何评价库纳耶夫这个中亚当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不妨听听他的同事纳扎尔巴耶夫的意见。纳扎尔巴耶夫同样认为，库纳耶夫是"勃列日涅夫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不过，纳扎尔巴耶夫对库纳耶夫的整体认识要比其他人深入得多："库纳耶夫，正如现在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远不是个单一性格的人。他学识渊博，而主要的是他深刻地了解哈萨克斯坦，通晓其传统、习俗和民族心理。如果仅以勃列日涅夫的支持来解释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的话，那我就把那个时代及其所造就的一批代表人物完全简单化了。在我看来，酿成库纳耶夫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数十年来形成的信念：党的准则不可动摇并具有无限力量，党的领导传统一贯正确。权力主义或迟或早会腐蚀被推上权力金字塔顶峰的任何一个人。"[③]

而哈萨克斯坦学者、纳扎尔巴耶夫传记的作者奥莉加·维多娃（Ольга Видова）对库纳耶夫的评价还要高得多。她写道："哈萨克斯坦在库纳耶夫及勃列日涅夫时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这不是什么秘密。不管那里过去是什么样的，库纳耶夫追求的一个伟大目标就是尽一切可能使哈萨克斯坦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变成有教育、有文化和融入

① 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的浮沉》，第184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5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96页，第129~1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到世界文明中去的人。可以说，由于库纳耶夫的功劳而使苏维埃哈萨克斯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①]甚至对于人人非议的库纳耶夫同勃列日涅夫的亲密个人关系，维多娃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于库纳耶夫来说，勃列日涅夫首先是贯彻执行了列宁主义的党的路线的强大国家的象征，然后才是朋友。这样的结论我是在研究了许多有关勃列日涅夫及库纳耶夫的文献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的回忆录之后得出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从国家全局思考问题的人，善于从他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热忱关系中不是为他个人，而是为哈萨克斯坦取得更多的利益”。[②]

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是苏维埃中亚历史上仅次于库纳耶夫的地位显赫的领导人。拉希多夫当过教师、编辑，卫国战争时期还当过兵。他是个作家，1949年担任了乌兹别克共和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1950年当选为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9年3月，拉希多夫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至于拉希多夫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关系，克里姆林宫保健医生、前苏联卫生部部长恰佐夫（ Е.И. Чазов ）是这样说的：“勃列日涅夫本人同拉希多夫的关系并不很密切。例如，在他家里可以经常遇见阿利耶夫（Г.А. Алиев，当时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在15年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在那里碰见过拉希多夫。至少，波德戈尔内对拉希多夫的保护不亚于勃列日涅夫。或许可以把拉希多夫的‘稳固、平安’的原因归结于‘稳定干部队伍’的方针。”[③]

①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56~57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56页，第57~58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叶·伊·恰佐夫：《健康与权力——“克里姆林宫医生”回忆录》，第21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应当指出，拉希多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明显不如后者与库纳耶夫的关系密切。在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漫长时间里，拉希多夫没有得到任何提拔，但是他在领导岗位上的地位日益牢固，并且得到过多次奖赏，仅勋章就得了十多枚，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三次亲自向他授勋。这些足以说明拉希多夫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非同一般。

1978年1月5日，勃列日涅夫在向拉希多夫授勋时称赞他“在为国家争取棉花丰收的斗争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①]1980年6月25日，勃列日涅夫再次向拉希多夫授勋时发表的讲话，主要称赞乌兹别克共和国不断刷新棉花生产“所达到的最高产量指标”，并且“对二十多年来一直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夏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所进行的目的明确的创造性活动，自然也应予以应有的评价”。[②]在1982年3月25日塔什干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勃列日涅夫还是在不断地强调棉花生产问题，他称拉希多夫在“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群众顺利完成1981年向国家交售棉花、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各项计划和社会主义义务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荣膺勋章”。[③]

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对拉希多夫的肯定明显比不上对库纳耶夫的赞扬，不过他还是十分看重拉希多夫的，特别是1982年当苏联国内许多人怀疑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棉花“连年丰收”有假时，勃列日涅夫还亲自赶到塔什干为拉希多夫及他领导的共和国授勋。虽然勃列日涅夫对待拉希多夫远不及对待库纳耶夫那么亲密，但是拉希多夫对勃列日涅夫的吹捧比库纳耶夫有过之而无不及。

---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4集，第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6集，第1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6集，第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原苏联《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В. Г.Афанасьев）与拉希多夫打过交道，他认为这位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又是一个狡猾的、会耍东方式手腕的政客，对上司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因此而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极大赏识和信任，他非常喜欢去乌兹别克斯坦访问”。他也看到拉希多夫“在共和国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却享有巨大的威望和人民的尊敬，因为他为共和国，为使它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做了许多工作”。[①]看来，拉希多夫与库纳耶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中亚各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大多得到过苏联领导集团的奖赏和关照，他们同样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不遗余力地进行颂扬。

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竞相巴结奉承苏联最高领导人，除了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共和国的局部利益考虑以外，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也起了作用。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社会历来重视血缘与邻里关系，而且十分慷慨好客，给客人馈赠礼物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中亚各共和国不少领导人把这样的传统风习搬进现代政治生活当中。他们不仅对上司曲意逢迎，行贿送礼，而且在本共和国内部也推行这一套。所以，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当中，中亚地区（还有外高加索）任人唯亲、买官鬻爵、结党营私的风气是最为昭著的。[②]

在哈萨克斯坦，“第一领导人亲信们的小圈子实际主宰着所有的事情。我们身为中央书记，同时为共和国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却经常在事后才得知干部的任命、调动和其他一些主要

① 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的浮沉》，第175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② K.西米斯：《苏联各部门的贪污贿赂》，载《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第211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问题的情况的。经常出入库纳耶夫家门的人能够决定任何一个人的任命、晋升、免职、奖励、分配住宅”。[1]纳扎尔巴耶夫是这样描述哈萨克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反常情况的。他担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后，曾经与库纳耶夫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和支持。

任人唯亲最典型的例子是库纳耶夫的胞弟阿斯卡尔·库纳耶夫（Аскар Кунаев）的任职情况。此人从1974年起担任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但是他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超出这个职位的权力：“科学院士抑或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的授予，共和国任何一所高校校长的任命，学位论文答辩的通过和批准都取决于他个人意志。”[2]阿斯卡尔·库纳耶夫嗜酒如命，可是在1981年居然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后来负责调查“乌兹别克案件”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Е. К.Лигачёв）描述拉希多夫重用亲信、结党营私时说过：“共和国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他的亲戚。在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有30多位拉希多夫的亲戚。此外，苛捐杂税和送礼之风猖獗。”“就拿他的妻子去下面州里来说，既然汗的妻子来了，意味着应该送些什么。整车整车的贡品……”[3]曾受拉希多夫攻击过的《真理报》负责人博尔金（В.И. Болдин）也认为，在拉希多夫领导下的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专断、虚报浮夸、贪污受贿成风”。[4]

不过，在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年代，中亚各共和国也有一些领导人受到了惩处。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权力斗

①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1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1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69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④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0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争的牺牲品，也有一些人是因严重的违纪犯法行为而又无法包庇过失被撤职、开除甚至坐牢的。

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别伊谢巴耶夫就是因与库纳耶夫作对而在1970年3月“提前退休”的，他当时62岁，而比他仅仅年轻两岁的库纳耶夫还继续工作了16年。清除别伊谢巴耶夫以后，哈萨克共和国高层领导中几乎全是库纳耶夫的人。

早在1964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就查出吉尔吉斯高层领导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犯罪集团相勾结、收取不义之财。但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没有严惩他们，案子拖了很久，最后到1968年1月，吉尔吉斯部长会议主席马姆别托夫及一批官员被撤职，只有一名部长会议副主席被判刑。吉共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不仅保住了职位，而且继续任职十多年，1969年他50岁生日时还得过一枚列宁勋章。

70年代初，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拉希多夫把部长会议主席库尔班诺夫、最高法院院长霍贾耶夫（Ходжаев）赶下了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纳斯里金诺娃被调往莫斯科。后来又依靠克格勃揭露了他们的“犯罪事实”：他们大量收取犯罪集团的钱财，纵容并且庇护罪犯们胡作非为——诈骗、盗窃、黑市买卖和贩毒。最后经苏共中央批准，乌兹别克共和国法院1976~1977年间举行了一系列审判：库尔班诺夫被判刑8年，霍贾耶夫被判刑10年，纳斯里金诺娃则最后贬职当了一名副部长。

其实，拉希多夫本人及其同伙也不干净。他们虚报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和收购量，骗取了国家巨额的拨款。勃列日涅夫在世时，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严重问题已经为人知晓，只不过盖子一直被捂着罢了。例如，《真理报》驻乌兹别克的特派记者早就撰文揭露共和国任人唯亲、贪污受贿等问题，但是没人去追究，相反，拉希多夫宣布那位记者为“乌兹别克人民的

敌人"。而《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以及博尔金却先后奉命前往乌兹别克去跟拉希多夫"和解"。[①]直到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拉希多夫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

安德罗波夫在短短15个月任期内，已经着手对党政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整肃。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等人被开除出党，接着就轮到了拉希多夫。

1983年6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开过以后，安德罗波夫亲自安排利加乔夫调查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问题，他说："您不认为该管管乌兹别克斯坦了吗？我早就开始注意那里的情况。应该开始这项工作。"利加乔夫把拉希多夫请到莫斯科，后来，他回忆这次不愉快的会见情形时说："起先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只好对他说，是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安德罗波夫——引者注）之托和他谈话。他坐下来了，对我说话也变得温和了。事先我已把五六十封信摆在桌上。他立刻明白要谈的话题了。最后我说：'我建议派一个委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他说：'我们现在正是收获棉花的季节，你们会妨碍工作'。"[②]

利加乔夫同意等到棉花收获结束以后再说，可是10月31日拉希多夫突然去世了。苏共中央派了一个委员会去乌兹别克共和国进行调查，结果除了前面提到的任人唯亲和送礼受贿以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虚报棉花的产量和收购量，骗取国家巨额补助金，中饱私囊。

利加乔夫说："最后在塔什干召开中央全会，我被派去出席这次全会，许多人被开除公职。"[③]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局14名成员只有6人保留下来了，乌共中央第二书记格列科夫

① 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的浮沉》，第175~176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9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692~69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69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 Л.И. Греков ）、部长会议主席胡代别尔迪耶夫都被撤职了。

据乌兹别克当局1988年宣布，自1983年下半年以来，共有100名官员受到起诉，有3000人被革职，另有1.8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2名罪犯被判处死刑。[①]

但是，“乌兹别克案件”很快就被“政治化”了。负责此案调查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员格德良（ Т.Х.Гдлян ）和伊万诺夫（ Н.В.Иванов ）企图进一步控告利加乔夫等人受贿包庇罪犯，因此不惜采用逼供手段。苏联许多要人指责他们二人企图通过办案往上爬，结果他们反被指控违法办案。案件一直拖到苏联解体也没有完全了结，不过有不少已经入狱的人后来被宣布无罪释放。

第二节　中亚的民族状况和民族纠纷

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以后，苏联领导集团在民族问题方面基本上沿袭赫鲁晓夫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沿袭斯大林时期）奉行的方针和政策，仍然把防止地方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当做头等重要的任务。鉴于民族主义势力比赫鲁晓夫时期壮大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国内外的形势又不允许一味进行无情镇压，所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时，还是做了许多调整和变动。这些都影响到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处理与民族主义力量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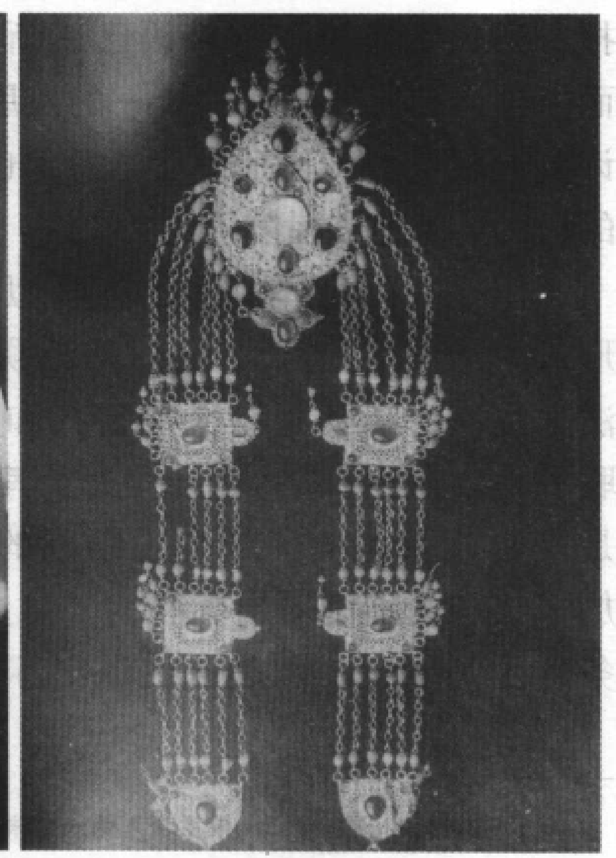
在理论上，苏联官方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民族平等，同时更加不遗余力地宣扬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已经形成“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观点和“民族接近理论”。1970年4月9日，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过去这个时期的特点是

①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18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我国各大小民族的全面进步和进一步接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①]1972年12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甚至宣布：“苏联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②]

苏联领导人反复宣传的苏联“各民族接近”，实际上是“民族融合”的代名词。当然，谁都知道，苏联的“民族接近”就是向俄罗斯族靠近。在这方面，中亚某些共和国领导人显得特别卖力。库纳耶夫在196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讲话中说道：“由于历史命运的意志，哈萨克人一向认为自己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儿子。”[③]拉希多夫在1976年说过：“同相互





哈萨克姑娘服饰、胸饰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66页，三联书店1976年版。

②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柯雄编：《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第384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平等的我国各族人民一样，乌兹别克人有一位老大哥，那就是俄罗斯族人民。”[1]

1979年5月23日，勃列日涅夫在给一个讨论语言问题的会议的信中说：“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当我国经济已成为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时，出现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时，俄语作为各族人民交往的语言，在建设共产主义和造就新人方面的作用客观上在增强。全体苏联人民在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自由地掌握俄语，自愿把俄语作为共同的历史财富来继承。这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联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2]中亚地区不少领导人也在各类场合宣传学习俄语的重要性。库纳耶夫在1973年4月30日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俄语已逐渐成为哈萨克族的第二本族语”，而把俄语和民族语言“统一的发展进程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3]许多苏联学者（包括中亚学者）也发表文章，论述苏联所有民族的居民自由地掌握俄语的必要性。

但是在国家体制上，苏联似乎保留了与上述政策相矛盾的形式。1977年10月7日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仍然保留了1936年宪法的提法，承认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拥有主权，并且有退出苏联的自由权利。[4]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保留这样的条文，只不过是表明苏联是各民族自愿结成的联盟。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加盟共和国别说退出苏联的“自由”，就连处理本共和国内部事务也受到限制。但是自由退出苏联的宪法条文使民族主义者看

---

① 利奥波德·昂格尔：《俄罗斯人的统治未使民族集团消失》，载《苏联问题译丛》，第4辑，第180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5集，第1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③ 郑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载《苏联问题译丛》，第五辑，第132~133页。

④ 《世界宪法全书》，第847页，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到了希望，一旦他们的势力发展起来，形势就会大不相同了。中亚地区的形势当然也不会例外。

经过斯大林时期的严厉打击和镇压，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遭到了灭顶之灾。尽管赫鲁晓夫当权以后在政治上实行“解冻”，然而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复活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和压力，加上中亚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所以直到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中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形成任何气候。

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中亚地区现代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广大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要求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及中亚地区领导人看来，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抬头，因此进行了批判和压制，结果在中亚地区导致了民族问题的出现。

这一时期，中亚民族主义的复活已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主要就是中亚各共和国民族人口迅速增长，占共和国总人口的比例明显上升，以及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和共产党内部“民族主义人士”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中亚各共和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据1970年苏联人口普查的资料，中亚五个共和国当年总人口为3280.1万人，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3.6%，比上次人口普查的1959年增加了2.6个百分点。此外，中亚地区总人口与1959年相比增长达42.8%，远远超出全苏联同期增长16%的幅度。这21年间，苏联共有6个共和国的人口增长超过40%，而中亚地区占了5个：塔吉克增长了46%，增速居全苏联之首；乌兹别克增长了45%，居全苏联第二位；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均增加了42%，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哈萨克增加了40%，居第六位（排在第五位的是亚美尼亚）。1970年，哈萨克共和国总人口为1284.9万人，像1959年一样，仍居全苏联第三位；乌兹别克共和国总人口为1196万人，仍居第四位；吉尔吉斯共和国总人口为293.3万人，由1959年的第十一

位上升到第十位；塔吉克共和国总人口为290万人，由1959年的第十二位上升到第十一位；土库曼共和国总人口为215.9万人，仍居第十四位。[①]

而且，这期间中亚各共和国人口增长迅速主要是因为当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1970年，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乌兹别克人的出生率达到39.2‰，而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出生率只有19.3‰。此外，生活在该共和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的出生率也明显高出斯拉夫民族。[②]加上中亚地区的本地居民很少向境外移民，而生活在这里的斯拉夫居民却经常移居到其他共和国，因此中亚各共和国本民族的人口在共和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土库曼妇女

1970年，土库曼共和国居民中的土库曼人占65.6%，比1959年增加了4.7个百分点；乌兹别克共和国居民中的乌兹别克人占64.7%，比1959年增加了3.6个

① 泽夫·卡茨主编：《苏联主要民族手册》，第6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O.阿塔－米尔扎耶夫等：《中亚人口再生产的前景》，载《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第180页。

百分点；吉尔吉斯共和国居民中的吉尔吉斯人占43.8%，比1959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塔吉克共和国居民中塔吉克人占56.2%，比1959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哈萨克共和国居民中哈萨克人占32.6%，比1959年增加了2.6个百分点。这样的增幅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当中居第二到第六位（第一位是阿塞拜疆）。[①]从而扭转了1939~1959年期间中亚各共和国本民族人数在共和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下降的趋势。

中亚各共和国人口快速增长和来民族人口比例增加的趋势，在1970年以后一直持续下去。到1985年1月1日为止，中亚地区总人口达4547.1万人，占全苏联人口总数的比例比1970年上升了2.9个百分点，达到16.4%。与1970年相比，中亚地区1985年初的总人口增加了38.6%（全苏联只增加14.3%）。其中塔吉克共和国增加了55.1%，增幅居全苏联第一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加了50.3%，增幅居全苏联第二位；土库曼共和国增加了47.7%，增幅居全苏联第三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加了35.3%，增幅居全苏联第四位；哈萨克共和国增加了23.3%，增幅居全苏联第七位（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居第五和第六位）。到1985年1月1日，哈萨克共和国总人口为1584.2万人，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居第四位（1970年为第三位）；乌兹别克共和国总人口为1797.4万人，在苏联居第三位（1970年为第四位）；吉尔吉斯共和国总人口为396.7万人，在苏联居第十位（1970年也是第十位）；土库曼共和国总人口为318.9万人，在苏联居第十三位（1970年为第十四位）；塔吉克共和国总人口为449.9万人，在苏联居第九位（1970年居第十一位）。[②]

据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中亚各命名民族在本共和国

① 泽夫·卡茨主编：《苏联主要民族手册》，第62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B.T.帕诺夫主编：《苏联大百科年鉴》（1985年），第113、117、158、163、167页，莫斯科1985年俄文版。

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比1970年又明显提高了。其中哈萨克共和国居民中的哈萨克人占36%，比1970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乌兹别克共和国居民中的乌兹别克人占68.7%，比197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吉尔吉斯共和国居民中的吉尔吉斯人占47.9%，比1970年上升了4.1个百分点；土库曼共和国居民中的土库曼人占68.4%，比1970年上升了2.8个百分点；塔吉克共和国居民中的塔吉克人占58.8%，比1970年上升了2.6个百分点。[①]

在前述同一时期，中亚地区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1976年，中亚各共和国每千名10岁以上人群中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数分别为：哈萨克557人，乌兹别克537人，吉尔吉斯544人，土库曼539人，塔吉克—498人。虽然都没有达到全苏联的平均水平570人，但是与1959年相比，中亚各共和国受教育者增幅还是不小，其中哈萨克为60.5%，乌兹别克为52.7%，吉尔吉斯为59.1%，土库曼为39.3%，塔吉克为53.2%，与全苏联平均增幅（57.9%）相差无几。[②]这时期中亚地区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像斯大林时期主要表现为扫除了文盲和学到了技术，这两三代人经历了政治上的“解冻”和经济方面的“新体制改革”，目睹了中亚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以及与之不相适应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现状，耳闻了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因此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新的民族意识（或潜意识），新一代民族知识分子开始成长起来。

中亚城市人口的比重在这期间也明显上升了。1977年，中亚各共和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哈萨克为54%，比

① B.T.帕诺夫主编：《苏联大百科年鉴》（1985年），第113、117、158、163、167页，莫斯科1985年俄文版。

② 苏联社会主义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50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959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乌兹别克为39%，比1959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吉尔吉斯为39%，比1959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土库曼为48%，比1959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塔吉克为36%，比1959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全苏联同期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上升了14个百分点。[①]这说明中亚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放慢了步伐，因为1939~1965年间中亚各共和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苏联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中亚地区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居民的城镇化速度更慢，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居住在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农村地区。1965年以后中亚地区城市人口的缓慢增长主要来自斯拉夫移民的增加。

尽管苏联官方推广俄语，中亚地区会俄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多数居民还是把本民族语言作为第一语言。有不少人在实际生活中讲俄语的时间比讲本族语的时间还要多，然而在人口



希瓦老人

① 苏联社会主义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36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普查登记表的第一语言栏目中还是填写了本族语。从官方公布的1970年和1979年苏联两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看出，中亚五个共和国的民族居民以民族语言为第一语言的比例仍很大，与1959年相差无几。1970年和1979年，全苏联的哈萨克人以本族语为第一语言的比例分别为98%和97.5%，乌兹别克人分别为98.6%和98.5%，吉尔吉斯人分别为98.8%和97.9%，土库曼人分别为98.9%和98.7%，塔吉克人分别为98.5%和97.8%。①而且，统计资料显示，居住在共和国的命名民族以本族语言为第一语言的比重还要高一些，居住在农村的居民以本族语言为第一语言的比重要高于城市。②不过，通过综合分析各种资料可以肯定，在实际生活中，中亚各族居民以本民族语言为第一语言的人数比例要比上面的数字低。

中亚地区各共和国党员干部和高级领导人的民族成分结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与以前差不多。各共和国三个最高职位——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直由共和国本民族出身的干部担任，没有一个例外。他们的副手或同事中也是同族干部占多数，但每个副职都有俄罗斯族（或其他斯拉夫民族）干部。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照例都是俄罗斯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也都是俄罗斯人，另外还有一两个俄罗斯人任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中一般也有一名俄罗斯人。在共产党中央局和书记处当中，俄罗斯族或乌克兰族成员的比例要高一些（哈萨克共产党中央例外），而且这些干部基本上是苏共中央派来的，很少有本地出生的俄罗斯干部。俄罗斯人担任中央第二书记虽然传统上是共和国的主要监督者，也是联

① 赵龙庚、金火根：《苏联民族概览》，第221~222页，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阮西湖等：《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第19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盟中央在共和国的代表，但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这些人的职权已经削弱，因为中亚各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都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在这期间，除土库曼共和国以外，中亚其他四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一直没有换人，而第二书记则频繁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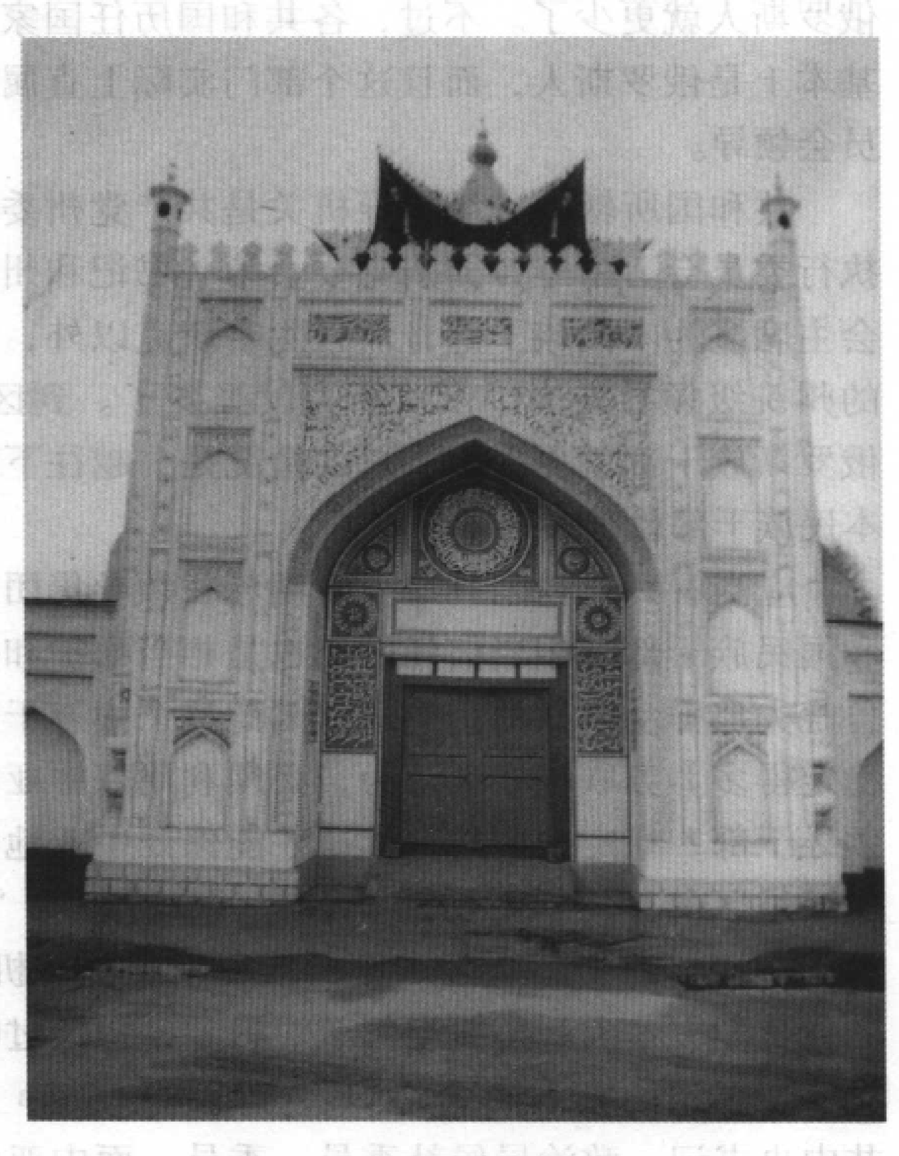
在中亚各共和国部长一级的干部中，本民族的干部明显多于俄罗斯族干部。而且，共产党中央诸部中一般只有少数几个俄罗斯人任部长（中央机关报主编都是俄罗斯人），政府部长中俄罗斯人就更少了。不过，各共和国历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基本上是俄罗斯人，而且这个部门实际上直属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

共和国所辖州一级领导机关是共产党州委员会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亚各国州党委会第一书记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多为本民族干部，而且除哈萨克以外，其他四个共和国的州一级领导人当中俄罗斯人就极少了。到区一级领导人中，俄罗斯族干部就更少了。总的情况是，越往下级机关，共和国本民族干部就越多。

应当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集团对中亚地区各共和国民族干部是相当信任的，也是相当呵护和关照的，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动辄撤他们的职，因此整个中亚干部队伍比以前要稳定得多。苏联领导人认为，必须利用好中亚本地民族出身的领导干部，稳定他们的地位，才能保证中亚地区的安宁，结果中亚地区的民族干部出现了如前一节所述的“超稳定”结构。另一方面，在中亚地区工作的俄罗斯干部有机会调往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典型例子。另外，担任过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的索洛缅采夫（М.С.Соломенцев）后来当上了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而中亚的民族干部则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库纳耶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老资格成员，

拉希多夫则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不能到莫斯科中央机关工作，实际上始终是地方领导人。中亚的民族干部长期在本地任职，容易滋长地方主义（从库纳耶夫、拉希多夫那里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在苏联的体制下，要滋长地方民族主义就难得多，原因就在于苏联实行的“超稳定”的干部政策。

由于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错综交织，相互作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复兴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势。一方面，新型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政干部）向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与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密切关联的，它与二三十年代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地方民族主义很不相同，因为后者更多的是植根于伊斯兰社会和宗教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原有的地方民族主义也在复活，因为



东干人清真寺

中亚地区农村人口占多数，在广大农村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宗教观念和民族风习。这些成了地方民族主义孳生的温床。但是，中亚地区上述两种民族主义倾向却一直没有汇合在一起。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远不如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发达。中亚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代言人的主要诉求是，发展健全的民族经济，保留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完善民族自治体制，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还没有成为他们的主流意识。因此，当苏联走向解体之际，中亚各共和国宣布主权和独立比其他加盟共和国要迟。此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亚地区即使发生令当局震惊的民族突发事件，也多是自发的群众性事件。

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到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之前，中亚地区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群众性的示威、骚乱事件逐渐增多。除了中亚各共和国本民族对抗性质的事件以外，卫国战争期间流放到中亚的几个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要求返回家园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其斗争更加令人瞩目。

在这些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亚地区文学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批评苏联官方民族政策、强调保持发扬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抵制推广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潮流。这股思想潮流虽然遭到苏联及中亚各共和国官方的批判和压制，但是并没有被彻底禁绝，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在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领域留下了影响。

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重心，主要在吉尔吉斯共和国。1972年6月15日，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苏维埃吉尔吉斯报》公开点名批评了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尤达欣（К.КЮдахин）。因为，尤达欣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把俄语作为吉尔吉斯人的第二本族语言的观点是否正确值得怀

疑。”[1]12月，《苏维埃吉尔吉斯报》又点名批判了吉尔吉斯法律学者努尔别科夫（К.Нурбеков）和图尔贡别科夫（Рафик Тургунбеков）。根据苏联宪法中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拥有的退出苏联的权力，前者曾经撰文认为，即使某些民族的分离要求与苏联“总的利益相矛盾”，“任何人也无权强制干涉其内部事务和通过暴力去‘纠正’错误”。文章还指出，对共和国边界进行任何强制改变都应看做是“吞并”和“侵略行径”，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践踏”。他们两人的著作都提到了1922年吉尔吉斯族领导人要求在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内部建立戈尔纳亚自治州一事，并且肯定这是吉尔吉斯人民的“主权意志”。[2]言下之意是当年苏维埃政权违背了吉尔吉斯人民的意志。这两位法学专家被认为持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而且《苏维埃吉尔吉斯报》后来还发表社论，批评吉尔吉斯大学和共和国科学院的党政领导没有及时地发现和谴责这些“错误观点”。

1973年1~2月，《苏维埃吉尔吉斯报》两次发表批判文章，批判的对象是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知名作家塞迪克别科夫（Т. Сейдыкбеков）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包括“企图将本族语言与伟大的俄语对立起来”，他们的著作“无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过分注重吉尔吉斯人的落后习俗，等等。[3]

1973年6月，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在一次会议上亲自点名批评乌麦塔利耶夫（Темиркул Уметалиев）、塞迪克别科夫等作家，说他们把吉尔吉斯民族利益与全苏

---

① 郑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载《苏联历史问题译丛》，第5辑，第124页。

② 郑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载《苏联历史问题译丛》，第5辑，第127~128页。

③ 郑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载《苏联历史问题译丛》，第5辑，第129~130页。

利益对立起来，借口“拯救”民族文化来美化革命前的吉尔吉斯社会，等等。直到1976年1月，乌苏巴利耶夫还在谴责吉尔吉斯的民族主义幽灵，他说：“不久前，在社会学家的一些著作中，对吉尔吉斯人民某些时期的历史，尤其是民族国家体制、民族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他一些文化问题，作了错误的论述。”①

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也是相当严重，因为它引起了苏共中央的直接干预。1972年8月8日，苏共中央通过的一项决议，指责乌兹别克共和国有些报告和出版物“片面阐述共和国建设成就，而不深刻揭示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评价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犯有美化过去和脱离阶级立场的错误”。决议要求地方党组织同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不调和的斗争。②

1973年3月7日，苏联《真理报》刊登文章，批评乌兹别克共和国“某些创作人员在评价过去时丧失阶级观点和党性态度”，他们在历史题材的著作中“把可汗、艾米尔和君主的形象理想化”。③同时，共和国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上述“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塔吉克共产党1969年1月遭到苏共中央批评，因为在塔吉克共和国“无神论的宣传削弱了，宗教活动活跃起来了”。塔共中央开会表示，要加强“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族人民友好的思想”，在发扬民族传统的同时，要更积极地树立各民族间的“全苏传统”。④

---

① 郑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载《苏联历史问题译丛》，第5辑，第138页。

② 柯雄编：《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第564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③ 郑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载《苏联历史问题译丛》，第5辑，第130页。

④ 柯雄编：《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第426~427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中亚地区因民族、宗教纠纷引起的突发事件和暴力冲突比赫鲁晓夫时期有增无减。但是苏联官方对此讳莫如深，外界很难了解真相，人们（包括苏联公民）只能从西方媒体那里得到一些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年代的主要事件逐渐透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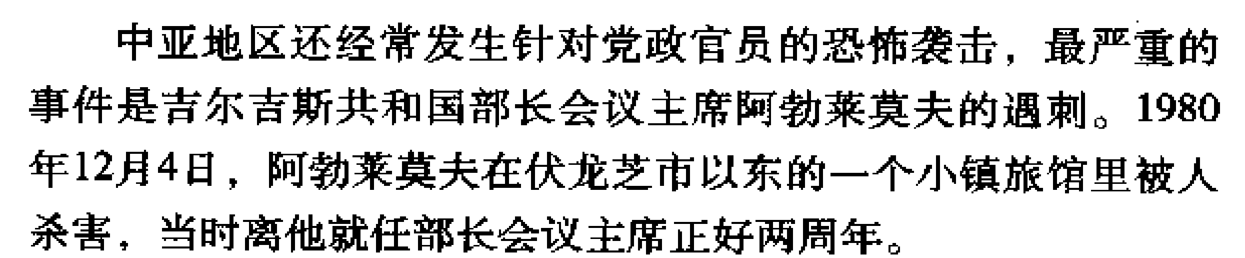
1967年5月17日，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伏龙芝市发生骚乱，近700人捣毁了区内务分局。起因是一名被拘捕者被警察打死。冲突结果造成数人伤亡，18人遭到审判。

1967年6月，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因一名出租车司机遭警察殴打致死而引发大规模骚乱。愤怒的群众聚集起来，袭击了警察机关。最后当局派来军队进行镇压，导致数十人死亡，还有很多人被逮捕。

1969年4月底，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举行足球赛时发生骚乱。穆斯林观众与俄罗斯球迷对打起来，据说有15名俄罗斯人被打死。5月初，塔什干又爆发群众集会示威，有人高喊“俄罗斯人滚出乌兹别克”一类口号。当局紧急出动军警弹压，最后有150多人被逮捕。乌兹别克斯坦报纸只报道了对那些耍“流氓行为”的肇事者的审判，3名主要被告被判5年徒刑。6月4日，塔什干市党委会开会讨论“对流氓行为加强斗争”的问题，拉希多夫亲自出席。6月12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开会讨论“加强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

1978年5月下旬，塔吉克共和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民族骚乱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一个俄罗斯人打了一名塔吉克小孩。结果卷入冲突的群众达到1.3万多人，当局只得动用军队进行镇压，有60多人受伤，许多人被捕。

1985年1月12日，塔吉克共和国首都杜尚别的“塔吉克”电影院附近发生塔吉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斗殴事件，双方共有700人卷入，幸无人员伤亡，最后有5名领头闹事者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亚地区还经常发生针对党政官员的恐怖袭击，最严重的事件是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阿勃莱莫夫的遇刺。1980年12月4日，阿勃莱莫夫在伏龙芝市以东的一个小镇旅馆里被人杀害，当时离他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正好两周年。

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以后，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更加突出。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主持苏共中央会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反动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采取思想隔离措施的决定》，以严厉禁止宗教宣传和防止民族主义的复兴，但是收效并不是十分显著。

与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对抗”相比，流放到中亚的苏联几个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显得声势更大，也更持久，引起的国内和国际反响更为强烈。苏联官方同样对这些民族的请愿、集会、示威等斗争的消息严加封锁，但外界对“流放民族”的反抗活动了解得更多一些。

居住在中亚各共和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是最引人注目的。从1966年开始，克里米亚鞑靼人不断上访、请愿。1967年8月，他们派代表前往莫斯科请愿，有关当局“接见”了这些代表。9月，苏联最高苏维主席团颁布法令，撤销当年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指控和判决，但是不允许他们返回克里木半岛定居。

苏联政府这种“解决”方式引起中亚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强烈的抗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推选代表向苏联最高当局请愿，1968年5月，去莫斯科的请愿团竟多达5000余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多次向勃列日涅夫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寄呈请愿信件。1972年8月的请愿信上有2万人签名，要求“结束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政治恐怖和民族歧视行为”。[①]克里米亚鞑靼人还不断地向国际社

① 郑志：《勃列夫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附二，载《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第159页。

会呼吁。1968年7月，他们的118名代表签发了一份《致世界公众的呼吁书》。1969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代表向大会主席团发出了一篇很长的呼吁书。呼吁书列举了苏联当局对他们实行的种种镇压措施，要求大会伸张正义，帮助他们返回克里米亚，“释放一切政治犯”。呼吁书还提出让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代表、家住塔什干的共产党员伊·哈伊罗夫（И. Хайров）和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原苏军少将格里戈连科（П. Г. Григоренко）参加大会。[①]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中亚城市举行的各种抗议集会更是频频不断。

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抗议活动，苏联和中亚有关共和国当局动用各种方式进行镇压：驱散示威人群、逮捕为首人员、开除参与反抗活动者的党籍和公职等等。格里戈连科将军因帮助克里米亚鞑靼人，于1969年5月7日在塔什干再次被捕，被关进特种精神病院。

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要求，除了让他们返回伏尔加河沿岸、恢复自治共和国以外，还有就是移居联邦德国。1965年6月，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德意志人代表在莫斯科见到了米高扬，提出了返回家园的要求。米高扬以哈萨克斯坦要求德意志人帮助经营垦荒地为由予以拒绝。后来，中亚的德意志人以移居联邦德国为主要诉求，多次在莫斯科和哈萨克共和国一些城市举行集会示威，但无一不遭到驱散，不少人被捕。苏联德意志人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阿贝尔（Э. Абел）1973年被当局逮捕。但是在70年代，苏联为了同西方搞缓和，允许数以万计的德意志人离开中亚等流放地移居联邦德国。

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也在顽强地为返回外高加索而努力。

① 郑志：《勃列夫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记要》附二，载《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第159页。

1968年4月，6000名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举行集会，遭到镇压。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规定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永久地定居"在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等地。7月，7000多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奔赴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举行抗议集会。后来，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的代表几次到莫斯科请愿，都被武装遣返回中亚。

上述流放到中亚的几个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包括德意志人移居联邦德国的要求），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继续。

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从表面上看尽管还不是苏联国内最尖锐的，然而这个地区的民族矛盾一直在不断激化，从而为苏联解体时中亚五个共和国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节　中亚的经济建设成就和问题

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调整的幅度比在政治、民族诸领域进行的调整要大。苏联领导人把赫鲁晓夫推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说成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产物，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以后，铺开了经济管理新体制改革。

1965年9月末，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著名决议，正式启动工业和建筑业领域的新体制改革。新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最主要指标，职工的工资福利与企业利润紧紧挂钩，作为条件，国家给予企业较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同时，全体会议决定取消经济行政区与相应的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以

及部门性的国家委员会，恢复原先的联盟部、联盟—共和国部以及共和国部。把主要掌握在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归还”给上述各部，从而在形式上又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部门垂直管理体制。

实行新体制改革以后，苏联的经济尤其是工业获得了长达十余年的快速稳定发展。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0%，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达8.6%。农业同样引入了经济刺激机制，加上国家对农业投资明显增加，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因此，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在上述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也获得高速增长，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6%和7.2%，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和6.4%。苏联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为其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①

但是，苏联的新体制改革一直是在经济领域孤军深入，没有带动社会政治等领域发生相应的变革，相反，来自政治方面的改革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后，苏联领导集团中主流派转向保守，生怕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借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刹了改革之车。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从新体制开倒车，逐步废止了经济刺激机制，陆续收回了企业自主权，苏联经济于是走上了下坡路，进入了所谓“十年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安德罗波夫企图用整顿劳动纪律和惩治经济犯罪来振兴苏联经济，结果效果不显著。契尔年科上台以后，苏联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的迹象。

作为苏联经济整体一部分的中亚地区经济，在这一时期大

① 苏联社会主义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14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体上走过了与苏联全国经济发展的同样轨迹，不过并不完全同步，此外程度也不完全一样。总的来说，中亚地区的经济在这20年间的波动不如整个苏联经济那么剧烈。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哈萨克斯坦不存在‘停滞’阶段！”[①]

从1966年开始，苏联公布的第八、第九、第十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一直强调要改善全国的生产力布局，加快广大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要按照经济专业化的要求，重点发展东部的优势产业。根据这一方针，作为苏联东部地区组成部分的中亚重点发展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采矿、冶炼、发电以及农业）。这类产业大多需要巨额投资，可是苏联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给予倾斜。

1965~1975年间，中亚各共和国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对苏联全国来说呈一种下降的趋势，通过1970年和1976年这两年的当年投资额与1965年的投资额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亚各共和国1970年、197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比1965年投资额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哈萨克29.5%和65.3%，乌兹别克50.6%和111.2%，吉尔吉斯50%和79.5%，土库曼50.4%和122%，塔吉克24.4%和65.2%，而同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平均增幅为44%和101.5%（其中俄罗斯联邦为44.5%和108.8%）。[②]由于中亚地区投资绝对额最多的哈萨克共和国（几乎相当于其他四个共和国之和）再加上吉尔吉斯、塔吉克两个共和国的投资增长与苏联平均增长水平相距甚远，因此整个中亚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苏联全国的投资增长速度。

另一个反映投资的指标——中亚各共和国国营与合作社企业单位（不包括集体农庄）交付使用的固定基金（即已经完工

①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58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苏联社会主义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419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的项目占用的建设投资）情况也差不多。1979年，中亚各共和国交付使用的固定基金比1965年的增幅分别为：哈萨克187.8%，乌兹别克259.1%，吉尔吉斯213%，土库曼250.1%，塔吉克226.1%，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平均增幅为233.6%。[①]综合起来，中亚又没有达到全苏联的平均增长水平。

相对工业而言，苏联对中亚地区农业的投资一般达到甚至超过了全苏联的平均增长水平。

这样一来，20世纪60~70年代中亚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比全苏平均速度要稍慢一些，而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比全苏平均增长速度快得多。

如果以1965年工业总产值（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指数为100，那么1979年中亚各共和国相应的各项指数为：哈萨克254（256和253），乌兹别克245（233和285），吉尔吉斯339（398和248），土库曼248（249和239），塔吉克256（235和306），而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平均指数为258（267和240）。[②]

如果以1965年的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那么1976年中亚各共和国的农业总产值指数分别为：哈萨克170，乌兹别克157，吉尔吉斯143，土库曼169，塔吉克157，而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平均指数只有131。[③]

尽管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亚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发展速度没有达到全苏联的平均增长水平，但是以绝对量的增加来说，是中亚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以相比的。在这期间，中亚各共和国新建、扩建或改建了数以千计的大中型工业、交通、水利及农牧业项目，其中有不少是具有全苏联意义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7卷，第587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7卷，第596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苏联社会主义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260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的骨干项目。下面分别来介绍一些最重要的工程项目。

哈萨克共和国的煤炭工业除了进一步扩建卡拉干达煤矿以外，在巴甫洛达尔州埃基巴斯图兹大煤田建成了4个大型露天煤矿，其中“勇士”露天矿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另外，卡拉干达新建了一个洗煤焦化厂。在石油工业方面，曼格什拉克半岛的油田得到大规模开发，另外在布扎奇半岛也开发了一个大油田。从乌津经古里耶夫到古比雪夫的大口径长距离输油管道投产。此外，建成了鄂木斯克—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输油管，把西伯利亚的石油输入中亚，并且在巴甫洛达尔和奇姆肯特建成了大型炼油厂。老厂古里耶夫炼油厂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能力，还有曼格什拉克天然气加工厂投产。

哈萨克斯坦建成了一批大型发电厂：装机240万千瓦的叶尔马克国营地区发电站、装机123万千瓦的江布尔国营地区发电站、装机400万千瓦的埃基巴斯图兹国营地区一号电站（同样规模的二、三、四号电站和巴尔喀什电站已经开工或部分投产），以及卡普恰盖水电站（装机43.4万千瓦）、布赫塔尔马水电站（装机67.5万千瓦）、舒尔宾卡水电站以及舍甫琴柯市（今阿克套）核电站等。

哈萨克斯坦钢铁工业建设的工程项目主要有：在铁米尔套钢铁厂基础上建成大型冶金联合企业，索科洛沃—萨尔巴伊铁矿年开采量达到3000万吨，利萨科夫斯克铁矿也形成了86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卡恰尔铁矿在加紧建设。叶尔马克建成了一座苏联数一数二的铁合金工厂。有色金属工业继续扩建了杰兹卡兹甘、列宁诺戈尔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等地的铜、铅、锌、钛、镁开采和冶炼企业，巴甫洛达尔铝厂也投产了。

哈萨克共和国建成切利诺格勒农业机械厂、巴甫洛达尔拖拉机厂（扩建）等大型机械工厂；卡拉套磷矿（扩建为年产680万吨）、江布尔和奇姆肯特磷肥厂、巴甫洛达尔化工联合企业、

曼格什拉克塑料厂、舍甫琴柯氮肥厂等化工企业；阿拉木图纺织联合企业、库斯塔奈人造纤维厂、卡拉干达橡胶制品厂、江布尔制鞋联合工厂等轻纺企业，以及全苏联最大的杰特加拉温石棉矿等。

哈萨克斯坦还根据苏联的统一规划，建设了三个大型区域生产综合体：巴甫洛达尔—埃基巴斯图兹、卡拉套—江布尔和曼格什拉克综合体。巴甫洛达尔—埃基巴斯图兹综合体由巴甫洛达尔热电厂、叶尔马克和埃基巴斯图兹的国营地区电站、“勇士”露天煤矿、巴甫洛达尔铝厂和拖拉机厂等骨干企业组成。卡拉套—江布尔综合体由卡拉套磷矿、卡拉套化工联合公司、江布尔国营地区电站和江布尔磷肥厂等骨干企业组成。曼格什拉克综合体由乌津和热特巴伊油田、哈萨克天然气加工厂、舍甫琴柯核电站、曼格什拉克捕鱼冷冻联合企业等骨干企业组成。

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境内马卡特—舍甫琴柯—新乌津铁路全面通车，还修筑了由古里耶夫到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别伊涅乌到乌兹别克共和国昆格勒的铁路，由俄罗斯联邦亚历山德罗夫盖通向马卡特的铁路也修到了占加拉。原有铁路干线的复线建设和电气化改造取得了全面进展。此外，公路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哈萨克斯坦的水利工程建设同样成绩不凡。建成了额尔齐斯河—卡拉干达运河，运河全长458公里，除了保证沿途工矿中的供水以外，还可灌溉农田5万多公顷。克齐尔库姆沙漠灌溉系统和恰尔达拉大型水库也告完工。向曼格什拉克地区输水的管道和舍甫琴柯原子能海水淡化工厂都投入了使用。此外，哈萨克斯坦一直在不断地开垦一些“荒地”。

随着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哈萨克共和国兴起了一批新兴城市：埃基巴斯图兹、叶尔马克、舍甫琴柯、新乌津、热特巴伊、卡拉套、恰尔达拉等。

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天然气开采发展较快，在布哈拉州和卡什卡达里亚州（穆巴列斯克）开发新的气田，建成了穆巴列斯克天然气加工厂，扩建了阿尔马雷克和费尔干纳的炼油厂。建成投产的大型发电企业有：装机192万千瓦的塔什干国营地区发电站、装机125万千瓦的纳沃伊国营地区发电站和装机300万千瓦的锡尔河国营地区发电站，以及别卡巴德、安格连、塔希阿塔什等地的发电厂和恰尔瓦克水电站（装机60万千瓦）等。

乌兹别克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冶金、化工、建材和轻纺企业，主要有：阿尔马雷克冶炼厂（扩建）、别卡巴德钢厂（改建）、穆伦套金矿（储量居欧亚大陆首位）、纳沃伊化工联合企业、奇尔奇克化工联合企业、费尔干纳氮肥厂、阿尔马雷克和撒马儿罕的磷肥厂、纳沃伊水泥联合公司、布哈拉和安集延的棉纺织联合企业、费尔干纳人造纤维厂、纳曼干人造丝织品联合工厂、浩罕制革厂等。在此期间还发展了飞机、拖拉机和日用冰箱的制造工业。

乌兹别克的灌溉农业历来发达，这一时期又建成了安集延水库、卡尔希运河、图亚穆尤水利枢纽等大型工程。在阿姆河下游建设了水稻生产基地，建设了饥饿草原、卡尔希荒漠和苏尔汉河盆地垦殖灌溉系统。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乌兹别克共和国出现了纳沃伊、希林、扎拉夫尚、于奇库尔干、恰尔瓦克等新兴城市。

吉尔吉斯共和国建成的主要工程项目有：装机120万千瓦的托克托古尔水电站、装机80万千瓦的库普赛水电站、伏龙芝中央热电站、奥什和托克马克的棉纺织厂、伏龙芝化工机械厂，以及生产汽车、电机、机床的机械厂。随着水电站建设兴起了卡拉库尔等城市。

土库曼共和国主要是开发天然气，沙特雷克特大型气田等一批气田和拜拉姆阿里—阿什哈巴德—别兹梅因输气管道、沙

特雷克—乌拉尔地区输气管道建成。西部地区油田扩大了开采规模，查尔朱炼油厂竣工。建成的其他重要企业有：马雷国营地区发电站（装机126万千瓦）和别兹梅因国营地区发电站等一批发电厂，土库曼氮肥厂、塔沙乌兹石墨电极厂、查尔朱磷肥厂（扩建）、阿什哈巴德棉纺织联合企业（改建）等。卡拉库姆大运河第四期工程继续修建。

塔吉克共和国建成了装机270万千瓦的努列克水电站、戈洛夫纳亚水电站，杜尚别、亚万热电厂，装机360万千瓦的罗贡水电站在加紧建设。建成的其他重要企业包括：列加尔（今图尔松扎德）铝厂、阿尔滕托普坎铅锌矿（扩建）、瓦赫什氮肥厂、亚万化工联合企业、阿德拉斯曼锻压设备厂、杜尚别棉纺织联合企业（扩建）、列宁纳巴德（今苦盏）合成纤维厂等。70年代中期组建了南塔吉克区域生产综合体，主要有努列克水电站、戈洛夫纳亚水电站（以及在建的罗贡水电站）、列加尔铝厂、亚万化工联合企业等企业。修筑了库尔干秋别至库利亚布的铁路。亚万谷地和丹加拉草原的灌溉农业开发也开展起来了。塔吉克境内出现的新兴城市有亚万、努列克、阿德拉斯曼等。

经过几十年努力建设，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亚地区许多产业成为具有全苏联意义的重要产业，许多工农业产品在苏联占有重要地位。

哈萨克共和国成了苏联重要的重工业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它的铅、锌、铜、黄磷、磷肥产量居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首，石油、羊毛的产量和谷物收购量居全苏联第二位，煤炭、钢铁、电力、肉类的生产量居全苏联第三位。哈萨克的重型机械、农业机械、压力机、机床制造业在苏联占有重要位置。哈萨克的铁路、等级公路总长居全苏联第三位。共和国整体经济实力居全苏联第三位。

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经济实力在中亚地区仅次于哈萨克，在

全苏联居第四位。在工业方面，乌兹别克的棉纱和棉花采摘和加工机械的产量居全苏联首位，棉织品和丝织品的产量居全苏联第三位，化肥、天然气的产量和发电量居全苏联第四位。此外，乌兹别克的有色金属工业和农业机械、纺织机械制造在苏联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方面，乌兹别克共和国生产的棉花历来居苏联第一位，还是苏联有名的蔬菜和水果产地，生产的羔皮居苏联首位。

吉尔吉斯共和国发展最快的是重工业部门。在苏联排得比较靠前的部门有有色金属加工、水力发电和某些专用机械制造以及毛纺织工业。畜牧业发达，羊毛产量居全苏联第三位。

土库曼共和国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是天然气开采，产量居全苏联第二位，石油产量也居第四位。化学工业在苏联也占重要地位。棉花和羔皮产量居全苏联第二位。

塔吉克共和国的水力发电、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在苏联占有相当地位，水力发电量居全苏联第二位。棉花产量在全苏联居第三位。

与苏联全国一样，中亚地区在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经过多年累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中亚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使中亚经济同样陷入一种“停滞”的境地。

中亚地区的经济问题，有些与苏联全国的问题是基本相同的，有些则是中亚地区所特有的。中亚地区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减慢，而虚报产量和夸大成绩成风。

例如，哈萨克共和国工业发展的速度，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还是8.4%，以后不断下降，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年）降为3.8%；

同期，国民收人的年均增长率也由4.4%降为1.4%。[1]哈萨克斯坦的农业一直得到苏联领导集团的重视，1979年每个农业就业人员拥有的农业机械动力为41.7马力，高出全苏联平均值（22.9马力）将近一倍。[2]可是，这也没有使哈萨克的农业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较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28%，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了15%，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增加了0.1%。[3]

中亚其他共和国普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但是像哈萨克一样，中亚各共和国也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虚报产量和成绩的问题，所以从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还不能看出发展速度放慢的实际程度。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人虚报棉花产量就是一个典型。在东窗事发之前，他们上报国家收购的籽棉已经超过600万吨。从70年代中期起，勃列日涅夫几乎每年都要致电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领导人，表示祝贺和鼓励。1981年11月25日，勃列日涅夫的最后一次电报是这样说的："共和国的棉农再次达到了高指标。他们收摘并向收购站送去了600万吨棉花，其中有37万吨是最珍贵的细长纤维品种。这是对发展我国经济的巨大贡献。"[4]

虚报成绩、欺骗国家和人民的问题在中亚其他共和国同样严重，只是当时没有揭露出来罢了。哈萨克共和国是勃列日涅夫最青睐的一个共和国，他年年打电报给哈萨克领导人，祝贺他们给国家仓库"装进"的粮食不断增加。但是实际情况如何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97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7卷，第59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③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54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④《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8集，第48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呢？纳扎尔巴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确实认真到农场做了调查的人，会对缴售大量粮食产生怀疑。通常在收割开始前就以各种借口不让他们介入了。为的是防止有人搅乱人心，并使其他人不敢造次。……我愈是深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就愈加对农业中的虚假成就看得更加清楚，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就是因这虚假的成就而获得荣誉的。"[①]

第二，中亚的工农业生产大多是粗放经营，经济效益低下，浪费惊人，而70年代中期以后问题更加严重。

哈萨克共和国是中亚最大的工业国，但是它的工业以采矿和矿产品加工为主，其资金消耗率始终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首，而利润偏低。与苏联平均水平相比，哈萨克共和国每一卢布工业产值所需的投资要高出40%~50%。[②]矿产资源浪费极为严重，大量贵重金属丢弃在矿渣中没有综合开发利用。有资料披露，有色金属的资源浪费在50%以上。[③]

农业也是一样。1981~1985年间，农业大国哈萨克有53%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处于亏损状态。[④]而且，越是丰收浪费越严重，尽管每年动员了大批学生、军人和工人帮助收割，哈萨克斯坦因运输落后和仓储不足而损失了20%~40%的成熟谷物。[⑤]哈萨克共和国的农业投资效益在全苏联属于较低行列，纳扎尔巴耶夫在1986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最近10年里，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超过320亿卢布，生产基金增加了80%，肥料供应增加了1.4倍，农业产量仅增加了23%。劳动生产率未见增长。"[⑥]

中亚其他共和国同样存在浪费大、效益低的问题。例如，

①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17~11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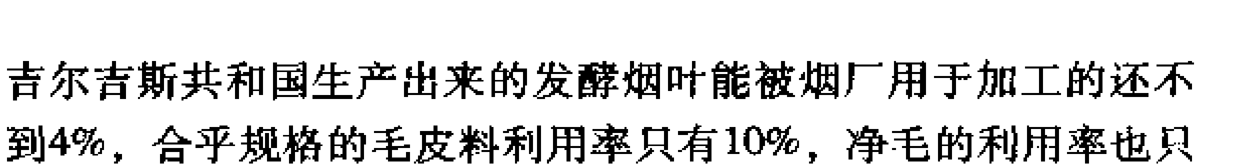
②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18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18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55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⑤ Е.К.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197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⑥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4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吉尔吉斯共和国生产出来的发酵烟叶能被烟厂用于加工的还不到4%，合乎规格的毛皮料利用率只有10%，净毛的利用率也只有30%，其他再生原料利用率也很低。①

第三，中亚地区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没有得到解决，相反，由于苏联不断强化地区专业化分工，中亚各共和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更突出了。

哈萨克共和国每年从地下开采出数以亿吨的矿产品，一般只经过了初级加工，然后大量外运。它的机器制造业发展较快，但是在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例如，采矿业十分发达，采矿设备却几乎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运进来的。

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共和国的耕地绝大部分用来种棉花，粮食需要大量调入，如果这以专业分工还说得过去，那么每年大量皮棉运到几千公里以外去纺纱织布就很不合理了。尽管乌兹别克等共和国的棉纺织工业有一定发展，但远远没有赶上棉花生产的步伐。

根据苏联专业化分工，中亚地区主要生产矿物、燃料、谷物、棉花、羊毛、肉类等初级产品，这些产品主要运往苏联欧洲地区，因此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经济交流并不是很密切，相反与俄罗斯联邦的物资交换很紧密。这种舍近求远的方式，给交通运输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些工艺简单而又需求量大的日用消费品也要大量运进来，付出的成本是很不合算的。结果日用消费品总是短缺，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第四，中亚地区各共和国经济管理权限自取消经济行政区以后就减少了一大半，后来一直没有改变，重要的经济活动都由联盟中央来安排。

哈萨克是苏联第三大工业生产共和国，但是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直接掌握在联盟中央手里。共和国无权过问境内骨干企

①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第22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业的生产经营，这些企业产生的利润也几乎不纳入共和国预算。但是这些企业能为共和国带来配套产业和农副产品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所以各共和国还是竭尽努力从联盟中央争取投资项目，当然更愿意争取由联盟财政拨款而由共和国管理的项目。每当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审议共和国计划期间，其办公大楼门庭若市，请客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区域生产综合体的命运充分暴露了这一体制的种种弊病。根据有关规定，区域生产综合体由所在地共和国负责组建，但是在综合体内建立和发展哪些企业，却由苏联有关部提出建议，再由苏联国家计委编制极严格的实施规划。而且，区域生产综合体内的企业由不同的主管部门管理，它们相互间也难以协调。这么多矛盾交织着，所以苏联的区域生产综合体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在中亚地区更是如此。

中亚各共和国当局希望能改变这种局面，不过一般都不公开阐明自己的态度。1973年6月，乌兹别克共和国计委主席发表文章，抱怨一些联盟部下达企业发展方案和修改计划不同共和国商量。他主张："国家计委只有在加盟共和国代表参加下才能研究和制定各工业部门发展计划的方案。"他还要求进一步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某些权利。①

第五，中亚地区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影响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隐患。

前面说过，中亚地区是全苏联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地区。由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容纳不了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就业，而中亚就业率低的本地居民很少到外地去工作，因此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哈萨克的情况要比其他四个共和国明显好一些）。结果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苏联全国粗放型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增加大批劳动力，但又苦于劳

① 柯雄编：《苏联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纪事》（1953~1973），第614~615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动力严重缺乏；另一方面，中亚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又不愿离开故土。中亚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因此人均国民收入远远低于苏联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收入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些。

第六，由于片面追求开发，中亚地区出现资源枯竭的现象，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长时期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发，使中亚地区各共和国许多宝贵资源日益枯竭。例如哈萨克的有色金属、土库曼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乌兹别克的天然气到80年代因储量不足出现连年减产。而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三个共和国的煤炭和有色金属资源更是接近枯竭。

中亚地区是苏联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这里分布着苏联境内惟一的大片干旱荒漠。由于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用水激增，阿姆河和锡尔河上中游拦截和取走的水量巨大，因此加剧了下游的干旱和盐碱。到80年代为止的20年时间里，咸海因来水量剧减水面下降了14米，水面面积缩小了40%，水量减少了65%。[①]后来，情况更加恶化，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说："在20~25年的期间里，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系之一——咸海消失的见证人。"[②]此外，由于过度开垦和放牧而引起的土地沙化面积也越来越大。

总之，中亚地区的经济到80年代初中期像苏联全国一样，已经是问题丛生，迫切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人们也普遍感觉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当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宣布立即开展全面经济改革以后，得到中亚各国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①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58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② 伊斯拉姆·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第9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

第九章
全面改革和苏联解体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全面改革的启动和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

1985年3月1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戈尔巴乔夫（М.С.Горбачёв）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接替了前一天去世的契尔年科（К.У.Черненко）。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比他的前任整整年轻20岁，从而结束了苏联长期以来领导人老化的局面。苏联人民把摆脱国家“停滞状态”的希望寄托在新任总书记身上。戈尔巴乔夫决心不负众望，上台伊始就倡导改革。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苏联的改革迅速铺开，对沿袭了50多年的苏联旧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了有力冲击。

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可以看做是苏联全面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为了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对原有的干部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因而使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出现了动摇。

最初，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沿用安德罗波夫的做法，



企图通过整顿秩序的手段加速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后来，他们采用"新体制"改革的加强经济核算和物质刺激的方式，给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增加一些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但是苏联的经济改革成效并不显著，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由于干部推行改革方针不力造成的，于是把重点转向干部政策的调整上来。

其实，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让那些年老体弱、思想保守的领导人，还有他的政治对手们一批接一批地"下岗"了，同时提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支持改革方针的人物。1987年1月以后，苏联把对干部政策的调整作为中心环节来抓，但是同样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苏联的中亚地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不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几十年来，中亚地区与周边国家如中国、阿富汗、伊朗来往不多，有时处于隔绝状态，即使与苏联其他地区也缺乏足够的交流。因此，中亚地区的改革起步要慢一些，而且阻力也要大一些。以中亚地区领导人为例，当时各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是几朝元老，如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 Кунаев）、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Турдакун Усубалиев）、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加普罗夫（Мухамедназар Гапуров）。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Инамжон Усманходжаев）和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纳比耶夫（Рахман Набиев）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在此之前在共和国担任领导职务也有多年，何况乌斯曼霍贾耶夫很可能是"拉希多夫案件"的漏网之鱼。在这些人治理下的中亚戈尔巴乔夫要推行全面改革，当然会困难重重。

为了清除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集团

利用旧体制赋予他们的中央集权权力，撤换了中亚各共和国差不多所有的主要领导人。撤换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决定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出的，但是形式上是通过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完成的。

1985年11月2日，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退休，选举伊塞克库利州党委第一书记马萨利耶夫（Абсамат Масалиев）为吉共中央第一书记。12月14日，塔吉克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解除纳比耶夫的第一书记职务，选举部长会议主席马赫卡莫夫（Кахар Махкамов）为塔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实比戈尔巴乔夫仅仅年长一岁的纳比耶夫身体健康（何况后来他还一度东山再起），解除他的职务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12月21日，土库曼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宣布，第一书记加普罗夫退休，选举当年3月开始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尼亚佐夫（Сапармурат Ниязов）为土共中央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任职到1988年初，因受到各种指控后提出退休。1986年1月12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选举尼沙诺夫（Рафик Нишанов）为乌共中央第一书记。上述中亚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更迭都显得相当顺利，社会反应也相当平静。但是，苏共中央在更换哈萨克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的地位是中亚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因为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老资格的委员之一。据说，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前与库纳耶夫在政治局共事并不和谐。[①]而且改革开始以后，哈萨克共和国领导层内部对库纳耶夫提出了种种批评和指责，完全是考虑到哈萨克这么一个大共和国的稳定，暂时没有触动他。198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

①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1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库纳耶夫继续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苏共代表大会前夕举行的哈萨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作了例行报告。但是他的报告一反常态，花了很多篇幅谈论共和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工农业生产完不成计划任务、领导干部虚报成绩、经济活动中浪费严重、不少领导人以权谋私等等，甚至点名批评了库纳耶夫的胞弟、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阿·库纳耶夫（Аскар Кунаев）。[①] 报告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会场内掌声热烈。


阿拉木图共和国广场

尽管如此，可是惹恼了库纳耶夫，因为纳扎尔巴耶夫所讲的这些内容事先并没有同他商量，而且批评的矛头指向他本人。

库纳耶夫再次当选为哈共中央第一书记，他发动自己的追

① 努·阿·纳扎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38~14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随着孤立、打击纳扎尔巴耶夫，同时向苏共中央正式提出解除或调动纳扎尔巴耶夫的职务的要求，纳扎尔巴耶夫也被迫提出辞职申请。可是，戈尔巴乔夫和主管干部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Е. Р. Лигачёв）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真理报》在报道哈共代表大会的有关消息时也明显站在纳扎尔巴耶夫一边。[①]

哈萨克共和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首脑再也难以共处下去，这给苏共中央着手解除库纳耶夫的职务提供了一个理由。同时，库纳耶夫毕竟是75岁的老人了，让他退休是一种体面的安排。纳扎尔巴耶夫比库纳耶夫年轻28岁，而且在哈萨克共和国工作成绩显著，声望颇高。但是库纳耶夫极力反对由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除了照顾库纳耶夫的面子以外，还出于其他的考虑也没有让纳扎尔巴耶夫"接班"。

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在物色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人选时，没有从哈萨克共和国现任领导人当中考虑，也没有同他们进行商量或征求意见。1986年12月1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库纳耶夫缺席的情况下，决定调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科尔宾（Г.В. Колбин）担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科尔宾是俄罗斯人，他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是时隔20多年以后再次打破了由命名民族的干部担任中亚各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惯例，而且，科尔宾从未在哈萨克斯坦工作过。然而为什么选中了他呢？戈尔巴乔夫后来是这样解释的："尽管他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党委会工作时间不长，在那里我们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而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出

①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80~81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于对他的生活经历、从事党的工作经验的考虑，以及对他的政治品质和个人品质的确认，我们推荐科尔宾担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①后来戈尔巴乔夫又披露，正是库纳耶夫本人提名科尔宾接替他的职务的，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哈萨克是一个多民族共和国，俄罗斯人很多，派科尔宾去那里当领导人并没有什么不合适。②正如雷日科夫所说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任命一个俄罗斯人担任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会引起民族情绪的爆发。③

1986年12月15日，科尔宾随苏共中央主管干部工作的书记拉祖莫夫斯基（Г. П. Разумовский）抵达阿拉木图。据纳扎尔巴耶夫说，他和哈共中央许多领导人是在飞机舷梯旁迎接时才得知任命科尔宾为他们的第一书记的。④

第二天（12月16日）召开的哈共中央全体会议同样离奇。首先由拉祖莫夫斯基宣布库纳耶夫退休，并且对他的工作进行了一番例行赞扬，接着进行“选举”，与会者一致举手同意苏共中央的“建议”：科尔宾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整个会议只开了18分钟！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无条件服从了苏共中央的决定。但是，哈萨克一些群众闻知这一消息后却自发地举行抗议，从而发生了震惊苏联国内外的“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

12月17日清早7点多钟，一群哈萨克青年约两三百人来到哈共中央办公大楼前的广场，聚会抗议任命科尔宾为哈共中央第一书记，要求当局对此作出解释。随后，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多，正午前后达到5000余人，基本上是哈萨克族居民，其中又

①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62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②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10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③ Н.И.雷日科夫：《改革：一部背叛的历史》，第200页，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

④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5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以大专学生为主。集会者高唱哈萨克歌曲，高举列宁的画像和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领袖”、“列宁的民族政策万岁”一类的口号。不少目击者证实，抗议集会是和平性质的，当时尚没有发生任何破坏行为。

但是，以科尔宾为代表的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感到异常紧张和突然，认为这是民族主义者的严重挑衅行为，于是动用内务部队和警察封锁广场。同时，当局派纳扎尔巴耶夫、卡马利杰诺夫（Закаш Камалиденов，时任哈共中央书记）等哈萨克族领导人与集会者对话。集会人群群情激愤，不久离开广场上街游行，纳扎尔巴耶夫等人为了稳住抗议民众的情绪，也参加了游行。

游行队伍遭到内务部队的拦截，于是人们又回到广场，重新举行抗议集会。当局调集更多的人员包括警察和消防学校的学员参加对现场的封锁，还有很多工人民兵在工厂待命。接着，广场上对峙的双方开始发生冲突，形势一触即发。

夜晚，苏共中央派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叶利索夫（Б.К Елисов）等人赶到阿拉木图，与科尔宾等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协同处理事件。他们作出了强行驱散集会人群的决定。

不久，20辆消防车开进广场，强大而凛冽的水龙射向聚会人群。愤怒的抗议者用石头、冰块还击，还推倒和焚烧了一些消防汽车。接着，手持铁锹、木棒，牵着警犬的武装人员出动了，在驱散行动中不少人受伤和被捕。

次日，大群抗议者继续在广场集会，情绪更为激动，当局增调部队参加封锁。双方在上午就开始发生冲突。下午，大规模的驱赶行动开始了。一位目击者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对集会人群的冲击和毒打开始了。人们四散逃走，许多被打倒在地的示威者被拖进了警车。（武装人员）揪住那些挨打和受伤的人的头发，倒拖他们的双腿。事情过后，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

迹。”[1]大约9点半左右，集会者最后被赶出了广场。

两天的冲突下来，双方共有768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平民。[2]公开报道有2名示威者死在医院。但是在1990年10月16日举行的一次公开对话中，2名前军人当众告诉一直为十二月事件得到平反而四处奔走的苏联人民代表沙哈诺夫（МШаханов），在十二月事件流血冲突中有168人死亡，其中155人是示威者，而且死者基本上是青年女性。[3]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的。

阿拉木图发生的抗议风潮很快波及到了哈萨克斯坦其他一些城市，杰兹卡兹甘、卡拉干达、塔尔迪库尔干、阿尔卡雷克、科克切塔夫、萨雷奥泽克、塔尔加尔、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等地也都有人被拘捕。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发生后，苏联官方和中亚当局就认定这是一起“民族主义事件”。媒体最初说参与抗议的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分子唆使下的部分没有觉悟的青年”，接着又说他们是“黑手党”、“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4]1987年1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把十二月事件定性为“哈萨克民族主义”。戈尔巴乔夫后来是这样解释这个决议的：“政治局当时通过的决议，其意图与其说是为了弄清楚事件的缘由，从而为自己汲取教训，倒不如说是想给哈萨克斯坦，从而也给其他民族上一堂课。当时遵循的现成概念是，一切都已走上团结友谊的正轨，惟一的危险是民族主义的抬头。”[5]但是官方尽量不扩散有关消息，连上述决议也只刊登在内部刊物《苏共中央通报》上。科尔宾次年3月在哈共中央作报告时也放低了调门，他说：“通过对那些

①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42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②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43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③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165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④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37~38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⑤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10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天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后，今天可以这样说，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进分子人数不多，而且没有组织。”①

话虽这么说，对参加抗议集会游行的哈萨克人的追究却没有停止，当时就有2401人被关进了警察局，而且绝大多数不是在广场上而是在逃跑的街道上甚至在公寓里被抓走的。据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调查委员会1990年提供的材料，最后的处理结果是：99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83人判了刑；707人遭到行政拘留，1400人受到行政警告；53人被开除出共产党，210人受到党纪处分；758人被开除出共青团，1164人受到共青团纪律处分；266名大学生被学校开除。②1998年出版的一本哈萨克斯坦历史著作提供的材料稍有出入：大约2400人遭到拘捕，其中1722人受过体罚。99人受到刑事追究，309名大学生被学校开除，758人被开除出共青团组织。③阿拉木图建筑学院学生雷斯库尔别科夫（Кайрат Рыскулбеков）因被控打死一名民兵而被判处死刑。1987年6月22日，《消息报》公布的处理结果只提到雷斯库尔别科夫判了死刑，另有4人判了有期徒刑，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受到了惩罚，一些高等学校的负责人被撤职和开除出党。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的诱因无疑是苏共中央决定让一位俄罗斯人担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因为此举破坏了由哈萨克人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惯例。但是仅以“哈萨克民族主义”评价这一事件未免过于简单，因为集会人群没有反对现行制度和现任政府的意图，也没有提出反对其他民族的主张，他们只是受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精神的鼓舞，要求让一位哈萨克

①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58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②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45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③ Ж.Б.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65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人来当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不过，在集会和游行时，人们提出的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除了纳扎尔巴耶夫等哈萨克族领导人以外，还有几位俄罗斯族的共和国现任领导人。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唤起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他们要求领导人在作重要决策的时候应该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呼声。

纳扎尔巴耶夫给予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的评价是很高的。1996年他写道："1986年12月事件表明，哈萨克青年的自觉意识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率先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青年们代表自己的人民公开声明，将不再允许践踏任何民族所固有的民族自豪感。"[①]而他本人1991年对事件的评价是：在肯定青年们行动的同时，也赞成当局的驱逐行为："采取了应当采取的行动，是因为社会局势极度紧张。流氓分子、极端分子混入了人群。"[②]

随着改革的深入，哈萨克斯坦要求重新评价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的呼声越来越高。后来，苏共中央撤销了把事件定性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决议。1990年6月，哈萨克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也强调十二月事件"不是民族对抗的表现，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或某个其他民族的人们的事件"。[③]哈萨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十二月事件真相。

1990年9月，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当时的集会是和平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当局把它视为对现存政权和制度的威胁，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结果导致悲剧的发生。报告指出："十二月事件的罪魁祸首是行政命令体制"，至于对此事件负有责任的某些个人，其罪责在于"滥用权力和错误地履行

① 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第22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努·阿·纳扎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努·阿·纳扎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61~1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所谓义务”。[1]报告还列出了科尔宾等44名“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名单。报告最后建议：对镇压行为进行谴责，撤销某些主要责任者的职务，成立特别法庭审理镇压集会民众的刑事案件，为被害者进行平反，宣布12月17日为国家纪念日，等等。[2]

1990年9月24日，哈萨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基本上同意调查委员会所作的结论。决议认为：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不是民族主义行为，在最初阶段并不具有对抗的性质。青年们举行抗议的直接原因是联盟中央从各方面公然蔑视共和国居民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它按自己的意旨把一个改选之前在共和国鲜为人知的党务工作者派来当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3]决定还责成哈萨克共和国司法部门重新审理涉及事件参加者的案件，但是没有提及如何处理那些“负有责任的人”的问题。1990年12月17日，2万余人在阿拉木图共和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十二月事件四周年。

科尔宾刚到哈萨克共和国任职就碰上了抗议风潮，所以对此耿耿于怀，随后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他把纳扎尔巴耶夫等哈萨克族领导人排除在处理十二月事件的决策过程之外，因为集会游行群众提出的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纳扎尔巴耶夫，而且他还亲自参加了游行，库纳耶夫也指责他应对骚乱负责。但是科尔宾以及苏共中央并没有处分纳扎尔巴耶夫，可能是怕处分这位有威望的哈萨克族领导人会导致更大的动乱。

库纳耶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科尔宾指责他没有配合当局做平息事态的工作。库纳耶夫辩解说，他本来接通知后到了哈共中央办公大楼，可是科尔宾不让他与集会群众见面做解释工

①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9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②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13-16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③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3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作。[1]1987年1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M.C. Солменцев，曾担任过哈共中央第二书记）在中央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认定库纳耶夫对发生在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事件”负有责任。就在这次会议上，库纳耶夫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6月，库纳耶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他从大楼出来时，警卫人员收回了他的证件。这位老一辈党的活动家、共和国领导人就这样含着满腹冤屈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2]其实，要库纳耶夫对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负责确实是冤屈了他，作为勃列日涅夫体制的典型代表，库纳耶夫是坚定反对任何地方民族主义的，何况阿拉木图的哈萨克青年举行抗议并不是为了保卫库纳耶夫，甚至连同情他的因素也不明显。

因十二月事件受到处分的还有其他一些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1987年1月10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免除了米罗什欣（О.С.Мирошхин）的哈共中央第二书记职务，选举库巴舍夫（Садидулла Кубашев）为哈共中央第二书记。库巴舍夫是哈萨克人，这样出现了与惯例相反的安排。2月14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给予已免职的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阿·库纳耶夫严重警告处分，理由是他粗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任人唯亲。

科尔宾执政以后，除了清洗干部以外，还大张旗鼓地开展同“犯罪行为”的斗争、加强全面的书报检查、按照严格的民族成分比例录取大专学生，等等。同时，科尔宾为了抚慰哈萨克人，要求所有领导干部迅速掌握哈萨克语，甚至保证在下一次哈共中央全会上用哈萨克语作报告。根据1987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的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族际主义教育的决定，哈萨克共和国

① 《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第82页，阿拉木图1991年俄文版。

②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各级都成立了族际关系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防止一切“民族事件”，事无巨细都要查民族背景。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过去几十年来，“民族因素从未成为共和国民族间关系复杂化的原因”，经科尔宾这么一搞，“简直就是在挑动新的冲突”。[①]库纳耶夫对科尔宾的工作评价同样不高，说此人完全不懂哈萨克斯坦的文化、科学、艺术。“他没有顺利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党组织的才能。简单说，他没有坐对自己的位子。”[②]可是，苏联领导人对科尔宾的评价却不一样，5月6日，科尔宾获得列宁勋章，这是对他为党和国家所作出的贡献的表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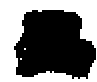
除了最高领导人的更迭以外，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中亚各共和国其他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换班。1985年9月，年迈的阿希莫夫（Байкен Ашимов）辞去哈萨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由曼格什拉克州党委第一书记穆卡舍夫（Саламат Мукашев）接任。1986年1月4日，塔吉克共和国一位部长哈约耶夫（Изамулло Хаёев）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月9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以“粗暴破坏党的生活原则和准则”、“滥用职权”等罪名开除了5名中央委员和2名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解除了乌共中央第二书记奥谢特罗夫（Т.Н.Осетров）和中央书记艾特穆拉托夫（Ережеп Айтмуратов）的职务。1986年10月，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亚佐夫在中央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塔沙乌兹州党组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并处分了一批人，此举为尼亚佐夫赢得了很高威望。

在苏联全面改革的第一阶段，整个中亚地区的局势总的来说还算比较平静。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平息下去以后，哈萨克

---

①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94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斯坦再也没有出现如此大的政治风波。但是要看到，苏联传统的旧体制在中亚积累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这个阶段一个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1985~1986年，各个方面都曾响起了警钟：国家处于危机前状态。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然而却未能避免危机”。[①]矛盾和危机在继续发展，而苏联及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谈不上采取得力的措施。当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各种矛盾和冲突全面爆发出来了。

第二节 中亚政治体制改革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苏联全面改革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与代表大会不同）开始的，到1990年3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为止。在这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重心从经济体制转向了政治体制：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针指导下全面改组国家政权机构、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切实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等等。但是由于改革缺乏明确而一贯的目标，没有得力的政策措施，因此导致苏联国内局势出现剧烈的动荡：苏联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并且开始失去执政地位，“非正式组织”（反对派的政治组织、民族主义政党等）如俄谚所说的“像雨后蘑菇一样”涌现出来，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越来越频繁，民族间的武装械斗愈演愈烈，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日益扩大，国民经济危机四伏，等等。中亚各共和国同样开始步入一个局势混乱的阶段，不过较之苏联全国还算稳定一些。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就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一

① 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系列重要决定，目的是实现国家政治生活和共产党内部生活的“民主化”。代表会议闭幕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苏联全面迅速地铺开了。

根据苏共中央的安排，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革选举制度。1988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自由选举的立法，规定新设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通过秘密投票产生，第一次享受到自由选举权的苏联顿时爆发了热闹非凡的“选举战”，为数众多的“非正式组织”为了竞选频频举行集会游行，向苏共的传统权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1989年3月26日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投票中，不少苏共领导人物落选（另有100名代表由苏共组织推举），而一批反对派人士却成功当选，比如被撤职的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叶利钦（Б. Н. Ельцин）就以高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中亚各共和国主要领导人都顺利地当选（或被推选）为人民代表。

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此前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成为苏联“最高公职人员”。叶利钦最终也当选为最高苏维埃成员。雷日科夫（Н. И. Рыжков）连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但是他提出的部长名单中不少人被人民代表否决，这在苏联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问题以外，苏联的民族问题突然间变得空前尖锐起来了。长期受压抑的苏联各少数民族初次接触到民主化的空气，首先想到的就是实现本民族的完全自治甚至独立（波罗的海三国最先提出这类要求），在某些民族杂居地区（如外高加索和中亚）还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在此之前，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执政集团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例如，198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就宣

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①]阿拉木图十二月事件也没有动摇他们的看法。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等人才看到了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不断地开会通过决议，发表声明，企图缓解国内的民族矛盾。由于缺乏得力的措施，苏联的民族问题最终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以后，中亚各共和国走上了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的改革进程。在改革过程中，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权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和国的权力中心由共产党中央向最高苏维埃转移，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不过都是由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第一次真正能履行自己的法定权力——对共和国政府（部长会议）实行监督和领导。与此同时，对政府机构尤其是共产党的机关进行了大幅度精简。

在这期间，中亚各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领导人人事变动。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在1989年5月召开的哈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原第一书记科尔宾已经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这是苏共中央为安定哈萨克斯坦的局势而刻意作出的安排。

1990年2月22日，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为哈萨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从而成为共和国法定的最高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是苏联全面改革期间成长起来的重要政治活动家。纳扎尔巴耶夫1940年出生于阿拉木图州一个哈萨克族农牧民家庭，青年时毕业于乌克兰一所技工学校，后来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毕业后，纳扎尔巴耶夫来到卡拉干达钢铁联合工厂当炼钢工，1962年加入共产党。1973年起，他历任工厂党委书记、卡拉干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达州党委第二书记、哈共中央书记。1984年3月起，纳扎尔巴耶夫历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几次连任共和国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长期在哈萨克共和国担任领导人至今。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误导致的混乱时期，哈萨克共和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在哈萨克斯坦居住的100多个大小民族基本上相安无事，因此纳扎尔巴耶夫赢得了哈萨克斯坦各族居民的支持和拥戴。苏联不少知名政治人士与国际社会对他也是好评如潮。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我早已注意观察纳扎尔巴耶夫这个人了，我很欣赏他的务实肯干的精神。"①苏联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В.А. Крючков）的评价更高："纳扎尔巴耶夫执掌了共和国的领导权，他不仅受到本国人民的重视，而且很快就名扬世界。"②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eck）曾两次会见纳扎尔巴耶夫，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可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纳扎尔巴耶夫既有能看到必须作什么的洞察力，又具有如何把事情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的准确的理解力。"③

在1990年1月，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亚佐夫当选为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1940年生于阿什哈巴德，土库曼族人。19岁时尼亚佐夫参加工作，后到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当过工程师，1970年进入土共中央机关工作。从1980年起，尼亚佐夫历任阿什哈巴德市党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组织党务部指导员。1985年先后担任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和土共中央第一书记，1990年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几次连任共和国总统至今。在尼亚佐夫领导之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第4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第453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209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下的土库曼斯坦，是苏联改革年代局势最稳定的共和国，经济状况也是最好的。尼亚佐夫在土库曼共和国居民中的威信很高，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是当时西方人士对他在国内推行的政策颇有微词。①

1989年6月（当时发生了严重的民族流血冲突），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易人。尼沙诺夫被免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他担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卡什卡达里亚州党委第一书记伊斯兰·卡里莫夫（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当选为乌共中央第一书记，从此成为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至今。

卡里莫夫1938年生于撒马儿罕市，乌兹别克族人。他先后就读于中亚工学院和塔什干国民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0年参加工作后，当过工程师和主任设计师。卡里莫夫1964年加入共产党，后来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先后担任过共和国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财政部部长、卡什卡达里亚州党委第一书记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多次连任共和国总统。

卡里莫夫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拥有无人可比的权威。克留奇科夫认为，卡里莫夫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对苏联的局势失控"感到痛心"，"他指出，乌兹别克不准备使'民主化'的步子过快，主张逐步变革"。②但是西方有些人士指责卡里莫夫在国内不够民主。③

在这个阶段，中亚其他重要的领导人变更包括：1988年5月，哈共中央书记卡马利杰诺夫接替穆卡舍夫担任哈萨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哈比布拉耶夫（Пулат Хабибулаев）接替尼沙诺夫（已担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担

①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第83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第452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第83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任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以后，苏联定于1990年3月举行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为了参加这次选举，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不过，在中亚各共和国这类组织还算是比较少的，而且影响都不大。

哈萨克共和国早在1987年就出现了一些非官方组织，多是反核环保运动或民族文化与历史启蒙协会一类组织，后来出现了不少政治团体。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3月，哈萨克共和国成立的政党和政治性组织共103个。[①]这些组织大多按民族成分组成，如“十二月党人”、“阿拉什”等均为哈萨克族政党，斯拉夫民族也有自己的政党，后来逐渐形成几个主要政党。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到1990年春成立了“比尔里克”（统一）人民运动、“艾尔肯”（意志党）、伊斯兰复兴党等政党。“艾尔肯”为自由知识分子政党，当时支持卡里莫夫，而伊斯兰复兴党遭到当局禁止。

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个共和国当时虽然有许多“非正式组织”，但还未形成政治上能有所作为的政党。1990年8月成立的塔吉克民主党后来在共和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成为挑起内战的党派之一。在土库曼共和国，局势牢牢控制在尼亚佐夫手里，根本不存在值得一提的反对派组织。

尽管反对党派数目众多，但是势力相当分散，而且没有比较成熟的纲领，其中不少是不太得人心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宗教党派。此外，反对党的领袖们一般都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因此，中亚政治舞台上新近涌现出来的众多党派还不能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威胁。

在1990年3月下旬举行的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

① Ж.Б.阿贝尔霍仁：《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第270页，阿拉木图1998年俄文版。

举中，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12个共和国都是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在中亚5个共和国的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其中在哈萨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当中，共产党占有87.8%的席位，乌兹别克共产党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拥有的席位更是高达90%。

中亚各共和国共产党虽然牢牢地控制着本国的政权，但是它们没能阻止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仇杀。1989年，中亚一度成为苏联民族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亚地区每个共和国都是多民族杂居区。中亚的穆斯林各民族聚居区本来就犬牙交错，加上大量的斯拉夫移民搀杂其中。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国家划界，许多命名的民族被划入不同的共和国版图，后来又有大批的各族移民进出中亚地区，因此造成中亚各共和国命名民族所占比例不大的状况。

据198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哈萨克共和国人口总数为1649.4万人，共有130个民族或民族集团。其中：哈萨克人653.5万人，占总人口的39.7%；俄罗斯人622.8万人，占总人口的37.8%；德意志人95.8万人，占总人口的5.8%；乌克兰人89.6万人，占总人口的5.4%；乌兹别克人33.2万人，占总人口的2%；鞑靼人32.8万人，占总人口的2%。[①]其余为维吾尔人、白俄罗斯人、朝鲜人、阿塞拜疆人、波兰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希腊人、东干人、亚美尼亚人、吉尔吉斯人等。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族居民人数首次超过俄罗斯人，成为共和国第一大民族。

1989年，乌兹别克共和国总人口为2066万人，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共和国，共有120多个民族。其中：乌兹别克人1470万人，占总人口71%；俄罗斯人162.4万人，占总人口8%；塔吉克人101.5万人，占总人口5%；哈萨克人81.2万人，占4%。与前几

① 郝文明主编：《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第100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次人口普查相比，只有俄罗斯人所占比例明显下降（人口绝对数量也少于1979年），另三个民族的比例都有所上升。[①]其他人口较多的民族有鞑靼人、卡拉卡尔帕克人、朝鲜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

吉尔吉斯共和国共有80多个大小民族。1991年总人口437.2万人。其中：吉尔吉斯人约229万人，占52.4%；俄罗斯人约94万人，占21.5%；乌兹别克人约56万人，占12.9%。[②]另外，人口较多的民族有乌克兰人、德意志人、鞑靼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东干人、塔吉克人等。

1990年，土库曼共和国总人口360万人，由100多个民族居民组成。其中：土库曼人259.2万人，占总人口72%；俄罗斯人36万人，占10%；乌兹别克人32.4万人，占9%；哈萨克人10.8万人，占3%。[③]另外，乌克兰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是人口较多的民族。

塔吉克共和国境内居住着86个民族的居民，在510.86万人（1989年）中，塔吉克人有317.24万人，占总人口的62.1%；乌兹别克人119.78万人，占23.5%；俄罗斯人38.85万人，占7.6%。[④]其余主要有鞑靼人、吉尔吉斯人、乌克兰人、德意志人、土库曼人、朝鲜人、哈萨克人。

中亚各共和国虽然都是多民族杂居共和国，但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长期以来各民族相处得比较和睦，对外来移民甚至流放来的民族也没有实行歧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维埃政权有能力控制局面，另一方面长期的民族团结和友谊的宣传

① 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据第157页和第226~241页综合得出上述数据，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第257~25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第339~3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 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第396~3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教育起了作用。可是到1989年前后，中亚各共和国局势开始出现失控，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挑唆下，一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居民滋长了排外思想，终于因土地、水源纠纷和就业竞争与其他民族居民发生了严重冲突。

1989年5月2日，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儿罕州一个村庄的乌兹别克人与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发生斗殴，当局很快平息了这里的事件，可是5月下旬同样的斗殴在费尔干纳州库瓦赛市发生了。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尼沙诺夫还在说"乌兹别克人对待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像亲兄弟一样'"。[①]实际上两个穆斯林民族（不过乌兹别克人属逊尼派，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属什叶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6月3日，费尔干纳州塔什拉克区约400名乌兹别克族青年聚众闹事，他们高喊"把乌兹别克还给乌兹别克人"、"绞死土耳其人"、"乌兹别克伊斯兰共和国万岁"等极端口号，连续两日进行破坏性活动，并袭击警察，结果有40多座民房被烧，一家商店被砸，多辆汽车被毁。两天的冲突造成120人受伤，警察逮捕了50名肇事者。但是从6月5日起，骚乱迅速蔓延到费尔干纳市、马尔吉兰、库瓦塞等地。到6月8日，费尔干纳州的民族冲突已演变为反政府的暴力行动，当局把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紧急转移，大约1.5万名难民从费尔干纳盆地逃到了山前地带。

6月10日，大约350~400名乌兹别克族极端分子乘车前往福贾纳山谷攻打临时难民营，他们烧毁不少民房和办公楼房，殴打难民。苏联当局紧急派出4架武装直升机运送军队赶往冲突地点，事态才得以平息。到6月12日，总共发现了87具尸体（其中大多数是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军警逮捕了147名肇事者，近2000名麦斯赫特土耳其人被送进军营避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① Н.И.雷日科夫：《改革：一部背叛的历史》，第218页，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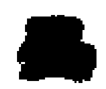
雷日科夫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В.М.Чебриков）当天赶往费尔干纳处理善后事宜。

在5~6月的乌兹别克民族械斗中，共造成95人死亡，1010人受伤，676座民房被烧毁，26个国家机关被袭击，186辆汽车被毁坏。为了平息这场骚乱，苏联当局出动了1.1万名内务部队官兵对费尔干纳州实行宵禁，逮捕了439名不法之徒，收缴了7718件武器。[①]这次骚乱后，中亚地区很多麦斯赫特土耳其人被陆续迁往俄罗斯联邦中部地区。但是，他们坚持要返回在格鲁吉亚的故土，为此在1990~1991年间举行了很多次请愿、示威和游行，最终还是没能如愿以偿。

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民族冲突刚刚平息，哈萨克共和国又出事了。1989年6月16~17日，曼格什拉克州石油城市新乌津的哈萨克人同高加索移民（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列兹金人）发生械斗，起因是当地的哈萨克人认为高加索移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他们“优越得多”。哈萨克人举行游行，要求把高加索移民迁至城外，并关闭他们的合作社。当地警察一度制止了双方的冲突，可是入夜以后，大群手握棍棒、铁条和石块的哈萨克青年试图冲进市内务分局，并且袭击至关重要的供水系统。同时，约有5000~7000名哈萨克人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大楼前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把高加索人赶出境外。集会游行期间发生了打砸商店、烧毁汽车等暴力行为。当局一面组织移民撤离，一面采取断然措施。到6月18日，事件终于平息下去，而新乌津市党委书记被免职。

塔吉克共和国的民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1989年7月中旬，列宁纳巴德州伊斯法拉区因土地和灌溉纠纷发生塔吉克人与吉尔吉斯人的暴力冲突，双方共有数千人卷入，由于当局及时干

① 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第334页，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



预，才没有导致重大伤亡。

1990年初，一则流言在塔吉克共和国四处传播，说是苏联政府正准备把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的亚美尼亚难民迁移到塔吉克斯坦。2月11日，2000多名群众在杜尚别举行集会，对此表示抗议。示威者包围了塔共中央办公大楼，高呼反对口号，他们不顾有关负责人出面对移民消息的否定讲话，继续举行抗议，参加集会示威的人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愤，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政治动乱。2月12日，共和国当局宣布杜尚别市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可是警察和内务部队无力制止抗议人群的行为，而当地苏联驻军在兵营按兵不动，声称不打算介入这场冲突，共和国当局应当靠自己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因为驻塔苏军对1989年军队奉命镇压格鲁吉亚动乱而蒙受羞辱一事记忆犹新。这样，杜尚别的局势反而更加恶化。2月12日的冲突造成了37人死亡，80多人受伤。

2月14日，示威者成立了由反对派人士组成的“临时人民委员会”。2月15日，8000多人在塔共中央办公大楼前举行示威，要求共和国政府辞职，于是杜尚别市反对“移民”的骚乱迅速演变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在示威者强大压力之下，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赫卡莫夫、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帕拉耶夫（Гаибназар Паллаев）和部长会议主席哈约耶夫一齐提出辞职，但是塔共中央全体会议拒绝了他们的辞职请求。共和国当局再次宣布杜尚别市进人紧急状态，并且增调内务部队准备强行驱散示威民众。苏联政府派遣克格勃人员和空降兵部队赶到杜尚别进行弹压。到2月17日，杜尚别市的局面才基本平静下来。通过调查，对示威者提起了70起刑事起诉，许多人被判了刑。然而出于对局势不稳的担心，2万多名俄罗斯人在1990年上半年离开了塔吉克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也爆发了严重的民族冲突。1990年6月4日，

奥什州一个集体农庄的吉尔吉斯族农民要在一块“国有土地”上建造住房，而当地的乌兹别克人认为这块32公顷水浇地是属于他们的，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共和国首都伏龙芝爆发吉尔吉斯人的大示威，要求政府帮助自己的同族同胞，示威者砸毁了多家商店和许多汽车，共和国当局只得宣布伏龙芝市进入紧急状态。到6月7日，骚乱已造成48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天，苏联内务部部长巴卡京（В.В.Бакатин）宣布，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冲突已扩展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有发展成为两个共和国之间冲突的危险。不过，事态最终没有继续扩大，不久就被平息下去了。

到1990年下半年，中亚地区的民族暴力冲突明显减少。7月上旬，吉尔吉斯共和国贾拉拉巴德市发生吉尔吉斯人打死一名乌兹别克人的事件，结果导致5000多人上街示威。12月2日，乌兹别克共和国纳曼干市居民与驻军发生冲突，造成5名军人死亡。到1991年，这类流血的民族冲突基本上没有再发生了。

值得提出的是，中亚地区有一个共和国即土库曼共和国在这些年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暴力事件，这与尼亚佐夫总统牢牢控制着共和国的局势很有关系。

此外，克里米亚鞑靼人等被流放到中亚地区的民族争取返回家园的斗争，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原则鼓舞下重新高涨起来。从1985年秋开始，克里木半岛鞑靼人在莫斯科等地频频举行静坐、请愿、游行，要求回到克里木半岛。

1987年7月上旬，一群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克里姆林宫周围连续数日举行请愿和示威。7月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久拖未决的难题，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44年来我们积累了250卷要求恢复公正的签名和声明。”[1]会议认为，在克里木半

[1]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108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岛恢复鞑靼人自治共和国已经不可能了，除少数已经回去的人以外，其他的人要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妥善安置。7月23日，塔斯社发表公告，公布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克里米亚鞑靼人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是9名委员之一。后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成立了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委员会和苏联德意志人委员会。

7月末到8月初，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塔什干附近举行示威，结果都被苏联政府和地方当局强行弹压。苏联外交部还就美国外交官鼓动克里米亚鞑靼人进行反社会活动一事向美国驻苏大使馆提出口头交涉。

10月15日，葛罗米柯召集委员们开会，讨论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会议只是建议联盟、有关共和国和地方各级机构保证实行各项补充措施来满足该族居民的要求。

1988年2月4日，葛罗米柯又召集委员们举行例会，讨论上次会议提出的措施实施情况，实际上没有什么进展。

克里米亚鞑靼人继续他们的努力，不断地举行集会和示威。1989年8月17日，苏共中央公布的《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承认没有消除由于民族驱逐的不公正而造成的后果。事后，苏联政府虽然承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权利，但是实现这一权利困难重重，因为那里已经被俄罗斯、乌克兰等民族居住。经过无数曲折，到1991年6月，有13余万鞑靼人回到了克里木半岛。当时还召开了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宣布克里木半岛是鞑靼人的家园，他们对那里拥有主权，并且宣布成立一个由41人组成的自治机构。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自然没有了下文。

随着东欧剧变和德国重新统一，苏联的德意志人移居德国的人数明显增加。1990年前10个月，有10.5万苏联德意志人从中亚等地移民到了德国。另有2万名希腊人离开苏联中亚等地移居希腊。而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没有多少人回到了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

第三节　苏联走向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

从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苏联的全面改革进入最后阶段，也就是全面失败的阶段。1991年8月19日事件以后，苏联无可挽回地走向国家解体。

在这个阶段，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急速展开，全国局势出现全面失控。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款原文如下："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①]这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放弃了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地位，苏联从此实行多党制。苏联共产党自身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提出党的目标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在组织形式上由集中统一的政党向分权的联邦党演变。大会产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主要由15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组成，当时的中亚各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卡里莫夫（乌兹别克）、马萨利耶夫（吉尔吉斯）、尼亚佐夫（土库曼）、马赫卡莫夫（塔吉克）全都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政权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

① 《世界宪法全书》，第842页，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卢基扬诺夫（А.И. Лукьянов）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此职由国家元首变成了议长。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选举亚纳耶夫（Г.И.Янаев）为苏联副总统，同时把部长会议改为内阁，任命帕夫洛夫（В. С.Павлов）为总理。这样，苏联初步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权体制。

在经济领域，这一阶段苏联改革的主攻方向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然而由于缺乏起码的条件和准备，而有关各方（苏联总统、政府、顾问人员、俄罗斯联邦等一些共和国）为过渡方案争吵不休，结果任何一个方案都无法实施，相反国家的经济状态迅速恶化。从1985年起，苏联的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1990年出现了苏联历史上在和平时期的首次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了2%，国民收入下降了4%。1991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又下降了10%，国民收入下降了12%，对外贸易总额则猛降了37.1%。[①]中亚各共和国经济状况同样陷入了衰退的困境。

在民族国家体制方面，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6月12日被迫提出革新联盟体制，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因为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加盟共和国政权纷纷宣布自己是"主权国家"，连本是苏联的核心的俄罗斯联邦也发表了"主权宣言"。这正如纳扎尔巴耶夫所说的："俄罗斯宣布自己的主权，自然意味着苏联不可能按原先的结构再继续存在下去了。"[②]

一场人们称之为"主权战"的风潮就这样在苏联展开了。

---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第439页和第626页，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第27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包括中亚各共和国在内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在1990年内宣布为“主权国家”，而波罗的海三国还宣布了独立。在共和国的强大压力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政权一再作出让步。当年11月23日，新的联盟条约草案公布，根据这个草案，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空前扩展，而联盟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年底，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把新联盟定名为“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去掉了“社会主义”一词，仍然简称“苏联”。

为了遏止日益强大的分离主义趋势，苏联在1991年3月17日组织了一次全民公决，每个投票者对下面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结果投赞成票的人占了多数。在组织了全民公决投票的9个共和国当中，中亚五国无论参加投票人数的比例还是投赞成票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哈萨克共和国参加投票的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9%，其中投赞成票的为94%。其他四个共和国相应的数字分别为：乌兹别克95%和93.7%，吉尔吉斯92.9%和94.5%，土库曼97.7%和98%，塔吉克94%和96%。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只有75.4%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投赞成票的为71%。①

但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并没有有效地阻止民族分离主义的分离势头，戈尔巴乔夫于是加紧制订新联盟条约，并争取早日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正式文本经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之后于8月14日公布，条约规定“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并且预定8月20日举行首批共和国签字仪式。

不料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名联盟领导人组成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政变”，宣布在外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权而被停职，并且宣布在苏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第471~472页，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但是紧急状态委员会两三天后就被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激进势力击败。随后，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下令解散苏联共产党，借口是苏共领导人卷入了“政变阴谋”。叶利钦同时下令由俄罗斯联邦机构开始全面接管联盟权力。

尽管戈尔巴乔夫仍然为组建新联盟国家奔走努力，然而毫



江布尔市

无结果。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共和国的首脑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达成协议，决定以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联。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中亚五国）的首脑在阿拉木图签订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1991年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正式解体。

在苏联全面改革的最后阶段，中亚各共和国经历了与联盟

大体相似的命运历程，但是总的形势比联盟要稳定一些。1990年3月，中亚各国共产党赢得了最高苏维埃选举胜利，成为无可争辩的合法执政党。共产党在中亚各族居民中的威望提高了，权威也加强了，因此中亚各共和国内部局势逐步走向稳定，到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前，中亚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和各族居民间的流血冲突。

中亚各国的政权体制同样朝“三权分立”的方向演变。国家的权力中心由共产党组织机关向共和国政府转移，共产党则一步步变为议会党。虽然在法律上确认了多党制，但是中亚各共和国反对党势力一直相当弱小，没有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与此同时，政府机构也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普遍实行了总统制。总统是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后来的内阁总理）是政府首脑，直接受总统领导。最高苏维埃成了真正的议会，其主席就是议长。而且，在1990年苏联政局陷入混乱的时候，中亚各共和国步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后尘，陆续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自己为“主权国家”。

首先实行总统制的中亚共和国是乌兹别克。1990年3月24日，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卡里莫夫为共和国总统。6月20日，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紧随俄罗斯联邦之后颁布“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的主权在其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乌兹别克因而成为第一个发表主权宣言的中亚共和国。11月1日，乌兹别克共和国取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由总统负责的内阁行使政府职能。

1990年4月24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为哈萨克共和国总统。10月25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强调哈萨克共和国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和不可侵犯的”。

1990年8月22日，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表共和国主权

宣言，不久决定实行总统制。10月27日，土库曼共和国举行全民选举，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尼亚佐夫当选为土库曼共和国总统。

1990年8月25日，塔吉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主权宣言。11月29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塔共中央第一书记马赫卡莫夫为塔吉克共和国总统。

1990年3月选举以后，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4月10日选举吉共中央第一书记马萨利耶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10月，马萨利耶夫签署了实行总统制的法令，但是在10月28日选举总统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萨利耶夫败给了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阿斯卡尔·阿卡耶夫（Аскар Акаев）。

阿卡耶夫1944年出生于克明区农村，吉尔吉斯族。1968年在列宁格勒一所工业学院毕业后留校，当过研究员和高级教师，后到伏龙芝工学院当过高级教师和副教授。从1986年起，阿卡耶夫历任吉共中央科学和学校工作部部长、共和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90年10月当选共和国总统，以后多次连任至今。阿卡耶夫是惟一一个不是由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当选的中亚共和国总统，而且他强调吉尔吉斯斯坦应当走“既以资本主义的长处也以社会主义的长处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积极推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因此西方人士称他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中最出色的改革者”。[①]

1990年12月15日，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发表主权国家宣言，同时将国名由“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991年2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伏龙芝改名为比什凯克（原名为皮什佩克）。

中亚各共和国尽管都发表了主权国家宣言，而且选举产生

①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第83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了自己的总统，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中亚各共和国像另外一些采取了同样行动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打算脱离苏联而完全独立。相反，它们不希望看到苏联解体，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由拥有足够政治经济主权的共和国组成的新的联盟。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中亚各共和国不仅经济比较落后，而且苏联长期推行地区经济专业化分工的方针，导致中亚地区形成以生产原料和初加工为主的经济结构，经济上对联盟和其他共和国依赖极大。以哈萨克共和国为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采矿工业规模巨大，但加工产业部门和



比什凯克市

机械制造业在共和国国民经济结构的比重却低于全苏指标的一半。迄今共和国开采的1.42亿吨煤，2600万吨石油，80~9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以及生产的70%的生丝和72%的原棉，实际全都运出共和国境外加工”。[①]苏联一旦解体，原有的经济联系势必遭到破坏，本来经济就相对落后的中亚各共和国就会遇到难以解

① 努·阿·纳扎巴耶夫：《探索之路》，第192~1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决的困难，后果殊难预料。所以，在苏联全面改革的最后阶段，有些加盟共和国急不可待地宣布独立，有些则动摇不定，而中亚各共和国却尽量维持联盟国家。同时，由于联盟中央的威信和权力急剧衰落，但是它又把许多应该交付共和国掌握的经济权力死死抱住不放，因此中亚各共和国在维护苏联内部旧的经济联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其他共和国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并且开始探索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其他方面的合作。

1990年9月28日，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个中亚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等六个加盟共和国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讨论经济合作等问题。会议期间，吉尔吉斯共和国分别与立陶宛、拉脱维亚两个共和国签订了双边经济合作协定。这是中亚共和国第一次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确立横向合作关系。

11月21日，哈萨克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签订一个条约，条约称双方“把对方看做是主权国家，不采取损害对方国家主权的行动；在多方面发展平等互利合作”。

1991年2月5日，哈萨克、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四个共和国的代表举行会晤，会后发表的声明主张各共和国通过的主权宣言和各共和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应成为新的联盟条约的基础。

8月2日，塔吉克与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的首脑在杜尚别签订了两国关系条约。10天后，塔吉克和土库曼两个中亚共和国的总统在杜尚别签订了同样的条约。

8月16日，哈萨克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在阿拉木图签订两国合作协议。次日，两位总统发表了关于保障主权国家联盟的稳定和关于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建立统一经济区域的联合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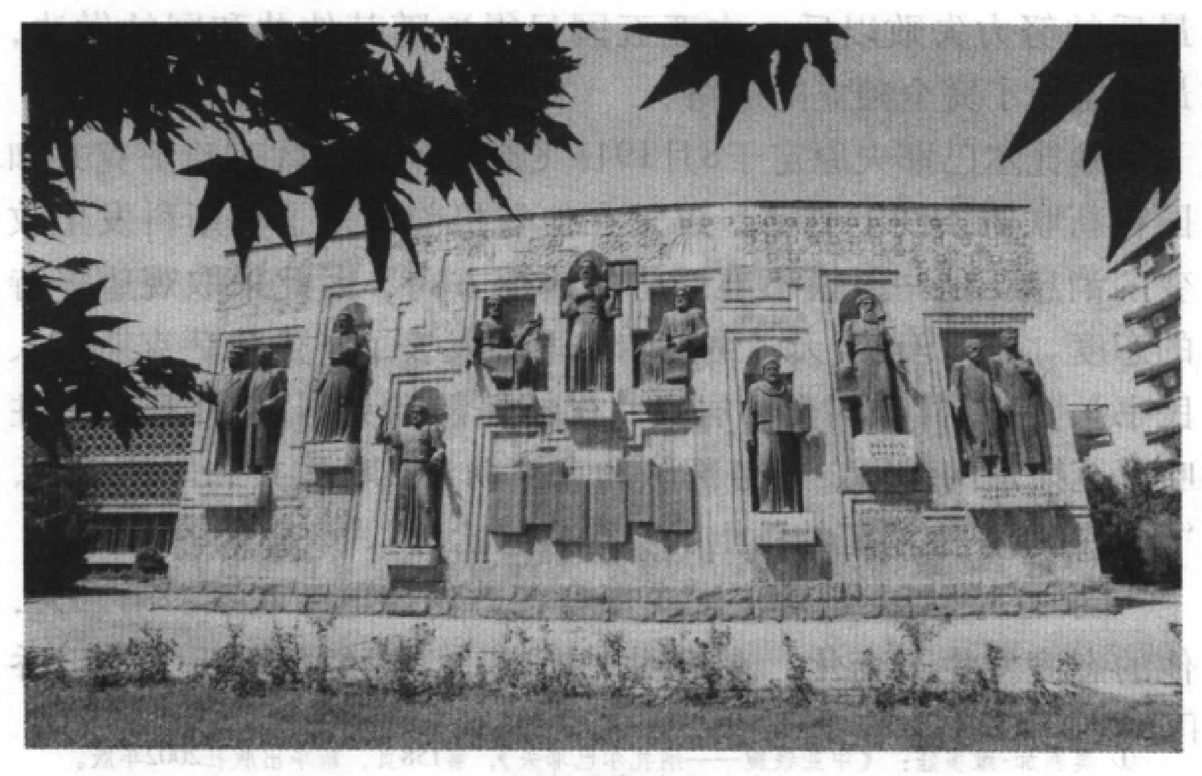
8月14日，中亚五位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马赫卡莫夫在塔什干签署了《关于组织中亚共和国和哈萨克跨共和国协商委员会的协定》以及其他一

些文件。他们认为，这次会议对中亚各共和国政治局势和族际关系的稳定将会产生良好影响。同时他们还一致认为，必须尽快缔结新的联盟条约。

中亚各共和国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加强经济和政治合作并不是为了促使联盟瓦解，而是为了给新的联盟奠定一个新的基础。因此，中亚五国在推动共和国之间加强横向合作的同时，积极参与新联盟的建设工作。

1990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尼沙诺夫（原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代表联盟正式提出新联盟条约草案，中亚五个共和国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共同提交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亚五国的公民均以很高的比例投了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票。中亚五国的领导人深受鼓舞，更加致力于新联盟的创建工作。中亚五国总统多次参加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的会晤，终于就



杜尚别市雕塑

"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定稿和签字达成了协议。

7月底到8月初，已经在中亚乃至苏联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的纳扎尔巴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莫斯科举行重要会晤，三位总统就缔结新联盟条约的问题达成了最后的一致。在协调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对老对手的意见中，纳扎尔巴耶夫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还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担任联盟的新内阁总理。但是他们的谈话被克格勃窃听，因而成为"八一九"事件的重要起因之一。[①]会晤之后，公布了俄罗斯联邦、哈萨克、乌兹别克三个共和国将于8月20日首批签署联盟条约的消息。但是8月19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一举改变了苏联和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各共和国（以及其他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最后历史进程。

"八一九"事件无疑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而且给一贯主张并致力于保留联盟的中亚各共和国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事件平息以后，中亚各国面临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在最后的努力失败以后，中亚五国只得追随其他共和国的做法，最终走上了完全独立的道路。

纳扎尔巴耶夫原定于8月19日飞赴莫斯科，代表哈萨克共和国在新联盟条约上签字，可是在他登机前传来了莫斯科发生政变的消息。他一时摸不准局势的演变方向，因此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8月19日当天，纳扎尔巴耶夫发表了《告哈萨克斯坦人民书》，呼吁共和国全体居民"保持镇静和克制"，并且呼吁驻哈萨克斯坦的苏军、内务部队和克格勃人员尊重共和国的权力，"不要在哈萨克斯坦的领土上实行紧急状态"。[②]

同时，纳扎尔巴耶夫同莫斯科各方保持电话联系。第二天，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声明中提出："我们想听听戈尔巴乔

①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158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165~16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夫本人的意见，他应当亲自确认他没有能力履行赋予他的职责。”[①]批评的矛头开始指向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21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89年6月成立，此前只有中央局）发表声明，支持共和国总统的立场。至于其他党派，事件一发生就号召居民不要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和指令。

8月22日，紧急状态委员会败局已定，纳扎尔巴耶夫谴责苏共有些领导人参与了“政变阴谋”，声明自己辞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且宣称要在哈萨克斯坦建立独立政党。同日，哈共中央宣布哈萨克共产党自即日起脱离苏联共产党。9月7日，哈萨克共产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激烈辩论，最后决定把哈萨克共产党改名为哈萨克社会党。但是很多党员没有转人新党，力主“我们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原理”的纳扎尔巴耶夫后来也不再担任该党领袖。

12月1日，哈萨克共和国举行全民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是惟一的候选人，结果以98%的得票率连任总统。12月10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把国名由“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正式宣布独立，两天后独立法公布。

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人对“八一九”事件的态度最初也是不明确的。听到政变消息后，卡里莫夫马上中断对印度的访问回到塔什干。他在广播演说中强调，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没有必要实行紧急状态，因为局势相当稳定。而其他党派都指责政变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8月24日，卡里莫夫宣布退出苏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28日，乌共中央开会通过决议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时宣布乌兹别克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卡里莫夫还在会上发言，指责

① 莫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167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戈尔巴乔夫个人作出解散苏共的决定，认为“这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或者党代表大会决定”。[1]9月14日，乌兹别克共产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作为乌兹别克共产党的合法继承者。11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在塔什干举行成立大会，原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当选为人民民主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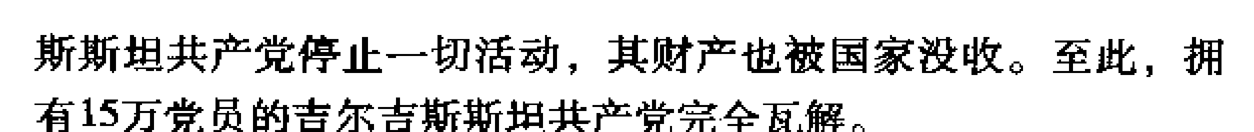
8月31日，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共和国从9月1日起成为独立国家，并且把国名由“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2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结果98.2%的投票者赞成国家独立。在同时举行的全民总统选举中，作为人民民主党候选人的卡里莫夫击败对手，以86%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的政治立场倾向“民主派”，但是在8月19日发表的声明措词非常谨慎，只是号召共和国各族人民“在这严峻的时候保持平静、理智和智慧”。而当天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当年4月6日，吉尔吉斯共产党改名为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中央局发表的声明，明确支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8月21日，莫斯科局势明朗起来，阿卡耶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且指责吉共中央领导人“反对民主的宪法，扮演了投机分子的角色”，说他们为了“利己主义”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2]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吉共中央于8月24日召开全体会议，解除中央局和书记处全体成员的职务，吉共中央五名书记全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尽管如此，共和国当局还是不罢休。8月27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命令吉尔吉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3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3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斯斯坦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其财产也被国家没收。至此，拥有15万党员的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完全瓦解。

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独立宣言。10月12日，阿卡耶夫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在全民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得率票高达95.3%。

“八一九”事件发生后，土库曼共和国总统尼亚佐夫召集高层领导人秘密开会，商讨对策。然后，共和国当局同驻扎在共和国境内的苏军达成协议，宣布土库曼共和国不实行紧急状态。土库曼共产党尽管是共和国惟一有影响的政党，但是在“八一九”事件后鉴于形势激变，不仅退出了苏联共产党，而且土共中央于11月19日发表声明，把党的名称改为土库曼斯坦民主党。12月16日，仍然以土库曼共产党的名义召开了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正式停止土库曼共产党的活动，将其改建为土库曼斯坦民主党，尼亚佐夫当选为民主党主席。

10月26日，土库曼共和国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结果94%的投票人赞成国家独立。10月27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国家独立，并且把国名由“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

与中亚其他共和国不同，“八一九”事件使塔吉克共和国陷人长期动荡。事件发生后，共和国总统马赫卡莫夫没有表态，但是塔吉克民主党等反对派对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政府公开否定紧急状态委员会。直到8月21日18时，政变者败局已定，马赫卡莫夫才发表告人民书，对政变者提出了“温和的”指责，重点强调共和国居民应保持平静，维护法制和纪律。反对派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对马赫卡莫夫总统和塔吉克共产党进行猛烈抨击。8月28日，塔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谴责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宪法政变”，同时宣布塔吉克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成为独立的议会型政党。



8月29日，塔吉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特别会议，代表们指责马赫卡莫夫对“八一九”事件反应迟钝，失去了掌握时局的主动权。马赫卡莫夫于是辞去总统职务，由最高苏维埃主席阿斯洛诺夫（Кадышкин Аслонов）担任代理总统。8月31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把国名由“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

9月21日，处境艰难的塔吉克共产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塔吉克斯坦社会党，并且继续履行执政党的职责。但是反对派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停止塔吉克共产党在共和国领土上的一切活动。9月22日，集会继续举行，阿斯洛诺夫赶到现场并当众宣布同意集会者的要求，解散塔共并将财产收归国有。同时，杜尚别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伊克拉莫夫（М.Икрамов）宣布，拆除集会广场上的列宁纪念碑，纪念碑当即被推倒。

这些举动激怒了共产党人，他们组织了反对当局决定的群众示威集会，反对派在另一处举行反对共产党人的集会，形势十分紧张。9月23日，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召开非常会议，会议展开了长达36小时的激烈争论。绝大多数代表是共产党人，因此阿斯洛诺夫被指责违反宪法，有些代表说他的行为构成了犯罪。共和国检察长宣布对拆除列宁纪念碑一事提请刑事诉讼。阿斯洛诺夫不得不提出辞职，会议选举1985年被解职的塔共中央第一书记纳比耶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并且代理总统之职。会议还决定在杜尚别市实行紧急状态。

反对派对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9月24日，反对派三党（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和“拉斯托赫兹”人民运动）组成“塔吉克斯坦民主力量联合会”，在杜尚别市苏维埃执委会办公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示威集会，示威者要求取消

紧急状态，解散“亲共产党的最高苏维埃”，要求“非法当选的”纳比耶夫辞职。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在广场上搭起帐篷，表示不达目的誓不回家。

9月30日，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再次举行非常会议，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部分答应了反对派的要求：停止实施紧急状态，在查明是否卷入“八一九”事件之前暂停塔吉克共产党及其继承者的活动，其财产则由政府负责保护。可是反对派仍不满足，继续举行示威，还组织大规模绝食。最后，在莫斯科赶来的“民主派”人士调解下，最高苏维埃再次让步，同意在新的总统大选之前暂停纳比耶夫的职务。10月6日，纳比耶夫辞职，反对派这才罢休。

11月24日，塔吉克斯坦举行第一次全民总统选举，共有8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结果社会党候选人纳比耶夫获得57.52%的选票而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反对派联合推举的胡多纳扎罗夫（Худоназаров）得票30%多一点。社会党终于击败了反对派，继续在塔吉克斯坦执政。

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社会党于1992年1月18日恢复共产党的名称，成为中亚各共和国当中惟一以共产党名称执政的政党。但是，随后塔吉克斯坦爆发了激烈内战。直到1994年11月拉赫莫诺夫（Эмомали Рахмонов）当选为总统以后，塔吉克斯坦的局势才开始走向稳定。

“八一九”事件以后，中亚各共和国虽然陆续宣布了独立，但是它们并不打算就此彻底脱离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后，总统卡里莫夫说：“将来的联盟必须以独立国家的邦联和自由联盟的形成构成”，但是参加邦联的国家应当具有统一的经济区域以及统一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①]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35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为保留和挽救联盟国家可以说努力到了最后一刻。纳扎尔巴耶夫尤其典型，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称他“实际上是为签订联盟条约，重组联盟或邦联而努力的最后一位共和国领导人”。[1]的确是这样，哈萨克斯坦直到1991年12月16日，即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后一个星期才宣布独立。

1991年9月2日，苏联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各共和国领导人推举纳扎尔巴耶夫（而不是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和10个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中亚五国）的领导人宣读《致人民代表大会的声明》。这个被称之为“10+1”的声明是前一天经过长达七小时的讨论后达成的。声明的内容包括尽快签署联盟条约、缔结经济联盟、成立过渡性的临时权力机构、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等等。后来，在大会上成立了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委员会。

10月10日，苏联公布新的联盟条约草案，根据草案未来的“自由主权共和国联盟”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邦联制国家。但是签署条约的事一再被推迟，主要是最重要的共和国之一乌克兰变了卦，没有出席10月18日的经济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也没有派代表团参加新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0月21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而中亚五个共和国均是这两次活动的积极参加者。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宣布完全独立，此举使得建立联盟的希望彻底破灭。

乌克兰改变态度与“八一九”事件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泛滥密切相关。当时，“俄罗斯拯救了联盟”之类的口号甚嚣尘上。8月26日，俄罗斯一份官方声明公开宣称：“一旦联盟关系停止，俄罗斯联邦保留提出修改边界问题的权利。”第二天，

[1]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第71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俄罗斯代表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醒”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等共和国出现了民族主义倾向。有人认为，正是这些举动“迫使某些共和国，首先是乌克兰加快宣布自己国家的独立”。[①]

中亚各共和国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同样十分反感，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对联盟条约采取消极态度。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中亚各国的代表发言，指责俄罗斯对其他共和国实行沙文主义”。8月28日，纳扎尔巴耶夫公开批评俄罗斯领导人和代表，说他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话流露出救世主的语气，谴责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企图取代苏联总统的权力，将联盟中央舆论机关和全苏联人民的其他财产据为己有，对相邻的共和国提出领土要求。[②]遭到有力抵制后，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态度软了下来，与哈萨克共和国代表团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确认双方的“领土完整”。

10月1日，纳扎尔巴耶夫把一些共和国领导人请到阿拉木图，商讨建立经济联盟等事情，结果达成了共识。11月，中亚五国领导人两次参加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使联盟条约草案得以公布。遗憾的是，中亚各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为保留联盟一再作出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了。

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决定建立独联体取代苏联以后，中亚各国领导人感到相当震惊。纳扎尔巴耶夫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联盟国家没有任何希望了，他感到十分无奈和无比伤感，从不抽烟的他这次竟抽起烟来了。[③]但是纳扎尔巴耶夫没有绝望，他马上去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会晤。事后，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讲话，说自己事前对别洛

① E.K.盖纳扎罗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第207页，阿拉木图1992年俄文版。

②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第622页，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奥莉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第178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韦日协定一无所知，仍然希望能签订联盟条约。他称建立独联体只是一个建议，可以与建立联盟一并讨论。他还主张各主权共和国之间应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不过，以后的事态表明，联盟国家解体的趋势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

12月12日，中亚五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纳比耶夫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是否参加独联体问题。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中亚五国邦联（所谓“突厥联盟”）对抗独联体（所谓“斯拉夫联盟”）的建议，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卡里莫夫等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俄罗斯联邦境内居住着众多的突厥语民族居民，中亚五国也有不少斯拉夫居民，所以建立种族对抗性质的联盟是不适宜的。最后五位总统达成了一致意见。

12月13日，中亚五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亚五个共和国准备加入独联体，条件是必须让它们享有同等的共同创始国地位。他们的立场得到了其他共和国尊重，而且各方同意12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会议。

1991年12月21日独联体正式成立和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以后，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完全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的独立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1992年3月2日，联合国同时接纳中亚五国为会员国。与此同时，中国同邻近的中亚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中亚地区以及中亚各共和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十章
战后中亚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

第一节 中亚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新疆的关系

从中亚地区苏维埃政权确立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同中国新疆基本上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可是，苏德战争爆发后，随着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对苏联态度的急剧转变和国民党政府对新疆控制的不断加强，苏联与新疆的关系逐渐疏远恶化，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对新疆局势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中亚地区，苏联政府对“地方民族主义”（包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打击和镇压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同样，苏联及其中亚各共和国当局对新疆当权者（从杨增新到盛世才）打击反政府势力的行动予以大力支持。这样做是出于，苏联害怕新疆的“民族主义”会感染中亚，因为在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有为数众多的跨界民族居民。

1942年以后，盛世才跟苏联翻了脸，接着国民党接管了统治新疆的权力。特别是1943年英国和美国在迪化设立领事馆，

苏联认为这是西方列强打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其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挑战和威胁。由于苏联政府把新疆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目标并没有丝毫改变，因此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既然觉得与新疆当局无法实行合作，于是苏联把目光转向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新疆各族民众，尤其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群众。而当时新疆各族人民受够了盛世才和国民党政权的高压统治，加上省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所以新疆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反政府的暴动。40年代中后期，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和暴动主流是好的，但是参加甚至领导这类运动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苏联政府不仅利用这种动荡的局势插手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而且对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给予支持。

前面说过，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主要是从遥远的土耳其而不是从邻近的俄属中亚地区传入新疆的。这是因为中亚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传播历史也不是很早，而且俄国沙皇政府对它们严加防范和压制。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确立以后，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实行严厉查禁与镇压。可是在1942年以后，苏联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当时，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成立了“支援东方委员会”，负责对新疆进行宣传，其中主要任务是向新疆穆斯林民众散发刊物，主持其事的是曾经担任过新疆日报社社长的阿拉木图维吾尔人满素尔·肉孜尤夫。委员会发行的主要刊物有塔什干的《东方真理》和阿拉木图的《哈萨克国土》等，用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出版印刷（当时苏联中亚各共和国发行的印刷品都已改为用俄文字母出版）。从1943年冬开始，上述刊物通过走私、边境贸易、互访等渠道源源流入新疆，在新疆各地广为传播。这些刊物大力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是如何正确，苏联的民

族问题解决得如何好，同时也借此向新疆各族人民灌输在中亚（及全苏联）已遭严厉禁绝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甚至鼓吹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

同时，苏联政府注意从赴中亚及苏联其他地方留学或避难的新疆人当中物色对象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回新疆开展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后来新疆“三区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大多数人都在苏联待过一些时间。

此外，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支持新疆当局镇压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的立场，转而援助反政府武装与新疆地方政府对抗。例如，1940年以后，阿山区的哈萨克牧民不堪当局的压榨，不断举行暴动，结果大多数被镇压下去。但是其中一支武装在乌斯满率领下壮大起来了，原因就在于得到了外蒙古的有力援助（也是苏联的间接援助），包括大量的军火援助。此人得志后于1943年12月成立一个叫“阿尔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的机构，自任“帕夏”。苏联当时派在中亚留过学的新疆哈萨克人达列力汗·苏古尔巴耶夫在十多名苏联顾问陪同下到乌斯满那里工作，最后控制了阿山区的暴动主力。

不过，苏联当时把干涉新疆的重点放在伊犁。伊犁靠近中亚哈萨克共和国，从伊犁去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比去省会迪化还要便利快捷。苏联驻伊宁领事达巴申等在当地不满当局的人当中组建反政府组织。1942年，伊宁第一个名为“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组织成立。后来，在伊犁及塔城乃至迪化秘密成立了类似的“解放组织”。苏联的外交官员在这些组织中宣传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组建各民族加盟共和国，中亚五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苏联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直接参加“解放组织”的活动。更有甚者，苏联政府在阿拉木图成立了一个“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协调各“解放组织”的活动。

当时，参加“解放组织”的人士中不仅有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也有商人和许多宗教界头面人物，而且让后者取得了主导权。1944年9月，在苏联领事馆主持下，新疆“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宣告成立，12个中央委员中有4名伊斯兰教人士，6名商人、知识界代表只有2人。而且，伊犁大清真寺阿訇艾力汗·吐烈成了该组织主要领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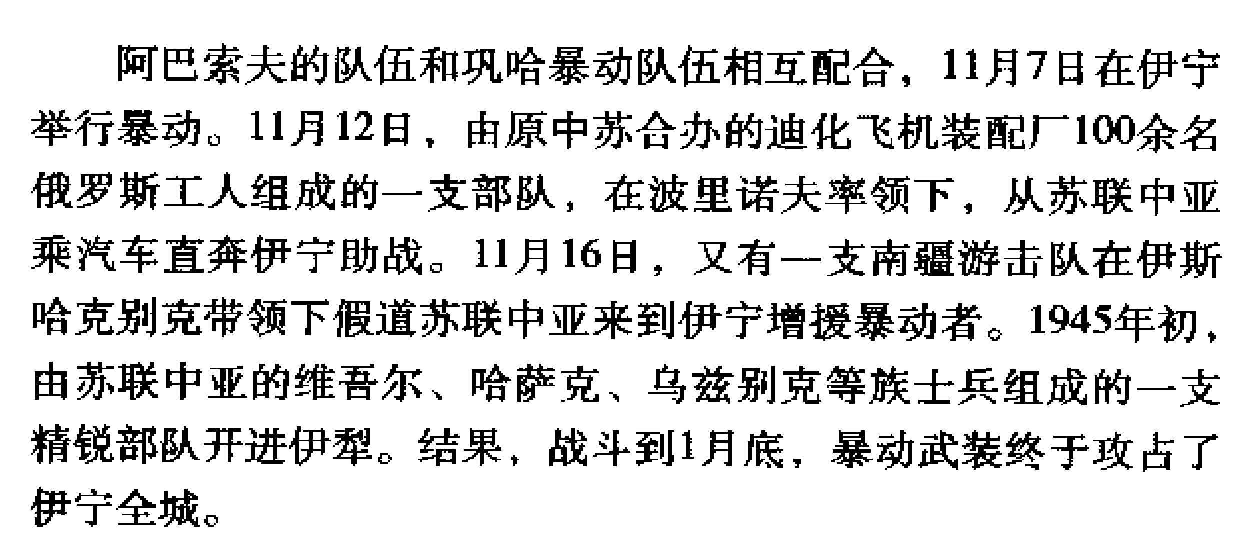
艾力汗·吐烈本来是中亚安集延的大阿訇，乌兹别克人，因建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组织于1924年被中亚苏维埃政权逮捕。1927年，艾力汗·吐烈越狱逃到中国新疆，由于同样的原因又被盛世才关进了监狱。他开释后到伊宁以宗教职业谋生，在穆斯林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在“三区革命”中，艾力汗·吐烈力图使革命走上民族仇杀和国家分裂的邪路，苏联政府为了确保新疆继续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居然支持艾力汗·吐烈这样一个泛突厥主义分子。

1944年8月下旬，伊犁谷地的巩哈县（今尼勒克）牧民掀起暴动，从而揭开了“三区革命”的序幕。暴动队伍使用的武器多是苏联提供的。10月6日，暴动武装攻占巩哈县城。负责伊犁军务的国民党官员宣称：“攻陷巩哈匪徒，拥有由苏方交换来的机枪3挺，步枪200支。”[①]

伊宁暴动选择在俄国十月革命37周年纪念日（11月7日）举行，显然是根据苏联方面的决定。当天凌晨三点钟，伊宁“解放组织”负责人阿巴索夫率领数十名流亡中亚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潜回伊宁城。阿巴索夫是10月底去中亚同苏联紧急商谈“购买”武器的。这一次他的队伍带回了20驮军火，他们全部装备着自动化武器。[②]

①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4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赛福鼎回忆录》，第304、307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阿巴索夫的队伍和巩哈暴动队伍相互配合，11月7日在伊宁举行暴动。11月12日，由原中苏合办的迪化飞机装配厂100余名俄罗斯工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在波里诺夫率领下，从苏联中亚乘汽车直奔伊宁助战。11月16日，又有一支南疆游击队在伊斯哈克别克带领下假道苏联中亚来到伊宁增援暴动者。1945年初，由苏联中亚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族士兵组成的一支精锐部队开进伊犁。结果，战斗到1月底，暴动武装终于攻占了伊宁全城。

后来，伊犁暴动队伍挥师北上，1945年7月占领塔城，9月占领阿山，与国民党军队在中路隔玛纳斯河对峙。这时，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完全控制在暴动者手中，因此这场暴动被称为“三区革命”。

早在1944年11月12日，暴动者就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苏联领事和苏联顾问指导下开展工作。艾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部长中有很多宗教界人士。

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九项宣言”，作为施政纲领，主要内容为：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解放的独立共和国；扶助伊斯兰教；与苏联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也和中国政府建立关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等等。[①]从上述纲领可以看出，“三区革命”初期固然有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主流的一面，也有分裂国家及鼓吹泛突厥主义等严重错误的非主流的一面。这与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反动立场是分不开的。例如，艾力汗·吐烈公开否认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鼓吹“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②]这就是分裂国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第36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家、宣扬泛突厥主义的真实写照。

1949年中共中央派往三区的联络员邓力群认为："三区革命是得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支持的。"[①]

三区革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大多都有苏联背景，他们或在苏联中亚等地留过学，或在中亚地区受到政治、军事培训，有些领导人干脆就是苏联公民。他们都具有苏联、中国双重国籍，有重要的事情均请示苏联领事馆。1945年4月，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正式建立民族军，总指挥就是苏联俄罗斯人波里诺夫。此外，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的时候，苏联就派出了以科兹洛夫（Козлов）中将为首的高级顾问团秘密来到新疆伊宁，控制了这个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任该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赛福鼎·艾则孜对此深有感触，当时他的身边就有一个苏联顾问和一个宗教顾问，他说"无论我做什么，都必须先去征求这两位顾问的意见"。[②]

后来，三区革命临时政府经过改组，排除了艾力汗·吐烈等反动人士，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拜克·穆努诺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耶夫等进步人士掌握了"三区革命"的领导权，遂使革命运动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是，苏联对三区革命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伊斯哈克拜克是苏联军事顾问招募的柯尔克孜军官，曾在中亚避过难，后接替波里诺夫任民族军总指挥；达列力汗也在中亚避过难，并在阿拉木图留学，1943年被苏联派往乌斯满的暴动队伍，后任民族军副总指挥。因此，赛福鼎说：

①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5页。

② 《赛福鼎回忆录》，第330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三区革命如此顺利地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①]邓力群回忆说："在1944年关键性的一次战役中，国民党一个师的主力在伊犁附近被消灭，实际是苏联方面支持、协助暴动起义群众干的，缴获的武器也全武装了'民族军'。"[②]一位当代俄罗斯学者也持同样的看法："在1944年的决定性战役中，国民党一个师在伊犁郊区被击败，实际上在苏联方面帮助下被歼灭了。"[③]

苏联政府之所以全力以赴支持"三区革命"运动，主要是想在邻近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且直接控制这个政权，以确保新疆这个势力范围不致丧失，从而保障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苏联有关人士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只不过说法委婉一些罢了。例如，当时苏联驻伊宁领事达巴申就这样说过："我要公开的说——这并不是一个秘密——苏联与新疆有3400余公里的国界相连，我们当然注意新疆的情形，当然愿意新疆和平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当然愿意在这儿与苏联有亲善的关系。"[④]

同时，苏联在三区大量发展苏联侨民，就如沙俄以前在新疆大肆发展俄国侨民一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此于1945年11月和1946年1月发布了相关命令。苏联领事馆人员说，取得苏联国籍，"不仅得到最优的国民待遇，而且不畏他族欺凌"。[⑤]此外，苏联在三区普遍成立苏侨协会。苏侨协会配合苏联领事机构四处发放苏侨护照。结果，三区70余万人口中，竟有一二

① 《赛福鼎回忆录》，第459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②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5页。

③ 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第17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5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十万人成了“苏联侨民”。[①]不过他们大都同时保留了中国国籍。新疆境内俄罗斯族居民加入苏联国籍的特别多，大约有12万人。[②]三区各级政权机关的负责人大多数具有中苏两重国籍。苏联派遣的众多顾问实际上控制着三区革命的整个局势。

但是，苏联政府的利己打算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而且遭到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广大群众抵制，甚至三区革命领导层当中也有人对苏联方面的过分控制产生了反感。此外，国际局势的发展也迫使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有所收敛。

在1945年初春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首脑讨论了中国问题。当时，斯大林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中国政府让外蒙古实现独立，作为交换，苏联则表示不干涉新疆事务。在同中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谈时，斯大林表示：“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人在那里可以做一切想要做的事。苏联不想干涉新疆省的内政。”[③]

经过艰难的谈判，中国和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至于新疆问题，苏联方面在关于条约的换文中声明：“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④]1949年2月，苏联特使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在西柏坡同毛泽东会谈时也保证：“苏联在新疆既不支持独立运动，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苏联在任何时候都把新疆看作是中国的组成部分。”[⑤]

尽管苏联方面没有不折不扣地信守自己的诺言，但是《中

① 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6页。

② 尤·米·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2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119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28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⑤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252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以后，苏联还是要求三区民族军停止进攻，为三区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创造了条件。

接着，苏联为双方的谈判主动牵线。1945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与苏联驻迪化副领事叶甫谢也夫（Евсеев）举行会晤。张治中请苏联政府调停新疆冲突，叶甫谢也夫表示就此向莫斯科请示。不久，三区方面旋即停止了攻势，这表明苏联方面做了工作。

不久，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Петров）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据苏联驻伊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有回民（指穆斯林——引者注）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向该领事申请，并暗示希望俄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之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回民在新疆占多数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即塔城——引者注）、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之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之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1]这实际上是苏联官方假托"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代三区方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外交部积极回应了苏联方面的建议。10月10日，也就是中国国民党同共产党签订"双十协定"的那一天，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同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1945年10月17日，张治中与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等开始谈判。在苏联领事出面斡旋以后，阿合买提江等不再坚持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而改称"暴动区域人民代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第42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表"，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1946年1月2日，《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在迪化正式签订，同时签订了一个关于改组新疆省政府的附件。6月，关于改组军队的第二个附件签字。协议的顺利签字，苏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回忆新疆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时，张治中说："我们首先要对我们伟大的友邦——苏联——致其诚挚的感谢，因为在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愿意从中斡旋，先后由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甫谢也夫和新任总领事萨维诺夫（Савинов）从旁帮忙，给我们很厚的友情，很大的助力。"[①]

7月1日，新疆联合省政府宣告成立，张治中任主席，阿合买提江（三区代表）、包尔汉（另七区代表）任副主席。在外交方面，新政府公开宣称奉行对苏联友好的政策，具体有三条：（一）切实增进中苏亲善；（二）促进中苏经济合作；（三）发展中苏文化与学术关系。[②]

新疆联合省政府的成功组建给了泛突厥主义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在联合政府宣布成立前夕的6月27日，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发布324号决议，决定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更名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署"。同时，塔城专署、阿山专署宣告成立。三个专署由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协调负责。

至于艾力汗·吐烈，双方谈判时还拟议将他作为伊犁专员的候选人，后来苏联决定换人。联合省政府成立时，艾力汗·吐烈虽然名列政府委员之中，但是此前苏联顾问团和驻伊宁领事馆已经秘密将他及另外几名泛突厥主义分子强行遣送到阿拉木图。从此，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第467–46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下），第47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三区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阿合买提江等进步人士手中。1948年8月1日，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同盟”宣告成立。从此，“东突厥斯坦”一词基本上废止不用了。

新疆联合省政府成立之际，正是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之时，国民党无力顾及新疆事务。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对泛突厥主义代表人物麦斯武德、艾沙以及曾逃亡国外的穆罕默德·伊敏委以重任，麦斯武德当上了新疆省政府主席，艾沙任省政府秘书长，伊敏任省政府副主席。这些人敌视苏联，反对三区革命，因此导致联合省政府名存实亡。

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敦促之下，张治中提出改组新疆省政府的建议。1949年1月，朝不保夕的国民党政府撤了麦斯武德的职，任命包尔汉为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奉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逐步清洗泛突厥主义分裂势力。

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苏联方面指出，美国企图扶植西北军阀在新疆建立“伊斯兰国”。苏联方面认为，这不仅危及到中国的统一，而且对苏联中亚地区也是一个威胁。因此，斯大林敦促中共尽快解放新疆，并且许诺提供军事援助。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提前于年内进军新疆。

此外，斯大林谈到新疆有三区革命政权与国民党政府对立，并建议中共派员去三区进行联络。接着，访问苏联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邓力群奉命从莫斯科直接去伊宁，到阿拉木图以后，由苏联驻伊宁副领事陪同于8月15日抵达伊宁。

邓力群会见三区领导人时，向他们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电函。电函肯定三区革命“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欢迎三区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1]9

① 《赛福鼎回忆录》，第478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月初，阿合买提江率三区五人代表团离开伊宁，经阿拉木图飞往北京，结果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胜利进军，新疆军政界人士酝酿和平起义，并且要求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代向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在同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谢也夫商谈以后，邓力群来到迪化，帮助促成新疆和平解放。9月下旬，新疆军政两界分别通电举行起义。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邓力群在回忆文章中肯定了苏联帮助和平解放新疆的作用："苏联方面是真心希望我们进军新疆，打垮国民党，挤掉美国人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因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总比他们强，对苏联有利。"[①]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如双方的政治关系一样，错综复杂，曲折起伏。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虽然减少了对新疆的出口，新疆方面对苏联的出口同样有所缩减，但是总额仍然达到9079.7万卢布的高水平。[②]

进入1942年以后，政治形势进一步影响到新疆与苏联贸易的发展。由于盛世才转而对苏联实行敌视政策，双方贸易条件恶化。当年11月，新疆省政府颁布《省营贸易暂行办法》，规定只有官办的裕新公司才有权经营对外贸易，其他任何公司、个人要与苏联做生意，必须通过裕新公司出面，所以私商从事的对苏贸易迅速萎缩，直至停顿。后来，新疆当局进一步规定，任何外商在新疆收购土产要运往境外，必须经裕新公司同意批准。这样，等于剥夺了苏联驻新疆贸易机构的经营权力，苏联

①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7页。

②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47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方面也加强了对新疆方面的贸易限制。如此一来，原先双方签订的贸易协定名存实亡。

1943年，苏联与新疆的贸易形势继续恶化。6月，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А. С.Панюшкин）照会中国政府，借口苏联专家在新疆的工作环境“实令人不能忍受”，决定中止苏联同新疆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项目——撤销迪化飞机装配厂和独山子炼油厂建设项目，召回苏联技术专家和工人，运回苏联的设备。同时，“缩减苏联驻新商业机关之活动”；“召回在新之其他苏联专家”。[①]当年，苏联与新疆之间的贸易额仅为1490万卢布，只相当于1941年的16.4%。[②]而且以后几年连续走低。

1944年9月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国民党政府打算恢复对苏联的贸易，但是并无真正的起色。三区革命爆发后，新疆省政府控制的七区与苏联中亚地区之间的贸易通道全被隔断。直到1946年，除了走私以外，新疆七区与苏联中亚地区的正常贸易基本上停止。

与七区相反，新疆三区与苏联中亚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三区革命临时政府积极发展一切形式的对苏贸易，尤其鼓励私商开展对苏贸易和与中亚的边境贸易。这样做，一来是依赖对苏贸易解决因国民党政府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二来该政府本身就是苏联扶持建立的，并且建立以后一直依靠苏联各方面的援助，所以要以扩展对苏贸易而且是优惠苏联的贸易回报苏联。三区革命临时政府与苏联之间虽然没有签订贸易协定，但是双方间的贸易基本上受苏联控制。除此之外，三区革命临时政府还向苏联出让稀有金属的开采权。例如，苏联在伊犁阿拉套山开采钨矿，到1947年有矿工2万余人，年产千吨。

①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4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4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另在阿山富蕴的钨矿亦雇有3900余人，来自苏联的职员和技工约100人。[1]可见，开采规模非常庞大。国民党政府曾下令停止苏联在三区采矿，可是无人理睬。

1946年6月，新疆省政府与三区革命临时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以后，七区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才开始恢复。当年11月，张治中主动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提出恢复和发展双边贸易的建议，但是由于新疆局势出现急变，贸易谈判难以启动。直到1949年1月24日，也就是麦斯武德下台以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才对两年多以前张治中提出的建议作出正式回应，谈判得以启动。

1949年7月15日，新疆省政府与苏联就《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草案达成协议。协议内容较之1931年苏联新疆贸易协定对苏方更为有利，这与包尔汉等主政人员的亲苏立场有关。尽管国民党政府没有批准这个协定，然而由于它此刻自身难保，因此协定草案实际上在起作用。张治中认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苏联所签订的经济合作协定，就是用这个草案作基础的。"[2]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协调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同时为寻求苏联对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6日抵达莫斯科。毛泽东在苏联待了两个多月，除了进行访问外，主

①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5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30页。

要是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和谈判。后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谈判。

经过长达两三个月的商讨和谈判，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字，从而奠定了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关系。随后，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其中有不少的内容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了中国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各种关系。从此，中国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新疆的过程中，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苏联空军运送了1万多解放军官兵进入新疆，还运送了一些燃油制品。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军政首脑机关提出由苏联提供更多援助的要求。为此，以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为首的新疆代表团于1949年底到达莫斯科，参加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方面的谈判。两国达成的各项协议中与新疆关系密切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按苏联方面的要求，中国政府同意新疆成为除苏联以外任何外国的势力都不能进入的地区。1950年初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①]斯大林的意图是要排除美、英、日等国在上述地区的势力。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秘密地签订了《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协定规定："不论在苏联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的领土上，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①

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政府把美国、英国驻迪化领事馆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驻喀什领事馆的人员全部遣送回国。同时，对持有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国籍证明文件的“侨民”全部进行了清理，逐一予以登记。凡是愿意放弃外国国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留居新疆，否则必须离境。对具有中国和苏联双重国籍的新疆人，一般可继续保留双重国籍，但是担任了重要职务的也要放弃苏联国籍。至于在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早在这个协定签订之前多年，苏联就已经禁止外国人在那里定居和进行活动了。

然而，中国方面对这个协定一直心存芥蒂。1956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废除这个秘密协定的要求。5月，得到苏联方面同意。《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旋即被废除了。但是，在此后数年中，新疆仍然只有苏联人在那里开展活动。

第二，中国和苏联在新疆创办合营公司。新疆和平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军民生活困难，由于同内地相距遥远，交通落后，因此争取苏联的支持与合作显得十分重要。

1950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致电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主席，提出新疆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与苏联正式通商以及在新疆建立中苏合营企业等建议。毛泽东将电报转交给了斯大林。同时，刘少奇也致电毛泽东提出类似建议。②苏联方面的反应相当积极。

在两国领导人谈判中，斯大林提出在新疆合作开办采矿公

①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601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2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640~641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司，开采那里的有色金属和石油等矿藏。新疆代表团也参加了这一议题的谈判。在得到中方同意后，斯大林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有关决议。1950年3月27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上签字。同时，双方在莫斯科还签订了一份关于上述两个协定的秘密议定书。协定规定：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金属公司由双方各出一半资金创办，产品和利润亦对半平分，各级管理人员双方各出一半，而且定期相互轮换，合营期为30年。秘密议定书则规定，未经苏联同意，中国不得把开采出来的矿产原料出售给第三国。[①]

随后，中苏双方开始了有关新疆两个合营公司的紧张的谈判和组建工作。9月，两国政府代表在迪化签订了关于两个公司组织条例及章程的议定书，中苏合办的新疆石油公司和新疆金属公司宣告正式成立。依据协议并经过商谈，双方同意任命中方的卡·哈木拜考夫为新疆金属公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董事长），苏方一人为副主任委员；任命苏方的克·西蒙诺夫为总经理，中方一人为副总经理。任命中方的张英明为新疆石油公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苏方一人为副主任委员；任命苏方的列聂廷为总经理，中方一人为副总经理。并且约定，三年以后中方和苏方的职位互相调换。1954年6月进行了一次调换，即由中方人士出任两公司的总经理，苏方人士改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新疆两个合营公司的组建和运行过程中，中苏双方的地位、权利并不是平等的。公司开采的全是中国的资源，但是产品、利润只得一半。而且根据秘密议定书，公司开采的稀有金

①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642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属和有色金属产品全都运往了苏联，中国不能拿自己应得的一半去国际市场换取紧缺的外汇。此外，由于苏联方面拥有管理、技术、设备方面的优势，因此在公司管理权限的分配上也是对苏联有利。公司初期，实权掌握在总经理手中，而两个公司的总经理都是由苏联人担任。

当然，两个合营公司的创办对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中苏石油公司的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因为苏联本国盛产石油，其中亚地区的石油开采也蓬勃发展，所以苏方所得的石油产品就地卖给了新疆。从1952年起，新疆所需的石油产品可以基本自给。

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方面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收回两个合营的新疆公司及其他中苏合营公司。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他提出上述要求，赫鲁晓夫当即表示同意。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规定自1955年1月1日起，股份完全移交给中国。1954年年底，在乌鲁木齐（迪化1953年改名乌鲁木齐）举行了中苏合营的石油公司和金属公司完全移交给中国的交接仪式。

就在签订在新疆创办合营公司的协定的1950年3月27日，中国和苏联还签署了两个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协定：一个是《关于建立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把阿拉木图经迪化至哈密的航线延长至北京。另一个是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秘密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先后有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帮助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教育和国防建设。其中有一批苏联专家来到新疆，指导和帮助新疆进行勘探、采矿、加工、修路等建设。中国收回两个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以后，仍有一部分苏联专家继续留在新疆，直到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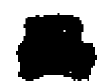
第三，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之间的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同斯大林会谈时，毛泽东曾经提议由苏联同新疆单独缔结一个贸易协定（就如1931年金树仁主政新疆时签订协定那样），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东北单独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①]因为在他看来，新疆远离内地，交通阻塞，货物运输不便，加上几十万军队进驻新疆，使得供应更加困难，而东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后双方商定，把新疆的对苏贸易纳入中国与苏联两国贸易协定的框架之中。

1950年4月19日，《中苏贸易协定》及关于两国货物交换的议定书在莫斯科签订。同时，作为贸易协定的一个附件，在《新疆出口土产技术条件之临时规定》上也签了字。

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积极发展同苏联及其中亚地区之间的贸易。当时，新疆与苏联的贸易额仍然大于新疆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中苏贸易协定》及有关新疆的附件签字以后，新疆与苏联中亚各共和国边界上的口岸霍尔果斯、吉木乃、巴克图、吐尔尕特、伊尔克斯塘等开始繁忙起来。接着，新疆改组了全省的海关机构，并建立了地方国营为主的对苏贸易体制。1953年8月，中央对外贸易部在新疆设立特派员办事处，掌管对苏贸易。第二年办事处改组为新疆省对外贸易局。到1956年，新疆同苏联及其中亚地区间的贸易完全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新疆不再与苏联方面单独签订年度供货合同。

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和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新疆同苏联及其中亚地区间的贸易额逐年增加，有些年份呈飞跃式上升。据统计，新疆同苏联的贸易额1950年为2906.79万卢布，1951年为7750万卢布，1952年为9616万卢布，1953年为7529万卢布，1954年为8693万卢布，1955年一跃为20235万卢布（这一

①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579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年中苏合营两公司完全收归中国所有，运往苏联的产品完全算入新疆对苏出口额内），1956年为25755.3万卢布。1957年、1958年因新疆压缩进口，与苏联贸易额明显下降，但1959年又回升到28506.4万卢布。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两国贸易额锐减，但新疆与苏联的贸易仍然在增长，达到29013万卢布。①

新疆对苏联的出口中农畜土产品占了绝大多数，从苏联进口的商品中则基本上是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和建筑材料等。新疆进口产品有不少是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提供的，而新疆出口的产品很多运到了中亚各共和国以外的苏联地区。

1956年，苏联提出在《中苏贸易协定》之外开展中亚各共和国与新疆之间的边境贸易，但是此事延至1959年才正式启动。新疆与苏联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小额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新疆经营边境贸易的地方进出口公司在阿拉木图、伏龙芝、斯大林纳巴德分别派驻了贸易代表，每地两人。苏联方面则确定上述三地的消费合作社为负责边境贸易的机构。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苏联共产党确立的新的路线和方针，两党开始产生严重分歧。后来，这种分歧逐渐影响到中国和苏联的国家关系。1959年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在中国与印度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从而把两国分歧公诸于世。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决定中止中苏两国的科技合作项目，撤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接着，中苏两国就边界问题发生争端。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交替恶化，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双方关系没有任何好转。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继续恶化。不久，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两国

① 参见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十章，第1~5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关系降至冰点。1969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为边界争端发生武装冲突。整个7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敌对状态。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苏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再次破灭了。

在这20年间，新疆同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关系同样恶化了。双方的正常交往基本断绝，而边界纠纷愈演愈烈。1962年中国新疆边民大量逃亡苏联中亚和1969年边境流血冲突是这一时期双方关系恶化最突出的事件。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在新疆显露出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于是苏联利用这一机会，引诱新疆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逃亡苏联中亚地区。

在新疆，尤其是在"三区革命"地区，有十多万"苏联公民"或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俄罗斯人及哈萨克人，数以千计的人担任党、政、军干部。迄至1959年11月，经中苏双方协商遣返去苏联中亚定居的苏侨及其中国籍家属达13万余人。[①]但还有2万多持有苏联侨民证的人继续留在新疆，连同他们的家属又是好几万人。[②]1961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把没有在苏联领事馆进行国籍登记的苏联移民或已进行登记但尚未领到有效证明的人登记为中国国籍。而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和"苏联侨民协会"却抓紧在边民中发放"苏联侨民证"，并鼓动他们移居苏联，从而导致气氛更加紧张。

同时，苏联领事馆人员、"苏侨协会"工作人员，还有从中亚渗入新疆的特工人员，开始策划中国新疆边民大规模逃亡苏联的事件，他们甚至公开召集边民聚会，煽动边民外逃。新疆也有少数军政官员参与其事。例如，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

①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2年版。

② 尤·米·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2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祖农·太甫也夫（俄罗斯族）、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果甫·伊斯哈科夫（俄罗斯族）就在新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中从事过鼓动外逃的工作。

被称为“伊塔事件”的新疆边民大规模逃亡事件是1962年3~4月间开始的。4月下旬，发生了冲击霍尔果斯口岸的大规模群众性事件。5月29日，在苏联领事馆官员鼓动下和部分苏侨带领下，在伊宁市爆发了数千群众围攻、冲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伊犁地区党政机关的严重事件，结果造成流血冲突。在此期间，一批又一批的外逃边民冲过边境口岸，涌进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境内。而且，越境逃亡风潮由霍尔果斯口岸迅速扩展到塔城的巴克图口岸、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阿拉山口等地。苏联方面则剪开边境线上的铁丝网，派汽车到口岸，敞开接纳逃亡的新疆边民。逃亡者越境以后，便得到妥善安置。有些人还再次返回新疆，鼓动更多的人参加越境行动。结果在4月中旬到5月底的逃亡高潮期间，共有六七万新疆的少数民族居民逃到了苏联中亚主要是地广人稀的哈萨克斯坦（其中不少人没有苏联公民身份），带去牲畜23万头，大车1500辆，致使土地抛荒60万亩，加上捣毁党政机关、企业和盗抢的粮食、物资，致使中方损失超过1亿元。[①]这次越境逃亡事件涉及伊犁、博尔塔拉、塔城、阿勒泰4个地区（州）一二十个县，有的县大多数居民都走了。

5月30日，在中国方面强烈要求下，苏联方面封锁中亚边境，越境风潮渐告平息。同时，苏联以其领事馆行动受到中方严格限制为由，于6月关闭了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6月中旬，中国军队进抵新疆同中亚接壤的边界地带，从而结束了“有边无防”的状况。

围绕新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大规模越境逃亡中亚的事

① 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第3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参见尤·米·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2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件，中国和苏联之间从1962年4月到1963年10月，双方各向对方发出了5次备忘录和照会。中国方面指责苏联一手策划了这一严重事件，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阻止居民外逃，苏联接受中国居民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等等。

实际上，1962年6月以后越境及遣送人员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9月，中国方面向苏联提出，凡愿意去中亚的苏联移民，可以采用免予签证的简便形式放行。因此，1962年10月至1963年5月期间，又有4.5万多人离开新疆去了中亚。[①]祖农·太甫也夫和马尔果甫·伊斯哈科夫带着40多名军官也去了苏联中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再次出现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越境去苏联中亚的事件，直到1967年2月中方严密封锁边界为止，出逃的人数据苏方报道也有几万人。[②]

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有长达3400多公里的边界线，像中苏其他地段的边界线一样，存在着不少有争议的地方。在50年代中苏友好的岁月里，两国间的边界问题被掩盖下去了。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中苏边界争端也变得突出起来。1963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提到，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西方有学者认为：“这个评论被看做是中国保留要求在将来某个时期归还这些领土的权利的一个建议。”[③]

经过反复交涉，中苏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举行。中国要求苏联承认19世纪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讨论边界问题。苏联方面则否认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谈判充其量只能是“澄清”某

① 尤·米·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2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彼得·琼斯等：《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5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彼得·琼斯等：《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5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些地段的具体走向。所以，中苏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20多年，也没有实质性结果。而边界冲突，包括新疆与苏联中亚之间的边界冲突却不时发生。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队在乌苏里江江心的珍宝岛（苏方称达曼斯基岛）两次发生激烈战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这以后，中苏两国边境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新疆和苏联中亚的边界上也终于爆发了严重的流血战斗。

1969年8月13日，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铁里克奇边防哨所与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扎拉纳果什之间的边境线上，中苏两国的边境巡逻部队发生严重交火事件。苏联方面出动数百名官兵围攻中国一支边防巡逻队，经过激战，中国军人全部阵亡。后来周恩来在同柯西金会谈时讲到："关于新疆的冲突，我们认为发生冲突的地区在我国一侧，你们也打死我们20多名士兵，中国从来没有想把你们的武装力量从这些地区赶出去。"[①]对此，柯西金没有否认。

1969年11月，为了加强对中国的防务和压力，苏联从突厥斯坦军区（负责中亚五国防务）分出一个中亚军区，防区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三个与新疆毗邻的共和国，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中亚军区首任司令员是突厥斯坦军区原司令员利亚申科（Н. Г. Лященко）大将。

就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1969年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协议。从此以后，中苏边界包括新疆与中亚的边界再也没有发生严重冲突。

除了新疆边民大规模逃亡苏联中亚和两国边境武装冲突以外，苏联方面没有完全停止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尤·米·加列诺维奇：《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第6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拟定了在新疆实行民族自治的草案，但是1951年3月，“伊犁五十一人会议”在讨论草案时，提出仿效苏联在中亚的做法，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要求。会议《纪要》说，这个“自治共和国在其范围内的一切问题上应充分享受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①]这样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中央人民政府和新疆当局的否决。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

1957年，新疆文学艺术界有人公开鼓动新疆闹“独立”。随后这些人在开展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遭到严厉批判。1958年，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及其追随者去了苏联中亚，后来成为在中亚的国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骨干。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苏联对新疆的干涉进一步强化，秘密扶植民族分裂主义组织。例如，当时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党纲中就写道：“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民族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②]

在中苏两国关系恶化时期，两国的经济合作完全停止，双边贸易也急剧缩减，而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一度几乎完全断绝。由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加上中国经济困难，原计划修筑的连接中国西北和哈萨克斯坦的铁路没有修通。苏方修到了边界，中方1962年修到乌鲁木齐就停工了。这与两国贸易当时急剧萎缩也是相关的。

从1961年起，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间的贸易额连年下降。当年贸易额为3345万新卢布（折合旧卢布为14866.5万），只相当1960年的51.2%。1962年贸易额降至2402万新卢布，1963年再降至1657万新卢布。[③]

①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33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4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66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从1962年起，《中苏贸易协定》不复存在，只签订临时性换文安排两国贸易，新疆受的影响尤其大。1962年8月，新疆塔城巴克图贸易口岸关闭。次年阿勒泰吉木乃陆路口岸关闭。1965年布尔津、三道河子水运口岸和吐尔尕特口岸关闭。最后，新疆与苏联中亚3000多公里边境线上只剩下霍尔果斯一处贸易口岸。1970年，霍尔果斯口岸也关闭了。新疆的对苏贸易仅剩下少许出口，而且都要经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口岸进行。20世纪70年代，新疆对苏联的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1970年仅为12万美元（约合10.91万卢布），1973年超过100万美元，1978年达到382万美元（约合347.24万卢布）。[1]

进入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包含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外交往包括对外贸易急速升温。但是由于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中苏关系并没有好转。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苏联在国内实行重大改革，在国际上奉行缓和紧张局势的方针，与中国的关系一步步好转。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开始逐步恢复乃至迅速发展。但是苏联的改革后来引起国内局势动荡，中亚各共和国出现了民族分离运动，所以新疆与苏联尤其是中亚各共和国的交往并非在一种正常状态下开展，中亚的动乱也影响到新疆。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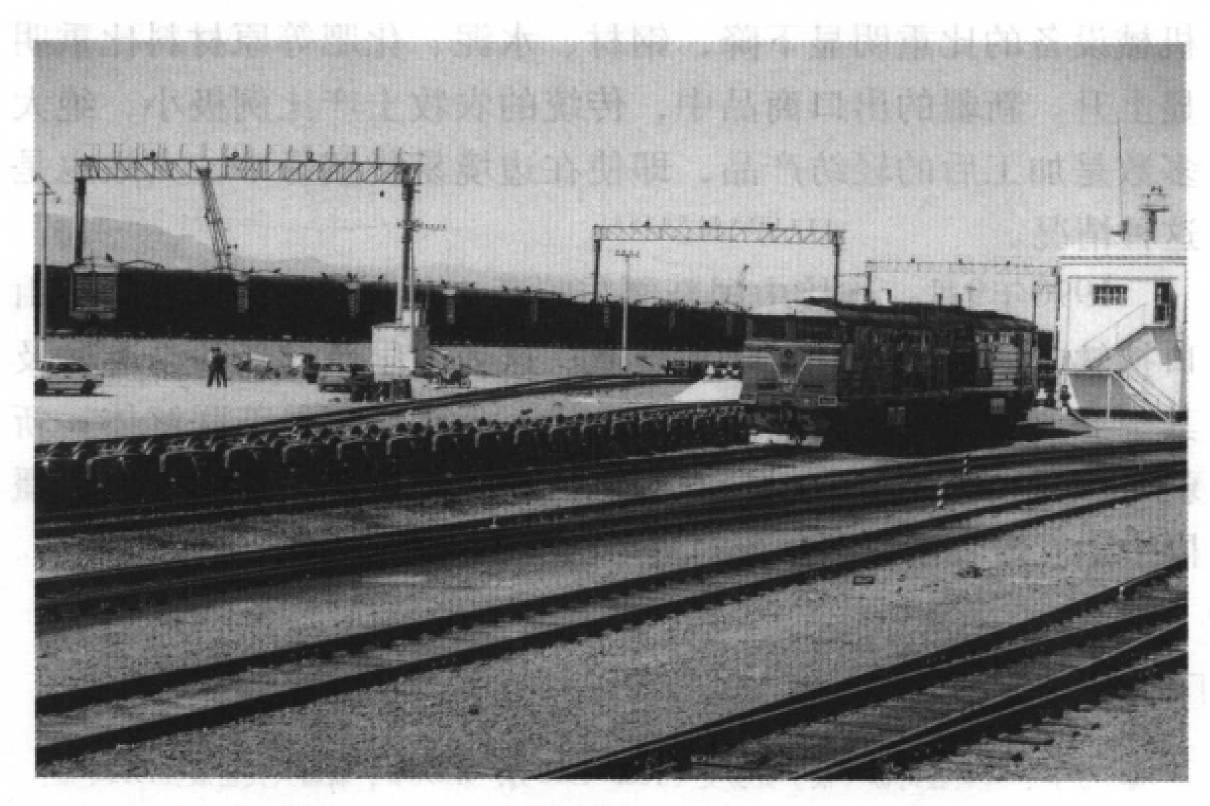
戈尔巴乔夫改革实施以后，流亡或移居中亚的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积极组建旨在使新疆从中国分离的政治组织。例如，1986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建立的“东突厥斯坦革命民族统一阵线”，其宗旨是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共和国”。该组

[1]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67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织主席尤素甫伯克·莫克利斯（玉素甫·莫哈里索夫），1962年移居哈萨克斯坦，其他骨干中不少人在新疆党政机关中工作过。苏联解体后，这类组织在中亚各国陆续地建立起来了。

中亚各国的新疆民族分裂组织及其骨干在当地极端主义分子支持下，不断向新疆境内进行渗透，制造事端，甚至蓄意制造暴力事件。1990年4月5日，发生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的武装暴乱是当时最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结果导致数十人伤亡。苏联解体后，由境外主要是中亚各国民族分裂组织策划的暴力恐怖事件就更多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贸易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1982年4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了双边贸易议定书，新疆积极筹划恢复对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直接贸易。1983年冬，关闭多年的霍尔果斯和吐尔尕特口岸陆续重新开放。1985年，新疆与苏联的贸易额达到14751.13万瑞士法郎（从1970



德鲁日巴火车站

年起，中苏商定用瑞士法郎结算，当时1卢布约合2.92瑞士法郎)，比上年猛增138.5%。[①]但是接下来几年，两国政府安排的中国新疆与苏联的贸易额呈下降趋势，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也只达到8511万瑞士法郎。[②]

与此同时，中国新疆与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的地方边境贸易却迅猛发展起来。1986年1月，中苏两国决定，即时开展新疆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五个中亚共和国及俄罗斯联邦邻近新疆地区之间的边境直接易货贸易。到1988年，新疆与中亚边境贸易额激增到5177.1万瑞士法郎，较上年增长118.4%，而且超过国家协定的新疆对苏联贸易额4730万瑞士法郎。1990年，双方的边境贸易额更是达到11798万瑞士法郎，继续超过国家协定双边贸易的8511万瑞士法郎。[③]

必须指出，80年代中期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贸易商品结构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疆的进口商品中机械设备的比重明显下降，钢材、水泥、化肥等原材料比重明显上升。新疆的出口商品中，传统的农牧土产比例极小，绝大多数是加工后的轻纺产品，即使在边境易货贸易中，大致也是这种情况。

1990年9月，连接中国新疆与哈萨克共和国的铁路在阿拉山口接轨，第二座亚欧大陆桥贯通。这为中国及其新疆与苏联及其中亚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良机。一年后随着苏联解体，新疆对苏联贸易结束。但是双方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为发展新疆同中亚五国及俄罗斯联邦的贸易奠定了有利基础。

①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67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6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684页，第692页，第6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节 苏联及其中亚地区与阿富汗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富汗社会发生着缓慢的变化。1946年5月，有“自由亲王”之称的查希尔国王之叔沙赫·马茂德（Shah Mahmud）出任首相，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出现了新的起色，甚至还举行过议会自由选举。但是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1953年9月，马茂德辞去首相职务，国王的堂兄穆罕默德·达乌德（Muhammad Daoud）接任首相。达乌德政府同样奉行改革方针，并且坚持了10年，结果还是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于1963年3月倒了台。接着，阿富汗颁布新宪法，标榜“三权分立”，然而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终于酿成了1973年7月推翻查希尔国王的政变。

这一时期阿富汗与苏联及其中亚地区的关系时冷时暖，起伏不定。战后初期，双方关系比较冷淡。1950年7月，阿富汗与苏联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苏联向阿富汗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石油产品、棉布、食糖、水泥等，这些商品多为中亚各共和国生产，就近运往阿富汗。同时，协定允许作为内陆国的阿富汗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商品自由经过苏联及其中亚地区。

1955年，阿富汗与东部邻国巴基斯坦因跨界民族普什图人的地位问题发生争执，两国关系紧张恶化起来。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措施，不允许阿富汗的进出口商品在本国过境，而当时阿富汗进出口商品的80%要通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封锁贸易通道以后，阿富汗达乌德内阁只得向北部邻国苏联求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正在推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外交方针，因此与阿富汗于当年6月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将1950年阿苏贸易协定延长5年，允许阿富汗的进出口货物可以使用苏联的运输工具和免税自由出入苏联的国土。12月，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


阿富汗普什图人

尔加宁访问阿富汗。两国领导人同意把1931年签订的苏阿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延长20年。同时，苏联领导人宣布向阿富汗五年计划建设提供1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并且表示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争端中公开支持阿富汗。据统计，1954年1月至1963年1月，苏联向阿富汗提供的各种援助达5.15亿美元之巨。①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继续增加。两国的贸易额不断上升。而同期美国由于支持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明显疏远了。

苏联不仅援助阿富汗建设了一大批重要的工程，而且一步步加强了对阿富汗的影响，乃至某种程度的控制。例如，苏联援建的交通项目密切了阿富汗与苏联尤其是中亚地区的联系，也强化了阿富汗对后者的依赖。从乌兹别克斯坦边城铁尔梅兹经阿富汗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到首都喀布尔的萨朗公路，是沟通苏联中亚和阿富汗腹心区域的方便通道。另一条苏联斥巨资援建的阿富汗公路从土库曼斯坦边城库什卡起，经阿富汗西部门户赫拉特再到南方重镇

①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坎大哈，全长750公里，这条公路当时的战略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此外，苏联帮助建设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等设施都是从方便进入阿富汗着眼的。苏联还从铁尔梅兹修建了一条输油管道至马扎里沙里夫，掌握着阿富汗北方的能源供应。除了经济援助以外，苏联给阿富汗的军事援助也是十分可观的。一方面向阿富汗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为阿富汗军队培训了很多军官。这样，到70年代初期，苏联与阿富汗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特殊关系。

苏联如此重视内陆小国阿富汗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第一，苏联要冲破美国、英国操纵的中央条约组织对其南部中亚边境的封锁，进而朝南下印度洋的传统战略目标前进。第二，一个友好甚至顺从的阿富汗有利于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里除了地缘因素以外，还有跨界民族的问题，“巴斯马奇运动”曾经凸显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中必须考虑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这个党是阿富汗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于1965年1月1日创建的，它宣称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在阿富汗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该党的领导人多系亲苏人士，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曾在苏联游历多年。人民民主党希望在苏联的支持下推翻现存制度，夺取阿富汗的政权。

但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不久就分裂为以塔拉基、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为首的“人民派”和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首的“旗帜派”。两派是如此地严重对立，连苏联也无法调和。于是苏联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1963年下野的前首相达乌德身上，而达乌德与“旗帜派”往来比较密切。

1973年6月，阿富汗国王查希尔远赴英国治病，随后又到罗

马进行疗养。7月17日夜，一批亲苏倾向的军官发动政变，达乌德重新上台执政。新政权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任共和国总统，并兼任执政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而该委员会成员多系人民民主党旗帜派成员。

苏联对这次政变持相当欢迎的态度，马上给予阿富汗新政权有力的支援。第一年达乌德政府就从苏联得到了1.5亿美元的贷款和1.37亿美元的武器。迄至1978年，苏联还为达乌德政府培训了4000多名军官。[①]达乌德政府总体上奉行倾向苏联的外交政策，但是注意避免过分仰赖苏联，后来努力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在内政方面，达乌德抑制人民民主党势力。1977年2月，他解散了旗帜派人员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下令取缔人民派。达乌德的政策转变固然引起苏联不满，不过更激起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愤恨。该党决定利用时机除掉达乌德。

1978年4月27日，一批人民民主党军官突然发动政变，政变部队很快控制了首都局势，达乌德在交火中被击毙。29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全国政权，第二天宣布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塔拉基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卡尔迈勒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副总理，阿明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新政府很快公布了激进的施政纲领，内容包括大力推行土地改革、社会经济改造直至婚俗革新，等等，但是同样遭到国内僧俗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因此一直进展不大。

对于这次称之为"阿富汗四月革命"的政变，苏联方面事先并不知情。俄罗斯的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P.A. Медведев）写道："以普扎诺夫为首的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感到惊慌失措；它没有预见到和没有预报事态的这种发展。关于喀布尔的政变，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葛里米柯是从西方通讯

① 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26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社的报道中知道的。”他还引用安德罗波夫后来说的一段话证实这一点；“瞧，生活充满着多少矛盾啊！我们曾经梦想过‘世界革命’，可现在却甚至无法为邻国中的革命感到高兴……唉，如果这场革命迟两三年开始，一切该多好啊！……另一方面，革命好像生孩子一样，它是无法推迟的。”[①]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副主席的克留奇科夫（В.А. Крючков）更是认为：“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的进行不但没有得到苏联的倡导和支持，反而违背了苏联的愿望。”[②]

不论怎样，在阿富汗发生“革命”的既成事实面前，苏联别无选择，只有给人民民主党政权以全力支援。3个月内，苏联与阿富汗签署了30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合同，并允诺提供10470万美元的贷款，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的人数急剧增加，达3000人之多。[③]这样一来，苏联很快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阿富汗政府的政策走向。

在外交领域，阿富汗政府实行朝苏联一边倒的政策。1978年12月5日，塔拉基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实行全方位的合作，其中第四条写道：“缔约双方本着睦邻友好传统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将为保障两国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磋商，并经双方同意后采取相应措施。为了加强缔约双方的防御能力，双方将在它们缔结的相应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军事领域内的合作。”[④]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条约具有的军事同盟性质和苏联严密控制阿富汗的企图。

① 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第220~221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第17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28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④ 刘竟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4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实际上塔拉基政府甘愿追随苏联，并且奉行公开的反西方政策。

在内政方面，塔拉基政府的激进措施引发了内乱。经常出入阿富汗的克留奇科夫认为，塔拉基政府的错误是“经常性的冒进主义，不考虑本国特殊情况，盲目地照搬苏联模式”。阿富汗领导人甚至声称：“苏联各中亚共和国的经验都不适合阿富汗”，他们要照搬俄罗斯模式。[①]

“四月革命”没过多久，阿富汗境内就出现了零星的叛乱，部族领袖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往往是叛乱首领，而政府军哗变更令阿富汗政府伤透了脑筋。1979年3月，赫拉特驻军哗变顿时恶化了阿富汗局势。阿富汗政府号称有10万正规军，在叛军面前却毫无战斗力。为了稳定阿富汗局势，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于3月17日至19日连续开了三天会，最后决定拒绝塔拉基政府提出的苏联出兵的要求，但是加大对阿富汗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②]

在这紧要关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却激化起来了。塔拉基所属的人民派大肆清洗旗帜派，许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接着，人民派内部强硬派代表阿明与塔拉基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苏联支持相对温和的塔拉基。可是在1979年9月14日的火并中，阿明取得了胜利。不久，阿明下令处死了塔拉基。阿明就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以后，苏联领导人只得向他发去“贺电”，但是双方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

阿明执政以后，对他的政敌进行无情清洗，阿富汗弥漫着恐怖气氛。其次，阿明对苏联心怀不满，迫使苏联召回大使普扎诺夫（А. М. Пузанов）。此外，阿明对国内反政府游击队进行

---

① 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第201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第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残酷镇压，但是游击队越战越强，不少政府军官兵也投奔到反政府武装那里去了。鉴于阿明政府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决定动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迫使阿明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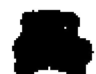
1979年10月和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的负责阿富汗问题的“四人委员会”（成员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负责国际问题的书记波诺马廖夫）频频开会，讨论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变化和苏联应当采取的对策。他们越来越觉得苏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的决定已经不适应形势了，苏联必须直接出兵才能解决“阿富汗问题”。“四人委员会”之所以提出出兵阿富汗的主张，除了不信任阿明和担心阿明控制不住局面以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那就是苏联和阿富汗的邻国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原教旨主义的狂涛如果从伊朗席卷到阿富汗，那么不仅阿富汗会脱离苏联控制，而且中亚各共和国的安全和稳定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兵阿富汗问题展开讨论。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这次会议确实作出了派兵入侵阿富汗的决定，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除了有关人员的回忆以外，还有1992年从苏联“特别档案”中查出的一份用密码写的决议证明了这一点。决议全文如下：

苏共中央决议　编号176/125　1979年12月12日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会议。

出席人员：米·安·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维·瓦·格里申（В.В.Гришин）、安·帕·基里连科（А.П.Кириленко）、阿·雅·佩尔谢（А.Я.Пельше）、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尤·弗·安德罗波夫、安·安·葛罗米柯、尼·阿·吉洪诺夫（Н. А. Тихонов）、鲍·尼·波诺马廖夫。



关于'A'（指阿富汗——译者注）的局势

1.同意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意见和措施。

准许他们在贯彻这些措施时进行非原则性的更改。

需要中央决定的问题应及时提交政治局。

由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同志负责贯彻这些措施。

2.责成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执行已拟定措施的进展情况。

中央书记　列·勃列日涅夫①

苏联军队即将开始行动之际，几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讨论出兵阿富汗的有关问题。他们的意见由契尔年科作了记录，作为对上面这个决议的附件。记录全文如下：

对1979年12月12日176/125号决议的补充

1979年12月26日（列·伊·勃列日涅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康·乌·契尔年科在别墅聚会）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及安德罗波夫同志报告了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同时赞成同志们最近拟定的行动计划。

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呈报的行动计划的内容和方针是适当的，要仔细考虑自己行动的每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① 《特别档案中的秘密文件：阿富汗》，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93年第3期，第5页。

康·契尔年科　　1979年12月27日[①]

据克留奇科夫说，在出兵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进行过秘密讨论，结果全体政治局委员（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都投了赞成票。[②]据传，当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Н. В.Огарков）元帅提出反对意见时，安德罗波夫粗暴地打断他说："我们有负责政策的人。您应该考虑军事方面的问题，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布置给您的任务。"[③]

苏联几万大军就是依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暧昧不明的决议（至少从文字上看是如此）开进阿富汗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或其主席团连一个形式上的出兵命令都没有。政治局的有关决定乃至乌斯季诺夫给入侵部队下达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的。根据乌斯季诺夫的口头指示，苏军有关指挥机关发布了30多条命令。按照这些命令，苏联中亚军区和突厥斯坦军区部署了6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其他一些部队，兵力共计12.5万人。

在大举派兵进入阿富汗以前，苏联就已经派遣若干作战部队到了阿富汗。首批500人左右的一支部队早在11月就到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12月24~26日，苏联动用280架次大型运输机，把一个空降师运送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喀布尔国际机场，总兵力达到1万人。这些行动阿明当然都知道，而且他以为苏联派兵是帮助他平定叛乱的，没有想到苏联要清除他。

12月26日，苏联驻阿富汗全权代表、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帕普京（В. С.Папутин）中将面见阿明，要求后者辞职，以便让苏军大举进入阿富汗。阿明坚决拒绝了帕普京的要求，

① 《特别档案中的秘密文件：阿富汗》，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93年第3期，第5页。

② 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第185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640~641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结果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帕普京也被阿明的卫兵杀害。驻喀布尔地区的苏联军队闻讯后马上开始行动，很快占领了市内许多重要据点。27日晚，一支精锐的克格勒部队经过激战攻克了阿明居住的达鲁拉曼宫，消灭了阿明的卫队，并且打死了阿明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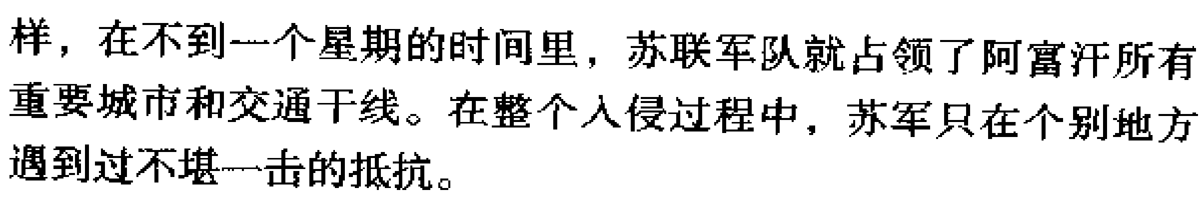
就在此刻，苏联塔什干的一家电台冒用阿富汗国家电台的频率播放了推翻阿明政权的消息，并且播放了身在苏联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导人卡尔迈勒的一篇《告阿富汗人民书》。电台宣布，卡尔迈勒已经担任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卡尔迈勒是塔吉克族人，遭塔拉基排挤，1978年7月被任命为阿富汗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苏联出兵前来到莫斯科。

12月28日，卡尔迈勒在苏联特种部队护卫下，从塔什干乘飞机回到喀布尔。他马上组织了一个新政府，自己兼任总理，革命委员会也同时组建起来了。

12月28日清晨，部署在中亚边境的苏联大军兵分两路侵人阿富汗。东路担任主攻，进军方向是从铁尔梅兹经马扎里沙里夫直取喀布尔，然后再向南进攻坎大哈。西路为辅攻，由库什卡出发，占领赫拉特以后再向东进攻，与东路部队在坎大哈会师。

东路作战集群由隶属于中亚军区的第40集团军组成，总兵力约5万人。集团军司令员潘菲洛夫（Панфилов）中将是塔什干人，比较熟悉阿富汗的情况。西路作战集群由隶属于突厥斯坦军区的部队组成，总兵力共约4万人，指挥员是谢夫钦科（Шевченко）中将。前线的军事行动由索科洛夫（С.Л .Соколов）元帅通过卫星通讯统一指挥。

越过阿富汗边界以后，苏军进展异常顺利。东路苏军28日中午就占领了马扎里沙里夫，30日进抵喀布尔。西路苏军29日占领赫拉特。1980年1月2日，两支苏军部队在坎大哈会师。这



样，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军队就占领了阿富汗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在整个入侵过程中，苏军只在个别地方遇到过不堪一击的抵抗。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四人委员会"在12月31日呈报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乐观地断言："广大人民群众以无比高兴的心情欢迎阿明政权被推翻的消息，并且表示准备支持新政府公布的纲领。阿富汗军队各主要部队的指挥官都已宣布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党和政府的新领导。对苏联的军人和专家总的来说继续表示欢迎。国内的形势正在正常化。"①

可是，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苏联入侵阿富汗很快就使自己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军企图速战速决消灭反政府武装的计划落了空，不久就遇到了穆斯林游击队顽强的抵抗。苏联从此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拼命打了八九年，最后以承认失败和全面撤军而告终。

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声。在入侵之际，苏共中央政治局一共通过了8个文件，旨在向世界各国和苏联人民"解释"出兵阿富汗的理由。辩解的理由是应阿富汗政府多次"请求"，抗击外国侵略；同时强调苏联只派出了"有限的军事力量"，而且一旦上述理由不再存在，即撤出所有的苏联部队。

但是世界各国谁也不相信苏联的辩解。中国、巴基斯坦、伊朗等阿富汗的邻国，伊斯兰各国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在1980年1月14日举行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上，以104票赞成、18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决议。在同年11月举行的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再次以压倒

① 《特别档案中的秘密文件：阿富汗》，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93年第3期，第16页。

多数通过类似决议。以后年年联合国大会都通过了这样的决议。

与国际社会的持续反对一样，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的武装抵抗同样令苏联大伤脑筋。阿富汗是一个拥有20多个民族、3000多个部落的国家，游击队多是以部落武装为基础联合起来的大大小小的作战集团。而且，以这些武装集团为依托，形成了许多政治组织，其中绝大多数是伊斯兰政党团体。

阿富汗抵抗运动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的政党团体：第一类是逊尼派穆斯林组织，最初有六个较大党派，主要是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àtyar）为首的伊斯兰党和布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ani）为首的伊斯兰促进会。它们都有几千到几万人不等的武装，是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主力。第二类是较小一些的八个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第三类是规模不大的各部族组织，但是数量很多。此外，还有数量很少的左翼组织和没有武装的流亡组织。

这些抵抗组织后来逐渐走向形式上的联合，逊尼派从“五党联盟”、“六党联盟”到1982年5月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的“七党联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什叶派也形成过所谓的“八党联盟”。部族组织也在一起开过会，讨论共同行动的问题。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组织虽然没有统一起来，但是在与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战斗中行动是一致的。

阿富汗游击队一开始就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而且援助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光是通过巴基斯坦边境运进阿富汗的武器弹药，起初一年为1万吨，1985年达到6.5万吨。[①] 1986年，美国把“毒刺”导弹交给游击队，使苏联的空中优势大打折扣。美国还帮助游击队培训人员，向他们提供卫星照片，确定打击目标。美国甚至策划、帮助阿富汗游击队向苏联中亚

① 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第13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边境地区进行渗透。

除了西方国家的援助之外，伊斯兰国家向阿富汗游击队也提供了可观的援助。此外，很多国家的穆斯林作为志愿者来到阿富汗帮助游击队同苏联军队作战，例如沙特阿拉伯的一支志愿者部队赴阿富汗进行“圣战”，他们同样从美国那里得到过大量援助。

为了扑灭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武装反抗，也为了协调苏联各有关部门在阿富汗的行动，1980年初在“四人委员会”下面成立了阿富汗事务工作小组，由克格勃副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С. Ф. Ахромеев）大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科尔尼延科（Г. М. Корниенко）三人组成，他们分别代表克格勃、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小组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从1980年1月下旬开始，苏联占领军对阿富汗游击队进行全面清剿，但是战况越来越糟。于是苏军从秋季开始调整战略，变全面清剿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顺序依次为北部、中部和东部。到1982年年中，苏联入侵部队的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最初，侵阿苏军中的官兵大多来自中亚各共和国，他们与阿富汗人同为穆斯林，甚至属于同一民族（如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比较熟悉阿富汗的情况，本来以为这是作战的有利条件，可是来自中亚的官兵也更同情阿富汗人。于是，苏联通过不断换防，明显减少了侵阿部队中的中亚官兵比例。尽管如此，苏军对阿富汗游击队的重点进攻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潘杰希尔山谷争夺战是阿富汗游击队最突出的战斗范例。山谷南端在喀布尔以北80公里处，扼制萨朗公路这一重要的战略通道。据守山谷的是伊斯兰促进会塔吉克族指挥官艾哈迈德·沙赫·马茂德（Ahmed shah Mohsood）所率领的游击队。1980~1984年，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对潘杰希尔山谷连续发动了七次



大规模进攻，企图拔除这颗“眼中钉”。但是苏军的进攻无一不是以损兵折将而收场，人员损失数以千计。到1982年底，阿富汗各游击队总兵力约有10万人，控制的国土有百分之七八十。

在阿富汗政府控制区，苏联加紧培植亲苏势力及其社会基础。苏联的顾问和专家到处都是，控制着卡尔迈勒政府的各个领域。苏联的军事顾问派到了阿富汗政府军的营甚至连级，大批阿富汗军官被送往苏联或就地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苏联克格勃更是把阿富汗的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苏联还帮助阿富汗政府仿效苏联的样式，建立和完善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例如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甚至由官方主导的伊斯兰宗教组织。数以万计的阿富汗少年儿童被送到苏联接受教育。

苏联与阿富汗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双边贸易更是十分红火。阿富汗对苏出口的主要产品是天然气和其他矿产、水果等，从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石油产品和日用消费品。阿富汗三分之二以上的对外贸易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的。1983~1984年度，苏联和阿富汗的贸易额超过4亿美元（1978~1979年度仅为1.1亿美元），占阿富汗对外贸易总额的55%。[①]苏联还与阿富汗签订了建设成百个“合作工程”的协议合同，包括矿山、工厂、公用设施尤其是交通项目的建设，从而进一步控制了阿富汗的经济命脉。可是，尽管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阿富汗政府控制区仍然是百业萧条。

除了全面控制阿富汗各个部门以外，苏联甚至掠夺阿富汗的领土，把瓦罕地区并入苏联。瓦罕是阿富汗东端一条狭长走廊，战略位置相当重要。1980年下半年，苏联塔吉克族部队占领了瓦罕。1981年6月16日，苏联与阿富汗签订新的边界条约，

① 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29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将瓦罕地区划给苏联。直到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以后，瓦罕才回归阿富汗。

连年的战乱使阿富汗的社会经济遭到彻底的破坏，1982年的主要粮食产量还不及1978年的三分之一。[①]为躲避战祸，阿富汗各族人民大量外逃。到1987年，流落邻国的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多达600万人。

阿富汗战局的演变证明，苏联不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战事迁延不绝不仅给阿富汗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的灾难，而且给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同时苏联也背上了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包袱。于是，国际社会开始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从1982年2月到1987年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迭戈·科多维斯（Diego Codovis）的斡旋和主持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在日内瓦举行了十轮会谈，但由于双方立场相距太远，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口头上赞成和谈，实际上希望阿富汗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把苏联拖垮。

戈尔巴乔夫当上苏联领导人以后，曾经指望靠军事胜利解决阿富汗问题。激烈的战斗从1985年5月持续到9月，但是苏军遭到比往年更大的损失。这样又逼得苏联寻求政治解决。1985年10月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尽快从阿富汗撤出军队，同时确保阿富汗对苏联友好的目标。[②]苏联想从阿富汗脱身，目的在于甩掉这个沉重包袱，以便在国内顺利地推行改革，同时也为了同西方和中国改善关系。

为了使阿富汗政府积极配合苏联的行动，戈尔巴乔夫认为必须换掉卡尔迈勒。在苏联压力下，卡尔迈勒在1986年5月4日

① 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第27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第3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宣布辞职，阿富汗情报局长扎尔·纳吉布拉（Czar Najibullah）接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之职。10月，纳吉布拉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苏联领导人认为，换掉卡尔迈勒有利于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同时在他们看来，纳吉布拉不仅年轻，而且政治态度较之卡尔迈勒要灵活，是配合苏联实现其在阿富汗新目标的合适人选。纳吉布拉上台后，实行宽松和解的政策，阿富汗政府所处的内外环境似乎均有明显的好转。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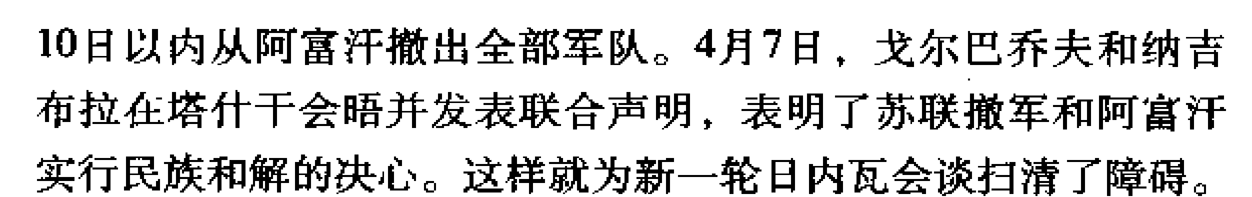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开始实施撤军行动。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当年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8000人的苏军官兵。11月5日，苏联宣布上述兵力已经撤到了中亚军区和突厥斯坦军区指定地点。

1987年1月14日，纳吉布拉宣布阿富汗政府将于当日午夜开始停火三个月。第二天，纳吉布拉发表声明，称已同苏联就全面撤军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且提出了民族和解纲领，后来又宣布同意与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6月28日，纳吉布拉决定将国名由“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7月底，纳吉布拉当选为阿富汗共和国总统。

但是，阿富汗游击队领导人拒绝响应政府方面所有的和解行动，他们坚持要求苏联完全撤军和推翻现政府，并且发誓要为此战斗到底。1988年2月，阿富汗游击队“七党联盟”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为了迫使游击队同意实行“和解”，苏军从1987年5月起发动大规模攻势，到1988年1月，攻势再次以失利告终。到这时苏联认定，必须尽快从阿富汗脱身。1988年2月8日，即第11轮日内瓦和谈前夕，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将自5月15日起

① 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第206页、第214~215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10日以内从阿富汗撤出全部军队。4月7日，戈尔巴乔夫和纳吉布拉在塔什干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了苏联撤军和阿富汗实行民族和解的决心。这样就为新一轮日内瓦会谈扫清了障碍。

1988年4月14日，在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主持下，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四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协议共有4份有关文件和一份备忘录。协议规定：苏联军队从5月15日起的9个月时间内全部撤出阿富汗，而且最初3个月内要撤出一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共和国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使用武力；苏联和美国保证尊重巴基斯坦、阿富汗两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阿富汗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保证难民自愿返回家园，等等。

苏联马上为撤军进行准备，在铁尔梅兹和库什卡设立了撤军行动指挥所。5月15日，苏军开始撤出第一批部队。喀布尔为苏联军队举行了送行仪式，苏联突厥斯坦军区司令波波夫（Попов）大将和纳吉布拉出席了盛大的仪式。截至8月15日的3个月内，苏联按日内瓦协议规定撤出了5.7万人（占全部驻阿苏军10万余人的一半）。

但是，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趁苏军撤离之机频频发起武装进攻，抢占地盘，直至袭扰后撤的苏军部队。有鉴于此，苏联于11月初宣布暂停撤军行动，而游击队在美国和巴基斯坦支持下加强了攻势。最终苏联退让了，于1989年年初加快了撤军步伐，同时也加大了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以保住既有的阵地。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军部队在驻阿富汗苏军司令员兼第40集团军司令员格罗莫夫（В.Громов）率领下通过铁尔梅兹以南阿姆河上的边界大桥。格罗莫夫最后一个步行走过苏阿边界线，他向围上来的各国记者大声说：“我是最后一名撤出阿富汗国土的苏军人员，在我身后的阿富汗境内，再也找不到

一个苏联士兵了。”[①]这一天正是日内瓦协议规定的苏军撤离阿富汗的最后期限。

在长达九年零两个月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据克留奇科夫的说法，苏军在阿富汗阵亡、病故及其他原因死亡的官兵为1.33万人，受伤约3万人，另有311人失踪。[②]苏联《真理报》1989年8月17日公布的数字与克留奇科夫所说的差不多，牺牲13833人，另有330人失踪或被俘。[③]另外，苏联用于阿富汗的军费开支十分庞大，每年约50亿卢布，总共花费了600亿卢布。[④]

不难看出，1979年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大错误决策。时隔整整十年以后，1989年12月24日，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谴责出兵阿富汗的决议。决议写道：“派遣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的决定应该受到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谴责，这是违背苏联宪法采取的行动，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均没有审议这个问题。决定是由狭小圈子里的几个人作出的。代表大会已经点了他们的名：列·伊·勃列日涅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尤·弗·安德罗波夫、安·安·葛罗米柯。”[⑤]

苏联撤军以后，阿富汗各方并没有实现民族和解，而是使国家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内战。1989年3月6日，游击队攻占东部重镇贾拉拉巴德，从而揭开了阿富汗内战序幕。苏联继续援助阿富汗政府。但是阿富汗政府的处境日趋恶化。不久，苏联

① 刘逼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第4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第206页、第216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刘逼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第43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第22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⑤ 《特别档案中的秘密文件：阿富汗》，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93年第3期，第4页。

自身也开始走向解体。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完全停止了对阿富汗的援助。纳吉布拉于1992年3月18日宣布交出权力，他的政府随之走向瓦解。4月16日，驻守喀布尔的乌兹别克民兵司令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让北方游击队联合司令马苏德的大军进城，希克马蒂亚尔的游击队也蜂拥而入。纳吉布拉逃进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

两派游击队进驻喀布尔以后发生了激烈战斗。在联合国和巴基斯坦调停之下，直到4月24日，逊尼派七党联盟才在日内瓦达成接管政权的协议。4月28日，“阿富汗伊斯兰国”宣告成立。经过两个月的过渡期以后，6月28日，伊斯兰促进会主席拉巴尼（塔吉克人）出任总统，他与国防部长马苏德（塔吉克人）主导了政府。不久，身为总理的普什图人希克马蒂亚尔和乌兹别克民兵司令杜斯塔姆联合起来反对拉巴尼，阿富汗内战再起。[①]可是另一支武装伊斯兰学生军“塔利班”后来异军突起，于1996年9月27日攻占喀布尔，拉巴尼和马苏德率残部退守北方，其他军阀作鸟兽散，而纳吉布拉被杀害。

塔利班统治阿富汗5年多，实行严酷的伊斯兰法统治。2001年10月，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追捕本·拉登为名，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11月13日，在美国和俄罗斯支持下，拉巴尼为首的北方联盟的军队攻占喀布尔，塔利班政权倒台。

大事年表

○ 1914年　　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同年，中亚棉花种植面积达到60万公顷，为革命前最多的一年。

○ 1915年　　中亚种植棉花57万公顷，总产量为2051.8万普特，均比上年有所下降。

○ 1916年　　7月8日，沙皇颁布征召中亚穆斯林男子上前线服役的敕令。7月17日，反抗服役敕令的示威在苦盏爆发，随后发展为波及中亚各省的民族暴动。突厥斯坦总督区的暴动在10月被镇压下去。

11月5日，草原区图尔盖省的穆斯林暴动大军围困图尔盖城。11月29日，暴动队伍战败，余部分散活动。

○ 1917年　　2月，突厥斯坦总督区当局对七河省暴动者进行严厉判决。

3月12日（俄历二月二十七日），俄国首都爆发起义，沙皇政权被推翻，革命政权苏维埃及临时政府相继成立。俄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

4月13日，塔什干苏维埃和穆斯林委员会宣布撤销突厥斯坦总督区，随后逮捕原总督。4月20日，突厥斯坦边区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4月20-28日，突厥斯坦边区苏

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4月，哈萨克人代表大会在奥伦堡举行，成立“吉尔吉斯委员会”。

4月29日至5月6日，突厥斯坦边区第一次穆斯林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了“穆斯林中央委员会”。

8月3~8日，全吉尔吉斯代表大会在奥伦堡举行，会上宣布成立“阿拉什党”。

9月25日，塔什干的布尔什维克等激进组织成立革命委员会。29日，边区苏维埃等组织否定革命委员会，使其夺取政权的企图落空，这就是“九月事变”。

11月7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起义在首都彼得格勒取得成功，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11月11日，塔什干武装起义爆发。11月13日起义取得胜利。11月15日组成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

11月28日~12月5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举行，成立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布尔什维克科列索夫。边区各省在以后3个月内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

○ 1918年　1月31日，苏维埃军队攻克草原区重镇奥伦堡，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哈萨克斯坦各省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

2月20日，苏维埃军队攻克浩罕，“浩罕自治政府”灭亡。

4月30日，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告成立。

6月，突厥斯坦共产党成立。

○ 1919年　1月19日，塔什干发生军事政变，两天后政变被平息。

1月，苏俄红军收复奥伦堡。3月，高尔察克叛军占领哈萨克斯坦大片地区。

3月27日，苏维埃俄国第一个承认阿富汗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7月9日，外里海省恢复苏维埃政权。

7月10日，哈萨克草原地区苏维埃政权机关——吉尔吉斯边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8月8日，阿富汗与英国签订和约，获得独立。

8月14日~11月4日，苏俄红军连续取得阿克纠宾斯克战役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的胜利，解放哈萨克草原地区。

9月，巴斯马奇武装攻占奥什城，从此巴斯马奇运动与中亚苏维埃政权展开长期对抗。

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联合成立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

○ 1920年　2月1日，苏俄红军攻占希瓦汗国都城，推翻可汗政权，次日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

3月，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作为州一级党组织加入俄共（布）。

4月27~30日，花剌子模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希瓦城召开，大会宣布废除希瓦汗国，成立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

5月27日，中俄《伊犁临时通商协定》签订。

7月，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成立。1922年2月改组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

8月26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自治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9月2日，苏俄红军攻占布哈拉酋长国首都布哈拉城，宣布

成立革命委员会。10月6~8日，布哈拉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布取消布哈拉酋长国，成立布哈拉人民共和国。

9月7日，苏俄政府决定建立国立突厥斯坦大学。

○ 1921年　2月，反抗余粮收集制的哈萨克斯坦农民暴动队伍一度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

2月28日，苏维埃俄国与阿富汗在莫斯科签订两国友好条约。

3月14日，中亚苏维埃政权解散由青年希瓦党人掌握的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政府。

3月，被推翻的布哈拉埃米尔阿利姆·汗逃进阿富汗。

5月，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停止了余粮收集制，实施新经济政策。

8~9月，苏俄红军进入新疆，与中国军队合击，歼灭流窜新疆白俄武装。

○ 1922年　2月中旬，巴斯马奇武装攻克杜尚别。

2月，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开始全面推行新经济政策。

7月14日，红军收复杜尚别。8月4日，击毙布哈拉境内巴斯马奇武装首领、土耳其将军恩维尔。

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

○ 1923年　3月，突厥斯坦、布哈拉、花剌子模三个共和国决定联合成立中亚经济委员会。

6月9~12日，俄共（布）中央开会讨伐“地方民族主义”，对中亚地区政局演变影响极大。

6月，中亚苏维埃当局彻底改组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改名为花剌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1924年　1月，苏维埃政府宣布巴斯马奇武装已被平定。但是零星的战斗持续到30年代初。

1月21日，列宁去世。

6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在中亚进行民族国家划界的决定。

9月，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改为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0月27日，在突厥斯坦、布哈拉、花剌子模三个共和国领土上组建乌兹别克、土库曼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成立了属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

10月，苏联和中国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互在中亚和新疆各设五个领事馆。

○ 1925年　3月，卡拉—吉尔吉斯族恢复吉尔吉斯族名称，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改名为吉尔吉斯自治州。

4月，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改名为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族名称得到恢复。

5月13日，乌兹别克共和国和土库曼共和国加入苏联。

8月，苏联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与中国驻斜米（塞米巴拉金斯克）总领事到任。

12月，驻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苏联边防军队占领阿姆河的一座属于阿富汗的小岛。不久，苏军撤出。

○ 1926年　8月31日，苏联和阿富汗在喀布尔签订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

○ 1927年　3月7日，在吉尔吉斯自治州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

○ 1928年　5月，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访问苏联。

10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亚地区工业投资大幅度增加。

同年，苏联在中亚大力推广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30年代末，开始用俄文字母取代拉丁字母。

○ 1929年　　10月16日，塔吉克自治共和国脱离乌兹别克共和国，正式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1930年　　2月17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作出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定。中亚各共和国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同年，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特大型煤田开始大规模开发。

○ 1931年　　2月，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

3月，塔吉克共和国加入苏联。

10月1日，中国新疆省当局与苏联政府代表在迪化秘密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

○ 1932年　　3月20日，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改名为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

7月，中亚各共和国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告一段落。

同年，据官方统计，中亚各共和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 1933年　　苏联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重点投资建设地区。

12月，苏联从中亚出兵攻占伊犁，协助新疆省督办盛世才消灭张培元军。

○ 1934年　　1月，苏联中亚红军再次出兵中国新疆。2月11日，红军击溃马仲英军，解除迪化之围。随后，红军与盛世才军联合追击马仲英军至南疆。4月中旬，进占喀什，马仲英流亡苏联。

○ 1935年　　5月，中国新疆省当局与苏联签订贷款协议。

○ 1936年　　自农业集体化运动以来共有170万斯拉夫移民到中亚定居。

12月5日，苏联通过新宪法。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正式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日加入苏联。同时，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由俄罗斯联邦划归乌兹别克共和国。

○ 1937年　2月14日至3月26日，中亚各共和国通过新宪法。

同年，中亚地区开始大规模政治清洗。原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雷斯库洛夫等一大批党政领导人和知名人士被捕处死。

同年，中亚各共和国最终实现农业集体化。官方宣布中亚各共和国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它们的经济实力成倍增长。

○ 1938年　1月，中亚各共和国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

3月，原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霍贾耶夫和原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被判处死刑。

同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亚地区继续成为苏联重点投资建设地区。

○ 1939年　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1941年　6月22日，德国大举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全国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中亚各共和国陆续作出了相应决定。

8月28日，苏联政府决定撤销伏尔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国，将那里的德意志人全部迁往中亚等东方地区。

10月11日，苏联照会阿富汗政府，指责阿富汗策动对中亚进行武装袭击。10月19日，苏联限令阿富汗政府在一个月以内驱逐德国人。

11月18日，由哈萨克共和国各族官兵组成的第316师师长潘菲洛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牺牲。

○ 1942年　10月5日，盛世才向苏联提交备忘录，要求除外交官之外的所有苏联人员在3个月以内撤离新疆。

同年，从苏联西部迁至中亚的308个大型工厂全部开工。

○ 1943年　10~11月，苏联将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全体卡拉恰耶夫人强行迁到中亚。

○ 1944年　2~3月，苏联将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几十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行迁往中亚。

3月，苏联将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全体巴尔卡尔人强行迁至中亚。

5月，苏联将居住在克里木半岛的近20万鞑靼人强行迁到中亚等地安置。6月30日，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撤销。

8月下旬，苏联支持建立的新疆“解放组织”在伊犁巩哈发起暴动，“三区革命”开始。

○ 1945年　5月9日，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苏联卫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7月，新疆暴动武装攻占塔城。9月攻占阿山。暴动武装控制了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1946年　中亚各共和国开始实施第四个五年计划。

1月2日，在苏联斡旋下，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三区革命临时政府达成和平协议。

6月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名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署”，同时建立塔城专署和阿山专署，三区革命领导权转移到阿合买提江等进步人士手中。

○ 1948年　10月6日，阿什哈巴德发生强烈地



震。

○ 1949年　7月15日，中国新疆省政府与苏联就《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草案达成协议。

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试验场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同年，哈萨克斯坦的埃基巴斯图兹特大型煤田开始大规模开采。

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苏联中亚地区同新疆的关系进入新阶段。

○ 1950年　2月14日，中苏秘密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书，规定中亚和新疆不对第三国开放。

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在新疆合办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

4月19日，作为《中苏贸易协定》的附件的《新疆出口土产临时规定》在莫斯科签署。

12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哈萨克史学界的“民族主义错误”。后来，批判扩大到中亚各共和国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学术领域。

○ 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去世。

8月12日，苏联在塞米巴拉金试验场成功地爆炸第一颗氢弹。

○ 1954年　2月，勃列日涅夫出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

3月2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等地大规模开垦荒地。

○ 1955年　1月1日，中苏合办的新疆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的苏联股份完全移交给中国。

8月，勃列日涅夫担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至1956年2月。

1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宣布向阿富汗提供援助。

○ 1956年　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会后，在历次政治清洗运动受迫害的人士陆续平反，30年代遭到镇压的中亚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陆续恢复了名誉。

同年，自1954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垦荒1990万公顷，由于大垦荒加上风调雨顺，哈萨克共和国谷物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350万吨。

○ 1957年　1月9日，苏联政府决定允许在卫国战争期间被强行迁徙到中亚等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返回家园，并且恢复其民族自治行政区，但是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不能返回故土。

6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巩固其苏联最高领导人地位。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在全会上发言一致支持赫鲁晓夫。

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基地发射成功。

○ 1958年　3月29日，苏联在拜科努尔基地发射洲际导弹首次获得成功。

○ 1959年　1月1日，苏联进行人口普查，中亚地区总人口为2297.7万，成为苏联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3月，拉希多夫出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7月29日，哈萨克斯坦铁米尔套钢铁联合企业发生大规模工潮，事件延续了几天。

○ 1960年　7月3日，中亚第一座大型高炉在铁米尔套投产，标志卡拉干达钢铁联合企业诞生。

7月，苏联撤出在中国（包括新疆）工作的全部专家，中苏关系

恶化。但当年新疆同苏联的贸易额创出新高，次年起连年下降。

10月24日，拜科努尔试验场发生导弹发射重大事故，苏联战略火箭部队总司令等数十人死亡。

○ 1961年　4月12日，加加林乘坐宇宙飞船从拜科努尔成功升空，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太空旅行。

○ 1962年　4月中旬至5月底，中国新疆发生边民大规模逃往苏联中亚地区的事件，共有六七万人外逃。6月，苏联关闭其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

同年，中苏贸易协定废止，新疆与苏联间的贸易锐减。

同年，卡拉库姆大运河三期工程竣工，阿姆河水引至阿什哈巴德。

○ 1963年　2月，中亚地区原有16个经济行政区调整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两个大经济行政区，到1964年12月取消。

同年，乌兹别克共和国植棉162.8万公顷，籽棉产量达到创纪录的368.9万吨。

○ 1964年　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2月7日，库纳耶夫担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1965年　9月底，苏联决定实施新体制改革以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

同年，中国新疆与苏联中亚间的水陆口岸陆续关闭，只剩下霍尔果斯一地。

○ 1966年　4月26日和5月9日，塔什干连续两次发生强烈地震。

同年，哈萨克斯坦的大型油田——曼格什拉克油田开始采油。

○ 1967年　9月1日，苏联政府正式撤销斯大林时期对克

里米亚鞑靼人的指控，但不同意他们返回克里木半岛居住，只能在中亚地区就地安置。

○ 1968年　　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5000余名代表聚集莫斯科请愿，要求返回克里木半岛，开始了争取返回家园、重建自治共和国的长期斗争。

同年，土库曼共和国特大型沙特雷克天然气田开始大规模开发。

○ 1969年　　4月底，在塔什干举行足球赛期间，乌兹别克观众和俄罗斯球迷发生大规模斗殴。

8月13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新疆裕民县铁里克奇哨所附近发生武装冲突，中方遭受重大人员损失。

9月11日，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周恩来和柯西金达成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协议。

○ 1970年　　1月1日，苏联进行人口普查，中亚地区总人口为3280.1万人，比1959年1月增加42.8%，再次成为苏联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 1972年　　6月15日，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载文点名批评共和国一名院士，掀起对中亚思想文化界民族主义的新一轮批判。

○ 1973年　　7月17日，阿富汗发生政变，苏联对达乌德新政权予以大力支持。

○ 1976年　　中亚各共和国开始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

○ 1977年　　10月7日，苏联通过新宪法。

○ 1978年　　4月13~20日，中亚各共和国通过新宪法。

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兵变推翻达乌德政权，苏联大力支持新政权。

12月5日，苏联和阿富汗签订友好睦邻合作条约。

○ 1979年　中亚地区最大的水力发电站——瓦赫什河上的努列克水电站全面竣工。

12月27日晚，苏联特种部队杀死阿富汗领导人阿明。12月28日凌晨，苏联大军越过中亚南部边界大举入侵阿富汗，扶植卡尔迈勒上台。苏联的入侵遭到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坚决反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 1982年　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 1983年　10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因涉案受查，突然发病去世。

○ 1984年　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不久，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同年，中亚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埃基巴斯图兹国营地区一号电站全部投产。

○ 1985年　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11~12月，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易人。

○ 1986年　12月16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退休，俄罗斯人科尔宾当选为哈共中央第一书记。12月17日，阿拉木图爆发抗议科尔宾就任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和骚乱，事件持续了两天。

○ 1987年　7月23日，苏联宣布在最高苏维埃成立克里米亚鞑靼人委员会，最后有十多万鞑靼人回到了克里木半岛。

○ 1989年　2月15日，苏联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最后一支部队越过边界，返回中亚驻地。

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两国关系正常化，新疆与中亚的关系迅速恢复发展。

5月，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为哈共中央第一书记。

6月3~12日，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州乌兹别克人与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发生大规模武装械斗，造成重大伤亡。

○ 1990年　2月11~17日，塔吉克共和国首都杜尚别发生大规模骚乱，造成100多人伤亡。

3月下旬，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自由选举结果揭晓，中亚五个共和国共产党均以压倒优势获胜。

3月24日，卡里莫夫当选为乌兹别克共和国总统。6月20日，乌兹别克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

4月24日，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为哈萨克共和国总统。10月25日，哈萨克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

8月22日，土库曼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10月27日，尼亚佐夫当选为土库曼共和国总统。

8月25日，塔吉克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

○ 10月28日，阿卡耶夫当选为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12月15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并改国名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 1991年　3月17日，在全民公决投票中，中亚各共和国均有90%以上的投票人赞成保留联盟。

8月19日，苏联发生试图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纷纷谴责政变。

8月27日，吉尔吉斯共产党解体。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

9月1日，乌兹别克共和国宣布独立，并把国名改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9月14日，乌兹别克共产党改组为人民民主党。

9月7日，哈萨克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

9月9日，塔吉克共和国宣布独立。9月21日起，反对派持续举行反对共产党执政的大示威，局势混乱，直至10月6日暂时平静。11月24日，原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纳比耶夫当选为总统。

10月27日，土库曼共和国宣布独立，并把国名改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11月19日，土库曼共产党改名为民主党。

12月10日，哈萨克共和国改国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6日，哈萨克斯坦正式宣布独立。

12月13日，中亚五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入独联体。

12月21日，苏联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宣布成立独联体，取代苏联。

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